

阿古柏伯克传

[英] 包罗杰 著

7074

Demetrius Charles Boulger
THE LIFE
OF
YAKOOB BEG
ATHALIK GHAZI, AND BADAULET;
AMEER OF KASHGAR
London: W^M. H. Allen & Co.,
1878

内部发行

阿古柏伯克传
〔英〕包罗杰著
本馆翻译组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9 印张 215 千字
1976 年 5 月第 1 版 1976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 11017·368 定价: 0.85 元

出版说明

本书作者包罗杰(Demetrius Charles Boulger,1853—1928年),曾毕业于肯辛顿普通中学,以后自修,从事著述,是英国殖民主义的一个代言人和辩护士。

从1876年开始,包罗杰专就英俄、英法在亚洲争夺等问题于英国各主要报刊和杂志发表历史和政论文章。1885年出版的《中亚问题》就是他这一时期发表的文章汇编。包罗杰一生著作很多,主要有《英俄在中亚》、《中亚人物志》、《中国历史》、《印度史》、《刚果国家》、《比利时史》等专著以及《戈登传》、《马清臣传》等传记,所有这些著述,都是为英国帝国主义政策服务的。1878年(阿古柏政权覆灭的第二年)出版的《阿古柏伯克传》,就是包罗杰为了密切配合英国对中亚以及我国新疆地区的侵略需要而写的一本书。

《阿古柏伯克传》是一本叙述阿古柏生平的传记。作者通过阿古柏的一生活活动,对阿古柏入侵新疆、建立反动政权及其最后覆灭的经过,都做了较为详细的叙述。书中也叙述了阿古柏政权与英国、俄国的关系,以及英俄两国侵略势力于中亚角逐和在我国新疆争夺的情况。

阿古柏是浩罕的政治野心家,1865年,乘我国新疆少数民族中的一些地方势力反清运动的时机,侵入新疆地区,在血腥镇压新疆各族人民的基础上,建立起反动政权,对新疆各族人民实行野蛮的掠夺和残暴的统治。为了维持其反动政权,阿古柏先后同英国、俄国进行了一系列勾结,与英俄侵略者非法订立商约与协定,大批出卖我国新疆地区的权益。阿古柏是个英、俄帝国主义的走

狗,是新疆各族人民凶恶的敌人。

但本书作者站在英国殖民主义者的立场上,对这个穷凶极恶的入侵者阿古柏,大加吹捧,百般赞扬,说阿古柏“确是一个很能干很有胆略的人”(见本书序言),是一个“几个世纪以来出现于这些汗国中的最奋发和最有才能的统治者”(见原书第168页),完全歪曲了历史的真相。尽管作者为了掩饰其对阿古柏的同情与赞赏,说他对阿古柏的评价是“从不偏不倚的立场看问题”(见原书第256页),但仍然掩盖不住他作为英国殖民主义辩护士的本来面目。他在序言中直言不讳地供认,阿古柏是英国政府“在克什米尔以北土地上所树立的英雄”。这不仅说明了阿古柏政权是英国殖民主义政策的产物,而且也暴露出作者颂扬阿古柏的反动立场。

本书用较多的篇幅,叙述英国政府为了侵略我国新疆,并抵制沙俄势力南侵,对阿古柏入侵政权一直采取积极支持与庇护的态度,派遣特务、外交使团去与阿古柏谈判,提供大批军火,非法承认阿古柏政权,订立通商条约,攫取了我国新疆地区的大量权益。这本是人所共知的事实,然而作者在书中却说,英国政府和阿古柏政权的关系,仅仅是“泛泛之交”(见原书第234页),“并没有联盟,也没有坚定不变的友谊”(同前),极力为英国侵略我国新疆开脱罪责。

作者在本书的最后一章中,还总结了英国政府扶植阿古柏政权的经验教训,为英国殖民主义者出谋划策。在包罗杰看来,英国因支持阿古柏政权而在贸易上的所得比承认阿古柏政权而在政治上的所失,两者相较,是得不偿失的。他建议英国政府要利用俄国侵占中国伊犁而造成中俄关系紧张的时机,求得中英之间的谅解,以便中国和英国“一起去抵制俄国的过分扩张”(见原书第299页),并进而从中国得到“好处”。

正由于作者站在英国殖民主义者的立场,从与沙皇俄国相互

爭奪的角度出发，书中对沙俄侵略者与阿古柏政权的关系以及俄国侵略我国新疆地区的一系列活动，有一定的揭露。尤其本书在出版之时(1878年)，清朝政府为收回伊犁正与俄国进行交涉，因而作者对沙皇俄国侵占我国伊犁和中俄两国有关伊犁交涉的部分情况，记述得较具体，这对我们研究十九世纪后半期沙俄侵略我国西北地区的历史，提供了一定的材料。总之，本书对我们研究阿古柏入侵时期的新疆历史，以及十九世纪后半期的英俄关系与中俄关系，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最后，还应指出，由于作者对中国历史缺乏研究，书中有关中国历史的记述谬误甚多。不仅史实有出入，而且人名、地名、术语等等也有错误，我们作了一部分注释更正，不尽之处，希读者指正。

索引页码为原书页码，已依次排在中译本切口一边。



目 次

第一章	喀什噶尔地理概述	3
第二章	喀什噶尔种族概述	14
第三章	喀什噶尔的历史	20
第四章	中国征服喀什噶尔	34
第五章	中国人在喀什噶尔的统治	44
第六章	阿古柏伯克的出身及其在浩罕供职期间的经历	62
第七章	布素鲁克汗和阿古柏伯克对喀什噶尔的入侵	75
第八章	对东干人的战争	98
第九章	阿古柏伯克的喀什噶尔政府	112
第十章	阿古柏伯克的对俄政策	141
第十一章	阿古柏伯克和英国的关系	172
第十二章	阿古柏伯克和中国的最后一战及其死亡	192
第十三章	中国人重行征服喀什噶尔	210
第十四章	中亚问题中的中国因素	225
附录		
	罗布泊的位置	244
	中俄条约(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	248
	英国与克什米尔协定	251
	俄国与喀什噶尔条约	255
	英国与喀什噶尔条约	257

管理东土耳其斯坦新路线联合专员办事规则	263
来自喀什噶尔的故事	266
索引	268

第一章 喀什噶尔地理概述

1

喀什噶尔国包括东土耳其斯坦即中国土耳其斯坦的西部，其轮廓曾被人划为北接西伯利亚，南接克什米尔高山，东接大戈壁，西接“帕米尔高原”的草原，这种说法虽然一般说来够正确了，但在了一本较详细地讨论那个地区的著作中就需要作较详尽的说明。严格说来，喀什噶尔这一名称只指一个城市，直到马可波罗时代之后，由于在这整个地区中这个城市人口最多、最富有，这个地名才用来表示邻近的地域。正确的名称是小布哈拉或东土耳其斯坦，中国人称之为疏勒。晚近的作者们曾称阿塔勒克哈孜的疆域为喀什噶里亚。这个名称当然扩展到中国土耳其斯坦的一大部分，比喀什噶尔过去任何时代的当地人统治的地区为大；当然中国的统治除外。上面所举关于喀什噶尔疆界的轮廓说它北接西伯利亚，那也是错误的，因为有准噶尔或蒙兀儿斯坦的广大地区介乎其间。在中国人统治下，准噶尔因其首府称为伊犁，现在在俄国占领下则称为固尔扎^①，这是同一城市的另一名称。这个颇广大而重要的地区，当中国人从他们在伊犁的军府统治这整个区域时，包括喀什噶尔在内，同属这一政区；但在1863年中国人的势力瓦解后，喀什噶尔最后落入和卓^②布素鲁克汗之手，准噶尔东部，包括天山南路库

① 指沙俄占领伊犁时，作者常用这个名称指伊犁地区或指该地区的首府。译文为保持原著面目，在作者使用 Kuldja 时即译固尔扎，使用 Ili 时，译为伊犁。希读者注意。（按：固尔扎原为伊犁河北岸金顶寺的名称，当地人以寺名称呼该地。）——译者

② 原为波斯语 kwāja，此处意为“圣裔”、“圣者”，一般都为世袭封建领主，但也常常是一个空衔；和卓家族在有些地方，兼有政权和神权，成为宗教贵族。——译者

车、喀喇沙尔、吐鲁番等城落入东干人之手时，俄国人占领了固尔扎即伊犁。固尔扎和喀什噶尔之间的界线很清楚地由天山划出，这个起实际作用的屏障把这块大陆从阿克苏到吐鲁番以及更远的地方划分为两个界线分明的部分。这样，东土耳其斯坦就北界天山，南边由喀拉昆仑山脉形成一面同样良好的屏障，介乎它与库希斯坦和克什米尔西藏之间。如上所述，西边帕米尔草原和东边戈壁沙漠形成明显而安全的防卫地区，以御这两方面外敌侵入。在亚洲，没有几个国土具有上面所说那样的界线分明的地理位置。大自然似乎把它形成为可以与世隔绝独立生存，依靠本身资源幸福繁荣，并不愁外界侵犯；但它的历史却具有忧患较多的特性，只在一些短暂的间息期，它的天然财富得到适当的利用而使它成为名副其实的“亚洲的花园”。多少世纪以来几乎一直战祸连绵的情况给这片国土的外貌留下许多显著的痕迹，它的人口之少就是再明显不过的证明。按最保守的估计也有二十五万平方哩的地区，最可靠的权威认为，人口不到一百万。喀什噶尔地区横向从东经 73° 到 89° ，纵向从北纬 36° 到 43° 。但喀什噶尔古国则一向被认为疆界只到阿克苏为止，那是离喀什噶尔城东北约三百哩的一个城镇。约五十年前，中国人给予浩罕一些贸易优惠时，这些优惠亦不适用于阿克苏以东；这一事实对于喀什噶尔旧王朝的公认疆界似乎是定论性的。这个地区有一个时期曾是当地统治者治下的繁荣王国，有一个时期是屈服于某一鞑靼征服者之下的纳贡的属国，接着又为这个鞑靼征服者的不肖后裔们的争夺所破坏，再以后则成为中国的一个属省；这个地区的首府也象这块土地本身的命运一样几经变迁。它有时是叶尔羌，有时是喀什噶尔，也有几度是阿克苏。但最后喀什噶尔似乎居于首位，因为，叶尔羌虽然仍是较大的城市，但阿古柏建都于喀什噶尔，以他的政府使该城闻名全亚洲。

喀什噶尔位处这个地区北部一个平原上，它建于一条小河之

上,该河名叫克孜勒苏河。城外不远即是山区,极目远望可见天山雪顶以及阿克赛高原。人口虽仅三十万,现在这个首府的市场和商队客栈颇有一种比其他任何城市活跃的气氛。近年来与俄国通商,给予该地以某种生气,但如果说有商人进来,不论来自浩罕或固尔扎,那也只有极少数的商人进入比该城更深入的内地。该城跨克孜勒苏河两岸,河上架一木桥;但无说得上外观华美或室内舒适之建筑。爱弥尔^①的斡尔朶即宫邸设在离城五哩的新城,这是一座气氛阴沉的大兵营,由几重建筑物组成,外层建筑物中住着侍卫兵员和宫廷官吏,最内部一座建筑则与其他建筑隔开,专供统治者个人的家族及后宫之用。与这一建筑物相连接的是一座接见大厅,供统治者隆重接见他要加以礼遇的外国人之用。在往昔,喀什噶尔一向是一个重兵把守的要塞,但它的旧日威力的仅存遗迹只是周围随处可见的一些破瓦残垣而已。因此,喀什噶尔现在是一个开放的、全无防御的城市,它完全听凭任何侵入者的占领,不论这侵入者是沿大路从阿克苏或巴楚而来或从浩罕或固尔扎越过山岭而来;但在离喀什噶尔南约五哩之处的新城,阿古柏伯克筑了一个要塞,他在那里藏放了他的全部财宝,这个要塞可以视为喀什噶尔的卫城,也可以当作是统治者的宫邸,新城既然是一个中亚统治者用极有限的财力所建的要塞,那就必须认为这是一座很值得称誉的军事工程。一个长时期以来不断地定居到喀什噶尔来的安集延和浩罕商人,特别在这个城市里形成了一个很重要的阶级,布素鲁克汗和穆罕默德·阿古柏之所以能够入侵,其最主要的助力正是这些商人。但据说,这些商人阶级对于以后的情况相当不满,这是由于阿古柏伯克没有实践诺言呢还是其他原因,那就不清楚了。如果说喀什噶尔在他的治下没有恢复到为马可波罗和更前的中国

^① 原意为统帅,伊斯兰国家中君主或酋长的称号。这里指阿古柏;阿古柏在1872年受土耳其苏丹赠予爱弥尔尊号。——译者

旅行家玄奘^①所赞赏的繁荣境况，那末也可以说已相当富裕，无逊于东西土耳其斯坦的任何其他城市，生命和财产都比我们所能列举的某些城市有保障得多。

在通到叶尔羌去的路上约一半路程处为英吉沙，这是在军事⁵上和贸易上过去一向都占重要地位的城市。它已大为衰落，但由于是一个军事重镇，也由于邻近土地的特别肥沃，它仍保有昔日的一部分威势。

叶尔羌，在喀什噶尔东南，直线距离约八十哩，但旱路要走一百二十哩，至今仍为东土耳其斯坦人口最多的城市。它位处叶尔羌河边开阔平原上，它的城墙周长四哩，足证它往日的强盛。在中国人治下它足可称为这一地域的最昌盛城市，据道格拉斯·弗赛斯爵士估计，就是现在也有四万人口，其四周地区则接近二十万强。那扩展成一条宽阔地带围绕着它的果园，给予这个地方以特别繁荣的气氛，十分可能就是这些果园使旅行者对当时的资源产生一种过于乐观的看法。除了运进城里来出售的果物和粮食的丰富产品以外，这里还有一宗大规模的、利润高的皮革贸易。叶尔羌对这种商品几乎具有垄断权，它的消费也确实很大。爱弥尔本人就每年要为他的军队取得大量皮革，不仅用来作靴子和马鞍，他的许多部队还用来作制服。

然而，叶尔羌虽然是这个富饶之区的主要市集，它的居民虽然是富裕而精力旺盛的，但目前有一种普遍的一致意见，认为自从首府迁到喀什噶尔，中国商人随着中国统治者一同消失之后，它变得不如以往繁荣，变得更象是农村市镇了。当地一个很聪明的商人在有人问起他对中国统治者和本地统治者的意见时，作了如下的回答，从这里可以看出，这对于把中国人视为较好的治理者的看法是特别有利的。

^① 原文作 Hwang Tsang, 想为 Hsuang Tsang 之误。——译者

“你现在在赶集的日子看见的情况，与‘和台’^①时代的生活和活动比起来完全不是一码事。今天，庄稼人拿了鸡和蛋、棉花和棉纱、赶着牛羊马匹进城来卖，回去的时候带着印花棉布、皮帽、城里做的靴子和各种他们需要的日用品走，肚子里还有一顿很好的饭菜；我们关上店门，把货品收好，等下个星期赶集的日子我们的主顾再来。在这期间我们中间有些人的确也带些东西到乡下的农村市集上去转转，可是我们的大买卖是在城里的赶集那天。在‘和台’时代，那就很不一样了。那时候天天都做买卖，逢到赶集的日子那就更热闹了。那时候没有大哈孜带着他的六个宗教警察拿着皮鞭打人，要人去做礼拜，把妇女从大街上赶走，那时也没有人因为喝酒和吃禁吃的肉而挨打。那时候还有演小丑的和弄杂技的，算命的和说书的，在人群里来来往往，给人解闷。在店铺门前挂着各种各样的旗子和图画；还有涂脂抹粉、穿着绫罗绸缎的美女接待取悦客人。”问到在那个制度下的风气败坏，是不是不能与阿塔勒克哈孜的严格穆斯林制度下的风气相比，这个证人接着说：“不错，也许如此。那时有许多流氓和赌棍，有些人喝得醉熏熏的，钱包叫人掏走了。可是现在也是这样，不过不那么公开罢了，因为现在是在伊斯兰教治下，教规是要严格遵守的。”

这是很形象的证言，比连篇累牍的文字说明更清楚地描画了两种统治制度；回到我们刚才谈的题目上来，这些话表示了自从中国人在十五年前被赶走以后，叶尔羌的财富人口都减少了。

和田位处叶尔羌东南一百五十哩，桑株以东约九十哩。它坐落于昆仑山脉北麓，是喀什噶尔地区最南的一个较重要城市。在中国人治下时，它是最繁盛的工业中心之一，并由于它是与西藏全

^① Khitay，维吾尔语，源出“契丹”，清文献作和台。这是过去新疆少数民族对汉人的称呼，有贬意。作者于本书中常使用这个词，以别于 Chinese 一词。译文为保持原著面目，遇到 Khitay 一词时即译作“和台”。——译者

部贸易的集散地，市面是很活跃的。中国人称它为和田，当地现在仍称为额里齐。它除了有来自西藏的羊毛和黄金以外，它自己也有蕴藏于昆仑山里的金矿，它的麝香、丝绸、玉是四处驰名的。它也因中国人之离去而受到打击；在这个城市里的情况也一样，对于那个不平凡的民族的精力和财富说来，阿古柏伯克所建立的严格的军事秩序和保安措施是一种很不完备的代替物。

乌什，或新吐鲁番，是喀什噶尔到阿克苏中途的一个小城，不可与较知名的吐鲁番相混，吐鲁番位处于远远的东边，在通往甘肃的大路上。后者叫做库纳吐鲁番或旧吐鲁番，以与前者区别。乌什本来从来也不是什么有头等重要性的地方，由于位处中国商队必经之路而取得相当大的优越性，阿古柏伯克在那里筑了几个要塞而把它变成了一个军事重镇。

阿克苏是喀什噶尔的古老首府之一，可以公平地称之为那里的第三个城市，虽然在“和台”被逐之后它也许比任何其他城市更为衰败。在那个事件发生之前，有一条道路经木素尔冰岭^①通伊犁，置有驿站，长年雇用民夫维修这条不易修筑的道路，使适于人马通过。但现在这一切都已中断了好多年，不仅道路已不能通行，要使它恢复到往昔的可用情况就需要大量人工和费用。这个城的附近有许多富矿：铅、铜和硫。实际说来，这些矿藏近年来已无人过问。煤也是居民的日常燃料；无论就智力而论或就俗世的兴盛而论，阿克苏的善良居民一向有资格在喀什噶尔人之间居首位的。由于木素尔山口被阻断，以往与固尔扎进行的贸易已完全绝迹，与这个俄国地区的全部交通遂经由纳伦山口而通到威尔尼^②。这一变化对喀什噶尔城有利，但对阿克苏是决然不利的。阿克苏现在也许还有资格列为一个重要地点，并且在很偶然的条件下也许还

① 木素尔意为冰，天山主要高峰之一。——译者

② 即阿拉木图。——译者

可以重行获致它已失去的地位。总之,我们只可以说,阿古柏伯克已把它的古老的城堡改造成要塞,据说这些要塞能够抵御现代化的炮火。

我们已列举了六座城池——喀什噶尔、英吉沙、叶尔羌、和田、乌什、阿克苏——这几座城市组成喀什噶尔本部。曾有一时,它所以称为阿尔图沙尔,即六城,就是由于这一事实。在这几个城市之外还可以补充一点的是,在现代喀什噶尔,最西南边还有一个地点,叫做色勒库尔,或称塔什库尔干,主要由于是与阿富汗接境处的第一个据点而具有重要性。色勒库尔附近为巴达克山和瓦汉,有人认为,阿富汗的希尔·阿里对于喀什噶尔的势力伸到这一地区是侧目而视的。很可以肯定,他不会容忍阿古柏伯克似乎在某些机会上想进行的沿帕米尔再向前推进。色勒库尔控制巴拉吉尔山口的北口,因此近年来谈到这条通印度的道路时常被提及。

玛喇尔巴什,即巴楚,是一个有相当兵力的军事据点,在战略上是重要的,因它位处于从喀什噶尔和叶尔羌来的两条道路的汇合点上,从这里又沿叶尔羌河通向库车。但使我们更感兴趣的,它是那个极特殊的部族朵兰族居住地区的首府。这个部族的智力处于可能想象的人类所能达到的最低智力状态中。他们的体力和身材也许是地面上最糟糕的了,而他们的社会地位则更为可怜。他们有些风俗习惯具有最为令人厌恶的性质,他们的居住之处是最粗陋的,是一种地穴。在较大城市里见到过他们的旅行者说,一切关于他们的传说都没有夸大真正的事实;最为可怜的一种情况是,他们自甘低微,憎厌任何为求改善他们的处境的措施。他们曾被人比之于西藏的布提亚人(藏人),但与他们相比,布提亚人是优越得多了。所以邻近的部族都以轻蔑和讥笑对待他们。

库车是(应该说过去是)另一个很繁盛的城市,在中国人财富被损毁,以及后来东干战争的纷扰之后,至今没有得到恢复。有一

那个时候，库车至少有五十万人口，在资源财富和人民才智方面其名不声不在阿克苏之下。但现在它几乎是一个荒城。旧城的大部分是一堆废墟，东干人被阿塔勒克哈孜击溃以后九年的时间中，对于恢复这些破坏力很强的战事所造成的损毁，可说什么也没有做。

库尔勒或如过去称为库珑勒，以及喀喇沙尔，这两城在库车之东，同样从来没有从这整个地区所经历的混乱和流血时期之后得到恢复；但即使这些地方的情况，和在吐鲁番所造成的更为严重的破坏对比起来，还算是很好的了。在过去吐鲁番也许比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其受益于与中国贸易，因为它本身虽然不象阿克苏或库车那样富足，但它由于是一切从东到西或北行往乌鲁木齐和楚呼楚^①的车队的休憩之地，而得到一定的收益。车队常常在那里停留几个星期，商人在那里要作全部仔细的安排，才能越天山而去古城或者渡沙漠而去哈密，因此吐鲁番就大为繁盛起来。现在它的街道都荒凉了，它周围整个地区成为荒漠，它以往的活跃和繁荣都已全部消失。阿古柏伯克曾把他的统治伸展到吐鲁番之东不远处，叫做七克台的地方，但吐鲁番可称为他的最东部的领地。

我们现在可说已对喀什噶尔的主要城市作了相当细致的描述，在这样做时我们明确地致力于让读者获得一种印象，在不久前这个统治者的治下只有这些城市及其郊区是较富庶的。对于曾经到过喀什噶尔的人，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从叶尔羌到喀什噶尔这一地带上的农田极其繁荣景象；但同时，这种花好叶茂的景象只是使中间的和邻接的地区的荒凉更显突出而已。这些农田的确面积不小，但一片一片互相隔绝，大片农田的四周围着李子、苹果和其他果树，农田完全隐藏在那些果园中。一个喀什噶尔村子并不是一条大街、一列农舍再加上一些大农庄；它是一大片一大片农庄的集合，占着很广大的地亩，在一个外来者看来，与其说是一个农村社

^① 即塔城。——译者

会不如说是一个人口稀少的地区。再者,虽然土地本来是肥沃,但农作方法是消耗性的,似乎很可能每一农庄的土地只有一小部分是有一点生产力的。但这些表面上总算具有农村的幸福和纯朴外观的居住区,也只是极大的荒芜不毛之國中一些绿洲而已。即使每一个业主似乎拥有比他所需要的更多的地,即使肥沃的土地能使耕作得不很好的庄稼丰产,耕种面积的总量确实仍极为有限。更不幸的是,土质逐渐衰竭;更由于只种一种庄稼的制度似乎在居民心里根深蒂固,这种制度恐怕会永远保存下去,致使地力永无恢复的希望。还有一个一直存在的困难须克服,那就是供水量的微小。这个地区的一般情况是荒芜不毛的,荒凉的旷野向四面八方伸展,远处三个方面高山的轮廓构成全景。除了中国人留下了他们曾在这里住过的持久不变的标记的地方以外,在每一个方面都只有隐约可见的马行小道,表示这是大路的旧道,这种小道难于引诱旅行者进来;他们如果进来了,那他们也一定不能期望有什么较好的东西,只有一个落后的亚洲地区所能提供的最不完善的交通手段和供应而已。如果我们要想象从桑株到叶尔羌的沿途景色,我们只须去看一看苏塞克斯林原的某一片荒原,那就是它的一个缩影。在中亚平原上,瘦弱的干瘪的植物是更其稀少,灰石则更其突出;狂风使你想到那是从沙漠或高山地区刮来的;但你所看到的起伏不平的、干旱的荒野正象你站在克劳巴勒之上看到的一样。只有柯尔克孜^①牧人看守的可怜的羊群会迫使你想到你身在远离英国南部丘原的高原地区。远方,你可以看见桑株达坂或果沙尔布仑山云雾弥漫的峰顶,那时旅行者就不得不记起他身处世界上最难到达的一个地方。但是,如果说这些南行的道路不值一提,那末从喀什噶尔通阿克苏、库车、库尔勒、喀喇沙尔和吐鲁番的大路则是筑路工程的杰作。它尽可以大胆地与罗马帝国的大路相比,这

^① 清代文献称为布鲁特。——译者

是中国人在治理国家方面的毅力、技巧、能力的不可磨灭的纪念碑。在中国本部有许多大规模的重要大路，但在那边，这个任务由于有可航行的大河而容易得多。在东土耳其斯坦则没有这种辅助手段，因此，维系从中国到准噶尔、喀什噶尔、浩罕、布哈拉全部交通的这条道路必须保持高度畅通。要做到这点，我们不容怀疑，是一件费用极为浩大的工作，至于象木素尔山口那样特殊的工程那就更不必说了，这一工程之能取得保持一世纪多的成功，需要有非常完善的工作组织。

喀什噶尔的地理位置的一大缺陷是无法获致一种低廉而方便的通过河道的出口。但如果有一个较完备的灌溉系统，这个地区本身在这方面的损失就会较小，象阿图什河等河流，春季从山上带下的雪水无论如何就可以对喀什噶尔西部全境更广泛地供水。当地气候平稳，居民没有什么特别流行的病疾，只有比较多山的地区及叶尔羌常发生甲状腺肿大症。居民本身似乎是勤俭诚实的，但在这一个“中心地区”可以遇见那末许多种族，因此就很难对所有的种族作出普遍适用的描述了。安集延和浩罕商人是这个社会中最富有的阶级，从各方面讲他们似乎在买卖上具有高出一般以上的事务能力。塔兰奇人是中国人在 1762 年迁移到固尔扎去的喀什噶尔劳工的后裔；在军队里和政府里都还有许多“和台”人留着，准予他们背着人信奉他们自己的宗教。旁的种族都对他们不怀好感，把一切能够想象的罪恶都归于他们。但这些“和台”人却能在这个地区隐蔽起来，虽然他们在男性居民中形成一个很重要的少数集团，但当他们的从中国来的同胞逐渐迫近时，他们并没有被人当作是可能的危险人物。除喀什噶尔当地人和上述两个重要成分以外，还有许多从毗邻国家移入的人，特别是从浩罕来的，对于浩罕人，阿古柏当然表示特别优待。我们现在已对喀什噶尔的地理特点作了较详细的描述，接着就要就这一地区的种族方面作一描

述，并对过去情况作历史叙述。希望这些导论性的章节能够澄清一些模胡看法，使人对这位已故的阿塔勒克哈孜的生涯作出一个正确评价。

喀什噶尔在亚洲，可说是所处位置具有巨大优越性，并拥有很可观的资源的一个部分；但由于极不幸的遭遇，除近代中国人统治的短时期以外，内乱使它混乱衰败，一年比一年退化。十分可能，它的自然财富被人过于匆促地认为当然会有的，同时它又不具备必要的手段使自己能在某种程度上恢复到以往的状态。这是十分可能的假设；但我们所得到的最可信的资料却指向一种更可信的结论，使我们有理由认为，喀什噶尔的位置、自然资源、一般情况将会促使一个强有力的、安定的统治把它培育成一个真正具有重要性的、繁荣的同盟者。

第二章 喀什噶尔种族概述

从里海和黑海到克孜勒牙尔特山和帕米尔高原，从波斯湾到西伯利亚，几世纪来雅利安族和土兰系两大种族在这片广大土地上争霸。后者包括了这个地区里强悍好战的部族，终于征服了那些自称与欧洲各民族同系的种族。塔吉克人或波斯人就是这一地区中雅利安人的主要代表，到现在已有几个世纪成了西土耳其斯坦不同地区突厥统治者的臣民。突厥人则是土兰系的代表。塔吉克人之所以表现得安分顺服，与其说由于征服者在战争艺术上高过他，不如说他们自己爱好和平和无损于人的生活。除在兴都库什山脉的高山地区里，纯粹的塔吉克人在亚洲任何地方已不多见，其外表是体态端庄、长须飘逸、鹰鼻而巨眼。一般都身高貌美；在浩罕和布哈拉，当地人之视塔吉克人还很象诺曼人之视撒克逊人。在那些地区，一个人也是以种族来区别。如实际情况，他被称为乌兹别克人、乞卜察克人、柯尔克孜人、或塔吉克人；这样，往昔的敌意以某种程度保存至今。由于血统差别的外在表征所造成的不和，或是说得更恰当一些，不同种族间任何同情的被摧残，使西土耳其斯坦成为出名的内乱不息之处，这种内乱又反过来成为帮助俄国人的阴谋和俄国人的势力促使那些汗国解体的原因。在东土耳其斯坦，种族间的敌视没有那样严重，最可以说明这一点的是，在那里人是按照他的出生居住的城市来区别的。他可以是一个塔吉克人，或乌兹别克人，或柯尔克孜人，或乞卜察克人，但他只以叶尔羌人或喀什噶尔人为人所知。东西土耳其斯坦两地的居民习惯，从而居民的感情，有这样巨大而显著的区别，颇使我们惊讶，但

只须稍加探究，也就可以看出，不同民族间的恶感，比起在浩罕及其附近各汗国来，在喀什噶尔则更已成为过去的东西。无论如何，在这个地区里还存在的民族恶感，也明显地应溯源于其他原因而不是雅利安族与土兰系之间的敌意；那种恶感无疑是或由于宗教狂热，或由于个人野心，或由于以中国人为一方，以浩罕人为另一方，为争夺对喀什噶尔的统治而挑起的仇恨所造成。把这些事实清楚地记住，就可以明白，种族描述并不会把这个国家各民族间的政治关系说得更易于了解；但作为具有历史意义的事实，这种描述亦不应完全略去。

现在被人称作准噶尔和东土耳其斯坦的这些不甚为人知道的地区上的居民，不久以前还被人认为是纯粹的鞑靼族，因此也是土兰系的成员。现在还有一些人相信这个定义是极正确的，另一些人则以不同根据加以驳斥，似乎可靠性较大。没有问题，这里的原居民从历史上说是维吾尔人，这一民族确乎是鞑靼族。^①但在中世纪早期与喀什噶尔贸易的塔吉克商人频繁地在这个国土上定居，于是在维吾尔原居民世系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一个塔吉克移民的大殖民区。这些塔吉克人渐渐鞑靼化了，但他们仍保持着确实无疑的雅利安族的特点。施拉根瓦特两兄弟，以及步他们后尘的沙敖先生，是最早主张这一看法的，这种看法正在得到普遍的承认。这样，我们不但在喀什噶尔看到塔吉克人与他们与之杂居的土兰系人不是同一种族的奇怪现象，并且还可看到一种民族间的宽容态度，那是亚洲任何其他地区所没有的。无疑的，定居的和平的安集延移民和喀什噶尔居民对于秉性难移的柯尔克孜人的敌意是根深蒂固的，只要后者继续是威胁一切和平社会的危险根源，这种敌意就不会消失；但即使是这种感情，以及各个时代佛教徒和伊斯兰教徒的政治交往中表现出来的宗教仇恨，也没有西亚部族间持久不衰的

^① 维吾尔族古称“回纥”、“回鹘”等。——译者

种族恶感那样顽固，今后并可大为改善。喀什噶尔六城的绝大多数居民是塔吉克人的后裔。几世纪以来，他们的血统的纯粹性已由于在蒙古统治和中国人统治下大量地与鞑靼血统交混而减低。在这两大族系之上，还有许多阿富汗人和巴达克山人的移民，每当事态的进程暗示在这个国土上从军为有利可图时，他们就涌入喀什噶尔，他们之中有许多就定居下来，他们也就在居民的外表上留下明显的印记。然而，如果要探讨雅利安族从兴都库什山区和西亚平原向喀什噶尔这个更闭塞的草原地带大迁移，那我们就得追溯到史前时代，或者肯定地要追溯到已经消失在历史迷雾中的时代；那次大迁移发生在土兰各族象破坏性的蝗虫群那样，最初布满在这块大陆上的时候。和田就是在这个时候建城的，这个地名就表示它来自雅利安人。

柯尔克孜，或如俄国人把他们称为喀拉吉尔吉斯，以与其他柯尔克孜部族相区别（其实那些部族完全不是柯尔克孜人），这个大游牧部族一向都在浩罕、准噶尔和东土耳其斯坦的历史上扮演一个不定的、但又重要的角色。这个部族在位处伊塞克湖以西的难于进入的地区，沿克孜勒牙尔特高原和山脉保持他们的独立地位，一向是骚扰他们的任何邻邦的祸源。在许多场合，他们也间或在他们习以为常的劫掠本行以外从事征服，在他们中崛起过为数不多的几个大首领人物，在这几个人物的领导之下，他们也曾在东西土耳其斯坦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但他们的成就从未具有过持久的性质。他们的战斗力系由一群无纪律的、非正规的骑手所构成，他们的主要力量也就在于勇猛而坚决的袭击。他们没有完成任何长期性征服所必需的组织和本领。他们的入侵，即使是最为令人生畏、最为势如破竹的，那也仅只是劫掠烧杀。他们的目的是劫掠，而不是帝国；获得前者之后，对于后者就不重视了。在一个时候，他们几乎所向无敌，为所欲为；但是，当一些定居的政府在他们

的堡垒周围建立起来,限制了他们的用武之地时,过去曾由于他们爱好惊险而形成的冒险生活,那时就成为仅仅为了图存的挣扎了。¹⁸柯尔克孜人居住之地过于贫瘠,使他们有限的人口也无法终年维持生活;这样他们就每年必须出去和有准备、有纪律的敌人作战,去觅取维持生存所必须取得的生存资料。如果没有那些慢慢地消蚀亚洲那些国家的生命力的内讧,柯尔克孜人无疑地已逐渐灭绝了。然而,他们很快地掌握利用这些内讧的本领,向出价最高的一方以当兵为方式出售他们的服役;他们在勇猛上虽然比不上乞卜察克人各部族,但人们很重视与他们结盟,在许多紧要关头足以转危为安。通过这种办法,他们生存下来了,现在他们仍旧还是执行着同样的职能,他们的邻人大体上还象过去那样看待他们。

乞卜察克人,另一个大部族,虽然在喀什噶尔并没有什么作为,自称为乌兹别克人中最优秀的一支,但他们的盛世已经过去了,至少现在是如此。三十年前是他们的极盛时代,但他们激起了乌兹别克其他部族和柯尔克孜人的忌恨。由于他们的杰出的首领穆斯林·库里的才能,他们在浩罕成功地建立起了一个强大的国家,力能制止那时是从前的汗国的大敌布哈拉的侵扰。但1853年发生反对他们的阴谋,与俄国进驻锡尔河地区相配合,终于取得了成功,穆斯林·库里被杀,乞卜察克人的势力就完全瓦解了。然而,这以后出现了几个更为突出的领袖人物,如阿里姆·库里和阿布都拉赫曼·阿弗托拔查,都是这个部族的成员。阿古柏伯克统治下的东边部分几乎完全为加尔梅克人^①,或是说加尔梅克血统的¹⁹部族所居住。满洲和准噶尔居民的绝大多数为加尔梅克血统的,甚至俄国欧洲部分,在伏尔加河和顿河流域也有许多这个部族的居住区。然而,加尔梅克人大都没有什么政治上的重要性,除了居住在戈壁以北以及东土耳其斯坦与中国之间这一地区的那些以

^① 即准噶尔或厄鲁特人。——译者

外，这部分加尔梅克人的主要部族是喀尔喀人。加尔梅克人由于古老的关系而依附北京政府；他们虽然有时也起来反抗中央政府，并且常常造成扰乱，但他们通常总是向中国当局认罪投降的。在东干族叛乱中，加尔梅克人仍效忠中国，在不同情况下作出了很得力的贡献。驻在东土耳其斯坦的中国军队主要从加尔梅克各部中招募，这些部族在宗教上、在对于中国政府的忠诚上都不同于东干族，因而显著出众。

东干族的起源是众说纷纭的；在中国失去喀什噶尔和伊犁的事件中，以及在阿古柏伯克的统治的历史中，东干族扮演了那末重要的角色，那也就必须较详细地向读者介绍一些事情的实况。我们相信，中国人使用东干族这一名词时意味着穆斯林教徒，^①那是没有问题的。以同样理由可以假设，“和台”这个名词一般用来指佛教徒，而这个词的实际意义就是中国人。我们如果承认这两个说法为正确，——而且就我们所能肯定的，最权威的人士是采用这两种说法的，——那末就没有什么不能说明东干族是什么人的困难了。承认上面的说法，那末东干族就是中国东部的穆斯林臣民。但另有些人认为东干族是一个独立的民族，有特有的种族标志。

20 按这种说法，东干族可以追溯到五世纪、六世纪时的一个独立社会，那时他们定居在天山山脉一带，其首府为喀喇沙尔。一般认为，普尔热瓦尔斯基上校主持下的最新的考查中一般认为，并没有表现出这个地区有过什么重要城市。在这里可以顺便一提，在那时他们是佛教徒；但是，当伊斯兰教在八世纪时在亚洲广为传播时，他们是属于最早改信这种新宗教的人之列的。这种对中国人宗教的背叛导致他们与北京的皇帝发生冲突，于是许多东干人被迁徙到甘肃和陕西，在那里我们应假设他们仍旧继续是一个独立民族，有他们自己的宗教和他们自己的道德规范，这样继续了十个

^① 东干为俄国人对中国回族的通称，并非指所有的穆斯林教徒。——译者

世纪多。历史给我们指出，这种新宗教是在刀尖所指之下强加在他们头上的，即使承认对于一种新宗教可以有这样一种确立不移的态度，那也似乎很难令人信服，为什么在中国历史中关于这个麻烦的部族我们不能再听到些什么。在皇帝的诏书和其他官方文告中常常也提到东干族，但总是只提及他们的宗教，除了说他们是异端的中国人之外，也没有其他的问题。此外，即使是这样的提及，在十六、十七世纪以前也很少谈到东干人；直到那时候，仅由于在东干人中间出现了成为佛教政府的敌人的传教者，中国皇帝才对他们采取了极严厉的措置。认为东干人是一个民族而不是一个教派，这种理论是新的，但也许可能是一种正确的发现吧。从另一方面说，更可能的是：这只是一种机巧的企图，为了要说明那些表面现象只是很简单的事情。在这两种说法之间，读者只有自己抉择了。如果东干人被认为是一个独立民族，那末东土耳其斯坦的大部分居民就不是加尔梅克人，而是东干人；如果采用本书所采取 21 的看法，那末东干人就是在不同时期皈依伊斯兰教的加尔梅克人，东干人是中亚的这个部分上的主要部族；请记住，在本书后文中，“和台”专指佛教徒或统治阶级，东干则指甘肃及其以外的属地上的穆斯林或臣服种族。由于种族恶感在近代并不象宗教那样强烈地影响即将加以探讨的这个地区的民族争端，关于东干族这一名词的真正意义的不同看法对于总的问题的看法是没有什么实质性影响的。

第三章 喀什噶尔的历史

叙述喀什噶尔的历史的巨大困难在于，须从这个国家存在以来近二千年中接连不断的多次征服和臣服之中，把它的一些主要史实整理出来，使它较近的情况易于为我们所理解，而不赘述一些意义不大的人名，扰乱读者的思路。我可以在开始时预先声明，希望对喀什噶尔获得一个完整无缺的历史叙述的人必须去读一读道格拉斯·弗赛斯爵士关于出使叶尔羌的正式报告中贝柳医生所写的部分。他们可以在那里得到关于在中亚这个区域自公元以来发生的事情的详述；但是，仅仅各种不同的灾难的复述，中间夹着一些繁荣的短暂间隔时间，每一转折都与前一周期如此相似，那是不会符合我们目前的要求的，我们现在探讨它本身历史，为的是很好地了解它与邻邦和中国的关系，这个为阿塔勒克哈孜所缔造的国家是怎样在几乎无法探索的古代遗留下来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

九世纪以前，有很长一段时间中华帝国扩展到与浩罕和克什米尔接境的地方。但唐代末叶的变乱不久就使这个大帝国的极边地区很容易就产生虚弱状况，使那些臣服的民族及其原有的统治家族能重行获得他们的人身自由或已失的地位。但不幸的是，与中国脱离关系之后并未使他们命运有明显可见的改善；实在说来，几乎无例外地反而都陷入更深的奴役状态，带上更重的枷锁。当喀什噶尔、叶尔羌、吐鲁番及其他小土邦，不再听命于中国时，当帝国力量已不能镇压叛乱的臣民时，这整个地区落入了当地一些封建主之手，他们分裂为无数的小邦，进行无休止的战争，牺牲臣民的幸福和安宁，以追求他们的个人利益。象中世纪意大利的男爵和

伯爵把欧洲一些最繁盛的地区焚掠一空一样，这些维吾尔族的王公也在阿图什河和伊犁河流域进行牟私利的战争。很可能，这种事态会一直继续到中国又强盛和安定下来，足以重新在它失去的土地上恢复它的暂时中止的权利，但一股新的势力在喀什噶尔西部边境上兴起了。早在 676 年，以阿布都拉·齐察德为首的阿拉伯人从波斯过来，沿乌浒河两岸一路上进行破坏、散布恐怖。那时，在布哈拉有一个美丽而有才干的王后，名叫可敦^①，代她的儿子摄政。当她的国家受到这一意外而可怕的侵略的威胁时，她守寡还不久。周围的邻邦包括喀什噶尔，虽都援助了女王，她在战场上吃了两次败仗，不得不在她的首都城内固守。那个阿拉伯首领无法用猛攻之法把城攻破，后来也就慢慢退兵回波斯去了，带走了大量的俘虏和掳获物。几年之后，阿拉伯人卷土重来，但索得了大量 24 的献金又回去了。另一个首领屈底波则成就更大，他曾有一度带着火和剑经喀什噶尔而越过库车。这是穆罕默德教义第一次输入中国国境，并且是用武力作为强有力的后盾的，无怪乎在这个国土上建立了一些据点。以后几个世纪的继续进军，巩固了这个开始，不用多久，喀什噶尔的统治阶级就为这种新的教义所感染了。

在十世纪，喀什噶尔的统治者沙都克·布格拉汗改信了伊斯兰教，他强迫他的臣民也改信这个教；虽然我们相当清楚，到那时候为止，穆罕默德的代表在地上的至高无上地位还未受人承认。这个不统一的国家，屡次处于它的军人们的淫威之下，它的力量集中于军人们的门下，这时中国人已退到甘肃去了，它由于不能找到足够强大的盟国保护，只能以某种方式依赖比它强大的力量。十世纪末，伊斯兰教徒几次受挫于与中国还保持政治和贸易关系的于阗^②与和田军队。在英吉沙附近，他们的将军喀尔喀路屡予喀什噶

① Khaton, 即“王后”，并非人名。——译者

② mānchoo 可能系 māchīn 之误笔，即于阗。——译者

尔的伊斯兰统治者们的重创,但在以后二十年中,喀什噶尔从浩罕取得支援,报复了战败之仇,而和田本身第一次落入伊斯兰统治之下。布格拉汗家族这时牢固地建立了对东土耳其斯坦的统治,他们的疆域几乎和阿古柏伯克的疆域相同。

25 喀拉契丹部族^①从与黑龙江和中国北部接界的地方,经过长期的迁移,移居到准噶尔西部,并建伊犁城,再经过一段时间,与某些突厥部族联合起来而建立了一个强大而巩固的政权。他们的酋长叫做葛儿汗,意为领主之主,他们的宗教是佛教。按照某些人的说法,著名的约翰长老或约翰王,就是这个部族在中世纪的首领。为掠夺成性的部族所苦的一些邻近部族向葛儿汗求助,他都答应了;但是,当他成功地击败了乞卜察克和一些其他部族之后,他并未从这个他作为友邦和盟邦而进占的地区退出。他接着不但并吞了喀什噶尔与和田,并且越帕米尔而进入费尔干纳地区,在一个短时期内把布哈拉、撒马尔罕、塔什干都置于他的治下。但这个广大的帝国只存在了一个极短暂的时期,在葛儿汗取得最初这些成就之后,即爆发了内战,有半个世纪以上,基发即花拉子模与喀拉契丹争夺霸权。信基督教的乃蛮部落的一个酋长,名叫屈出律的,亦在反对老葛儿汗的人之列;葛儿汗在几次激战之后战败被俘。这是1214年。但屈出律之胜利亦极短暂,因为他马上就遇到了亚洲土地上所产生的最可怕的劲敌之一,成吉思汗。

蒙古族作为一个独立部族出现在历史舞台,约与喀拉契丹移往准噶尔同时,十二世纪初他们即已侵入中国的陕西和甘肃两省,造成破坏。当成吉思汗崛起时,他发现他的这个后来要由他率领取得那样伟大胜利的部族正处于精力极度旺盛的状态中,而当时
26 的近邻,有的正发生内讧,有的刚从长期混乱中恢复。中国人当时格外四分五裂,在那个帝国里有一些亲戚关系的成吉思汗很快发

^① 即西辽。——译者

现，成功地插入这个富有而没有防御的邻国的核心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成吉思汗 1154 年生于迭里温孛勒答黑，他的父亲也速该把阿秃儿是一个善战的军人，曾几次战胜鞑靼人。成吉思汗的早年完全在克服他本身地位的困难中度过。他所属的部族分裂为几个各自为政的集团，只有在战场上与外敌相对的时候才结成同盟。要使这些集团消除掉对于臣服于一个确定领袖的厌恶情绪，得经过许多年；要到他的军事成就威名在他的名字上形成一团圣光时，这些部族才肯承认它们所无力抗拒的霸权。但当他还是一个小游牧民族的族长，过着默默无闻微不足道的生活时，他已整天在为更广阔的前程、更宏大的统治作准备了。当他居留在巴勒渚纳盐泽附近的穷乡僻壤时，他拟出了作他的统治制度出发点的法典。法典的基础是：服从领袖为基本原则，各级军人遵守秩序和节制，战利品由全体平均分配；但这些法规的前面几点是太严格了，个人所得必须为了多数人而完全牺牲，所以，在最初建立这个秩序法规时，产生的效果不是把一些能够征服世界的狂热者吸引到他的旗帜下来，反而是把他的一些追随者赶走了。要到 1203 年，他快四十九岁时，成吉思汗才把所有的蒙古部族置于他的统率之下。他做到这 27 点之后，立刻就开展了他的征服事业，在很少几年内，把亚洲的大部分置于他的统治之下。在征服了鞑靼和唐古特各部族之后，他把这些部族编入他的军事组织，把他们纳入他的征兵制度之后，就拥有一个庞大的追随者队伍了。因此，成吉思汗是在我们曾详述的那个时候统治喀什噶尔、包括和田、准噶尔和唐古特地区的；当时，除东方的中国以及西方的那时在西土耳其斯坦处于全盛时代的基发政权，没有能与他抗衡的势力。在蒙古结成这样一个新的联盟的消息传到了花拉子模王那里，促使花拉子模王派出一个使团去探听一下事情的确实情况；因此，当成吉思汗正在对中国用兵的时候，西亚的使臣到达了营帐。这个征服者虽然是高傲而

威严的，但他和蔼地接见了使臣，并表示了深切的友好态度。他以丰盛的礼品和下面那样一封具有特色的书信打发使臣回去：“我是东方之王。您是西方之王。让商贾在两国之间来往，互易两国物产。”为了促进这一愿望的实现，他还派出了一个由商人和官吏组成的使团，以说明互相往来所能产生的好处。但基发国王或者是由于不相信他要应付的对手的可畏，或者是由于错误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他对成吉思汗的友好表示没有作出同样的反应，并且在那些被派到他的国家来的商人被谋杀时，也没有作什么愿意赔偿的表示。这样的对待就是十九世纪任何文明的统治者都不能容忍，更不用说能在十三世纪得到一个以自己的意志为法律的为所欲为的征服者容忍了。成吉思汗与中国的战争刚一胜利结束，他立刻进行一切准备，去惩罚这种背信行为。在那时候，成吉思汗带着好几十万武装的人马，象流星一样从东方冲向西亚的惊惶失措的各民族。在那时候，地球上一些最美好的地区听任那一支军队去蹂躏，那支军队把破坏这件事提高到了一种艺术的水平，就是在这个鞑靼征服者扫除了他的道路上一切阻力七百年后的今日，他们在布哈拉、巴尔赫、撒玛尔罕、基发，以及那些在荒漠上消失的城市上所完成的技艺还可以清楚地看出，深印在那些标志着古老的都市遗址的废墟上。阿富汗，以及现在仍为俄国人认为是不可逾越的山脉并不能阻滞这一“天鞭”的推进。喀布尔、坎大哈、吉兹尼都陷落于从遥远的蒙古来的军人之手，一如在不到四十年前陷落于不列颠的勇士之手一样，一如以后当攻击的力量和那次一样勇猛、一样有纪律，它们也必定再次陷落一样。涂改了亚洲的地图、把人口繁茂的富有的城市变为一片废墟、把曾经一度物产丰富、生活欢愉的地区变成人烟稀少之乡之后，成吉思汗还不满足，他把他的名字的恐怖带进了兴都库什山区最为遥远的幽僻之处。他在我们的西北边界斯伐特地区驻扎过冬，我们对于那个地方除了听到

些传闻外是一无所知的，那里只有蒙古和马其顿的征服者曾经到过。他从驻在喷赤河两岸的总司令部派了使者到德里去；现在还不能确定，他是否从来没有打算在那些已获得的战绩之上增加一次对印度的胜利。

他统治的领土的极东部分发生了叛乱，分散了他对印度的注意力，他不得不以全速亲自赶去扑灭要想颠覆他的统治地位的叛乱。他急忙离开了斯伐特的军营，经由库纳尔河谷和奇特拉尔，越巴拉吉尔山口而进入喀什噶尔。虽然那些山路在早春是几乎不能通行的，他在这次行军中受了很大损失，但他终于带着他的主力到达叶尔羌，随即急忙横越土耳其斯坦而到达他的首都和林，及时地扑灭了变乱。这以后，他的毕生精力都用在征服中国上，这一业绩是他始终没有能完成的。但在延续二十年之久的数次征战中，他继续不断地击败了中国的皇帝的军队，他去世之前，在1227年，终于占领了包括北京在内的这个帝国的北部诸省，把完成他已开始的事业的任务交付给他的儿子和继承者窝阔台汗。成吉思汗死后，他的庞大领土为他的儿子们所瓜分，喀什噶尔，连同准噶尔、花拉子模、阿富汗归于察合台汗名下。这一统治者在他生前能够保住他所承继的广大疆土，但在他死后这一国土到处都发生纷争，各地都重行分割。可以一提，察合台虽是一个狂热的佛教徒和荒淫无度的人，却也是一个谨慎而精明的统治者，而不是他的卓越出众的父亲的一个不肖的继承人。在他死后爆发的内乱，时缓时剧延续了约一百年，最后在察合台的一个后裔之下组成了一个新的蒙古国家，或更多地专称为察台兀鲁思，那也只是一个短暂的解决办法而已。

下面我们将尽可能简明地向读者陈述一下这个多灾多难时代的一些主要事件，在这个时代里，成吉思汗的为数众多的后人在整个中亚地区打来打去，直到他们全部消失才结束了他们的纷扰不

安的年代。首先,我们也可以在这里提一下,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中,基督教、佛教和伊斯兰教在东土耳其斯坦是得到平等的宽待的。阿拉伯人的入侵以及伊斯兰教的推进,已被伟大的信佛教的征服者成吉思汗的胜利大军推回到“圣城”布哈拉以西;蒙古人征服当地之后,有很长一个时期很少听到有改宗“真先知”教义的企图。但是,成吉思汗在攻占布哈拉时虽然已把伊斯兰宗教师们的种族几乎杀绝,我们亦断不可认为,他要把这种新的异教从他的领土上消灭。把它的力量摧毁之后,只要他的帝国和个人利益不受影响,他是很愿意让它自生自灭的。这样,我们面前就呈现了一幅奇异的图景,在十四世纪的东土耳其斯坦,世界三大宗教并列地盛行着。在马可波罗时代富有而繁盛的喀什噶尔的景教徒,后来被这个社会的其他成员的暴行所摧残,完全消失已有许多世纪了。

察合台汗死后不久,成吉思汗的一个曾孙海都取得喀什噶尔及叶尔羌的王位;不多几年之后,他使用了一点巧妙的外交手段,以武力为后盾,又并吞了浩罕与布哈拉的大部分。但他的胜利是短暂的,后即被他的竞争者取而代之。察合台的曾孙八刺之子都哇汗曾被任命为和田统治者,但如不同时也得西土耳其斯坦的

31 王位,他的野心是不能满足的。他最后实现了他的欲望;但在中国皇帝铁穆耳汗^①从一次几乎到达拉合尔城门口的远征回师时,他贸然与铁穆耳发生了冲突。他在巴楚附近战败,不得不承认中国的霸权。他与我们的叙述有点关系,因为他是额敏和卓之父,后者约在1310年为当地人民自己拥立为王,喀什噶尔历代的和卓王就是从他开始传下来的;喀什噶尔的和卓王族保有世袭权利的年代比中亚任何王族都更为久远。最后一个有点实际权力的察合台汗是哈赞爱弥尔。他死后,又是一个战乱时代开始,军队统领和称号可疑的敌对王公都来争夺这个空缺。但到此为止,所有这些统治者

^① 指元成宗。——译者

都是佛教徒。秃黑鲁·帖木儿是成吉思汗家族中留存下来很少的后裔之一,仅仅是由于喀什噶尔一个主要人物的慈悲心,他在一次对他们这族人进行的最大规模屠杀中得免于难,以后许多年他不得不在这个国家边境的山区和沙漠上维持着不稳定的生活。他来往的人都是佛教徒;但有一天,一个成吉思汗摧毁布哈拉时残存下来伊斯兰宗教师的后裔给他传了“真信仰”的教义,他甚为感动,他就许了一个愿,如果他重又取得他的权利,他一定改信伊斯兰教。不久以后,喀什噶尔的事件演变促使当地居民找一个具有公认资格的人来作他们的统治者,在这方面没有人能超过秃黑鲁·帖木儿。他在继任王位时就公开宣布改宗伊斯兰教,在以后几年中土耳其斯坦的一些主要酋长一个一个都仿效他。从那时直到现在,这个地区大多数人的宗教是伊斯兰教;也许中国统治时期是例外,因为有很多的中国商人、官吏、军人,使信佛教的少数人取得了与信对立宗教的人同等的地位。秃黑鲁死于1362年。

32

约在这时,亚洲的第二个大征服者崛起了。帖木儿于1333年生于碣石的沙赫里夏勃兹郊区。他是那个地区的统治者、巴鲁喇思部酋长塔拉海的儿子,父死后也成为碣石统治者。他在早年曾在哈赞爱弥尔的宫廷受到礼遇,哈赞爱弥尔不但给他几个贵显的职位,并且还把美丽的孙女奥里亚·秃儿罕·可敦嫁给他。但帖木儿在朝廷里的受宠并没好久。他的不安于位的性情促使他追求比爱弥尔能委付给他,或确实想委付给他的更大的任何事业。他在他的碣石政权中公开反叛中央政权,在他被中央政权的军队所击败后,他和他的妻子在基发沙漠的突厥人中间觅取安身之所。他在这些不可靠的游牧者中间感到很不安全,于是在他周围纠集了一小帮亡命之徒,进行一次野心更大的冒险活动,侵入波斯的锡斯坦省进行劫掠的远征。这一举动获得了相当的成功,但他本人的一足为箭所创。这一创伤他终生未能完全愈复,从此便以跛子帖

木儿或称帖木兰知名,人们所知道的帖木兰这个名字,就是由此而来的。从这次劫夺战争所得的名声给他树立了稳固的地位,后不久,他竟能募集一支军队足以进犯塔什干。他占领了包括费尔干纳在内的现在称为俄属浩罕的整个地区,在1363年把一个新的占领者哈比勒沙放在王位上。以后几年,他和名叫侯赛因的另一个酋长争霸,1369年他已获得如此大的胜利,使他可以抛去假面具而自称为王。他建都于撒马尔罕,把这个一度是人口众多的城市变为令人赞赏的西亚胜地。他安排好了内政之后,就开始进攻他的疆土之外的国家。巴达克山的山民首当其冲,经过几次激战之后,不得不承认他的统治权。于是他把注意力转向北方,在北部疆界之外是察台王公统治的准噶尔。在几次攻击中他击败了他们的君主卡马尔丁,但直到1390年的最后一次征讨才取得完全的胜利。他进军时,对方就退到伊塞克湖以东的要塞里去,侵略者撤退后,他们又从隐藏处出来。

现在回到喀什噶尔上来:秃黑鲁死后,他的儿子乞思和卓被废,直到1383年他三十岁时才又重行取得他的国家。他是一个坚信的伊斯兰教徒,为了要保持独立,他和帖木儿保持着一种邻国所能保持的最友好的关系,并结成最亲密的同盟。他虽与帖木儿同盟,但并不参与帖木儿对察台的战争,因此,当帖木儿的军队大掠天山南北时,他与察台的人一同在1389—90年的战事中受到损害。虽然在以后的十五年中他们之间保持友好关系,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到,一个那样可畏的宗主国就在国境之外,乞思和卓是不会太舒服的。这种令人厌恶的地位可以用帖木儿发给乞思和卓的命令来说明,帖木儿命令他在某些地方种植谷物和收集牲口,以供应他募集的入侵中国的大军。正在执行这些命令时,喀什噶尔的统治者得到消息,这个“天鞭”已在1405年二月五日突然去世了。乞思和卓本人以后也只活了不长时间。在短短一百五十年中一个大

征服者的领土又进行了一次重新分配。帖木儿的情况比成吉思汗的要简单些,因为帖木儿没有留下够得上承继他的事业的、象成吉思汗的后继者窝阔台和察合台那样的代表人物。成吉思汗大家族的各支,根扎得那末深,直到现代还有后人使他的名字保持不朽,但帖木儿没有留下那样的后裔。由于他的宠儿张格尔之死,他对于有一个配得上的继承人的希望已破灭了。

喀什噶尔所经历的祸乱特别严重,直到 1445 年才有一个可称为安定的政府,当时是爱国的老大臣库达达尔的孙子赛义德·阿里给这个混乱的国家恢复了一个短时期的秩序和统一。他死于 1457 年。这几年中,准噶尔地区君主云努斯对于发生在他的边界上的一些乱事起了主要作用。他被称为是一个很开明的君主,外国使臣从他的宫廷回去,都感到惊奇地说,他们原以为会看见一个粗暴野蛮的蒙古人,但出乎意外地却碰到一个彬彬有礼的人。当云努斯统治准噶尔地区时,在喀什噶尔出现了另一个杰出人物。阿布别卡尔是喀什噶尔统治者赛义德·阿里的儿子沙尼兹的儿子,是那个国家的少数几个有所作为而值得加以论述的君主之一。他在长时期忧患不绝的统治年代中侥幸克服了许多困难,他逝世之前他的事业虽又蒙上阴影,但在那次灾祸之前的美好的岁月使我们有理由对他的事业略作讨论。他是一个杰出的运动家、猎手和军人,因此得到他母亲的非常宠爱,使他的地位远远高出于他的弟兄之上。他任和田统治者不久即把叶尔羌纳入他的治下,他和喀什噶尔的统治者海达尔进行了长时间的激战,后者得到准噶尔的云努斯的支援。阿布别卡尔虽然几次战胜联军,但他毕竟不能希望击溃云努斯统率下的庞大军队;直到海达尔自己愚蠢地与云努斯决裂,阿布别卡尔才能提出他对于东土耳其斯坦全土的权利要求。海达尔与云努斯之间的战争爆发,后者得到准噶尔的大批援军的支援,击败并俘虏了他昔日的盟友。这些纷争对阿布别卡尔是有利的,云努斯死于

1486年，阿布別卡尔之占有喀什噶尔就没有什么争议了。他完全占有喀什噶尔以后，第一个威胁到他的严重危险发生在1499年，云努斯的儿子阿罕木德，或如一般所称的阿拉贾，意为“屠手”，带领着察台蒙古人侵入他的疆域。战事初起时胜负不决，但不久以后阿布別卡尔战胜了北方来的进犯者。

在以后的十五年中，阿布別卡尔安宁而兴盛地统治着喀什噶尔，积聚了大量的财富，成为他的贪婪的邻邦羡慕的对象。在这几年中，这个国家虽然是以任意独断的方式统治的，但颇为昌盛，如当地一本编年史所记载的，“旅客可从安集延走到中国边境哈密，而毋庸抱受扰之忧，亦毋须跋涉过劳觅取食宿歇息之处。”但在1513年，他的国家动乱突起，结果他完全被推翻了。阿罕木德之子，亦即准噶尔地区统治者曼苏尔的弟兄赛德，在那年侵入喀什噶尔，不久即占领了喀什噶尔，而阿布別卡尔留下的只是一堆瓦砾。赛德向英吉沙推进时受到了抵抗，但在英吉沙城下击败了喀什噶尔军队之后，他终于占领了这个城池，没有再遇到进一步的抵抗，这样他取得了所谓叶尔羌的也是喀什噶尔的锁钥。阿布別卡尔在叶尔羌闭关固守了几个月，但在赛德的大军迫近时，他放弃阵地逃到和田。不久以后他又退避到喀什噶尔东南更远的山区，在库鲁克塔克山停留了一个时候。后来，先被他的随从所抢劫，后又为他们所弃，他退入西藏高原的山谷和沙漠中。他在这个荒芜地区流浪了好几个月，过着半饱的孤独生活，最后据说被人发现已为山民所杀。这就是曾经显赫一时的阿布別卡尔的结局，这个君主得势之时使我们觉得很象大流士大王。凡是了解他逃亡时带走大量珍宝的人都很清楚他是贪婪的；也不能否认他是残暴好杀的；但在早年他具有一个大统治者的许多美德，连同一些罪恶，那同样也是不容争辩的。他把儿子札罕格尔留在叶尔羌指挥军队，在赛德的军队迫近时，札罕格尔逃到桑株，不到几个月也被擒处死了。约在

这个时候，亚洲的第三个大征服者崛起了。巴卑尔生于 1481 年，在十二岁时为浩罕的贵族们选定继承他父亲奥马尔·赛赫，登了浩罕的王位。这个征服印度的人对于喀什噶尔的命运只有间接的影响。他的事业是属于另一个范围的，在这里不必象对待他的前人成吉思汗和帖木儿那样叙述他的生平了。

击败了阿布别卡尔之后，赛德从事于把他的统治扩展到邻近各国去。他急于要占有我们的印度边境与帕米尔和巴达克山之间那一个山区，那个山区中分布的小国几乎与它分布的山脉一样多。³⁷但是，他虽然用尽全力企图征服博洛尔，或现在称为加菲里斯坦的加菲尔人，他始终不能在这方面持久地扩大他的版图。在另外几年，他以剑和火侵入西藏和克什米尔；1532 年从一次这样的远征回来的路上，他在喀拉昆仑山口附近，由于空气稀薄而毕命。他的死是新的扰乱的爆发信号。他的合法的儿子们都被赛德与一个女奴所生的儿子拉希德赶走了；拉希德早在攻打加菲里斯坦和西藏的战争中已作为一个将领而居显要地位；拉希德统治了一个短时期以后死去，情况就变得愈来愈混乱了。对于以后的情况，现在有许多不同说法，一一加以讨论会是一件极令人生厌的事。例如有一个名叫鄂本笃的葡萄牙传教士兼旅行家，在 1603 年遇到一个名叫穆罕默德汗的当时在位的统治者，受到他的殷勤款待；但他说这个汗的姊妹从麦加朝圣回来时多亏了他的帮助，这无论对于这个统治者的个人实力或这个国家所达到的文明程度，都不见得是公平的评述。

在这个时候，和卓家族显著地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在十七世纪早期，东土耳其斯坦有两个集团扮演着蒙塔古和卡普莱特^①的角色。他们被称为白山派和黑山派，在这两个集团的争斗中，前者

^① 蒙塔古和卡普莱特是文艺复兴早期意大利维罗纳城中两个世代为仇的家族。
——译者

的首领请霍占的和卓·卡拉尔，即前面已提到过的额敏和卓的后裔为助。那是1618年，这个和卓初次到达喀什噶尔，主要靠他的孙子伊达雅图勒和卓，吸引了当地居民对这个家族的爱戴。这种敬意到今天还没有消失，一般称他为哈司拉·阿法克^①，这个尊号
38 在当地居民的心目中差不多并不下于穆罕默德本人。据传是他所作出的一些大奇迹以及在他生前加在他身上的特殊神圣色彩，使他在整个地区获得优越的地位，在他生前，他被人推戴为最高权威。在他未死时他的儿子亚赫亚，或称汗和卓，已继承了他的地位；但在伊达雅图勒和卓，死后几个月即在一次扰乱中被害。于是旧日的连绵祸乱又重新大发作了。在政治舞台上僭求王位者一个接着一个地出现，但每一个由于出身关系都很少有资格充当领袖，接着又出现一个得势的对手，这个令人厌烦的循环就这样一直继续到1720年。

喀什噶尔的历史进程当时已到达十八世纪的初期，在这时候由于中国征服该地，它的历史发生了一个新的变化。因此，在叙述这次事件以及直接引起它的原因之前，不妨考虑一下前面所述的东土耳其斯坦历史给予我们的主要教训。最为匆匆涉猎的读者也会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在八个世纪的过程中，这个国土仅仅只有两次获得一个稳固安定的政府，而这两次乃是处于成吉思汗和帖木儿这两个征服者之下，他们把可以算是政权的一点迹象都化为仅仅是臣服。每隔一段时间，确也崛起过一些领袖人物，如云努斯，阿布别卡尔，或最初的几个和卓，他们也能够在他们的边界保住很少几年，阻止敌对的邻国入侵，对外国的旅客维持一种表面的兴盛安定气象；但即使象这样的几道阳光，在中亚的人类状况的黑暗地平线上也只是转瞬即逝的。在每一个僭主被推翻时，人民胸中的改善希望也就更加阴暗；当那些神圣和卓的继位人在重演

^① Hazrat Afak, 伊斯兰教中尊号，意为世界之尊。——译者

前任错误和短处上并不比以往任何统治者稍逊时，我们可以肯 39
定，人民就要向外求助了。在那一带有一句古老的谚语：“人民的
砖税已纳完，摩西就要来临。”不容置疑，在 1720 年时，喀什噶尔
人民苦难那末深重，那末持久，不论解救实际上是从那一方面来
的，都不会不受欢迎。但是，几乎已盼望了好几个世纪的摩西还未
得到证明正在出现，再由于“希望破灭使人灰心”，喀什噶尔人甚至
已失去了期望他们在专横暴君和征收方式特别恶劣的苛捐杂税下
的悲惨生活能略为改善的勇气。不容置疑，如果蔓延于准噶尔和
喀什噶尔的混乱状态再长久继续下去，这两个广大地区的生命和
财富是会完全消耗干净的。当时的实际情况是，人口以惊人的比
例减少，当地的财富和一般资源逐渐消失而无显而易见的补给来
源。也许，最令人惊异的事情是，后期的所有统治者对于他们国家
的资源似乎都抱着一种醉生梦死、只顾眼前作乐的愚蠢态度。他
们丝毫也没有想到过，苦于接连不断的战乱和骚扰的混乱国土总
有一天要结束混乱，多少世纪来处于暴政压迫下的臣民最后要拿
起武器来教训暴君，用一句诗人的话说，“受难的人有什么事不
敢。”中亚的那些汗和爱弥尔本身是不值得一提的；但由于有关他们
的一些事件是喀什噶尔近代史所固有的序曲，所以在这一章必须
对他们作一些描述。从八、九世纪，中国政权从中亚和西亚退出 40
起，直到十八世纪开始，喀什噶尔和它的邻邦的历史都只是连绵不
断的灾祸而已。在这些统治者身上没有什么值得我们同情的，也
许只有云努斯除外；我们的同情完全寄在生活在那个地区的不幸
的各族人民身上。因此，我们已到达这样一个转折点，适合于理解
喀什噶尔人民对于十八世纪里发生的变化的感情；下一章我们
将讨论那些变化；在这之前我们可以毫不惋惜地看着那一长串罪
恶累累，而没有一点品质可以用来赎罪的中亚王公的消失，而结束
了这一章。

第四章 中国征服喀什噶尔

在继续叙述 1720 年以后直到 1760 年喀什噶尔落入中国人之手在喀什噶尔发生的事件之前，不妨先简要地论述一下中国的历史，这样我们才可以理解，这个强国怎么会进行这样遥远的经略，尤其是，它怎么能成功地完成这些事业。十七世纪早期占有北京帝位的是明朝，但它的国势已由于屡次败于满洲鞑靼而基本动摇，满洲人在 1620 年万历帝去世前已从他手上夺去了辽东。满洲人据说是十三世纪蒙古侵略者的后裔，^① 在中国当地居民起来摧毁蒙古人的势力时被迫躲避到中国以北的荒野里去的。这种象煞有理的说法是否确实，抑或如某些人所断言：他们是发源于勘察加冻土地带的新民族，由于种族繁殖必需获取生活资料而被迫南迁的，那都对于我们目前叙述的目标关系不大。可确定的是，在当时他们是一个好战的民族，他们能够派出很大的兵力；而且很可能的是，当他们取得一些胜利时，他们的队伍可以从东准噶尔的鞑靼同族
42 中招募兵员而大为扩充。中国皇帝万历逝世后，反对他的继承者的冲突爆发了，在以后的斗争中满洲人被请来支持争夺帝位的一方。他们的支助使这一方取得了优势；但是，当战争的胜负已清楚地摆明时，满洲人表示并不想如约定的那样退出了。象英国史上的撒克逊人，中国史上的蒙古人所做的，现在满洲人也这样做了；1644 年，他们第一个皇帝顺治登了帝位，作为现在统治着的大清（意为“崇高的纯洁”）朝的第一代皇帝。不能以为当顺治为他的胜利之师所拥立时，他已征服了全中国。他在位的十七年中，经常不

^① 满洲人为女真人之后。——译者

断地对中国当地势力征战；但总是取得不断的胜利。1661年他的儿子康熙继位，通过一系列法律措施和成功的武功，他稳固地维持了他父亲在中国赢得的地位。在这一隆盛的朝代，西藏并入中国版图，从交趾支那及缅甸边境直到黑龙江，对满洲政府的权力已无异议。不容置疑，西藏的征服在中国人的思想里引起了新的想法，认为他们也有权利统治东土耳其斯坦；对西藏高原重建宗主权时，就促使中国人回忆起在遥远的过去他们对准噶尔和土耳其斯坦也有相似的权利，最后就有一个野心勃勃的统治者或总督顺从民众的愿望并予以实现，利用这一机会来显耀他自己。康熙是十分谨慎的，他没有对准噶尔或土耳其斯坦用兵，^① 以免危及他新近才巩固的国家；那些地区的厄鲁特王公对他的国家表示尊敬，他已十分满意了。1721年康熙去世，他的儿子雍正继位，在他统治的短促年代中，他紧随着两个先辈的榜样，不干涉甘肃省以西各地的骚乱。雍正死于1735年，于是给他的野心勃勃的好战的儿子乾隆扫清了道路。当乾隆开始亲政时，他发现他是一个国内升平的最强大的帝国的可以为所欲为的统治者，并对于它的事实上的政府的整个外观表示满意。他的国库充实；全国也许正达到繁荣的极顶。君主只须把这个由他的先人治理到这样好的程度的国家保持在这样富有和强大的状态中就行了。然而，对于一个好战的专制帝王，统治富裕的、爱和平、守本分的人民的事业从来是不合口味的；乾隆认为，一如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许多其他大统治者所认为的一样，富有而人数众多的臣民的唯一用处便是使统治者能够从事声名显赫的征伐，使他的威名远扬。中华帝国的声名和实力当时在亚洲是极大的，没有一个单独的国家或是任何可能的同盟敢于妄想与之对抗。因此，乾隆也没有正当的理由可以与邻国为敌，因为它们总是十分心甘情愿对于任何触犯帝国威严之处付出最大的赔偿。因

^① 此说不确。——译者

此,征服土耳其斯坦是他衷心赞同的一件事;我们如果记得他的好战性格,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拥有极富裕的财富和人力,足以完成比目前所要说的这个任务困难得多的功业,那就比较容易理解当下面我们要叙述的事件给他机会去进行干涉时,乾隆是如此热衷于干涉准噶尔的事务了。

- 44 现在应该回到喀什噶尔,叙述一下当时发生在这个多难地区的一些事件。白山派和黑山派的争端达到最高峰,是由于噶尔丹领导下的加尔梅克人推戴为叶尔羌王的阿法克,这位白山派首要代表人物,把敌对民族的有力支持者都排斥出去。阿法克统治了几年,但是面对着加尔梅克人、柯尔克孜人和乞卜察克人的反对,他难于在喀什噶尔的某些地区维持下去。他的儿子们的遭遇亦并不好,这个国家最后被一个乞卜察克首领和一个柯尔克孜首领所瓜分。这两个人互相争吵,幸而在首次交锋中都毕命了。阿法克的一个儿子阿克巴什在这次争战中在英吉沙被杀死;但他事前从浩罕的霍占请了一个敌对的黑山派的和卓达涅尔进来帮助他。这引起了白山派的更大敌意,于是,阿罕木德和卓被召请进来代表他们的利益。达涅尔在叶尔羌被围,但依靠一支柯尔克孜分遣队之助击退了围攻者。虽然在战场取得了胜利,达涅尔还是不得不在不久以后逃遁,让他的敌对者占有该地。他逃到准噶尔加尔梅克人那里,居然求告成功,借给他一支军队去收复喀什噶尔。这次征讨是胜利了,可是在围攻喀什噶尔时生擒阿罕木德的加尔梅克首领并不让达涅尔获取政权,而是把他和他的敌手都拘禁在他的伊犁的首府。问题得到了如此蛮横的解决,那就没有什么余地留给野心勃勃的达涅尔去作无益的抱怨了。从这时候起直到中国人征服该地,伊犁的加尔梅克首领们确立了对东土耳其斯坦的统治权。
- 45 几年之后达涅尔本人被任命为喀什噶尔(这时称为六城)的总督;但他下面每一个城都有地方长官,由加尔梅克人自己任命。他的

权力不是实有的，而是虚有其表的。他的长子被扣在伊犁作为人质，以免父亲有不轨行动；达涅尔本人必须常常到伊犁去汇报喀什噶尔的情况。这就是1740年在黑山派成员达涅尔统治下，作为伊犁的加尔梅克统治者的一个属省的喀什噶尔的情况。1745年，准噶尔的阿喇布坦汗的儿子噶尔丹^①去世，阿睦尔撒纳和达瓦齐这两个首领夺取了政权，有一个时期他们二人平分权力；但不久他们就闹翻了，下决心要抑制对方而扩张自己的权益。阿睦尔撒纳无力与他的对手达瓦齐的军队对抗，交战几次失败后，从准噶尔逃到中国。到达兰州府时，他请求进京向皇帝陈诉苦情，并以他的名义，以他的许多同族人的名义把伊犁和喀什噶尔地区献给权力无限的皇帝。

他的请求被批准了，乾隆优渥地接待了他，允予考虑他的陈请，同时并给他在中华帝国内赐予封号和俸禄。阿睦尔撒纳的禀奏是那末巧妙巴结，他是那末机巧地利用了乾隆对于武功的野心和爱好，所以在最后乾隆终于同意借给他兵力，那是他不惜作了大量许诺才取得的。1753年中国军队在阿睦尔撒纳的带领下出现在准噶尔；在若干次绝望的对抗之后，达瓦齐被逐出这个国土，据一种说法，被乌什的长官和卓木·伯克缚献给中国人。据另一种说法，系在战场上被俘；但两种说法都同意他被解到北京处死。^②阿睦尔撒纳在准噶尔恢复了自己的地位以后就把他的注意力用在征服它的属地喀什噶尔上。他现在是准噶尔的最高统治者，以伊犁为其首府；但他的军队，即支持他恢复他的地位的军队，是一支“和台”武装，只效忠于北京的皇帝，只服从他们的伴随厄鲁特王公阿睦尔撒纳到来的将军的命令。在这时，噶尔丹的一个儿子玉素普^③在喀

① 阿喇布坦汗的儿子为噶尔丹策零，死于乾隆十年。——译者

② 达瓦齐被解到北京后并未被处死。——译者

③ 阿睦尔撒纳死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而玉素普的出现当在道光十年（1830年），并非同时期的人。——译者

什噶尔攫取了最高权力，高呼伊斯兰清真教由于“和台”的到来而处于危险中，力图在他认为即将到来的争战中把浩罕和布哈拉等穆斯林政府都集结到他这一方面来。阿睦尔撒纳在喀什噶尔的北方边境上急切地守候着，以待时机一到即起来积极干涉那个国家；玉素普则是谨慎地在他边界外找寻能够帮他反对他的敌人的阴谋的同盟者。玉素普已使他自己成为这个国土内黑山派的首领和代表，阿睦尔撒纳因而就决定提出与之敌对的白山派的权利要求。中国的将军默许了这个计谋，后又得到乌什和阿克苏的加尔梅克的统治者的帮助，这个计谋毫不拖延地实现了。于是，古老的和卓家族的后裔被找了出来，阿罕木德的儿子博罗尼都被选中以供此用。他率领一群混合的追随者，立刻夺取了乌什，在那里受到热烈的接待，有几个小部落立刻归附了他。然而，玉素普从叶尔羌带了一支庞大的武力也往那里赶去，当博罗尼都的成功希望似乎十分稀薄的时候，玉素普在半路上去世了。但玉素普的儿子阿布都拉，自称为和卓帕特沙赫^①的，接着赶去，把博罗尼都围困在乌什。这时，⁴⁷ 阿布都拉力图与博罗尼都达成协议，倡议黑山派与白山派应和解，团结起来共同讨伐入侵的“和台”。博罗尼都是一个真正的穆斯林，他本人倾向于接受对方的提议，但他被中国官吏和他们的盟友所包围，因此不得不反而提出劝告，要阿布都拉投降中国人并承认他们的霸权。阿布都拉完全不愿意不作任何斗争就献出他的独立，于是乌什之围加紧了。在围攻的阵营中，有一些人赞同博罗尼都的要求，在这些人离开黑山派而投奔过去时，阿布都拉的其余兵力就只得急速退却。博罗尼都随即向喀什噶尔推进，在那里他受到热烈欢迎，叶尔羌随后也落入他的掌握，这样，和卓家族的后裔征服喀什噶尔，白山派的胜利就圆满实现了。

到这里为止，中国人还只是喀什噶尔事件演进的旁观者。阿

^① Padshah, 波斯语, 意为“大王”。——译者

阿睦尔撒纳诱使他们赞同博罗尼都的这一行动，中国人也在这次对玉素普父子的战争中作了一般性的支持；直到博罗尼都为胜利冲昏头脑，置他们的愿望于不顾，他们才下决心占领这个国土。但在这以前，阿睦尔撒纳的事业已被切断了。阿睦尔撒纳虽然是由大量的中国本土的军队保卫着的，他居然在 1757 年把他自己立为准噶尔的独立君主，摆脱了中国的控制。然而，他所收集的兵力被中国人非常容易地就打败了，阿睦尔撒纳不得不再度从他的老家逃亡——但这次他没有象上次他在北京得到的那样安定的藏身之处了。当时俄国人已占有了西伯利亚，但他们的势力不论是好是坏，一出他们的荒凉的并且几乎不可进入的驻扎处，可说等于是零；虽然这样，在阿睦尔撒纳看来这还是唯一能提供一点安全性的去处。⁴⁸ 他逃到托博尔斯克，不久，于 1757 年死在那里；毫不容情的中国人傲慢地向俄国人索取他的尸体，作为证明他死亡的证物，俄国政府就把尸首运到恰克图，移交给中国人。这就是命运坎坷而野心勃勃的阿睦尔撒纳的生涯，他是中国势力伸入东土耳其斯坦的直接诱因。

博罗尼都已目睹这样一个真实不虚的例证，证明中国人势力之不可侮，而他还是在喀什噶尔如此顽抗，那就令人感到奇怪了，但事实确是那样。1758 年，就是阿睦尔撒纳死后一年，这个统治者和他的弟弟汗和卓公开对中国人发动叛乱。在伊犁，有几个“和台”官吏被虐待，对于中国人的命令则表示了一些公开的蔑视。这种态度是任何已确立的统治所不能容忍的；给中国人说一句简单的公平话，这更是中国人从来未予容忍过的；因此，一支中国军队从伊犁被派出来征讨这个不逊的统治者，警告他，中国势力的手臂是非常长的。博罗尼都和他的弟弟在几次激烈的战役中被打败，一个接一个的城池开门迎入令人畏惧的入侵者，和卓家族的最后代表人物不得不到巴达克山的穷乡僻壤找寻躲避之所。但即使是那

里也不安全。中国人的威名已走在他们前面，巴达克山的首领急于要讨好征服者，把两兄弟的首级献送给从叶尔羌进军到来的中国将军。博罗尼都的许多儿子中只有一个逃脱了胜利的中国人对和卓家族所作的破坏，他的名字叫做萨木萨克和卓。现在中国人完全兼并了喀拉昆仑山以北、帕米尔和浩罕以东的全部土地，而且并
49 不见得这样做就付出多大代价。他们利用阿睦尔撒纳对于准噶尔的野心而在准噶尔取得了坚固的立足点，接着又用同样巧妙的手法利用白山派和黑山派的对立，把他们的统治也扩展到喀什噶尔。当他们的傀儡阿睦尔撒纳和博罗尼都作为中国的藩属已变得难以驾驭，企图独立时，中国人就命令中国军队采取行动，把他们的道路上的阻碍全部扫除。这一切似乎显出是最不正义的野心，同时我们也不想为中国人采用的恐怖粗暴的镇压手段作任何隐讳。不容置疑，只要对他们的统治还遗留任何反抗迹象，他们绝不节制使用武力以表示任何慈悲。据估计，在这两三年的战事中几乎有五十万人被杀戮，其中大多数是被屠杀的无辜居民。虽然我们也倾向于认为这是大大夸大的数字，但我们也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怀疑，只要对他们的向前推进有任何阻力，中国人就要使用武力，中国士兵的感情，在和穆斯林相遇时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宗教狂热而变得更为激烈。中国人征服了喀什噶尔之后，即把他们的兵力转向浩罕，胜利地进入塔什干和浩罕城。1760年年末，对于中国人的推进，西亚全境都大为惊恐。阿富汗是当时未受外国征服、巍然独存的唯一的穆斯林国土，受难的伊斯兰教徒求它抑制中国的推进。那时，一如近年中某一有些相似的情况一样，阿富汗认为不谨慎则不足言勇敢，它采取的行动仅限于侵入它所垂涎的巴达克山，以惩罚它的首领杀害去避难的二位和卓。
50 但是，中国人对浩罕显示了一下威力以后，明智地又退回喀什噶尔的本来边界；随后即着手巩固他们在那里的统治，他们在那样做时所具备的精力和行政管理能力，一

定会激起任何统治的民族赞赏的。

喀什噶尔的征服虽然进行得如此迅速，但也需要经过若干年才可认为是全部完成。新的军队须从甘肃调来，大量的屯户须从陕西和中国其他省份移来，以补被杀的喀什噶尔人的空隙。还得从乌鲁木齐和哈密邻近地区迁移住户；有了这些兵员人口以及从北京调来的帝国军队，中国人才可以感到自己是完全控制局势的主人。到这时中国总督才认为自己充分有力，可以把他的军队分散驻扎各城市。在这以前只能在一个地点、至多两三个地点、集中兵力机动，以备紧急行动之用。中国人从浩罕撤兵时，他们规定了一个贡赋数额要这个国家缴纳，随后把他们的兵力转向准噶尔以北的各游牧部族，柯尔克孜游牧部落各帐^①一个接一个进贡归顺，中国人对于他们的效忠一律接受，照例用中国的爵衔品级奖励他们的忠顺行动。这样中帐的酋长阿布赉在1766年受封为王公，小帐的努喇丽竟派了专人到北京，他们在那里受到款待，带回了因他们的主人表示忠顺而得的赏赐。在1765年底以前中国人这样地稳固了在准噶尔和喀什噶尔的地位；通过和田的占领，他们又打开了与他们的行省西藏之间的交通。在南部，他们占有了一块极好的边疆，只有在西南部，对他们的推进似乎有些阻力。如上所述，阿富汗的爱弥尔已占据巴达克山，以惩罚杀害博罗尼都兄弟之罪；他不断地接到请求，要他对中国公开宣战。他自己与信德和波斯的统治者发生纠纷已足以使他的宗教同情心守住在一个适当的限度内。但他毕竟派了使臣到北京，指出他的教友在中国征服中亚的威势下受到了损害；使臣带了不能使他满意的答复回来后，他似乎派了重兵进驻了巴达克山。这个高傲的杜伦尼族君主可能很想反对中国，但他比土耳其斯坦和准噶尔的一些同时代人明智一些，他准确地估计到这一行动的风险，而满足于把他在纳第尔·沙

^① 指哈萨克左中右部。——译者

赫征服后所遗留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强大帝国维持住。阿富汗人既然做了那末些事,并且允诺在保卫撒马尔罕时给予援助,这也就难怪喀什噶尔的人民认为他们还可以再有些作为,于是这个国土有好几处地方发生起义,特别是在乌什。中国人采取的措施是及时而有效的;叛乱被镇压,居民被屠杀,这个城市被摧毁。这次失败在当地人民心中造成了一种无比的恐惧,半世纪多的长时期中再没有什么能诱使他们敢于起来反抗中国人。中国对喀什噶尔的征服有效地解决了许多人自称应得该地统治权的纷争,和其他关于竞相自称为和卓后裔的纷争,即是自称为在1760年屠杀和卓家族时唯一幸存的萨木萨克的后裔的纷争。一方面,这个民族在当时很可能由于处在外国势力统治下而必然伴随产生低沉情绪,而且尽管中国人对于反抗的绝不容忍有十分粗暴和毫不含糊的表现,52 但是也还有人存有一种希望,认为尽管如此,中国人可能会永久统治下去,他们的统治因此会一年比一年变得温和些。正是这种想法使事情能够不变得更坏,使喀什噶尔人在对抗中国人上变得漠不关心。他们不敢再期望他们的命运会得到很大的改善;但总而言之他们可能认为,在反抗消失之后中国人的屠杀会停止,而他们本族人、他们自己的暴君所进行的屠杀几世纪来倒是日常发生不止的。

在讨论中国人占领喀什噶尔之前,先叙述一下白山派和黑山派,可能是有用的;这两派的敌对纷争曾充斥于十六、十七、十八世纪喀什噶尔历史中。我们可能还记得,1533年赛德的小儿子拉希德,在他父亲的征战中出人头地之后,从他的几个兄长那里夺取了国家政权,他比起那些兄长来无论从年龄上、从生母而论的出身上都是比不上的。为了实现他的统治,他利用了帕米尔以西的乌兹别克各部族酋长的同盟,在他们之间进行谈判期间,著名的神学家,撒马尔罕的大毛拉,和卓卡萨尼投奔到他那里。拉希德予他以

特别宠信的款待,赐予他一大块喀什噶尔的土地。他结了婚,在那里留下了两个儿子代表他的权利,享有他的领地。长子是撒马尔罕母亲所生,次子为喀什噶尔母亲所生,弟兄间彼此不和。后来他们二人都在担任国家工作中升了高官,但他们把那种不和传给子嗣。大的一个叫和卓·卡兰^①,在叶尔羌和喀拉塔克势力最大,是黑山派的创始人。小的叫和卓·伊萨克,在喀什噶尔和阿克塔克,即阿尔泰山^②,势力最大,是白山派的创始人。这两个和卓——即 53 撒马尔罕神学家——的后人都自称为和卓,但这又不能和曾经一度是统治者的那个家族所具有的更独特意义的称呼相混同。

① 清文献中作玛木特额敏。——译者

② 十七世纪时南疆伊斯兰教分为白山派(宗)和黑山派(宗),并不一定是因山而得名。白山、黑山又称白帽、黑帽。阿尔泰山为蒙古语“金山”的意思,在新疆东北,距喀什噶尔甚远,作者误以为阿克塔克山即阿尔泰山。——译者

第五章 中国人在喀什噶尔的统治

54

中国人征服准噶尔和东土耳其斯坦已是既成事实，那末这些新统治者做了些什么来证明他们在中亚进行武力干涉是正当的呢？他们采取什么措施来与被征服的各民族和解，什么措施来增进这一广大的地区的繁荣呢？这一地区本来是富庶的，但被几世纪的毫无长远打算的统治及无政府状态和内乱弄得民穷财尽。他们是否依照那些地区过去每一个统治者给他们作出的先例，只要贡赋到手就让人民自己去想办法、去挨饿或尽他们自己所能维持生活呢？中国的伊犁将军们以及他们手下派在喀什噶尔、叶尔羌、阿克苏、或库车的部属们是否采取了一种无为而治的政策，执行一种无原则的自私自利的行动路线以增加他们自己的个人财产，而证明他们自己与其他一切亚洲的专制君主一样，是既不关心当前事务更完全不顾明日的人物呢？要看清他们如何行动、他们做了些什么、他们没有做而可能做的是些什么，最好的办法是稍仔细地考察一下他们在喀什噶尔的统治。在这种统治中可以发现对也是伟大的统治民族的我们不无教益的东西；我们会从细察中国官吏在中亚所作所为之中，自愿地给他们高度赞扬，因为我们应该比其他任何民族更能正确估量他们的任务的艰巨性。

55 阿睦尔撒纳倾覆以后，中国人首先把他们的行政系统按下述基础进行组织：最高权力置于伊犁将军之手。在他下面设一参赞大臣，也即是一个副总督，治理喀什噶尔政事。他的驻在地是叶尔羌。在处理内政上，叶尔羌参赞大臣在天山以南为最高权威，但在对外事务上他必须听命于伊犁将军，只有伊犁将军与北京进行联

系。在这些行政长官之下，皆置有通常的协办大臣和领队大臣，即军事指挥官。所有的城市外面都筑有汉城，这种堡垒由中国军队——“和台”和东干人的混合部队——驻守。据估计，单是防守喀什噶尔及其邻接地带的就有二万人。军事职位只由中国人担任，较高的司法和行政职位也不让被臣服的民族担任。但这些就是中国人仅有的特权。

驻守叶尔羌的汗或首席办事大臣任命所有较低的官职，那些官职几乎全部由穆斯林担任。中国人采取的唯一慎为预防的措施似乎只是不让喀什噶尔人在当地供职，因此，一个叶尔羌人如果想在他们这个地区上担任什么公职，就得上阿克苏或其他离家乡颇远的地方去。但除此外，就没有什么限制了，而且，在名义上说，穆斯林的最高官职阿奇木伯克，品级与中国的办事大臣相等。他的部属全是穆斯林，唯一的例外是由“和台”部队构成的他的个人卫队。一切穆斯林之间的司法行政、钱粮、关卡税收和城市营业税，都在这些当地官吏的手中。只有在佛教徒和穆斯林之间发生诉讼时，办事大臣才进行干涉。因此，在我们面前呈现了富有教益 56 的景象，佛教徒的征服居然与穆斯林制度适应调和起来，中国人虽自尊自大，却不但可以做到容忍一个它几乎公开表示抱敌意的社会组织，而且还绝对地加以支持。这是中国人对穆斯林表示这种高出于亚洲式的抑制态度的唯一例子；如他们对待西藏，一个宗教神圣气氛特重的、而且是佛教的国家，情况就不相同了。然而，这种办法很有效。中国的实力只在绝对必需时才加以使用，因而得以节用；人民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自主，也就不感到他们是一个被征服的民族。他们的第一件操心事是完税，税率是完全不象在他们本族统治者之下那样苛重的；这件事办完，他们就可以无忧无虑了。

他们的本族人，阿奇木伯克，常常比驻在城外堡垒中的中国办

事大臣更暴虐；但他们也可以很快地对他的勒索得到补偿。当他们的阿奇木伯克，或如中国人所称呼的回王，在这个地方变为不得人心了，办事大臣就立刻把他撤换；即使他认为他们罪名不大，他总也要把他们调到另一地方去。在办事大臣的心目中，首要目的是维持秩序，同时他也很明白，如果居民不满意，除非使用他竭力避免使用的武力，秩序是不能维持的。因此，居民可以绝对信赖中国办事大臣，在他们与他们本族的首领发生纠纷时，可以从办事大臣那里得到公平的仲裁和公平的对待；作为是旧统治阶级的回王只能眼看着不幸的纳税人终于通过佛教徒征服者的宽大而躲避了他们的暴政。我们有理由认为，居民是看到这些显明的事实的力量的；中国人虽然不能在任何紧急事变中完全信赖纳税的、有忍耐心的喀什噶尔居民，但也不认为会从他们那里产生什么危险。

在最初五十年左右的时间中，中国人的统治保持着坚强有力的状态，办事大臣们与回王们保持着良好关系，并通过他们与居民保持着良好关系。但由于在本世纪初有一个新的因素进入这一问题，这些不同人物之间的内部关系也变得复杂起来，变得较不友善了。中国人原先给予阿克苏及阿克苏以西的各城市相当多的与浩罕通商的特许权利；在通商过程中浩罕成分就慢慢渗入这些城市，这种成份后来成为居民中的一个集团，享受着从中华帝国取得的繁荣，而对给予他们恩惠的人却并不怀有感激之情。若干年后，当浩罕的移民数目众多时，中国人默许他们在每一个城市里选举一个负责的首领；而这种首领，即商头，又为浩罕的汗所任命，浩罕的汗则是那些浩罕人所承认的唯一的现世君主。在这个国土上建立了这种原先是为了方便之计而准许存在的第三种势力，结果对中国人产生了最险恶的后果。“和台”很有理由说商头是“一切麻烦的起因”，至少在喀什噶尔是这样。商头本来是很谨慎的，决不会向中国官吏的统治挑衅，他们最初的目的也是为了

想不受回王的节制，而不是要与办事大臣对抗。在这一点上，他们得到了成功，因为中国人没有考虑到这些忙忙碌碌、鬼计多端的外国商头会造成什么危险。回王们已往一直是顺服的藩臣，但商头的花言巧语促使他们同他们的对手们相争。中国人对于他们的争吵袖手旁观，也许以为穆斯林人之间闹分裂，他们的统治就更稳固。在这一点上，他们错了。那些商头们，过了一段时期否认了他们对回王们的义务，就成了一切阴谋的中心，这些阴谋发生在中国统治的后半个世纪中；他们在对回王们取得胜利之后便神气起来，竟敢对治理他们的办事大臣的权力进行挑战。但这是更以后的事了。

当中国人在对待穆斯林居民上采取宽大政策时，他们并未忽视按权利应属于政府的其他一些责任。他们能够给予的最大的恩惠当然是维持秩序，公平地在许多诉讼者之间保持平衡乃是中国行政长官的第一条信条。在这个混乱的地区一旦能安定下来，贸易就复活了。大为衰落的当地工业又重新活跃起来；外国企业也被吸引到这个地区来，中国政权很快就使之成为中亚最繁荣幸福的地区。但中国统治者并不仅仅以维持良好秩序为满足。他们并不就此听任这个地方处在一个懒散民族的倾向之下，以他们所愿意的龟行速度前进；他们自己还作出榜样，使旁人感到应予仿效。富于进取性的甘肃、四川“和台”商人不仅到达哈密和吐鲁番的市集，他们之中有许多还深入到喀什噶尔本部，并定居在那里。这些难能可贵的经商者填补了在这个地区的生活中从来没有补足过的空白，因为他们带来了高度的事业精神和实践的智慧，还有他们特有的东西，资本。随着这些“和台”商人之后，财富和繁荣都增进了。叶尔羌、喀什噶尔、阿克苏和和田成了一等城市，1800年这个地区的人口达到从来没有达到过的数目。

在贸易上一切不同民族之间也有完全的平等。中国人并不象

一般所猜想的那样为他们本族人要求什么特殊豁免权。不远千里从兰州府到这里来觅取财富的“和台”，必须准备与浩罕人、喀什噶尔人、阿富汗人进行机会平等的竞争。他的籍贯并不能为他取得免税的优惠，或给他什么优于外国商人或当地商人的便利。当地商业的主要部分仍旧掌握在旧有商人的手里。浩罕和喀什噶尔同样都从贸易上取得利益，而中国，直接的利益比它们都少些。

自古以来，中国人名不虚传对于灌溉他们的许多省份的土地具有令人惊叹的办法。在中国本土没有大河流的地方纵横贯通的奇妙的渠道，在这个边远的属地上居然也照样出现了。东土耳其斯坦是世界上灌溉最为不良地区之一。实际上只在叶尔羌河周围有一条肥沃的地带，沿天山之麓向东伸及哈密。画在地图上的那些东一条西一条的小河流一年中有许多月份都是干涸的，即使是叶尔羌河，在那些月份也变为一条微不足道的小溪。为了补救这一缺陷，并尽可能多地栽培粮食作物，中国人在各地都挖了沟渠。在这一措施之下，耕种地区慢慢地、但稳固地在更大的面积上扩展开来，喀什噶尔、英吉沙和叶尔羌三城的附近地区变成著名的亚洲的花果园。谷物和水果出产丰富，从叶尔羌到天山南麓，旅行者可以一直在无边的果园中行进。各方面他看见的都是富裕和满足、
60 平静的农舍和微笑的居民，这些都是中国人治理下的成果。

中国人除拥有两条通他们本土的交通线，即天山北路和天山南路以外，还有一条从和田通西藏首府拉萨的大车路。通过这条路还与克什米尔有一些来往。过去名不虚传、至今还是有名的和田玉，大量地向西藏并经由巴楚向中国输出。这种矿物得到中国妇女的高度珍视，单靠它就可使和田的繁荣得到保证。黄金、白银和麝香也是这个繁荣城市的重要贸易项目。在中国人统治时代，还有规模颇大的地毯和棉制品工业。那里的金矿，除了两处以外，中国人走后一直未开工，一般认为没有什么人过问过，而要等人来

扶持才能重新恢复正常开工。

中国人对于阿克苏附近的煤矿也很关心，这些煤矿有些为私人企业，有些则为政府经营。煤是该城日常用品之一，但并不见它输出到邻近地带以外。我们知道，中国人对于发展当地内部资源手段比吸引外国人进来更感兴趣。因此，我们看见，矿产是特别地受到国家赞助和支持的。和田的金矿，阿克苏的煤矿，以及库车的锌矿都是显明的实例；而在过去所有的统治下，以及最近穆斯林的统治下，这些矿产一贯受到极愚蠢的忽视。

喀什噶尔在过去繁荣时期曾经驰名的那些专门行业也都未被忽视不顾。叶尔羌和阿克苏的皮革业，喀什噶尔和和田的丝绸业，从来没有象战云弥漫的乾隆年间那样繁忙，至于人民大众，即乡村 61 里的农业阶级也同样繁荣和受到很好的管理。贸易受到各方面的促进，征服者国家政权满足于只站在一旁监视它的臣民稳步地向以往从未达到、也不能达到的繁荣境地前进。

最后，中国人还注意改善当地各个部分之间的交通手段。为了保障他们的统治，绝对必需在伊犁和喀什噶尔之间有一条畅通而且常年通行的大路。因此，使用了大量资财开了一条路，在阿克苏北面，打通了天山南北，这条山路被称为木素尔岭，即冰河之意。这条路所经之地是那么崎岖险恶，常常有受到冰流和雪暴的侵袭的危险，因此，为了防止因失修而有一天时间不能通行，就必须置设常驻人员经常工作。首先，这条路的修筑已极费资金，维持的费用也许更大。中国人的这一最令人惊叹的工程，历经十五年失修，现在实际上已废弃无用了。如果中国人将收复伊犁，它无疑会被修复的。这条路西边的一些山路，即沿纳伦河到阿拉木图，以及通过捷列克到浩罕等道路，是阿古柏伯克选定来代替这条道路的。

中国人特别关心的另一件事是维护他们回中国的道路。因此，一条天山北路和一条天山南路是竭尽全力保持在效率最高的

状态中。前一条路在天山北面，经由玛纳斯和乌鲁木齐到哈密；后一条路在天山南面，经由阿克苏和库车到达同一地点。从库车到喀什噶尔和叶尔羌还有一条经由巴楚的道路，也有很多人走，特别是那些想在那个位处沙漠前哨地点改变行程折到和田和桑株去的人走这一条路。每一个城市里都设有专门机构，管理本地的道路，这一道路管理机构是极为重要而有用的机构。中国人采取这样一些措施，使他们的统治在五十多年中成为喀什噶尔和准噶尔的幸福。当然，这些公用事业设施有其财政方面的问题。如没有稳定的税收，道路就不能开筑，不能维持良好状态，沟渠就不能挖掘，这个地区就不能进行治理，不能促进贸易从而不能受到外国的尊重；而且，这种税收在开征之后十年，就是很多的了。

主要的两种税收是称为“乌什尔”的农产品什一税，以及对货物和牲畜征收的“扎朵提”(四十分之一)税。此外，在城里有房税，象我国的所得税一样是最基本的税收，还有一种军费税，视对外或对内战争所要求的军事需要而变动。国家也从矿场征取大笔的年税，这种税收一般用于某种公用事业。从柯尔克孜牧民也征取贡金，他们的牛羊马匹头数都有计算，而税率则甚低，他们纳税所换取的是受中国保护。在这几种巨额税收之外，还有一些小宗税收，如在市集上出售燃料税，在城里养乳牛的营业税。有一位记述喀什噶尔的著者说，这些税“成为一种现成的压迫手段，一种引起不满的重要根源，那种不满使统治者在危难、崩溃的时候没有一只手予以帮助，没有一个人对之表示同情。”但这种对原因和后果的臆说是很难站得住脚的。

当然，一切捐税都可以被税吏弄成现成的压迫手段；在目前讨论的问题中，税吏是穆斯林和当地人。但是，对于一切优良的政府，捐税都是绝对必需的，而且，当我们考虑到中国人怎样使用税收，它的行政官吏以怎样的为公精神把税收用在当地的公益事业

上,我们能说它把不公平的负担加于被征服的民族身上吗?而且,⁶³ 没有一个人能否认整个喀什噶尔在那个时候的普遍繁荣,在阿古柏伯克统治时代的极盛年代,居民们也怀着遗憾之情回顾那个时期。因此,要说中国人用苛捐重税压榨喀什噶尔,那是不合事实的;而且,如果说有什么卑鄙的暴政,那也是回王们所推行,而不是“和台”的办事大臣干的。

在灾难和崩溃的时刻,居民的确对他们最好的朋友采取了背叛的态度,或是说较普遍地采取漠不相关的态度,让精力旺盛的安集延人在他们的城市里与佛教徒的统治进行决战,这些外来移民是一直对那种统治表示敌意的。

喀什噶尔人的浅见为宗教狂热较高、野心较大的浩罕人效了劳;但是,那也要等到四十年的扰乱酿成前所未有的恶感,使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坏,致使过去被认为是宽大而不自私的政府被当作具有一切外族军事专制的黑暗色彩的政府,中国的统治地位才在东土耳其斯坦衰败。即使在那时候,中国也并未倾覆,而要等到在它本土发生内乱,分裂为三个敌对阵营,在中亚、在它自然疆界二千哩以外,它手里的剑才掉落下来。中国在喀什噶尔的统治一直到1820年,人们所见的就只是单调不变的繁荣的过程。从1820年到1860年,情况就有所不同,较不单调了,但也较为不能令人满意了。

1758年和1760年中国军队两次进入浩罕。塔什干在1758年陷落,浩罕则在1760年陷落。在对浩罕索取了一笔贡赋以后,中国人就退走了。乾隆朝的漫长年代中——一直到1795年——贡⁶⁴ 赋是按期交纳的。但在那年以后,纳贡情况就变得不按期了,在这两个邻邦之间也常常发生边界战事。最后,在1812年,在一个能干的汗统治之下的浩罕,不再交纳贡赋,中国人也默认了这种拒纳贡赋。但中国和浩罕关系的变化并不止于此;因为,几年后中国人认

为每年给浩罕一笔款子，以防止当时居住在浩罕的和卓家族搞反对中国的阴谋，是有利的。这笔补助金的数额为我国币值三千五百镑。在此以外，还允许浩罕的汗对安集延商人在喀什噶尔出售的穆斯林商品征收捐税。这笔税系由前面已提到过的商头所征收，对于那些贫穷的汗是一笔很可观的收入。但即使是这些让步和赏赐也不能令中亚的穆斯林满意，他们把中国人的温和看作是虚弱和衰败的表现。在穆斯林再起的那些年代里，这些商头成了最重要的政治人物。是他们，触发了在喀什噶尔可能存在的任何不满；是他们，把这个世界上从来未曾完全消失过的坏事都归罪于中国人；是他们，煽动了古老的和卓王族回来，在他们看来，能带来最完美的幸福的只能是和卓王族。由于这样一些原因在中国人所处地位的內部和外部发生作用，中国人的权威不用很久就受到更公开的挑战了。

在中国人所进行的屠杀中，和卓家族中唯一幸存的成员萨木萨克在孩提时逃到了瓦汉地区人迹难到的隐藏处。后来他从那里跑到浩罕居住下来，结了婚。这个王族成员有三个儿子，玉素普、巴布顶和最幼的也是最闻名的张格尔^①。1816年发生了第一次反
65 抗中国政府的暴动，在喀什噶尔西一个市镇塔什巴里克发生了一次小规模
的起事。这很快扑灭了，其首领也处决了。但这是风暴的前兆。

1822年，张格尔下决心收复他对喀什噶尔的权利，在他的长兄继续退居于布哈拉时，他已和喀拉柯尔克孜人联合在一起。张格尔纠集一批喀拉柯尔克孜人，在他们的首领苏兰奇伯克的带领下，进犯喀什噶尔城。他在城郊被阻击，被迫逸去。后来他又投奔纳伦附近博洛尔的柯尔克孜人，这个部族名义上是中国的藩属，在这些柯尔克孜人的支助下，张格尔又开始小规模地扰掠边境。一

^① 据《圣武记》说，张格尔是萨木萨克的次子。——译者

小支中国军队被派对他进行还击，把柯尔克孜人一直驱逐到库尔特卡堡垒。但中国人在得胜回师时在一条狭路上受到袭击，几乎全军覆灭。这是中国人在战场上第一次失利，这个消息立刻在中亚各地传遍。这给了和卓的事业以从来没有的活力，冒险者从各地投奔到张格尔现在在喀什噶尔各边境树立起来的旗帜之下。浩罕的汗对他的援助是给派了一个能干的将军伊萨·达克瓦，并给予他的事业以浩罕一贯对和卓家族所作的一切维护和支持。

1826年春，张格尔进攻喀什噶尔，中国人轻敌，从他们的堡垒出来，与他在战场上接战。一场大战爆发，详情我们不得而知，但结果是中国人战败。张格尔胜利进入喀什噶尔城，受到被商头煽惑起来的居民的欢呼，于是他自称赛义德·张格尔·苏丹，宣布为当地的统治者。他的第一个行动——这是喀什噶尔人民一定会有的一种真正感情的最有意义的表露——是以穆罕默德·赛义德的名义下令处决喀什噶尔的回王。 66

喀什噶尔的攻陷对于整个六城地区的商头是一种信号，召唤他们开始做他们早已作了长期准备的工作。英吉沙、叶尔羌、和田，立刻都起来了。受到突然袭击而且没有武装的中国人就在街上被屠杀，作为外族统治的显著标记的汉城被夷为平地。

喀什噶尔的汉城单独地坚守了一个时候，但最后还是在被围许多时日以后落入张格尔之手。张格尔取得全胜之后，他先得好好地处理他和浩罕的关系，那时候中国人是神秘地没有什么动静，倒还是不急之务。浩罕的迈玛达里汗认为张格尔的胜利全靠了他，要求某种传统的优越地位，凌驾于喀什噶尔属邦之上，这是和卓王公所不肯同意的。派赴喀什噶尔的庞大浩罕军队，在汉城之下损失了一千人之后被召回了；这支军队的召回是在新统治者的宫廷里发生阴谋和反阴谋的信号。他很快把那些阴谋扑灭了，把进行阴谋活动的浩罕将军伊萨·达克瓦降了职级，解除了他

自己对于浩罕的臣仆地位，这时中国人最后终于要回来的消息到了。

六城地区的西部虽已脱离中国人的掌握，但阿克苏和巴楚仍效忠中国。中国人还掌握着当地的军事重镇。而且，他们据有着伊犁，这使他们据有很重大战略有利地位，他们在东干族人口中拥有一种几乎取用不尽的为募集“征讨”部队所需的人员补充。在这里顺便指出，直到布素鲁克汗和阿古柏伯克时期，他们还掌有着这两个有利条件，而且，只要他们掌握这两个有利条件，即使是穆斯林最狂热的宗教信仰和浩罕对于和卓的庇护，也无回天之术的。
67 张格尔在喀什噶尔统治了六个月，中国将军在伊犁也作了六个月的彻底报复准备。由东干族、加尔梅克族、以及“和台”驻军集合而成的十万人以上的大军从伊犁出发，1827年1月开进了阿克苏。在这里集中全部兵力，伊犁将军和他部下一个名叫长龄的将军拟定作战计划如下：派一万二千人一支小部队经由阜窪勒河道越沙漠攻和田，余下大军则向巴楚推进。到巴楚后，再分出七千壮勇攻叶尔羌，主力则沿克孜勒苏河两岸进攻喀什噶尔。

他们的推进直到英阿瓦特庄才受阻，在那里张格尔集中了一支估计有五万人的军队，但也许不到此数。当两军互相可以望见时，双方摆好阵营，准备作近在眉睫的决战。按照久远以来的习惯，双方在第二天派出了斗士。中国方面是一个高大的加尔梅克弓手，与张格尔方面一个同样魁梧的浩罕军人遥遥相对。前者的装备是他固有的兵器，后者则是一支相当笨重的老式的火枪，当那个浩罕人忙着摆弄他的复杂的机械时，中国的弓手已用一支箭射穿他的胸部把他射死了。当然沒有一支军队会默认这种从它斗士的命运中暗示出来的战神的旨意，但在这一场合，正是：

“谁结束了他的为首的敌人的性命，
他的一方就在爭战中取得了胜利。”

经过一场剧烈而短促的冲突，喀什噶尔军队在混乱中退却了，第二天中国人从三面包围了喀什噶尔。夜间，张格尔害怕起来，逃 68 到喀拉塔克山。但山里的雪使各山口不能通行，终于在那个艰难险阻的地方躲藏了几天之后被中国人捕获。他的命运是叛变那个帝国的人通常得到的，他被押解到北京，凌迟处死。在这次战争中，乌什的回王伊萨克在反对和卓王公方面立了大功，由于他的功劳得到了被封为喀什噶尔回王的报赏。中国人在被毁的汉城旧址筑了一个新的城堡，即新城，留下了一支庞大的“和台”戍兵部队，归杨大人^①指挥。但伊萨克回王得到了象喀什噶尔郡王之类的封号之后不久就被撤销而被召回到中国去了。

中国的政权毫无困难地在这三个城市重建起来，东土耳其斯坦又安定下来。但中国人感到不得不采取的镇压和惩罚措施在居民思想里引起了较以前为烈的仇恨情绪。其实中国人只是使用了过去曾经被人用来对付他们自己的手段，但这些互相之间的暴行还是使在那里曾经存在过的任何友谊化为乌有。中国人所采取行动之一是把一万二千户穆斯林居民从喀什噶尔迁移到伊犁，这些命定将在这个地区里扮演一种重要角色的人后来被称为塔兰奇人，意为劳苦者。

中国人也决定要惩罚一下浩罕。他们和那个国家停止了一切贸易，如果他们能够继续封闭边界，那他们就没有事了。但是，浩罕当时的汗是迈玛达里汗，是那个国家中最有野心也是最能干的王公。他刚并吞了喀拉提锦，还得到了巴达克山的一些边地，约在此同时昆都斯的穆拉德伯克已并吞了巴达克山。要他忍 69 受中国人的挑战是不大可能的，他也相当谨慎地把他的进攻推迟到中国军队的主力撤走以后。但是，迈玛达里汗一听说中国人已回伊犁，他就把萨木萨克的长子玉素普从布哈拉的隐居处叫了出

^① 这个“杨大人”当是杨芳。——译者

来，让他带领一支军队，而派他自己的妹夫哈克·库里伯克担任指挥。中国人在明约洛失利，于是，象以前一样，阿克苏以西各城都起来反对中国人，并宣称拥护玉素普和卓。于是再一次的屠杀，玉素普的入侵完完全全是张格尔入侵的重演。但玉素普的胜利则为时更为短暂，张格尔曾统治了九个月，玉素普仅只挥舞了三个月的权杖。

中国人的军事行动由于巴里坤和陕西的一些小规模穆斯林叛乱而一直推迟到 1831 年春；但到了那时，当他们回来时，他们发觉玉素普和浩罕军队已在几个月前收兵回去了。事实原来是这样的：在浩罕进犯喀什噶尔时，布哈拉进攻了浩罕，哈克·库里伯克就不得被召回去应付比和卓的权利更紧急的事情。玉素普很不想单独与中国人周旋，也就与指挥官一同走了。浩罕军队的回去，足够消除从布哈拉来的一切危险，于是，在几个月以后，迈玛达里汗又开始军事行动，这一次是在东边，向中国人保护下的柯尔克孜人进攻。中国人对这些无关大局的战事已完全腻烦，就与浩罕订立了一个条约，据此浩罕在旧有一些特权外又获得一些新的通商特权，商头的地位是更重要了，而不是降低了。迈玛达里汗取得他所要取得的一切，并依照条约迫使他做的那样，的确对和卓方面表示了冷淡不再鼓动他们。张格尔和玉素普率领下
70 的两次起事对于中国人的威望无疑是一大打击。从各方面看来两次都已接近成功，这样，可以说是其中一次或两次都一样，中国人是公开地被击败了，虽然他们在中亚的威望本来极高，就象俄国现在的威望一样。但是，这与六十个太平年头培养出来的感情所受到的摇撼相比，毕竟还是小事。在佛教徒和穆斯林之间、在中国人和中亚人之间，一切旧日的恶感都在叶尔羌和喀什噶尔大屠杀中复活。喀什噶尔人表示不能感谢从中国得到的好处，中国人则由于同胞被杀，或许也由于对他们所表示的忘恩负义态度感到

愤怒，就报以同样的态度。他们不欣赏欧洲人在类似情况下总是采取的缓和态度，而按他们自己的古老方式进行报复。读者绝对必须记住，迅速地接续发生的张格尔和玉素普二次入侵，构成了中国人统治喀什噶尔历史中的转折点。在这一时期以前，中国在那里的德政可说是难于用言语足以公平评价的；在这一年以后，如使用同样的语言就是荒谬的了。对于这种变化，主要责任应该由浮躁、忘恩负义的喀什噶尔人自己来负，其次是由搞阴谋的安集延人来负。中国人至少有理由可以说，在公正地统治这个民族半个世纪多之后，当他们的非武装的同胞和军队成千成千地遭到突然袭击和屠杀的时候，他们只不过放松了对增进当地的福利的努力而已。

奇怪的是，而且看起来几乎是矛盾的是，这中间出现过一个短暂的间息时期，在这个时期中情况似乎又回到以往的繁荣兴隆之世去了；这主要应归功于中国总督手下的一个穆斯林副手。他的名字叫做作霍尔敦，他的职位高升到喀什噶尔参赞大臣这个从来没有让非“和台”担任过的高位。他出身于喀什噶尔人的家庭，但他总说他自己是在浩罕出生并长大，他在浩罕曾因政治罪被拘禁过。有七八年之久他把喀什噶尔治理得使当地居民和中国人两方面都完全感到满意，在他的一些公共事业中可以举出的是：在各城市外就在新近的叛乱中被毁的堡垒旧址上重新建起新的堡垒。这些堡垒现在称为新城而不再叫汉城。但在1846年作霍尔敦的统治由于浩罕和和卓家族方面的敌意而受到了干扰。

1845年，浩罕的迈玛达里汗死后，由呼达雅尔汗继位，^①但他的权力不是没有人争夺的。在当时接着发生的混乱状态中，浩罕的一些冒险家怂恿现在以张格尔的儿子们为代表的和卓们对中国人

^① 按迈玛达里汗死于1842年，由希尔阿里汗继位(1842—1845)，1845年，呼达雅尔接续希尔阿里汗即位。——译者

重新发动过去那种攻击。和卓们很喜欢听这种劝说，因而就为这种行动作准备。那时，在浩罕有许多冒险家，在过去迈玛达里汗是能够长期雇用他们的，但在一个较为和平的统治者呼达雅尔之下，他们在这个汗国的一些城市里就无所事事了。在这些人和一贯愿意出力的柯尔克孜人中间，喀什噶尔的和卓们不难募集一支人数可观但在内部结合上并不怎么样好的军队。那时，在浩罕有七个显要和卓，其中可以举出通常称为卡提·条列的伊山汗，布素鲁克汗和倭里汗。这次入侵不以他们中某一个人的名字称述，而说成是他们几个人合在一起的行动，称为七和卓之乱。

72 卡提·条列和他的弟兄们、亲戚们和相当多的部属向喀什噶尔进军，喀什噶尔总是这些侵入者的第一个目标，它在十三天的围困下由于阴谋手段而被攻陷了。但他们只取得了这一点成就；其他城市跟他们毫无关系，在他们过了两个月之久的为所欲为的放纵生活之后，中国人在科克拉巴特把他们击败，并把他们赶出境外。在喀什噶尔人的心目中，初次对和卓的这种入侵感到可笑；而他们在短暂的逗留中所犯的罪行则引起更大的憎恨。作霍尔敦由于中国人对他不满而下台，被撤了职，以后任命的参赞大臣们又是“和台”。和卓们有九年之久潜伏不动，但在1855年，倭里汗和他的弟弟基奇克汗又开始在喀什噶尔边境骚动。直到1857年，倭里汗才突破中国人在山隘中所设置的哨岗前卫阵地，但完成这一步以后，他的胜利就很快实现了。喀什噶尔在一次奇袭之下就落入他手中，在喀什噶尔的王帐中又高坐着一位和卓了。阿图什和英吉沙也落入他手中，他威胁了叶尔羌。但在每一处，中国人的守卫部队仍坚守堡垒，等待敌人力量的消竭和援兵的到来。倭里汗统治了将近四个月之后，他的军队终于被中国人所击败，这个和卓逃到遥远的达尔瓦斯，而被那里的酋长伊斯玛伊勒·沙赫把他引渡给浩罕。这个在所有的和卓之中最暴虐、嗜杀成性、荒淫无道的统

治者在很多年以后在阿古柏伯克手中遭遇到了他所应得的命运。他短时期的掌权年代使当地居民至今回忆起来还害怕，当地居民认为他是自古以来一切掌握这个国土的命运的人之中最穷凶极恶的人。中国人在这次战乱以后的惩罚措施比以前任何一次都更严厉；但是，虽然呼达雅尔和他的浩罕人在倭里汗的事情中扮演了那 73 样的角色，在这些如贝柳医生所说的“势不两立的人”之间的旧关系又恢复了。在这一事件之后，只有一次由柯尔克孜游牧部族入侵而造成的小扰乱，那次入侵的领头人也是中国人的报复行为中主要受害者之一的子弟，但这一次并没有政治上的重要性。

倭里汗的入侵是东干之乱以前那些和卓战事的最后一次。从张格尔的袭击到他儿子的进攻之间相隔三十二年，在这间期一共有四次入侵。张格尔本人是第一次，他的哥哥玉素普是第二次，玉素普的长子卡提·条列是第三次，张格尔次子倭里汗是第四次。这些入侵除随之而来的各种罪行外，没有一次在任何意义上值得一提，历次入侵只是给他们追随者以及他们自称根据神权所代表的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和痛苦。还必须指出，这些入侵是一次比一次道德败坏。这样，张格尔可说在各方面来说都是他们之中最好的一个，是根据他自己的智慧公平地进行统治的。他的兄长玉素普较胆小，但对于他所负使命的神圣性也还有一些概念。但从他们到卡提·条列，那就是水平大为降落了。那个和卓似乎只关心保障他个人的舒适和享受，全然不顾他的臣民在他的官吏专横统治下的疾苦。但下一个从“山上”来的和卓王公倭里汗，则在罪恶和暴虐上又远远超出他的堂兄，他完全缺乏目的，更说不到荣誉了，相差的程度一如卡提·条列不如他的父辈。可以毫不踌躇地说，根据布素鲁克汗在他掌权的几月中所作所为，如不是阿古柏伯克使他变得无能为力，他会以他个人独特的罪恶超越倭里汗之上。 74 读者对于这个邪恶狂暴，罪不容赦的家族不会有多少兴趣的。但

为了公平评价中国人和阿古柏伯克，应该如实地描画出他们的敌对者才对。特别受人尊敬的哈司拉·阿法克^①的后裔所能产生的一切神圣性，关于他们的某些祖先的善行的一切传说，对于一个本族统治者自然产生的一切敬爱，对于一个外族统治者，不管是做了多少好事的统治者必然隐藏于心的憎恶，所有这一切都被上述四个和卓的前两个的弱点和失败，被后两个的残暴、冷酷和放荡毁灭无余了。当布素鲁克汗到来时，他发觉对和卓效忠已只是少数几个家族的传统，而不是整个民族的传统了。

中国人与张格尔作战后如果对他们的惩罚情绪有所节制，对浩罕人以外的任何人宣布完全不究既往，然后把他们象旧日般的精力完全放在和平事业上，我们相信，中国人的统治是会永久保持下去的。在那时，中国人还很强大，足以把浩罕丢在一边，断绝与那个国家的一切交往。驱逐商头，并断绝两国之间的关系，中国人也许反而可以把四十年之久一直存在于他们面前的危险除掉，这一危险最后在东干人也起来时终于使他们倾覆。玉素普之入侵确实是由于中国人的压迫所引起的，即使在这以后才采取宽厚措施那也还不会完全无效，并且还可在作霍尔敦当政的恢复时期中巩固他们的地位。但中国人不懂得宽大的好处。他们可以在日常的生活事务中公正无私，但对于反抗他们权力的人，他们就不能给予一点人道待遇了。对于一个反叛他们的人，就一定得处死；历史告诉我们，对于一个民族，命运的遭遇也不相差太远。为了对付反叛者，他们毫不踌躇地用最可鄙的办法以补充他们的军事力量。已经接受了光荣条件的防守军队也被无情地屠杀；放下武器听任他们处置的王公被解到北京去绞杀或凌迟处死；这些事情是中国历史中常见的，在它经营中亚的历史中，情形也一样。我们虽然很想在这张除此之外就十分美好的画面上把这些污点稍加掩饰，但我

^① 参阅第三章。——译者

也不应该想把这些污点完全讳而不言。必须把它们陈述出来，那才能了解中国统治方法的全貌；如果居民保持安份守己，这种统治给予的好处是无可怀疑的。中国人愿意公正地统治一个安份守己的民族五十年或五百年，并带他们进入繁荣而平安的道路；但如果他们反叛，如果公然反抗他们的政权，如果邀请外敌进入国境，那末不论民族之间已有五十年或五百年的关系，惩罚将会象喀什噶尔所发生的那样厉害、那样残酷，并且，就某种较高的意义上说，也会那样错误而又愚蠢。没有什么理由可以期望中国会在目前正在演化的情况下改变它的要求“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古老习惯。

第六章 阿古柏伯克的出身及其在浩罕供职期间的经历

我们现在已经把喀什噶尔及其邻近诸国的历史探索到 1860 年，直到布素鲁克汗和和硕伯克穆罕默德·阿古柏领导下最近这次和卓入侵以前。在叙述那次冒险事业之前，有必要让读者知道这位未来的阿塔勒克哈孜的过去经历。希望以前的几章会有助于读者了解中亚情况并帮助那些研究这个问题的学者领悟到阿古柏伯克是怎样取得成功的，他在哪几点可说是在近代亚洲历史上完成了一番独特事业，而有资格要求人们承认他是个伟大的统治者。

穆罕默德·阿古柏约在 1820 年出生于浩罕汗国的一个兴隆的小市镇匹斯坎特。他的父亲普尔·穆罕默德·米尔扎在一生的不同时期曾在他所住城市的政府里担任负责的职务。就这样，本来是靠近撒马尔罕的迪比德人，他在迈玛达里汗在位期间，移居到霍占，想挤身于伊斯兰教宗教师阶级。在那里，尽管他进了一个宗教学院当学生，但由于某种原因，他似乎改变了主意，并没有担任圣职，而去从事世俗事务。他很快地被任命为浩罕的一个地区和
77 城市库拉玛的哈孜并和一个当地女子结了婚。由于这次结婚他有了一个儿子，穆罕默德·阿利夫，这个人曾经在喀什噶尔担任过几个重要职位，特别是色勒库尔的长官；但是由于无能呢，还是由于什么别的原因，阿古柏伯克的这个同父异母兄弟，近来似乎已经很不得意了。普尔·穆罕默德，或者象人们更常称呼的，穆罕默德·拉提夫，约在 1818 年，从库拉玛迁到匹斯坎特，在新地方安居下来不久，他又一次结婚，他的第二个妻子是匹斯坎特的哈孜，谢赫·

尼扎姆丁的妹妹。阿古柏伯克就是由这次结婚所生。阿古柏伯克父亲的家庭似乎原籍本是巴达克山边界上的喀拉提锦，当乌兹别克人征服那一地区的时候，穆罕默德·拉提夫的父亲（当时还是个幼儿）就逃难到浩罕来了。不能确定穆罕默德·拉提夫是在他们来到迪比德以前或是以后出生的；现在知道，他曾自称是帖木儿的后裔。不管这种自称是不是当他的儿子正在飞黄腾达的时候提出的，它的正确性是无法证明的。所以，阿古柏伯克的父母并不是全不夸耀自己的出身的人，看来，在阿古柏伯克的才能把他们的好运提高到从来没有过的高度以前，他们几代以来所遭受的厄运已在开始消逝了。除了阿古柏伯克的父亲和祖父曾经担任过一个重要城市的哈孜这样显要职位之外，他的姊妹还嫁给了塔什干总督纳尔·穆罕默德·汗；以后我们会看到，这一门亲戚关系对于年轻的阿古柏的晋升大有帮助。

匹斯坎特有时写作 Pskent 或 Biskent，目前仍是塔什干以南五十哩，通往霍占路上的一个繁荣的小市镇。它的居民是一些俭约而性情温和的人民，他们因为伟大的阿塔勒克哈孜，伊斯兰教的支持者，使俄国人害怕的著名人物原是他们当中的一员而感到非常自豪。在这个小居民区里有许多塔吉克人，这一原因和其它一些原因，无疑地诱使本身就是一个塔吉克人的穆罕默德·拉提夫在那里定居下来。在匹斯坎特以东，山脉蜿蜒伸展，构成了天山和克孜勒牙尔特山山脉，在这些高原地带，聚居的塔吉克人很多。塔吉克人原出波斯，所以他们是雅利安人种，和西土耳其斯坦的统治阶级突厥人或鞑靼人截然不同。然而，许多世代以来，他们在国家组织中的经历境遇却受到限制，因而很不公平地被认为是劣等种族。英国作者们也犯了这个错误，并且把突厥人对于这个从属的种族所作的定义当作正确的定义而接受过来。其实情况正好相反，塔吉克人在智力方面比他们的任何征服者都要高出一头。他们外表仍然

具有美好的身材并留着飘逸的长须，这些是雅利安血统的人区别于他们的对方鞑靼人的标记；在身高和体力方面他们也使中亚细亚的任何其它种族相形见绌。阿古柏伯克就是这个种族的代表，尽管他的大半生都在几乎尽是鞑靼族的统治民族中度过，但他的拥护者中较为杰出的一些人以及他的军队的优秀人物，却都以他们也代表诞生于印度高加索^①的统治种族而自豪。塔吉克人仍然说着一种波斯方言，这就使得他们的伊朗血统几乎是无可争议了。

穆罕默德·阿古柏的早年在他匹斯坎特的家中度过。据说本来打算让他继承他父亲所曾放弃的职业。他在青年时期非常固执任性，对于压制他的冲动的任何约束都不肯顺服，所以，如果曾经认真地考虑过想把他训练成为一个“毛拉”^②的话，这种打算也早在他成人以前被打消了。他一生的头二十年似乎是悠闲无事地在匹斯坎特度过的，后来他忽然下决心要在浩罕混乱政局中尽其所能去找寻幸运。我们发现，1845年他在新即位的汗王呼达雅尔随从队伍中当了“玛赫拉姆”即侍从，以后不久，由于他的姊夫塔什干长官的帮助，他被任命为胖色提巴士即五百夫长。这是1847年的事，约在同年，他和阿克摩斯杰德地区祖艾里克村的一个乞卜察克女子结了婚。在这次婚姻中他得了三个儿子，即库达·库尔·伯克、胡里伯克和哈克·库里·伯克，关于他们，以后我们将会听到更多的事情。后来，在1847年他被提升为和硕伯克，更容易理解的称呼是“大臣”，委他治理锡尔河上叫做阿克摩斯杰德，意为“白清真寺”的地方。他光荣地担任这个职位达六年之久，直到1853年俄国人开始了那个到现在为止还未结束的前进运动为止。那时，俄国还没有获得它现在占有的许多战略据点的任何一个。那时，锡尔河还远在它的边界以外，就象现在的乌浒河远在它

① 指兴都库什山。——译者

② 伊斯兰教教职，其职司为讲解教义和法典。——译者

的边界以外一样。阿克摩斯杰德建造在该河的下游，是浩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哨地点，是俄国人要从位于锡尔河口的卡查林斯克采取军事行动所必经之路上一个巨大障碍。毫无疑问，这个前哨是鼓励附近的所有劫掠者继续他们对俄国商队进行劫掠的，因此，俄国人就决心要把它从其原主手中夺下来，或者把它夷为平地，或者把它变为一个俄国要塞。彼罗夫斯基将军受命执行这个任务。从卡查林斯克或第一号堡垒沿锡尔河两岸到阿克摩斯杰德的距离约二百哩多一点。不需要作许多后勤供应方面的安排，行军的距离也不需要耽搁这位俄国军官太多的时间就可以开始他对于这个堡垒的作战行动。他率领着开到城下的军队人数，和近代军队比较起来，也许并不算多，但凡足以使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强大可畏的装备则都非常齐备。炮兵力量比一般认为必要的更为强大，这个远征军在工兵和骑兵方面发挥的实效更大。另一方面，阿克摩斯杰德的守卫部队在粮食和弹药的供应方面都很差，而堡垒本身，无论是位置方面或建筑方面，都没有任何特征足以使一个工兵军官认为它能够支持得住二十四小时的炮击。俄方的阵线是最受人称许的方法构成的，但他们的进击两次都被击退，而他们的地雷也两次被反地雷措施所破。俄国人用二十六天的工夫进行了迅猛的炮轰，但在整个这段时间内浩罕方面的防御却是顽强而坚持的。不过守军方面一切突围的努力都未能奏效，而且在这么长久的炮击之后，堡垒的好几处既已被洞穿成宽大的缺口，就没有多少希望再进行抵抗了。既已按照军人荣誉的最严格的法典要求作过一切努力，这位坚定的司令官只好承认继续抵抗已不能有任何收获；由于得知俄国人正在准备进行拂晓袭击，就立刻打发一个使者到俄国指挥官那里去，表示驻防军愿意在体面的条件下投降。曾经希望在这里获得轻易的胜利，并希望在别的地方获得进一步胜利的彼罗夫斯基将军，对于象阿克摩斯杰德这样微不足道

80

的地方向他所作的抵抗感到非常恼火，他在接待来自堡垒的使者
81 时表现了毫不掩饰的不耐烦态度。尽管求降书由堡垒的司令官以
极其谦恭的辞句写成，彼罗夫斯基将军也不屑一顾，反而向使者宣
称第二天即将用突击方式攻取堡垒，使这个使者大吃一惊。在一个
得胜的将领应该表示宽容大度的时刻所作的这种专横的行使其权
力的声明，第二天即付诸实践，而且当然是成功了，但它并不增加
这位军人的光彩，反而使人对于俄国将领们任意发号施令以及白
色沙皇的文明代表对中亚人所抱的看法中得到颇有启发的说明。
说彼罗夫斯基将军是急于想得到圣安娜或圣乔治十字勋章才这样
平白无故地残暴，毕竟只不过是加重其罪名罢了，而阿克摩斯杰德
改用征服者的名字命名为彼罗夫斯基堡，并不能使他的名字不朽，
而是使他的臭名远扬，使守卫者的勇敢行为永垂不朽。在堡垒失
陷后的冬季，阿古柏伯克和浩罕王的兄弟沙希布·汗曾经试图收
复，但这一尝试失败了，俄国人以后一直没有从他们新获得的领土
上退出过。

1845年，呼达雅尔汗，依靠穆斯林·库里的出力，登上了浩罕
国王的宝座。穆斯林·库里是一个乞卜察克酋长，为人非常机警，
有办事才能。当他担任宰相职位的时候，浩罕被治理得太平无事，
上下相安；但是，象中亚每一个类似情况下那样，统治者对于他的
大臣受到爱戴，很快就变得忌妒起来，尽管统治者本身的地位实际
上是由于他所暗中怀恨的人的聪明措施而获得巩固的。柔弱的呼
达雅尔汗和他的大臣穆斯林·库里在我们现在讲到的这十年期间
是这样，布素鲁克汗这个荡子但又是和卓的正统代表和他的将军
82 与大臣，和硕伯克穆罕默德·阿古柏在下一个十年里也是这样。
1858年，穆斯林·库里由呼达雅尔汗下令逮捕，并被野蛮地杀害。
这个不幸的浩罕统治者的衰微可以追溯到从这件事开始，最后终
于落到变成靠俄国恩施过日子的年金领取者。尽管阿古柏伯克由

于英勇守卫阿克摩斯杰德而在某种程度上出了名，但自从那件事以后就被称为仅仅是弥尔，意为酋长，在官阶方面似乎有所下降。其主要原因大概是由于他未能收复失地，而不是由于在守卫方面的失败。然而，他还是被派负责基劳奇堡垒的守卫任务。这一职位他一直担任到穆斯林·库里被杀害为止。

呼达雅尔汗有一个哥哥叫毛拉汗，当伟大的统治者迈玛达里汗去世时的倾轧纠纷在国内平定以后，他曾被穆斯林·库里排除在外。现在，赋予呼达雅尔政权活力的穆斯林·库里已死，毛拉汗和他的党羽就再度搞起阴谋来了。几个乞卜察克和吉尔吉斯领袖参与了他的事业，阿古柏伯克立刻成了他的最积极的支持者之一，呼达雅尔汗被废黜而暂时退隐。阿古柏伯克由于对新统治者的效劳，被任命为沙哈瓦尔，这是一个相当于侍从或宫廷主事的官职。他很快恢复他原来的和硕伯克级位，并被任命为边境要塞库拉玛的长官，这是他父亲曾经在那里担任过哈孜的地方。1860年，他被召到塔什干协助浩罕的讷克布伯克^①卡那阿特·沙赫进行准备，以防俄国越过边界，俄国在一段时期以来似乎一直威胁着浩罕，那时他就进身到更显要的地位了。这时，执政只有两年短暂时间的毛拉汗被杀，呼达雅尔汗又从他的藏身处出来。他受到卡那阿特·沙赫和阿古柏伯克的欢迎，为了酬答他们的支持，他同意忘掉过去。作为酬报，阿古柏伯克得到了库拉玛长官的职位，正是在这样的混乱时期，吉尔吉斯的酋长阿利姆·库里，出现在舞台上。此人具有他的前人穆斯林·库里和在人民眼中看来是他的后继者的阿古柏伯克的许多特出特点。毫无疑问，他有很大的阴谋活动能力，但在行政才能方面则逊于前者，在军事技术方面则逊于后者。他现在把希尔·阿里·汗的孙子，沙赫·姆拉德抬出来作为王位继承人，而且很快地得到阿古柏伯克的参加。阿古柏伯克再

^① 浩罕官名。——译者

一次背弃了呼达雅尔汗,而我们必须记住,呼达雅尔汗一直是把阿古柏伯克当作朋友看待的,而且从早年起就是他的好朋友。这一阴谋没有成功,当呼达雅尔汗的军队逼近的时候,阿古柏伯克就放弃了阿利姆·库里委托他守卫的霍占,避难到布哈拉。在那里他受到很好的接待,作为一个附属于宫廷的贵族居住下来。1868年布哈拉的爱弥尔穆扎夫尔丁,为了给他的姻亲呼达雅尔恢复王位,率领大军进入浩罕,因为呼达雅尔由于阿利姆·库里的阴谋,又一次被废黜了;阿古柏伯克随着这支军队,从而再一次,也就是最后一次,出现于纷纭扰攘的浩罕政治舞台。布哈拉军队很快就被调回,呼达雅尔汗处于孤立无援难以应付困难的地位。不出几个月,就在阿利姆·库里和阿古柏伯克以及其他主要贵族之间作出了反对呼达雅尔汗的安排。原先得到阿利姆·库里拥戴后来又被他杀害了的苏丹·姆拉德既被这样实际排除之后,这位国王制造者又立苏丹·赛义德来代替他。由于这次新的共谋阿古柏伯克获得了

84 很大好处,他恢复了他原来的官职和财产,而且还被派去充当从前担任过的库拉玛长官。他尽可能地搜罗了许多同盟者,并带他们去协助自己收复霍占。当这个重要城市正要到手的时候,摄政者阿利姆·库里在他前往夺取并平定首都塔什干的路上经过库拉玛。他指派了他自己的亲戚,带有胡戴奇头衔的海达尔·库里做库拉玛长官,而把阿古柏伯克作为随员带到塔什干。在他们到达塔什干后不久,就有消息传来说俄国已经占领了奇姆肯特,接着,被切尔尼亚耶夫所驱逐的军队中的残存者很快来到,并证实了这个消息。这是1864年4月,到那年的10月,当俄国人逼近城区的时候,阿古柏伯克正在从事巩固首都防御工事的工作。当切尔尼亚耶夫将军的军队出现在城郊的时候,阿古柏伯克以无以复加的轻率态度,在原野上迎战。正如可以预料到的,俄国人战胜了,阿古柏伯克被迫率领他的败兵残卒,躲进塔什干城里。俄国人本

身也受到一些损失,也许是被他们的老敌手的勇敢行为吓住了,但更可能是由于在运送补给品方面遇到了困难和没有攻城 的炮队,俄国人认为比较明智的策略是退到奇姆肯特等候援军和其它必需品来到。在这次挫败后没有几天,阿利姆·库里亲自率领一支大军来到塔什干,在俄国人回来以前全力以赴地加强防御工事。可以充分肯定,阿古柏伯克在这个第一次指挥一支可观的部队的时机中,让自己的急躁性子压倒了谨慎的考虑,和切尔尼亚耶夫的训练有素的强大部队在战场上接战真是愚不可及;他如果让那个将军 85 对塔什干进行围攻,当阿利姆·库里援军到达时,他就有可能给予俄国军队以严重的,在当时来说也是决定性的打击。阿利姆·库里发现,由于他的副手的过分急躁,有一半部队因战败而感沮丧,他自己只好采取一种静守的策略。俄国人直到阿古柏伯克前往喀什噶尔以后才回来,但这时他们发现阿利姆·库里已尽其力之所及,作好一切准备来迎接他们。最初,在一次小冲突之后,俄国人被迫后退,浩罕人把这叫做一次胜利;但在 1865 年,俄国人就以更大的兵力出现于城前。阿利姆·库里率领一支远比俄国人数为多的军队,在塔什干以北几哩的地方对他们进行攻击,正当胜负难分的时候,阿利姆·库里在率领一支吉尔吉斯骑兵勇猛袭击时,胸部中了一颗枪弹而跌下马来。他被一个忠诚的军官带出战场,当夜在塔什干死去。阿利姆·库里的行动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是一半被无私的爱国心所驱使,较多的一半是被个人动机所驱使。阿利姆·库里已死,阿古柏伯克又远在另一个战场,浩罕继续保持独立的一切希望都消失了。在这次重创之后,俄国人就加紧围攻塔什干,浩罕人在急难中求救于布哈拉。俄国人赶忙占领契纳兹予以阻截。1866 年 5 月,即塔什干被切尔尼亚耶夫占领十一个月以后,俄国军队在罗曼诺夫斯基将军指挥下,于伊尔扎尔一战,击溃了布哈拉的军队。正当敌人俄国军队和同盟者布哈拉军队都在他的国土上的这样一

86 个无政府时期，呼达雅尔汗再一次取代了阿利姆·库里所扶植的苏丹·赛义德，当战事终了时，呼达雅尔只占有着浩罕南部。这个汗王表现出是个胸无大志的人，因为在几次流亡时期，他都以一种在处理公务时所从来没有表现过的精力来从事他的私事，当他的全部国土被吞并，他自己降为一个平民，在俄国宫廷领受津贴的时候，据说他不仅感到很幸福，而且还表现了在他显贵时期所没有的品德。不幸的苏丹·赛义德在浩罕境外流浪了几年后，于1871年冒险回来时就被处决了。赛义德的许多党羽在被俄国人击败时以及在呼达雅尔推翻了他的竞争者时都逃到克孜勒牙尔特山区避难，从那里又前往喀什噶尔和阿古柏伯克会合，我们将看到，他们到达那里正是最恰当的时候。

现在再回头来说阿古柏伯克。他在塔什干城前被打败以后，就被阿里姆·库里任用来修补该城的防御工事并从整个地区招募军队，但他的声望由于这次挫败而降低了。在这个吉尔吉斯酋长和这个塔吉克幸运军人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互相猜忌。阿古柏伯克把阿里姆·库里看作是自己进一步晋升的障碍，而阿里姆·库里则认为这个和硕伯克是自己的一个可能的竞争者和取代者。所以，任何把阿古柏伯克压在背后、或者甚至把他完全搞掉的借口都会很受阿里姆·库里的欢迎。直到这位失败的将军几个月之后前往喀什噶尔，我们没有听到他的什么消息。他不得不在别的地方，在别的敌人身上，把他从俄国人那里所受到的污辱洗刷掉。

当塔什干发生这些事件的时候，从伊犁和喀什噶尔边界上一个柯尔克孜王公，思的克·伯克那里来了一个使者。他带来的消息是，他的主子已经利用中国人自相冲突的机会夺取了喀什噶尔
87 城，他请求浩罕汗把一个和卓后裔送去，以便把他立在王位上。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思的克·伯克只是对喀什噶尔进行了包围，当他发现自己遭到顽强的抵抗时，就想出拥立一个和卓王的计划，以挽

救自己垂败的努力,但很明显,当时塔什干的每一个人对于喀什噶尔事情的真实情况都毫无所知。然而,浩罕的政策一直就是,在东土耳其斯坦维持他们的利益不受损害并用各种可能的方法削弱中国人的威望。一个带来了在喀什噶尔发生新的叛乱的消息的使者,肯定在塔什干是会受到友好接待的,即使他不能带着明显的友好证物回去。但这一回由于俄国方面的军事进军的危险迫在眉睫,国家的一切努力都集中于准备防御方面,不管阿里姆·库里对这事的前途会有怎样的想法,也不管他对其目的多么深表同情,他也不能对这位柯尔克孜使者的使命提供任何援助。但当张格尔汗唯一残存的儿子,布素鲁克汗,或者是出于自愿,或者是象有些人所说的,受到阿古柏伯克的怂恿,表示愿意去提出他对喀什噶尔王位的要求的时候,阿里姆·库里就对这计划表示赞成,并在不可能积极参与的情况下给予了道义上的支持。但是,他仍旧还是指派和硕伯克穆罕默德·阿古柏以总司令或勇士长的身分给布素鲁克汗效劳。就这样,阿里姆·库里摆脱了他的麻烦的下属,派遣了他所害怕的唯一能够取代他的本地人物,去干一件很可能以耻辱和失败告终,但实际上却建立了一个帝国的差使。

直到这时为止,阿古柏伯克很少存有前途显赫的希望。的确, 88 他已取得了一个英勇军人的好名声,尽管是一个不很审慎的军人;在他的国家二十年来历史上层出不穷的阴谋活动中,他也有相当大的一份。但是谁做梦也没想到他会具有战胜优势军队的才能,并且还能够在他手中的废墟上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国家来。最好的意见也只会是,他将会象一个军人和忠诚的穆斯林那样勇敢地死于疆场。当他着手征服喀什噶尔的事业的时候,他已不再是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而是一个把他的火暴性格和巨大野心掩藏在宗教热诚和外交家式的冷漠的外表之下的成年人。在中亚阴谋活动最多的宫廷中二十年的经验,使得他浑身筋肉都完全服从他的

指挥,即使在他一生中最不幸的时刻,他也总是表现出镇定而沉着的气概——相信真主的旨意而镇定,认为自己具有应变的才能而沉着。有一个事实说明为什么他扬名于世非常缓慢,那就是他的升迁完全要依赖他自己的才能。他没有财富,没有庞大的党羽,而他的两个上司,一个乞卜察克人和一个吉尔吉斯人,穆斯林和阿里姆·库里都是具有和他本人几乎同样长处的竞争对手,而他们两个都拥有个人的权力和家族关系,使他们远远超出于这个能吃苦的军人和宫廷侍从之上。有些毁谤他的人利用他的贫穷散布他和俄国人做过交易的谣言,但是,尽管这些谣言所包含的细节都是在非俄罗斯地区发生的,大概也是毫无真实性的。姑不论其真假如何,在阿克摩斯杰德失陷以后,主要的指控说,他守卫阿克摩斯杰德地区不力,乃是由于他从俄国人那里得到过一笔巨大贿赂。另一个

89 指控是,在1863年,他从布哈拉回来以后,他没有阻止俄国人的推进,是由于一种金钱上的考虑。在这两个事例中所提到的钱数都很大;除了这些谣言的明显虚假外,我们只须考虑到,他是不值得贿赂的,而且他之反对俄国人完全是缺乏预见的宗教狂热表现。细想一想所有这些情况,这一类谣言就可以澄清了;而且,尽管我们知道,阿古柏伯克有一个追随者,他虽然不是这些指控的创作者,却确认过这些指控为真;但在我们看来,如果这种传说是真的,那么俄国人老早就会把这个事实公诸亚洲人民之前,也会要求阿古柏伯克在作喀什噶尔爱弥尔的时候对他以前的雇主采取比较友好的态度了。阿古柏伯克不曾能对俄国效过劳,以报答传说中他曾得到的数千英镑,仅仅这一简单理由就足以粉碎这整个虚构了。如果阿古柏伯克的一生有一件事能够较充分为他作证的话,那就是他是一个最狂热的穆斯林,而作为一个人,他是把俄国人当作伊斯兰教最可怕的敌人而深恶痛绝的。如果他在宗教上的不宽容态度不是真诚的,那么这个人的整个一生活活动一定是最大的招摇

撞骗；正是这种不宽容的态度使他不可能对俄国的策略表示任何默许的态度，由于他很早就和伊斯兰教教派有关系，而且他的外祖父曾经在教会里担任过重要职位，阿古柏伯克一直以观点的严格正统性而著名。在他整个一生中他似乎以保持教会紧紧和他在一起为其主要目的。当他后半生在喀什噶尔陷入极其险恶的窘境的时候，当他的某些最忠实的党羽抛弃他的时候，甚至当曾由他推上宝座的布素鲁克汗宣称他是一个叛徒和卖国贼的时候，只要宗教师们仍由他控制着，他就从来没有丧失过勇气；在另一方面，他们⁹⁰也认识到他们这位战士的忠贞，不管人家说好说歹，一直支持了他。当他住在“圣城”布哈拉的时候，他得到了几个全亚洲最著名的伊斯兰教教士的青睐，而且他曾立过各种誓言矢忠于教徒与其宗教师之间的关系的神圣感情。正是在这里他公开宣称他打算前往麦加去朝圣；当他统治喀什噶尔的时候他曾经在好几个场合重复说过这个打算，但由于他的地位和国家处在一种不稳定情况中，总是不得不派人代为执行。当他成为一个统治者的时候，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重新执行伊斯兰教教规，并给纪念主要和卓圣裔而兴建的几个圣殿捐赠基金。在他一生的每一个危急关头，他总是努力用这类方法使他的利益和他所信仰的宗教的利益等同起来，当他成为一个负责而成功的君主的时候，他过去的经历对他是如此地有利，使他在整个亚洲很容易地被认为是伊斯兰教的最忠诚、最可畏的支持者。

在他一生的这段时期，他被一个认识他的人描述为是一个身材短小但体格强壮的人，有一副非常聪明而且美观的面貌。他在浩罕的盛衰浮沉的经历，经常有面临被暗杀或被处决的危险，明天的结果如何，对他来说，显然已成为一种次要的考虑。长期宫廷阴谋的经历，使他的容貌养成一种无动于衷的神情，在一个偶然的观察者看来，会以为是迟钝而索然寡味的。但是，当话题转到他特别

感兴趣的事情上,例如俄国的进犯、伊斯兰教的将来或英国的政策等问题时,他就会抛开面具而立刻成为这样的人:其意见本身既有一些道理,更由于他的声音和态度具有一种特殊的魅力,几乎使人
91 不得不信服。他一直以衣着朴素,没有大多数亚洲人所具有的爱好虚饰、炫耀的特征而受到人们的尊敬;当他的权力达到最高峰的时候,他也不过是一个住在王宫里的军人而已。正如人们关于帖木儿说的那样,这位阿塔勒克哈孜就是把“勇敢的脚步放在忍耐的马镫里”,很显然,他一心要向成吉思汗、帖木儿和巴卑尔学习伟大军事胜利的经验。以上是关于布素鲁克汗的远征队总司令的一些描述。至于这位和卓本人,年龄和他的僚属大约相仿,但在一切其他方面,彼此之间却大不相同。他是一个胆小鬼、爱虚荣,爱好各式各样的奢华,具有他的种族所特有的奸诈和反复无常的性格,在他过去的生活中他从来没有做过任何事来弥补他所欠缺的最普通的德行。虽然他曾参加过倭里汗的远征,但全无任何优良表现;在其后诸和卓占有喀什噶尔时期,寥寥几个星期中,他也许比他的其他族人更以公开的、无节制的放纵行为,受到人民的唾弃。就是这样两个人,在1864年末期,从塔什干出发,去收复一个国家。很少人敢预言,他们会有什么成功的希望,至于象阿古柏伯克所获得的那样的成就,那就肯定更无人敢说了。现在就让我们来叙述他们在东土耳其斯坦的经历吧。

第七章 布素鲁克汗和阿古柏 伯克对喀什噶尔的人侵

92

如我们所已经看到的，中国人在东土耳其斯坦有好几次由于和卓的权位要求和浩罕的秘密的或公开的阴谋诡计而受到威胁。但是，只要他们自己能够团结一致，不管环境多么复杂艰难，他们总是取得了胜利。张格尔汗的一时成就，由于他占领这个地方期间的过分残暴行为和中国人在他逃跑以后绥靖这个地区时所花的精力和所显示的巨大力量而被消灭无余。最后一次在倭里汗领导下的入侵，除了称之为一次劫掠性的入侵外，就很难用什么别的名称来称颂了。但在 1859 年以来的几年中已经发生了很大而且重要的变化。中国人已不再能运用全力以对付攻击者的猛袭。在这个帝国，到处有胜利的造反者占据一方，极大程度地损耗了政府的有效实力。在云南，一个穆斯林统治者从他的首府大理府全权统治着潘泰^①；在戈登上校出现以前，太平天国以南京为中心达到了极盛时代；在这时候，1862 年，甘肃和陕西两省又出现了新的危机。从很远以前时期就有大量的伊斯兰教徒定居在这些省里，早在十七世纪，他们就是给伟大的康熙制造麻烦的根源。的确，乾隆皇帝曾 93 有一次为了一劳永逸解决问题，下令把凡在十五岁以上的伊斯兰教徒尽行杀光。连这种彻底的措施也并没有获得所希冀的结果，不知道迫害是否给予这种事业以生命力的手段，肯定的是，到了本世纪中叶，他们变得人数却越来越多，越来越坚决，而且越来越相

^① 原文是 Panthays，是欧洲人采用当时缅甸人对云南回民的一种称呼。——译者

信他们自己比其他中国人更优越。这些穆斯林被称为东干人，而信佛教的中国人则被称为“和台”。许多作者不满意对于东干一词作这种简单解释，一定要说他们是另一个种族，是中国人在某一次征服时期把他们从别处迁移来的，或是由于受到某些游牧部落的侵犯而被迫迁来避难的。他们甚至还断言能把这个民族的名称和根源追溯到住在黑龙江下游某地的一个部族。但这个问题既然完全无法确定，看来一个比较简单的办法就是承认这个词的含义对中国人来说就是伊斯兰教徒。我们确实知道，这些人居住在甘肃及其邻省已经有好几个世纪，他们在体力和活动能力上都胜过“和台”。并且有谨严和诚实的德行。他们也没有沾染上抽鸦片的嗜好，我们可以想象，在他们最兴盛的时代，他们一定是一个安静、满足与和善的民族。他们所以在体力上高于“和台”，很可能是由于他们不吸食大麻和鸦片的原故。既然我们手边有这么一个更为简单而且更为自然的说明，那就没有必要去假定他们是来自寒冷的北方的一个更强健种族的后代了。他们的“和台”统治者发现他们可以成为良好的军人、警察以及其它如驿差之类的政府差役。由于最后那一种差使，他们来到了哈密，从哈密又来到吐鲁番和乌鲁木齐，加上被遣散后宁愿作为军屯户留下来而不愿回到甘肃去的士兵，他们的人数就更增加了。经过几代的生育，他们的数目更多起来，最后他们就成了我们上面所说的这些城市居民的大多数。在固尔扎他们的人数也很多，但在天山以南，看来他们前进到库车以西的人数并不很多。在阿克苏，在西喀什噶尔占据优势的安集延势力成了东干人不可逾越的一个障碍，我们必须记住，东干人对于浩罕是没有任何好感的。所以，东干人是中国的穆斯林臣民，原出于甘肃，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逐渐向西发展到中国土耳其斯坦和准噶尔。在乾隆朝前期采取过反对他们的措施之后，他们不受限制地在国家公务中受到雇用，而且我们也未能发现他们受到任何

不公正的待遇。他们可能没有锡伯族那样受到高度优待，也可能在甘肃容易受人欺侮，但在准噶尔却与其他中国人处于同等地位，在政治待遇上要比安集延人或塔兰奇人好得不知多少。中国人有正当理由相信，威胁他们在东土耳其斯坦或准噶尔的统治的不会有来自东干人的危险，为什么他们的合乎道理的预料错了，那就不容易解释了。东干人尽管在形式上不是最正统的，但他们却是很虔诚的穆斯林，而且对于“和台”不免还有一种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受到“毛拉”或宗教师们的鼓励，当中国人把他们的领土扩展到亚洲心脏的时候，这些人在中国境内是很活跃的。仿佛是对“和台”的征服进行报复，穆斯林的宗教对于它的敌对者政权的外围工事不断地在进行一种缓慢的、然而却是确定无疑的摧毁工作。至少从纯粹中国人的观点来说，伴随着中国的统治而来的安全与奖励 95 促进了贸易，作为一种好处，是被准许宣扬伊斯兰教优点的那些精力充沛、能说善辩的宣教士进入帝国所抵销了。他们努力的结果需要经过许多世代才能被觉察到；一直要到中国人的权力降落到非常衰微地步——许多人好象有理由地认为，这种衰微将会宣告中国政权的瓦解，但后来的事实似乎证明，它乃是更为精力充沛的生命的的前奏——的时候，这些在东干人中的伊斯兰教宣教士们，才看出他们耐心地、坚持地播种的庄稼已到了收获的时候。不可能不把这件事在某种程度上和那种无法说明的伊斯兰教徒狂热精神的复活联系起来；这种复活的狂热精神已经在过去三十年中产生过那么许多重大事件，我们现在正要看到它的一些最显著成果。

1862年，甘肃一个小村子里发生了一次骚乱，几个人被处决，骚乱被镇压下去了，人们正要认为它是件无足轻重的事情，然而，一个大规模的暴乱却在河州或撒拉尔^①地方发生了。东干人起来了，许多不幸的、没有武装的“和台”到处被屠杀。暴乱很快具有了

^① 撒拉尔即撒拉族，汉文献中称“沙刺籛”或“撒拉回”。——译者

内战的规模，邻近的陕西省也受到了影响。接着就发生了最凶暴的野蛮场面。一辈子和和平方地生活着、和东干人睦邻相处的“和台”被无情地屠杀。伊斯兰教宗教师们把统治权抓到自己手里，并给他们的信徒作出肆无忌惮的凶暴榜样。即使我们考虑到政府在其它地方所遭遇到的困难，也必得承认这一次运动获得了意料不到的成功。只有假设“和台”受到了完全意外的袭击，而且他们对于自己所面临的危险的性质和规模都毫无所知，才可以对它作出解释。在1862年年底以前，一个东干政府就在甘肃建立起来了，它的权限有一个时期在陕西也受到承认。宗教师们成立了一个由他们自己组成的行政机构，随即着手巩固他们所已取得的权力，并作好准备以防中国人一旦回来报仇。在甘肃所发生的事情很自然地是在该省以外地区的东干人所感到兴趣的，他们的榜样很快地就被哈密、吐鲁番、乌鲁木齐、玛纳斯和那一带其它城市所效法。在这些地方这个运动也象在甘肃一样获得了同样的成功。中国人的政权被颠覆，如果可能的话，“和台”在更为残忍的情况下被屠杀，一个新的东干国家在这些城市里建立起来了。在一个宗教师或一个宗教师集团的领导下，或在一个当地东干王公的领导下，每一地区都保持名义上的独立；于是，这个运动就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大踏步地朝着喀什噶尔、库车和阿克苏发展。在那里就停了下来，在天山以南，真正的东干之乱，从来没有蔓延到阿克苏以西。

在六城地区和固尔扎，中国人的权力在表面上多维持了几个月，但他们和中国本部的一切联络都被切断了，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无论从人数上说或从资源力量上说，他们都不足以应付东干人。如果他们能够把他们还占有的地方保持住，那就是达到了对他们所能抱的最大期望了。东干人的势力在库车和阿克苏并不占优势，他们不得不和和卓们分享权力，如我们以后将会看到的，这两个城的和卓们就把统治权攫为己有。这些城市在哈密和乌鲁木

齐等纯粹中国城市和叶尔羌及喀什噶尔几乎完全是浩罕城市之间居于一个中间地位，东干扰乱之出现在这些城市，使得喀什噶尔人充分理解到这一运动对于他们自己的重要性，也使得中国驻防 97 部队和移民同样正确地认识到他们自己的危险。喀什噶尔人，也象他们所有的同教人一样，不免有一种宗教信仰的狂热，很自然地对于东干人的胜利感到洋洋得意，其习性变化无常已屡经证明，他们忘掉了从中国人那里所得到的一切好处，迫不及待地等候有利时机到来，以便仿效他们的东邻给他们作出的榜样。他们并不需要等候很久，尽管遍及六城全地区的内战和混乱的烽火并不是由他们首先燃点起来的。

大家会记得，浩罕政府在凡对穆斯林商货征税的城市，有权指派一个代理人或收税员，照管特有的征税事务。在有些较大的城市里，这个官员还需要相当数目的辅佐人员，因此，就有一定数目的熟练的浩罕官吏常驻在喀什噶尔即中国领土之内。在倭里汗的远征中，这些人或由于参加了倭里汗集团，或死于当时的大屠杀中因而消失了；远征失败之后，又任命了一批新的浩罕人，从法律上讲，他们占有和前任同样的地位。然而，看来他们帮助倭里汗袭扰的自然后果也跟着来了，中国办事大臣对于他们的来到表现出几乎毫不隐讳的憎恶，并且宣称，这些浩罕收税员所关心的，与其说是对于丝绸和其它商品征税，毋宁说是对于异端宗教和政治学说的宣传。只要有一点点的不利情况发生就足以把这种恶感煽成不可抑止的仇恨和敌意。当中国办事大臣们开始觉察到他们的大部 98 分东干士兵已和他们感情疏远了的时候，这种危险就变得更为严重了。当要反击一次新的和卓叛乱时，这些东干部队是否可靠已成问题；他们不会参加对伊斯兰教进行的任何镇压，即使受害者仅仅是安集延人，这也是肯定无疑的了。当 1862 年东干人在甘肃和陕西起来反叛并获得胜利的时候，六城地区的群众心理情况就是

这样。

中国办事大臣们对于安集延收税员的敌视，早在1859年就在叶尔羌事件中得到了有力的说明。当时郡王阿夫里顿为该城长官，不管当时采取行动的起因是否出于私人仇恨，他很容易地就使得他自己和其他中国居民确信，安集延代理人正在城内煽起一种对他们的不满情绪。既然最重要的自然律就是自卫，这个浩罕官员和他们属员就被逮捕并处决了。郡王阿夫里顿对他的对方的指控也许有某种根据；但更可能的是什么根据也没有；而当把这一问题送交伊犁将军裁决的时候，裁决是把这个长官免职。浩罕政府派来了新的代理人，至于受害人的家属是否获得任何赔偿那就没有提。由此看来，在六城地区充当一个为浩罕汗王服务的收税员并不是什么值得羡慕的职位。

郡王阿夫里顿辞职回到他的故乡吐鲁番，三年以后，他在那里对东干运动的成功作出的贡献比任何人都大。他的政策，如果说是反浩罕的，却是亲穆斯林或亲东干的，他的事例，对于这次叛乱99的性质来说，是很典型的。在吐鲁番，他继续是主要人物之一，直到六年以后该城陷入阿塔勒克哈孜之手为止。

继他在叶尔羌担任长官的人对于浩罕官员没有干涉，但是他虽在这方面作了节制，却在对当地居民方面，特别是居民中的穆斯林部分，大肆勒索。由于他的勒索和残忍行为，不仅激起受压迫者的反抗精神，也使他自己的属员对他产生憎恶。正当叶尔羌局势处在这种很不稳定状况的时候，这位长官得到了东干人在甘肃叛乱的秘密情报。他立刻感觉到，当这一重要情报被大家知道的时候，不仅他自己的东干士兵会更公开地反抗，和卓们也会乘机再一次提出他们对于这个地区的主权要求来。在这个特殊情况中，除了任何中国长官对于事态都会感到的一般忧虑外，还有他个人对于他处理公事的不公正行为所感到的恐惧。这个办事大臣在极度

惶恐中决定作最大努力采取预防措施,使他自己避免危险。他召集了他的信佛教的僚属们开了一个军事会议,对他们陈述了确实情况;他们的部队中的东干士兵部分怎样不可依靠;东干居民怎样会和他們联合起来;安集延代理人怎样会竭尽全力联合所有信伊斯兰教的人来反对他们自己;以及这些本来就可能发生的事情,怎样由于东干人在东方的胜利就变得更有发生的可能。他反复强调了及时执行他们所认为必要的预防措施的重要性,并且说任何时候消息都可能传到,到那时他们就将成为少数了;而且他也没有试图隐瞒他的讲话的目的,那就是他主张采取断然措施,立刻铲除祸根,把城里的所有的穆斯林统统杀尽。军事会议不愿意在未作仔细考虑之前就赞同这样激烈的行动。有许多不同意的人,于是就休会了。后来这个会又重新召集,这一次尽管赞成采取温和办法的人减少了,仍然是在未作出决定以前又休会了。很明显,危险对于这位长官来说比对于他的部属更显得可怕;可能在他的“和台”属员中间,对于他们的首领也有一些个人的憎恶情绪。看来在第二次会议上,他们的确似乎比较地愿意勉强同意他所建议的激烈措施,这可能是由于在这段期间他们已注意到舆论情况。但即使这样,他们也没有能够达成最后决议,从此之后,“和台”就没有机会在叶尔羌进行任何防御了。不久,东干士兵通过他们的首要军官马大老爷,获悉在“和台”中间正进行着一种把他们解除武装,或象另一些人所说,对他们进行屠杀的阴谋;接着他们又听到关于在中国,或通往中国的路上,穆斯林造反的事情。他们立即决定对于这位办事大臣和他的优柔寡断的军事会议采取先下手为强的办法,他们的阴谋的执行,并不象那位中国长官的阴谋那样,受到犹疑不决的阻碍。

没有武装的“和台”部队在夜间受到了突然的袭击,他们被无情地砍死,少数幸存的人躲进新城的堡垒。这是1863年8月里的

事情,据统计,单单这一次就有不下七千个“和台”军人遇害。接着城市居民也都参加到东干部队方面来,当时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谁应当任最高统治者,是东干人呢,还是安集延一喀什噶尔的穆斯林。前者只是些没有文化的、相当粗野的士兵,后者则具有操纵一

101 群狂热的居民和临时凑集一个表面上的管理机构的敏锐智力。在支援反东干人一派的援军从阿克苏和库车来到之前,力量的对比是不相上下的。两个曾经由于以浩罕名义图谋增进个人利益的和卓从库车被逐逃到阿克苏,在这里他们也碰到了同样的遭遇。在后一次逃跑时许多和他们志同道合的人也参加了他们的行列,所以当

他们到达叶尔羌的时候,他们就有相当多的力量作为后盾。这些和卓们起初是把他们的队伍参加到东干人方面,猛袭残留在新城内的“和台”。在经过一番勇敢的抵抗之后,“和台”感到继续进行抵抗已不可能。然后就发生了那样的一种事迹,如果这种事不是发生在亚洲而是发生在欧洲的话,它将会被作为一种罕有的军人献身精神和勇敢美德而流传后世,但是,尽管在我们正要叙述的战役史上也并不是唯一的事例,由于它发生在不著名的东土耳其斯坦,人们并不相信它是一件确实发生过的事情。它只被认为是它所属的神话国土上的一桩神话而已。然而,我们听说:办事大臣怎样把他的官员们召集到他的房间里,他自己庄严地坐在那里,周围是他的妻妾、家人和仆役,大家都静默无声,然而已沉着地作好准备;在接到了大家都到齐了,而敌人已到门口的暗号时,这位年迈的军人怎样把他点着的烟袋扔在下面的地雷上;结果这些耀武扬威的敌人只赢得了一场没有收获的胜利;以及中国人怎样教训这些本地人,让他们知道,如果说他们已经忘掉了怎样征服,他们并没有忘记怎样死去;当我们听到这些情况的时候,我们感到在整个故事中贯注着一股潜流,除了它本身值得赞赏外,还值得我们予以特殊的同情。中国人,正如我们在 1857 年黑暗艰难时期在印度所做的一样,

即使在一切恢复的希望都丧失的时候，对于他们统治下的半野蛮民族仍表现出他们的优越性。卫城失陷以后，和卓分子在叶尔羌取得最高地位，一个叫做阿布都拉门的宗教师被立为王。

102

六城地区的其它城市很快地效法了叶尔羌的榜样，中国人的政权在各地被完全推翻。只要“和台”一落入伊斯兰教徒之手，他们就都被屠杀，只有几个卫城还能坚持着，特别是喀什噶尔的新城。这个城市的居民似乎不能对中国人取胜，因为他们曾请求柯尔克孜人来支援他们。这些游牧民族，在他们的首领思的克·伯克的带领下，很高兴参加驱逐中国人的活动，因为这样一种以不安定的政府代替安定的政府的变化对他们更有利。于是喀什噶尔的卫城被包围了，但新同盟者的不正规部队对于城堡并未能产生任何影响，因为它有由一支人数很多的“和台”驻防部队守卫着。如果中国指挥官采取一种比较积极的政策，也许他就可能把他的敌人消灭掉，但他老在等候他已等了几个月的援军的到来。如果他确实并非已在考虑他后来最终要向阿古柏伯克投降，那末，从他未能完全倚赖自己的力量情况证明，他没有看清当时形势的变化。思的克·伯克既发现自己攻不下城堡，而且也不能肯定喀什噶尔人对他自己的友好会维持多久，他就决定扮演一个拥立国王的角色。他打发一个使者到塔什干去请求派一个和卓来统治喀什噶尔，只是他没有提到喀什噶尔还未被征服。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布素鲁克汗和他的总司令身上来了。当他们离开塔什干的时候，他们只有六个随从，其中有胖色提衔的阿伯杜拉；沙哈瓦尔衔的穆罕默德·库里，以及胡戴奇衔的和卓·库兰。所有这几个人在阿古柏伯克的领导下都起了很杰出的作用。他们从塔什干到了浩罕，在那里他们的人数增加到六十八人。在那里作了最后的准备，于1865年1月初，这帮冒险家就越过浩罕边界进入了东土耳其斯坦。山里的堡垒似乎都被放弃了，因为他

103

他们在捷列克峡道上并未遇到任何抵抗，有些小群的部队参加了他们，当他们到达喀什噶尔附近明约洛的时候，不仅人数增多了，而且信心也加强了。这时候，思的克·伯克已对他自己的处境抱有比较乐观的看法，现在他有几分懊悔，他完全不该请和卓来的，特别是他看到了和卓带来自己的随从队伍，还有阿古柏伯克这样一个干练的指挥官和大臣。他于是试图劝说布素鲁克汗不要再继续前进，因为这桩冒险事业充满巨大的危险，并说中国人一定要立刻回来报仇的。但他的立论无济于事。不管是布素鲁克汗或是他的顾问阿古柏伯克，都充耳不听他的一切劝阻，他们所已经开始的事业必须进行到底。他们不能设想毫无成就地就回到浩罕去，蒙受一种未遇到敌人就撤退的丑名。思的克·伯克只好尽可能高高兴兴地服从；于是布素鲁克汗就被拥立在他祖宗的宝座上了。

布素鲁克汗在他的“斡尔朶”或王宫里进行统治并接受他自己的随从和安集延市民的朝贺。按照在浩罕实行的典范拟定了宫廷规矩。当远征队刚刚在一个城市里还不很稳定地站住脚的时候，他们就认为对于仪节必须严格规定和强制执行，就好象所有这一切是发生在一个繁荣昌盛的首都一样。思的克·伯克发现他自己不过扮演了一个二等角色，几天之内就造起反来，在英吉沙自立为统
104 治者。现在是阿古柏伯克出头露面的时候了，他把管理事务的大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直到不足挂齿的布素鲁克汗倾覆为止。在遭到他们的柯尔克孜同盟者背弃后，他们费了很大的气力才在喀什噶尔这个新和卓麾下结集了三千人的队伍。思的克·伯克率领了一个大得多的队伍向着首都进犯，有一个时期阿古柏伯克只好处于守势。但每天都给他的兵营带来了新的兵员，而他的对手柯尔克孜首领的军队，由于提不出人民同情的目标，人数即使不减少，也不能增加了。最后这两个军队开始交锋，这一战由于阿伯杜拉的勇猛而成为全面进击。思的克的柯尔克孜军队抵挡不住向他们

进行的勇猛冲击，经过一场短暂的战斗后就抱头鼠窜了。柯尔克孜人在山里大量聚集在他们首领的周围，盘踞在喀什噶尔以北地区，形成了一种危险的力量，阿古柏伯克如果不将他们除掉就不可能继续前进。于是阿古柏伯克指挥他的军队向着盘踞在堡垒里的柯尔克孜人进击，不久柯尔克孜人被追得无路可走了，被迫向着追赶他们的人进行反击。双方军力大致相等，每一方都约有五千人。按照东方人的习惯，柯尔克孜人推出了一个叫做苏兰齐的斗士来，这个人曾经因他特别高大的身材和勇猛有力而闻名。挑战并不是无人应战，因为阿伯杜拉走出来对阵了。战斗虽然很激烈，但为时很短，矮小的浩罕战士战胜了比他庞大的对手。经过这次挫折，柯尔克孜的力量被粉碎，思的克·伯克逃亡到塔什干的阿利姆·库里那里。阿古柏伯克对柯尔克孜人的第一个战役就这样胜利结束，柯尔克孜人原是他的宣誓盟友，而且正是由于他们的邀请他才得以出现在喀什噶尔的；现在他能够重新追求他的征服喀什噶尔的主要目的了。使喀什噶尔免除了来自北方的突然袭击，105
留下一支军队维护他们的占领并抑制住“和台”驻防部队以后，布素鲁克和阿古柏就向南推进去占领英吉沙。这个城市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就被占领了，但对于中国人在里面避难的卫城的袭击却被击退，并受到了损失。阿古柏伯克打发布素鲁克汗回到喀什噶尔，而他自己却决心向叶尔羌挺进，力图把那个城市置于他们的直接影响之下。

在这段时期他大声宣称，在对佛教徒战争这件事上，在东干人或穆斯林中间不应有任何意见分歧，和卓们和东干人只有一个共同的利害关系。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六城地区的所有城市中，东干叛乱首先在叶尔羌发难，因此，在这里比在其北方的邻近城市，更早地取得了一个建立在妥协基础上的解决办法；因为在喀什噶尔和英吉沙，有一个野心勃勃的柯尔克孜首领曾打算为

他自己开创一个王国。阿布都拉门和卓被立为叶尔羌王或统治者，中国人连同他们的卫城被消灭以后，在东干人与和卓派之间达成了一个新的协议。按照它的条件，东干人占据卫城，而和卓们则以城内为其管辖范围。这两方的任何一方对于一个以整个地区的和卓君主的身分出来要求最高统治权的人的出现都不会表示友好，而阿古柏伯克正是作为这样一个人物的代表决定到叶尔羌来的。阿古柏伯克的进军受到了尽可能的阻难，最后并非轻易地获得允许带着少量随从进入城内。阿古柏伯克对于从他的同教人那里受到这样的敌视待遇自然感到非常恼火，他很快就着手来制服这些在叶尔羌占统治地位的和卓们。在一次很可能是由这个狡猾的浩罕人唆使的街市暴乱中主要的和卓们被逮捕，他们的从者被驱逐出城。阿古柏伯克以一支只有几百人的部队，就使自己做了那个地区最大城市的主人，但他这一次的成功是暂时的。他也有时运不佳的时候，一支有二千人的新的部队从库车来到了托合其，在那里和从叶尔羌及其附近来的部队汇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很庞大可怕的阵容。他们对自己在人数方面的优势满怀信心，立刻向着该城进发。一直赞成采取最大胆行动的阿古柏伯克出城迎战。但在一次小战斗中，阿伯杜拉率领的一个分遣队，由于这个军官的轻率，被歼灭得很惨，阿古柏伯克立刻看出了必须迅速撤退。当天夜里他进行了一次急行军，于第二天到达了英吉沙。人员的损失倒不很大，但所有的辎重都丢光了。这样，进军叶尔羌的行动结果成了一次轻率冒险。

在英吉沙城外堡垒里的“和台”仍然坚守着，阿古柏伯克下决心在进行任何新的冒险尝试以前，先把他们攻下。他从喀什噶尔调来了援军，重新以旺盛的精力加紧了包围，经过了四十天的严密包围后，驻防部队投降了。尽管阿古柏伯克本人似乎想对俘虏表示温和的态度，还是有两千多中国人被屠杀了。当所有这些小

事件连过去那种和卓进军行动的成果也没有获得时，不仅在外部有敌对行动，内部也有不满和分裂。这时一个新的危险又在地平线上出现。一支怀着敌意的巴达克山军队正在向色勒库尔推进。当阿古柏伯克忙着攻打英吉沙城外的卫城的时候，他对那支部队的前进采取了置之不理的态度，但在那个堡垒攻陷以后，这事又引起他注意力了。在喀什噶尔的新城的“和台”驻防部队也是这个新建王朝的危险来源，尽管它已经继续很久没有活动，但什么时候它又会活动起来是无法知道的。对于中国指挥官这种一反常态的木然不动状态我们只能解释为是由于他对在那一地区所发生的事情毫无所知。对于一个注意观察事实的人来说，一定会认为，这个拥有六千至七千训练有素的部队的中国长官，在这以前有好多时机完全可能击溃那些替阿古柏伯克打仗或者反对他的乌合之众。随着英吉沙驻防部队之被消灭，阿古柏伯克的情况就大大改善了，这位中国长官采取攻势的机会就比以前减少了，以前他还有一支近在英吉沙的同盟军。阿古柏伯克也下决心对于这些据守在他们最后堡垒里的“和台”加紧进逼，要在未和其他敌人交战前先把“和台”击溃，就象过去他先把柯尔克孜人击溃一样。这时思的克·伯克又率领一支柯尔克孜军队出现在喀什噶尔来反对阿古柏伯克，这次他似乎一度得到了较好的运气。但阿伯杜拉这个最受阿古柏伯克的信任和最勇敢的副手召集了一些他所能召集的部队，勇敢地挡住了他的进路，在一场血战中击溃了思的克以后，准备继续向那个不幸的酋长进逼，迫使他逃跑或是遭到毁灭。但阿古柏伯克由于缺乏同盟者和军队，阻止了阿伯杜拉，建议和思的克结成同盟，而不是将战争进行到底。遭受挫折的思的克欢喜不过地接受了这样优惠的条件，把他的军队和他过去的敌人阿古柏伯克的现在正在重新以旺盛精力围攻“和台”的军队汇合在一起。当时的困难局势，如果不及时得到解决，是很可能变得严重起来的；

这样一个难局得到顺利的结束，从外交意义上来说，不能不认为是阿古柏伯克的一个值得称誉的成就。以小比大，它可以和弗烈德里希大王在皮尔纳收编四万萨克森部队的措施相媲美。但是，更值得注意的也许是阿古柏伯克避开来自巴达克山军队的危险的做法。巴达克山人象他们同血统的阿富汗人一样，由于他们身材高大和有比较活跃的习惯，在其它情况相同的条件下，可以认为是比其他亚洲人更为优越的军人，因此，阿古柏伯克及其未经良好训练的部下，要战胜这些新来的入侵者，就会遇到一些困难并且一定要遭受相当大的损失。他向他们提出了建议，这些巴达克山人看到他很可能给他们以令人兴奋和有利可图的事做，就和他进行谈判。谈判结果是他们在他的手下服役，于是阿古柏伯克就开始成为一支由浩罕、喀什噶尔、柯尔克孜和巴达克山士兵组成的庞大军队的领导人了。对他来说幸运的是，他已能够把他的事务安排得如此圆满，因为一个新的危险正在从东方逼进。

读者也许已注意到，直到目前为止，我们在叙述这些战役的作战情况时很少提到布素鲁克汗。的确，关于这个君主的行动是很少或者没有什么可说的，因为他主要是定居在喀什噶尔，或把时间浪费在后宫，或沉缅于吸食麻醉品。阿古柏伯克从一开始就作为一个负责的首领出现于台前，随着事态的演变，人民和军队都把他看做他们未来的领袖。但是看来阿古柏伯克是真心实意地拥戴这个和卓君主的，因为他不仅有好几次对布素鲁克汗作了最有益的规劝，而且还迫使他积极参与公务。但对这个贪图玩乐的君主来说，这种一次一次的督促却最使他讨厌，结果他总是重新热情投入他所沉缅的罪恶享乐中去。阿古柏伯克有一次努力向他的君主灌输对职务抱负责精神的机会，就是这次六城地区和卓一东干势力入侵的时候。那是初夏时节，一支在阿克苏、库车和吐鲁番募集起来的，估计有四万人的庞大军队出现在巴楚，从那里，

它既可以威胁喀什噶尔，又可以保卫叶尔羌。如果我们相信当地人的报告，阿古柏伯克尽了最大的努力，只能把二千五百人投入战场；但更合理的估计是，连同他的柯尔克孜、乞卜察克和巴达克山辅助部队，在他手下的兵力远比此数为多，可能是一万二千五百人而不是二千五百人。然而，不管确实人数多少，肯定的是，在人数方面，他被入侵部队大大超过了；而且，由于他的军队成分不齐，因而大大降低了有效力量。东干军队从巴楚向英吉沙推进，阿古柏伯克正把他的军队集中在那里。他已经把布素鲁克汗，并尽可能地把他的宫廷随从从他们在首都的可耻闲散生活中拉出来，让他们经历一番战场上的风险。双方都迫切要求进入战斗，这场战斗终于在英吉沙附近打响了。阿古柏伯克对于他的军队所作的战术部署是熟练的军官所会赞同的，他既做了凡人所能做的一切以保证其结果，就把他自己和他的事业交托给真主。这一战役时间很长，打得也很激烈。有些时候打得如此势均力敌以致很难说谁胜谁负；最后，本来不热心作战的柯尔克孜部队被赶出了战场，直到这时为止还顽强地坚守阵地的巴达克山部队紧接着也效法了他们的可耻榜样。现在只剩下阿古柏伯克直接指挥下的部队来抵抗已在战场另外两方面获胜的敌军全部兵力的攻击了。处在当时这种全部事业的命运就在此一战的危急情况下，即使是最勇敢的人也不免要暂时感到沮丧。然而阿古柏伯克却鼓足勇气，丝毫也没有露出惊慌的神色，他大喊着“胜利是真主的恩赐”的口号，以此来鼓舞他的部队继续战斗整整一个下午。敌人被这很少的一点人所显示的无畏精神吓倒，加以他们在作战中已经遭受很大损失，就在傍晚的时候把他们已经削弱了的部队撤走了。阿古柏伯克勇敢地抓住这个采取攻势的机会，使他们蒙受了相当大的损失，狼狈地被赶出战场。除了阵亡和受伤的损失以外，有一千多东干士兵投到阿古柏伯克的麾下，这是他一生中所经历的最大战役之

一，经过这次战役，他发现自己领导下的兵力比战争开始前更强大了。这次巨大胜利使和卓家族得到了新的光荣，也使阿古柏伯克的军事声誉大为提高。我们也不应忘记，这次作战不仅显示出他有很好的军事天才，而且也显示出他具有一种可尊敬的品德。在这类的战争史上，俘虏第一次受到了某种照顾。由于某种原因，这次胜利没有继续扩大，战败了的库车军队退回到巴楚，在那里继续支持了几个月。然而，这次胜利的间接结果的重要性，并不下于当时的直接后果。

111 亲临这次战争的布素鲁克汗就是第一批逃跑其中的一个，当他得到最后胜利的消息的时候，他的满意心情几乎完全被懊恼和悔恨所压倒。在这以前，只要他的荒淫生活不受干扰，他是宁愿让阿古柏伯克代行君主职权的，但从此以后，他的受到损害的虚荣心就夹杂着一种想法，深信阿古柏伯克的权柄越来越大，并且如此得人心，最终必将成为一个危险人物。这个愚昧无能的君主让自己成了宫廷或军队里忌妒阿古柏伯克的成功的一个竞争者的工具，倾听他们谈论有关他的这个副手的阴谋的坏话，而其实他最应当害怕的阴谋家正是那些野心勃勃的酋长们，他把自己及皇冠都交给他们掌握。库车的军队被打败以后，叶尔羌统治集团认为和他们的得胜而好侵略的邻居讲和是明智的，因此，叶尔羌的和卓们就派了一个使节来到英吉沙表示他们愿向喀什噶尔君主投诚，并请求准许他们推荐一个布素鲁克汗和他的大臣阿古柏伯克都会同意的人任城市长官。富有暗示性的令人注意到，在他们所有的言词里他们总是把这个大臣的名字和他的主人的名字列在几乎同样显著的地位。叶尔羌的新城的东干长官在崇拜这个新升起的太阳上也不甘落后，他立刻派人到喀什噶尔去作了同样的臣服表示。

事情的发展再度把我们带回到喀什噶尔，中国人在这里仍然

坚守着卫城，抗击所有来犯者。但随着阿古柏伯克战胜许多敌人的每一个新胜利，随着东干权力扩展到准噶尔，在这个孤立的堡垒里单独维护着中国政权名义的不幸的“和台”的希望几乎全都变成泡影了。现在，城里的叛卖要帮助城外的围攻了。卫城里的一个高级军官何步云，尽管他并不是城防指挥官，却和阿古柏伯克达成了协议，根据这个协议给予驻防部队以体面的条件，于是三千人的“和台”部队就投降并定居在喀什噶尔。他们被要求正式承认和卓的最高权力并宣誓改宗伊斯兰教。但在他们自己中间所行的礼仪习惯并没有真正受到任何干预，在指派的任务方面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在他们改宗以后，他们被称为“英吉穆斯林”或“新穆斯林”。他们是向新征服者投降的最后一批“和台”军队，从此中国政权在准噶尔和东土耳其斯坦的一切痕迹都消失了。就是在这个由于长期围攻和伴随而来的贫乏生活折磨到绝望地步的驻防部队中，也有少数人宁愿死也不愿接受投降的耻辱。指挥官张泰拒绝参与何步云和阿古柏伯克达成的协议。当喀什噶尔军队进城的日期临近的时候，这位刚毅的办事大臣退到他的官邸里，把自己的家属和仆从聚集到自己的周围以后，燃着了一个预先在下面埋好的地雷把他们都炸死了。在由于这个事件而发生的混乱中，敌人冲进了堡垒，经过了几小时以后，阿古柏伯克才重新控制住他们。在这次反抗的短时间里，有许多“和台”被杀害，但他们并不是没有抵抗的。何步云和差不多三千人仍然留在征服军中服役，正如前面所已经说明过的。这个新的同盟由于阿古柏伯克娶了何步云的美貌的女儿而得到了加强，他们还有了几个孩子，由于太小还不能参与公共事务。也许阿古柏伯克对于“和台”的温和态度可以由这个原因来解释。可以肯定的是，直到最后，他的这个“和台”妻子对她的丈夫有很大的影响。

这是 1865 年 9 月，即他第一次到六城地区九个月以后的事

情。在这期间，他的工作，如果不算很快，却是完成得相当彻底的。113 “和台”被消灭了，柯尔克孜人被制服了，向喀什噶尔西部进犯的东干势力被制止住了，这些都是他的成就。几次战斗和围攻成功地达到一个成果，由战败者和战胜者的各种零星队伍组成了一支人数众多的军队。阿古柏伯克本人也为自己将来执掌政权的舆论准备做了不少工作，同时那个窃据王位的首领也在玩忽职守和纵情酒色欢乐方面走得更远了。布素鲁克汗可以代表典型的“荒淫无道的昏君”，而阿古柏伯克则不只是一个通常的刚毅果断的“宰相”。

喀什噶尔卫城投降后不久，就有报信者前来报告说，有大队从浩罕来的人马很快就要到达，至于这些人是谁以及他们是抱什么目的来的，则没有人知道。这些人是反对呼达雅尔汗失败的阴谋家们。呼达雅尔汗在阿利姆·库里死后，重新执掌政权，这些阴谋家被他的军队赶出来以后，被迫来喀什噶尔避难。当他们还在边境徘徊的时候，阿古柏伯克送给他们一封短筒：“如果他们是作为朋友来的，欢迎；如果是作为敌人来的，他已准备好和他们交战。”在这个声明到达以前，在这些浩罕人中间对于应该怎么做是显得有些踌躇莫决的，因为他们中有些人想为自己的利益试图征服喀什噶尔；但在阿古柏伯克传给他们这样一个明确的声明，而他们也更确切了解到阿古柏伯克胜利的稳固性以后，他们就抛弃了一切保留而加入了喀什噶尔同盟。在这期间，在叶尔羌发生了新的动乱，1865年的最后几个月阿古柏伯克带着布素鲁克汗前往去镇压他们。当他到达城下的时候，尽管和卓们和东干人把他留114 在城外，他们都赶快表示，他们非常愿意遵照他的意旨行事。如果他们不是受到布素鲁克汗的怂恿的话，很可能双方都不会作任何长久的抵抗。那个君主相当时期以来已不耐烦受他的副手钢铁般意志的拘束，现在更不高兴被人从喀什噶尔的安逸环境带到叶

尔羌度艰苦的军队生活，他挣脱了一切约束，不仅在他自己的军营里，而且也在敌人的军营里，筹划图谋摆脱他的这个麻烦将领。在东干军人中进行的这个阴谋达到了惊人的规模，正当所有的人都准备好要结束阿古柏伯克的前途时，这个阴谋幸而被他的忠实朋友阿伯杜拉发现了。阿古柏伯克采取了预防措施，军营中的阴谋被有效地挫败了；但这时阿古柏伯克还不够强大来表示他的愤慨。这个危险刚被除掉，另一个又发生了。在阿古柏伯克手下服役的东干士兵现在和他们在新城的同族人串通起来，为了消灭喀什噶尔部队的其余部分，他们作出了如下计划。驻防部队假装出愿意把他们自己和堡垒都向阿古柏伯克投降的样子，在阿古柏伯克并不怀疑有任何隐秘的计划，受骗而产生一种错误的安全感时，在他手下服役的东干部队就和堡垒里的东干部队汇合并向其余的部队进行夜袭。计划看来很有成功的可能。阿古柏伯克受了东干人友好建议的欺骗，放松了警戒，在东干人即将投降的前一夜，阴谋者们从堡垒出发，按照预先安排，与其他同盟者汇合，向阿古柏伯克和他的直属随从进行了突然袭击。这些武装不齐的人进行了拚死的抵抗，但东干人胜利了，阿古柏伯克费了很大的气力才在第二天结集了几百名士兵在自己的周围。在这些人当中究竟还有阿伯杜拉和他的一些比较可靠的伙伴。沙迪克率领的柯尔克孜人不可靠，看来那个首领仍然倾向于为他自己谋利益。在他一生中这个最危险的时期，阿古柏伯克的机敏和果断是最特出的。当他周围都是些敌对的派别，而只有不到五百人的忠诚可以依靠的时候，他克服了每一个障碍，无比强大地驾凌于那些要粉碎他的人的卑鄙的猜忌和倾轧之上。布素鲁克汗抓住了这个灾难的时刻，把一大支部队和全部柯尔克孜人拉出去组成了另一个阵营，正如已经说过的那样，东干人成功的突袭很可能就是他唆使的。不过并没有证据证明是他做的，我个人的意见认为，那是东干人自己发动的，

115

布素鲁克汗只是对发生这件事感到高兴而已，就如他对阿古柏伯克遇到任何其它挫折时会同样感到高兴一样。现在的情况如下：在卫城里面是胜利的东干人；在城里，他们和城里的人分享权力的分配。在外面，一方面是布素鲁克汗带着一支同情心模棱两可的部队，而且随时可能对阿古柏伯克采取敌视的态度，另一方面则是阿古柏伯克本人和他的人数减少了的追随者。看来事情已经到了近乎无望的地步，如果三方面那怕在二十四小时短时间内能够把他们的分歧调和一下，阿古柏伯克就一定会完蛋了。而当时的情况却是，有象阿古柏伯克这样的一个敌人近在身边，他们却什么也没有做，让他把由于自己过分轻信他的穆斯林兄弟的忠诚而失掉的一切都重新挽回过来。现在就让我们看看他是怎样拯救自己的吧。第一点需要做的是恢复他自己的士兵的勇气和自信心，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来一次稳操胜券的突然袭击。堡垒是不可能用奇袭的办法夺取的，但大而零散的城市则具有比较可能进行这样尝试的方面。阿伯杜拉这位喀什噶尔军队的穆拉特^①，以最坚决的大无畏精神完成了这次突击，尽管在这里他又是没有等到其它部队到达就进行了攻击。象爱德华·布鲁斯^②一样，

“莽撞粗鲁，是他本性，
捨身拚命，奋不顾身，
小心谨慎，容或有失，
一往直前，反而功成。”

这一成就使东干人的欢乐成为泡影，并迫使他们承认他们需要对付的敌人是多么可怕地精力旺盛和胆量十足。但是，正在这个时刻，发生了一项几乎把这样得来的优势全部抵消掉的严重

^① Murat 音译，系指某一地区，例如几个村落或几个县的地方独立的军队指挥官。——译者

^② 可能是指十四世纪时以勇猛著称，被立为爱尔兰王的苏格兰王族成员。所引诗出处不详。——译者

不幸事件。布素鲁克汗，既未能粉碎阿古柏伯克，又未能享受到他已沉溺到不能自拔的放纵生活，他决心不顾一切地要取得后者。因此，他带着许多随从从叶尔羌逃跑，退回到他的喀什噶尔王宫里去。在那里，他不以掠夺阿古柏伯克的官邸为满足，还宣布他是一个卖国贼和叛逆，对任何拿他的头来献的人悬了赏格。他指派了另一个将领指挥军队，并对保卫喀什噶尔防止阿古柏伯克的任何进攻企图做了准备工作。然而幸运的是，叶尔羌卫城里的东干人并不知道喀什噶尔人中间的这种不和，他们很钦佩阿古柏伯克的勇气，在布素鲁克逃跑后不久就向他投降了。这样他才能够用他的全副精力来对付这个执拗的首领。我们已经说过，阿古柏伯克一直是对伊斯兰教教会很友好的，由于这个值得称赞的方面，他现在得到了好处。布素鲁克汗最初用来粉碎阿古柏伯克的手段之一就是要求喀什噶尔的伊斯兰教长老宣布他的这位勇士长为不受法律保护的人。这位长老拒绝这样做，相反，却说阿古柏伯克值得他本国和整个穆斯林世界的称道。试图激起反对阿古柏伯克的宗教感情失败以后，布素鲁克汗就不得不采用一种武力解决的办法，这是切实有力的办法，然而这一办法在他手里却是毫无用处的。尽管当时的比武场在我们看来是有限的，但觊觎王位的还大有人在。思的克·伯克不但没有和布素鲁克汗联合起来，反而自立为这个地区的统治者，看到可能发生的事件，于是库车的和卓们和东干人都开始结集起军队来了。 117

布素鲁克汗开出来阻止阿古柏伯克进入的军队在英吉沙和这个首府之间被阿伯杜拉所包围，并予以击败，阿古柏伯克以不可抵抗的大踏步向前挺进，并在人民和他的士兵的欢呼声中被欢迎进入喀什噶尔。这时，他被公开宣布为统治者，他的朋友，伊斯兰教长老批准了人民的选择。逃避到新城里的布素鲁克汗，经过一番微弱的抵抗后，在他的王宫里被擒。阿古柏伯克的一些突出

的竞争者被处决；布素鲁克汗本人则被处以体面的幽禁。后来他仍旧坚持搞一些无用的阴谋，在他留在喀什噶尔的期间，他一直是新政府的无尽麻烦的根源。但他仍然被准许留住了十八个多月，直到他被发现唆使人谋杀阿古柏伯克的时候，才被流放到西藏去。经过几年的飘零生活以后他又回到了浩罕，据信他仍然带着一大家人住在那里。可以认为，他就是统治喀什噶尔的最后一个人的和卓王公，因为以后在任何解决那个地方的前途的方案中，很难再有人会支持在那里复辟旧的统治家族了。他是中亚专制君主统治的一个丝毫未加夸大的典型，这一长串小暴君和纵欲之徒是我们所亲眼目睹的，直到最近几年中才被阿塔勒克哈孜这样成功的军人或浩罕的穆斯林·库里那样老练的大臣所废黜。

柯尔克孜首领思的克·伯克对于阿古柏伯克巩固了的权力的
118 抗拒并没有持续多久，于是库车的骚动就中止了。在十二个月略多一点的时间里阿古柏伯克就占领了喀什噶尔、英吉沙和叶尔羌。色勒库尔和田也承认了他的统治；关于他和他们之间的另一些战争将在以后叙述。现在他感到自己的地位已经很巩固，他可以让巴达克山部队回家，并给了他们每一个士兵以丰厚的犒赏。自此以后阿古柏伯克对巴达克山一直具有一些影响，有几次甚至想和阿富汗的希尔·阿里争夺那个地区的所有权。他的野心从来没有在这方面充分显示出来，但肯定的是，希尔·阿里对他怀有几乎不加隐晦的猜疑和憎恶。

随着和卓布素鲁克汗被废，阿古柏伯克亲自掌权，1864年末所开始的事业的第一部分就告结束。在阿古柏伯克对东干人与和田的较长期的作战中，可以觉察出在他直接活动范围外的事件对于这位精力旺盛的统治者所产生的影响，直到他一生的最后几年，他才认识到俄国人的力量，而且直到1870年固尔扎被占领时，他还自信能够阻止这个巨大的北方强国的前进。除了渴望获得军事

声望和令人兴奋的事件以外，正是这种想法促使他从事建设一个他所痴心妄想的强大、广阔的国家。作为喀什噶尔的统治者，他只能是浩罕汗国的藩属；作为东土耳其斯坦君主，他才可以和俄国沙皇或中国皇帝分庭抗礼。这并不是一个不足取的雄心，1866年被布哈拉的爱弥尔封为阿塔勒克哈孜时，阿古柏伯克已完成了他所能完成的那么多了。

第八章 对东干人的战争

阿古柏伯克除掉了布素鲁克汗，平定了东干人和中国人在西喀什噶尔的抵抗以后，有一些闲暇时间来对他的确实地位作一番仔细的通盘考虑了。过去十二个月断断续续的战争的结果，他自己认为非常满意，但是，至少可以这样说，这种情况能持续多久是成问题的。以往的冒险家们也曾有过象他那样多的成就，但中国人总是恢复了元气打回来了。阿古柏伯克怎能知道，有些谣传是很有根据的呢？这些谣传说，中华帝国在对东干作战以外的其他战场上也受到沉重打击，而且就是对太平天国的胜利也不足以完全抵消帝国在其它各个方面所遭受的灾祸。欧洲评论家们虽然预言中华帝国的末日正在迅速临近，但阿古柏伯克所拥有的情报手段是非常不完善的，甚至在喀什噶尔卫城投降的时候他仍然在害怕中国人会回来报仇。我们知道，他的害怕并不是毫无根据的，但他把事情预料得比实际早了十多年。阿古柏伯克对于自己的力量或好运并不乐观到认为他不会遇到那打败他的前人的危险；因此，他的第一个目的就是把他所有的力量集中成一个坚实的集团，以便

120 当中国人来的时候对他们进行抵御。但是，聚集在布素鲁克汗旗帜周围的那些五花八门的人群在征服六城地区时如此清楚地表现出来的倾轧不和，使阿古柏伯克痛切感到民族分裂的害处。因此，他下定决心，不管在其它方面他可能遭到失败或取得成功，他应坚定地努力把安集延人和东干人，喀什噶尔人和“和台”融合成一个团结的、有效的整体。这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雄心，但要把这样不调和的成分粘合在一起需要有一种“铁血”政策。的确，阿古柏伯克对

于采用这种政策是毫不畏缩的；但当他完成了给自己规定的任务的时候，他发现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国家在人口和财富方面比以前任何时候都降低。但在 1866 年较早的日子里，他心里对后一点并未怀疑过。应当记得，奇怪的是，阿古柏伯克在喀什噶尔的成功反而使浩罕政府对他的事业的同情心疏远了；尽管这种情况可用呼达雅尔汗对他的恶感来解释，现在他已牢固地坐在宝座上，他对于一个曾经几次背弃他的事业的臣民当然不会有什么友好的表示，但这一事实不能单单地归之于这一种感情，一定还有较深的和比较非个人关系方面的解释。在这些亚洲小君主的一切历史阶段，每当这些君主中有一个人由于武功或仁政而超越他的同辈以上的时候，我们总会看到有互相猜忌和互相非难的现象出现。的确，他们当中的任何人都很少显示过有高出一般的才能或勇武；但一旦有个人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他就立刻被他的邻人宣布为一个危险的标新立异，因此就应该予以挫败或反对。这种习惯一直流传到了我们这个时代，俄国在亚洲进行的长期战争中，我们从来没有 121 见过两个国家，不管多么微小，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浩罕人从来没有帮助过布哈拉人或基发人，阿富汗人或喀什噶尔人也没有帮助过浩罕人。可以说，当他们在俄国人的勇武面前一个一个地单独败下阵去的时候，他们会保持中立，采取一种足以激起所有那些还记得拳击比赛场上传统荣誉的人们钦佩的方式保持中立，但是，既然他们受到的惩罚是丧失了自己的生存权，那么，他们这种并非为了遵守骑士的条律，而是单纯出于互相憎恶所产生的行为是否明智就很成问题了。阿古柏伯克在实现他的统一的喀什噶尔梦想以前，必须首先战胜这种器量狭小的猜忌。他的道路困难重重。如果满足于太少的收获，就有丧失所获得东西的危险，但如果企求的太多，也有把所赢得的一切都丢光的危险。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即使是最勇敢的人也可能踌躇莫决，最果断的人也会无所

适从，而直等到被事态进程所迫使才有所行动。阿古柏伯克似乎有好几个月的工夫不知下一步怎么办才好。

1865年，在他向叶尔羌最后一次进军以前，他首先拿下了巴楚，他这样做，不仅保证了阿克苏和叶尔羌之间的交通，而且也保证了阿克苏和田之间的交通。这个位于英吉沙以东二百哩的据点，过去一直是，现在仍然是很重要的；据说，阿古柏伯克大大加固了它的工事。这一成就是阿古柏伯克在英吉沙附近战胜来自阿克苏和库车的东干人的巨大胜利的持久性结果，在进一步的作战中它有效地保卫了他的侧翼。但是，取得这个要塞的重要性要到他把注意力转向南边一个城市和田的时候才变得明显了。到那时，
122 它才使他能够把注意力完全集中于向南扩张统治权，直到喀喇昆仑和昆仑山，在这些山以外他是不会再遇到敌人的。在和田，当中国当局被推翻以后，穆夫提哈毕吐拉^①就被授予了最高统治权。在他统治这个城市和地区的一段时期中，似乎没有不必要的周折就建立了秩序。大家会记得，当阿古柏伯克在喀什噶尔周围取得早期胜利以后第一次出现在叶尔羌的时候，叶尔羌人是承认新和卓君主的最高权力的。他们的榜样很快地为和田的哈毕吐拉所效法；而且在叶尔羌战争期间，也未听说过这个统治者对与他有关协议有什么异议。的确，他离直接采取行动的区域太远，但单这一点并不足以说明和田为什么对于喀什噶尔事情的进展无动于中，这是它在以往任何时候从未表现过的。因此，可以认为，和田对于在喀什噶尔建立的新和卓王朝特别恭顺；当阿古柏伯克向叶尔羌以南前进的时候，哈毕吐拉赶紧派代表去这位征服者的军营。他们受到体面的接待；但在阿古柏伯克的胸怀深处对于这个穆夫提哈毕吐拉却潜藏着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或憎恶。阿古柏伯克掩藏了他的真实感情，派人送信请这个穆夫提到他的军营里来。这个穆夫提，

^① 穆夫提是伊斯兰教教法诠释官；此人在汉籍中多作马福迪·哈比布拉。——译者

由于阿古柏伯克对他的使者的友好态度而受骗，带着他的许多亲属和随从来到这个喀什噶尔将军的营里。据说，最初他们受到非常尊敬和友好的待遇，给他们大摆筵宴并穿上贵重的衣服，但所有这一切光荣只不过是结尾的典礼的前奏而已。当晚餐还在进行中的时候，他们被解除了武装，并被带到外边处死，同时从几个方面向和田城发动攻击。即使这样，还是受到了长时间的抵抗，而且在所有的拼命抵抗都终止以后，被激怒了的阿塔勒克哈孜的士兵们 123 还继续进行了长时间的屠杀。对于阿古柏伯克在这次行动中的主要罪责是不可能予以宽宥的，如果他是一个文明的欧洲将领，我们就将把“永为其一生之玷”这句话应用在他身上了；但对于这一个无所不为的亚洲人使用这样一句话就未免是极端的嘲弄了，他即使是不比受同样教养的人更坏，从道德意义上讲确实也不会好得多的。正如事实所表明的，攻夺和田并屠杀其没有武装的领袖们的行为，既没有必要也无可辩解。也许在这位阿塔勒克哈孜看来，有好些理由说明和田具有特殊重要性，他也可能认为哈毕吐拉及其随从的忠诚是可疑的，但据我们所知，做出这种行动来的理由是极为模胡不清的，即使作为政治上的权宜手段来看，也是如此。直到今天，甚至在一个习惯于以大规模屠杀为攫取权力捷径的民族眼中，这种屠杀也毫无必要，每当和田和桑株人民回忆起这次屠杀的时候，就引起他们内心痛恨。按照阿古柏伯克前辈们的传统来讲，他的这次行动是最彻底的，因而也是最安全的，但正是在他的国家的这一部分，这位阿塔勒克哈孜最不得人心。这是 1867 年早期的事情，现在阿塔勒克哈孜有机会来解决他和他的东边邻人东干人的关系问题了。

真正的东干运动，正如上章已经说明过的那样，起源于中国的甘肃省和陕西省，接着就几乎毫无阻挡地蔓延到天山以南的吐鲁番和天山以北的乌鲁木齐。运动的火焰很快又从吐鲁蕃延烧到喀

喇沙尔、库车和阿克苏，而在所有这些城市，由于信伊斯兰教的浩罕人这个新成分的出现以及本地居民和中国东干人联合行动，这个火焰就受到了进一步的煽动。在天山以北运动暂时受到抑制；
124 在我们论述阿古柏伯克和东干人的早期战争之前，有必要对伊斯兰教在伊犁的复兴经过加以说明。早在 1860 年，那个地方就发生过严重纠纷，尽管中国人的地位在那里比在喀什噶尔巩固得多。在那年有人策划了一项谋杀中国将军和颠覆当地政府的阴谋。但这个阴谋被发现并完全失败了。看来在伊犁造成不满的原因比在南方地区为多，在这里问题倒不是出在“和台”和东干人之间，而是在一个叫嚷着要求给予工作、减少捐税，并付予工作酬劳的人民和一个不能满足从各方面对它的提出要求的政府之间。伊犁将军采取了一个在财政方面面临山穷水尽局面的政府最后会采用的手段，即通货贬值和滥发纸币的办法。本来指望这一措施会减少困难的，却只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情况变得愈来愈不可挽救，人民由于受到中国人在邻近地区遭遇困难的鼓舞而增加了他们的要求项目；而中国官吏们则在从四面八方他们袭来的风暴中吓昏了头脑。他们只是一些在其全盛时期受到普遍钦佩的制度的衰败了的代表，其所以不致受到我们的轻视，只是因为他们还保留着剩留下来的勇敢这个唯一美德。当中国人最初征服东土耳其斯坦的时候，他们从喀什噶尔带来了大批移民，把他们安置在伊犁周围的地方。这些人被称为塔兰奇人，经过两三代的时间，就繁殖成为一个人数众多的社会。这些人在心里总是对中国人不满的，但由于他们
125 们处于一个很低下的地位，如果不是由于征服者中有一大群人给他们作出了反抗的榜样，大概是不会想到造反的。一旦到了中国人财政上的困难使得劳动阶级的不满达到了可怕的程度，以及在准噶尔东边的东干人的胜利引起了仇恨一个衰微的佛教徒统治的狂热情绪高涨的时候，这些塔兰奇人也不甘落后地再燃起他们几

乎已被遗忘了的仇怨并和东干人结成攻守同盟。双方都尽可能地集合了军队,但在随后的交锋中,将军的受过训练的军队战胜了远比他们人数众多的起来反抗的民众。然而,就在几天之内,巴彥岱堡垒却落入了造反者之手,这一成就抵偿了他们在野战战场上的失利而有余。伊犁本身在 1866 年 1 月投降,一个东干—塔兰奇政府成立了。同时中国将军用点燃在他官邸下面的火药坑道的方法使他自己、许多随从和进攻者同归于尽。在行政方面,东干成分逐渐取代了塔兰奇人,在 1871 年俄国人来到以前的五年独立期间,主要是一些对于亚洲这一地区事件进程没有影响的无关大局的争吵。对伊犁的贸易衰退了,俄国进行干涉的其它许多有力的理由,也是在当地民族独立存在的这少数几年中累积起的。

随着 1867 年开始,阿古柏伯克既然在南方和西方获得了不受侵略的安全,就感到自己已能够对付在他北面和东面的不连接然而却是结成同盟的东干国家了。东干人与阿克苏及库车的和卓们的敌意已经显示出来,一般的猜测是,他们一朝从 1865 年的灾难性战争中一恢复过来,就会重新作出努力把浩罕的冒险者们从喀什噶尔赶出去。他们都信仰同一宗教教义,在一定程度上他们都需要战胜一个共同敌人即中国人,而且他们也肯定都害怕中国人再回来;但所有这些事实,不管是东干人或阿塔勒克哈孜,似乎竟然都毫不放在心上。为后者说一句简单的公道话,我们必须记住,东干人原是侵略者,而且他们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他本人的不友好态度。的确,他曾经作过某些努力,想同阿克苏的统治者达成一种友好的协议,但他的提议受到了冷遇,那个城的和卓们和东干人都采取疏远的态度而不与这个新来者作任何来往。双方都在互相窥视了一段时期,每一方都在等候对方采取第一步。当阿古柏伯克最初出现在喀什噶尔的时候,东干人从他们对他进攻中就已经尝到他的武力的分量了。所以,当阿古柏伯克已经具有远为强大而

且团结的阵容来迎击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更未必想要再尝一尝过去的滋味了。实际上，只要阿古柏伯克维持住在他自己疆界以内的秩序，他就可以免于从东方受到侵犯的危险；在他北面伊犁的东干人，并没有表示过对他的国家特别仇视。既然没有从东干人方面受到任何攻击的危险，阿古柏伯克应该有理由不把他和他们的关系推向极端了。在自己的边界上存在一个敌对的国家的确是件麻烦的事情，但是自己本处于一个非常坚固的防守阵势，那么如把它放弃而采取一个进攻政策，其不利条件就更为显然可见了。对于从道义上说几乎是无可原谅的，而从政治上说又完全没有必要的进攻，能够说出什么必要性来为它辩护呢？阿克苏附近地区

127 的战略意义，可以说已由于对巴楚的占领而被抵消了，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和平的恢复，从喀什噶尔到阿克苏的通商道路也有再度恢复的希望。但这种包含着容忍东干人冷淡态度的姑息措施是阿塔勒克哈孜所忍受不了的。这些穆斯林的信仰的正统性并不是无可指责的，对于象阿古柏伯克这样一个虔诚而精力旺盛的逊尼派信徒来说，他们几乎和敌对宗教的信徒同样地讨厌。他向阿克苏的和卓与东干统治者提出了专断的通告，在他们固执地表示抗拒之下，阿古柏伯克就纠集了军队去惩治他们了。他指责东干人的教义和伊斯兰教法典不严格一致，并呼吁虔信热诚的逊尼派信徒去促使这些顽梗的人民承认他们教派的错误。除了把这种半宗教性的因素引进这个问题里以外，阿古柏伯克还对直到库车的大片地区提出了主权要求，说这一地区原是和卓王朝古代领土的一部分。

1867年春天他的军队分成两路向阿克苏进发。当许多个月来一直威胁着他们的危险突然降临的时候，东干人似乎一下子就被吓瘫了。阿克苏无论从自然形势或防御工事来说都是一个很坚固的地方，但在这里所遭到的抵抗并没有多久，阿古柏伯克就以破竹之势向库车挺进。在这里，东干人从他们的惊恐状态中稍稍恢复过

来以后，作了拼死的抵抗，他们和从吐鲁蕃来的援军一道，摆开了相当坚强的阵容。库车的统治当局在中国人统治时期本是些负责保管一个纪念一位穆斯林圣人的神堂的和卓们，但在动乱发生以后，他们就离开了神堂而走进了议事室，放下了向已故圣人的祈祷而从事于为了治理人民而发号施令的更为艰巨的工作。在我们眼中看来，不利于他们的令名的是，他们在屠杀“和台”这件事上曾经特别卖力。在他们执政的短暂时期，他们似乎是相当慈惠的。在中国人被推翻后和阿古柏伯克入侵前的短暂期间，他们并没有做任何值得注意的事情却居然得到了他们的臣民的赞许和爱戴。因此，阿古柏伯克在离开他的首府五百多哩的库车，后方有一长串的敌对地区，遇到了东干人的全力抵抗。在向阿克苏推进以前，他曾经打发一些军官回到喀什噶尔去带领新征募的兵员来，而且也曾采取那种值得怀疑的权宜之计，把在阿克苏俘虏的许多东干人编进他的军队里。当他到达库车城下的时候，在援军未到之前，他已不可能进行任何强有力的围攻了。阿古柏伯克和他的一些比较慎重的幕僚们试图利用耽搁的时间进行谈判，但东干人，也许是出于不肯承认他们的劣势或者不相信阿塔勒克哈孜的诚意，拒绝进行他们认为是不必要的谈判。阿古柏伯克已经侵入了他们的领土而且吞併了阿克苏；他们所能同意的唯一条件就是把他的军队撤走。双方的比较温和和比较慎重的人们所作的努力都无济于事，每一方都用尽各种办法纠集新的军队来决定东干人和喀什噶尔人谁优谁劣的问题。有好几个礼拜之久双方军队互相对峙着，一方驻扎在俯瞰着从阿克苏来的大路的城西北面的小山上，另一方则驻扎在城本身的周围及其工事里。东干人在人数方面多得多，但在主力军的质量方面，以及武器和军官经验的总效率方面，则阿古柏伯克占绝对优势。他的军队的核心是由阿富汗、浩罕和巴达克山部队组成的，他们都是前两年战争的老兵。而东干人则有的是杀害无

助的中国人的凶手，有的是从阿克苏或英吉沙逃亡来的。他们武装不全、没有组织，而且也没有任何能胜任的领袖。尤其重要的是，他们对于战争的目的不明确，有许多人在内心里对于阿古柏伯克反比对他们自己的首领更同情。在另一方面，喀什噶尔军队则受到一长串辉煌战绩的鼓舞，渴望通过战争这个手段来发扬他们自己的宗教，他们面前还有一个劫掠象库车这样富庶城市以谋取个人利益的机会。因此，他们渴望援军的来到，而且有些更热心的人还要求毫不迟疑地率领他们上阵杀敌，阿古柏伯克非常小心谨慎，他不让自己由于部下的急躁而仓促采取未成熟的行动，由于援军的来到比预料的快，这就使他不仅能够把他的兵士的奋激心情保持在适当的限度以内，而且还能在比原来认为可能的日期更早一些时候开始积极进攻。东干的领袖们受了阿古柏伯克毫无动静状态的蒙骗，以为他已不能进行他已着手的冒险行动，因而采取了攻势，只落得在几次较小的交锋中就被打败了。东干部队被赶进城内，接着是最激烈的围攻。库车守军由于人数不足，对于保卫目前库车的大片郊区和广大的防御工事以及从古以来就耸立在旧址上的一些城市不能进行兵力相应的部署。过了没有几天，阿古柏伯克就觉察到防卫只限于防御工事的有限部分，有几个据点完全照顾不到。因此，他决定用总攻的方法占领城市，从而结束围攻的缓慢

130 进程。他用了可以动用的全部力量从三个方面向城进攻，但东干人奋力抵抗，使他所有的直接进攻都受到重大损失而被击退。他把从后面袭击这个城的任务交给了他的儿子库达·库尔·伯克，现在进攻库车的结果就完全倚靠这一行动的成功了。由于极好的幸运以及指挥者的勇敢，这一路取得了胜利；阿古柏伯克这个前途很有希望，当时只二十岁多一点的儿子虽然在随后进城的混战中阵亡，但库车是攻陷了。为这一胜利所付出的代价也许并不算太高。东干权力受到了打击，这使它的威胁不再可怕，并有效地保护了喀

什噶尔，东干城市之间有任何可能的同盟也不足为害了。阿古柏伯克在库车以其平素的敏捷乘胜前进，但他的能力尚未成熟到足以在离他的力量根据地这么远的地方从事大规模的战役。但这时还加上另一个原因，迫使他的注意力转向他的领土的另一部分。俄国人正在浩罕和阿拉木图地区向固尔扎西部推进。

很明显，为了慎重起见，需要迅速回去；目前，所有进一步的胜利都只能暂时放弃了。但在阿古柏伯克回去整顿他的西部领土的事务以前，他已经满意地接受了喀喇沙尔、吐鲁番、哈密和乌鲁木齐的统治集团谦恭地送来的降表。在这次光辉战役以后，他缓慢地经由库车退回到阿克苏。接着他就转向山区，征服了在前次进军时忽略掉的乌什；在他取得这处地方以后，伊犁的东干人对于这位使他的帝国和他们的国家直接接壤的人表示愿意建立友好关系。所有这些事件都是 1867 年发生的；关于在东土耳其斯坦的这些变化尽管不时地有不确实的谣言传到英国，整个世界，甚至俄国方面，对于现在已难以追溯确实情况的那些事件发展都是漠不关心的。但是，随着第一次东干战役的结束，随着这个新兴国家扩展到了库车城下，如在下一章里将会看到的那样，俄国政府对于这个它在征服进程中迅速靠近的新成立的联盟的正确情况，就力求获得一个明确的了解了。 131

由于外国不仅开始关心，而且几乎在进行监视阿古柏伯克在东土耳其斯坦的行动，这就使得阿古柏伯克迄今为止不受约束的任性行为受到了某种限制；这样库车以外直到吐鲁番的地区，在一个短暂的时期内，就避免了他们在 1871—73 年间所遭受的那种浩劫。当他在这次胜利进军并吞并了阿克苏、库车和乌什这三个重要城市后回到喀什噶尔的时候，曾有一度似乎威胁着这个国家的从俄国来的危险已消失了，于是阿古柏伯克就着手巩固他所已经获得的成果。在阿克苏和库车建筑了防御工事，并在通往浩罕和

固尔扎的山口构筑了各种小型要塞,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他采取了一切预防措施,以保证他的小小国家的安全,不受外来的侵扰,而内部的一切不平之鸣,看来由于欢呼阿塔勒克哈孜的胜利也暂时静默下来了。他的确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他对于自己的事业可以感到相当的得意。在中国政权的废墟上建起一个强盛的国家,以某种稳定的政府形式把各个扰扰嚷嚷的种族和互相仇视的宗派联合起来,并不是一件微不足道的成就,阿古柏伯克对于所有这一切光荣都有无可争辩的权利。如果不是他,东土耳其斯坦将会继续
132 混乱分裂,直到俄国人或中国人来建立一个体面的政府;如果不是他,喀什噶尔就会陷于几乎是绝望的混乱状况,从而给俄国的胜利大开方便之门。但当阿古柏伯克回来发现他在喀什噶尔并没有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候,他对自己没有用更大的力量把对东干人的战争进行到底就感到非常懊丧。他迫切地希望获得一种借口,好恢复已中断了的对东干人的战争。在这期间,他在伸向巴达克山和奇特拉尔的他的领土内的山区,进行了一次小规模战争。自从巴达克山军队开始为喀什噶尔效劳以来,色勒库尔就对阿古柏伯克表示了某种的臣服;但在1868年,过去一直受阿古柏伯克支持的这个长官起来反叛了,而且还在接近桑株和叶尔羌的地区犯了好几次劫掠罪行。阿古柏伯克立刻派遣了一支小部队去讨伐他,借助于山炮和适当运用少量精干的骑兵,只受了很微小的损失就成功地战胜了一切抵抗。1869年2月,在试用过几种温和的办法以后,正式兼并了这个地区,并把居民迁到叶尔羌,而把柯尔克孜牧民和叶尔羌人移殖到这个地方。他现在能够再度把注意力转向东方了,就在1869年开始了对东干人的最后战争,这次战争直到中国人再次出现才结束。阿古柏伯克一生的重大污点就是他对东干人重新采取敌对行动。在1867年,当他第一次以相当有力的行动向东干人作战的时候,由于当时东干人的势力还未被粉碎,有可

能成为一个可怕的邻居这个事实，那还可以为那次出人意料的行动找到某种借口。但在 1869 年，他们已被击退到库尔勒，尽管他们可能是些麻烦的邻居，会抢劫商队和骚扰旅客，阿古柏伯克对他们进行的后期几次战争，特别由于他本人和他的部属们以特殊残忍手段所进行的战争，总是很难认为是有理由的。但是，尽管动机可能很无力，尽管他对东干人发动的“十字军”战争结果非常不幸，但他要为对麻烦的邻居采取极端手段找出动听的借口也并非难事。1869 年秋，库尔勒被他的胜利的军队攻陷了，他似乎接着就转向北方发源于天山、流贯准噶尔的特克斯和裕勒都斯两河流域。这一行动引起了俄国人的敏感并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占领固尔扎的很简单的借口。在这个地区，东干人和塔兰赤人之间曾经发生过扰乱，如果允许阿古柏伯克前进的话，他必定能轻易取得固尔扎。但俄国人于 1871 年进占了固尔扎，并为他们的行动解释说，他们这样做只是为了恢复秩序并防止它落到阿古柏伯克的手里。他们说他们只是在替中国人保管着，一等到合法的所有人来到，能够永久占有它的时候，就会归还给他们的。当阿古柏伯克派遣一支大分遣队进入天山地区的时候，他的主力部队正在喀拉沙尔和吐鲁番进行激战。阿古柏伯克并不总是亲自作战，因为他的两个儿子，胡里伯克和哈克·库里伯克都已长大成人，他们得到一些较老的副将们的帮助，在若干次战斗中战胜了吐鲁番和哈密的东干统治者，甚至连天山北边的乌鲁木齐和玛纳斯的王侯们都抵挡不住勇武有力的敌军。这些军事成就的光荣被他们对这一地区的无情破坏和对居民的残酷屠杀所玷污了。这些愚蠢行为，只要象中国人攻入那样的考验时刻一到，就会证明它对于这些暴行的施行者是多么致命的事情。他们的作战行动，在没有什么大停顿的情况下一直进行到 1873 年年终，看来阿古柏伯克从这些劳民伤财而又距离遥远的战争中并没有得到任何好处。虽然乌鲁木齐和哈密的东干首

领们有好几次被阿塔勒克哈孜的军队所击败，但他们的城市并未被占领，因而他们的从库车的城墙一直延伸到罗布泊以北地区避免了被破坏成荒芜不毛之地的命运。七克台，一个位于吐鲁番和哈密之间的小城，是喀什噶尔军队深入的顶点。乌鲁木齐、吐鲁番和哈密的高贵家族在吐鲁番陷落的时候几乎全被消灭，他们在他们自己城市里的地位则被东干将领和冒险家们所夺占，这些东干人一听到中国人准备进攻准噶尔的谣言，就开始从甘肃向西撤退。

对东干人的战争确实起了一个有益的作用，使得阿古柏伯克得以征集大量受过训练的军队到他的旗帜下；但当人们知道，在由于连年战祸而弄得民穷财尽的地区，掠夺和获得赏金的机会已逐渐减少的时候，在土耳其斯坦及其邻近地区的一些比较能吃苦耐劳的部落的人们眼中看来，参加他的军队服役的吸引力就减少很多。对于习惯于比较轻松的工作和不受其他亚洲君主约束而自由行动的牧民和非正规部队来说，遵守严格的纪律也是件讨厌的事情，在他统治的后几年里，开小差的很多，在劝诱新兵加入他的军队方面也遇到了困难。在他统治的早年，运用得非常成功的劝诱被征服者加入征服者的队伍的老办法已不再可能，因为把被征服者屠杀净尽已经成为当时的风气了。乌兹别克人、柯尔克孜人和其它部落的人已不能充分供应国家所需要的兵员数目，而本应构成阿塔勒克哈孜的最大部分臣民的东干人，则被以不分青红皂白的严酷手段强制处于低下的地位。其结果是，完全由于人员缺乏就使他的军队真正陷于一种瘫痪状态，而且直到考验的时刻到来的时候人们才知道他的军队削弱到何等地步。用尽一切办法来劝诱阿富汗的、巴达克山的，尤其是印度的士兵参加，但是，尽管这些人组成了一个可靠的和有效率的兵员核心，但远远不足以拼凑成一支强大的军队。根据这些事实，我们有理由认为，不遗余力地进行这些东干战争，是阿古柏伯克一生中突出的最大的错误。只要他占领

了库车，他至少就可以说已经得到了一个有价值的战利品。凡是
可以被认为是喀什噶尔的每一部分地区，他都得到了，由于占领了
阿克苏和库车这些大城市，他的国家已经得到有效的防卫，他的税
收也有了预期的增加。他可以理直气壮地自称，在军事威力方面
他已经远远超过他的前辈，如果他是聪明的话，他应该把注意力转
向好好治理国家方面，而且这样做将会证明，他不仅在指挥军队方
面，而且在治理臣民方面，都比过去任何和卓君主有更大的才能。
如果他不是这样毫不放松地把他对于东干人的根深蒂固的憎恶坚
持到底，他本可以很容易地和他的邻居们友好相处，而他们可能加
给他的危害也将会是无限微小了。这个比较慎重的政策的主要好
处也将会在中国人前来讨伐东干人的时候显示出来。不仅东干人
将会更有能力抵抗中国人，不仅玛纳斯和乌鲁木齐将能够进行更
坚决的防御，而且东干人将会退回到吐鲁番，持久地守住那个城市
的周围地区以及喀喇沙尔和库尔勒，以抵抗金顺将军。阿古柏伯
克就能够以其原封未动的饱满实力，怀着充分的信心，等待中国人
前进到他的坚固的边境城市库车，而且，由于中国人刚完成了击溃
东干人这个艰巨任务，他将会满意地发现，中国人很可能在未到达
他自己的边疆以前，就已经精疲力竭了。 136

我们只能根据人们的行动结果来对人们作出判断，阿古柏伯
克的不停地和不必要地对东干人进行干扰，其结果是中国人在短
短几个月之内就能够把残存的东干城镇扫荡干净，而以胜利的充
沛的威力和阿古柏伯克的在数量上居于劣势的军队交锋。所以，
对于这位统治者的重大过失，即只要略微考虑一下就可以证明是
不明智的轻率作战行动，是不能加以原宥的。我们既已考察了阿
古柏伯克对中国穆斯林的战争，现在要研究一下他对喀什噶尔本
土的统治，以及这几年间发生在这个国家的其它部分的事件了。

第九章 阿古柏伯克的 喀什噶尔政府

阿古柏伯克值得我们重视的地方主要在于，十二年多的时间，他给予中亚一大块地区一个安定的政府。尽管在危急关头他的对外政策可能有缺点，但他的对内管理却建立在一个实际的和充分公正的基础上。作为一个军人，他做了不少值得我们钦佩的事情，在许多打胜仗的战场上和许多九死一生的交锋中证明他有资格被认为是一个无畏和坚定的军人。但在这一品质方面，他自己的副将，喀什噶尔的穆拉特阿伯杜拉伯克，如果不是超过他，也是和他相等，而他的儿子胡里伯克的某些业绩，和他的成就比起来，在勇敢方面不相上下，在凶狠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在行政才能方面，阿古柏伯克却远超过他的同时代人，而使他的成就的优点更突出的，倒不是他所采取的方法的独创性，而是他在实施中的无比精力和不屈不挠的精神。他把当一名中亚的伊斯兰教捍卫者作为自己的任务，只有经常记住这一事实才可以发现他的力量的秘密所在。布哈拉和阿富汗的爱弥尔们可能会受俄国人诱惑性的诺言所愚弄，可以为了暂时增进他们的世俗财富而同意牺牲他们的宗教利益，但作为阿塔勒克哈孜——即真正“元老卫士”——的阿古柏伯克，决不会屈身去做这样卑鄙的事情。不管土耳其斯坦的伊斯兰教人民出于同情和善意把什么空想出来的力量赋予这个统治者，但毫无疑问，他对俄国人采取的态度却证明他需要有比别人曾经认为他具有的力量更强大的力量。他本没有任何坚实基础采取那样大胆行动，而竟然采取了一种公然蔑视实力的态度，这种狂妄

想法的隐秘原因，只能从阿塔勒克哈孜努力要作为不只是喀什噶尔人而且是中亚整个伊斯兰世界的代表而得到说明。他在征服喀什噶尔以后，发现他已引起了俄国人的敏感，由于他自己地位的需要，他不得不从各方面寻求支援，并求助于各种手段来增加他的力量，哪怕是表面现象也好，以避免他的国家的瓦解和向沙皇臣服。他的努力是如此成功，他的行动是如此敏捷，他的态度是如此大胆，以致俄国人竟错误地相信——我们断然认为，这种相信是毫无根据的——喀什噶尔会是一个比布哈拉，或浩罕，或基发更为强大的对手。

一个尽管年轻，然而却似乎是高出于其他类似国家的国家的内部管理，可能被认为是一个值得加以详述的有趣的题目，但关于这个题目的直接证据并不象我们所希望的那么多。甚至连道格拉斯·弗赛斯爵士在他的正式报告里，对于阿古柏伯克的行政制度内部活动情况，也未能象我们所期望的那样予以详细阐述。然而，除了俄国作家格雷戈里也夫以外，他是这个问题的唯一权威。

从阿古柏伯克的宫廷和他身边说起，我们就碰到两桩不协调的事情。第一，没有大贵族，或者说，真正依附他的家族的人。那些曾经效忠于他的统治和有工作能力的首领们，不管他们是浩罕的贵族也好或是柯尔克孜或阿富汗的冒险家也好，都被积极使用 139 为地方长官或者充当了散布于他们的专断的君主的广大领土中的要塞司令官。他们都按期来到首都朝觐，阿古柏伯克也经常到边疆去看望他们，亲自监督他们的工作；但在这样一个人数不多的活跃的社会里，社会中的有才智的成员是非常宝贵的，不可能容许他们把精力专门用来作为宫廷的装饰品。阿古柏伯克是把他自己强加于一个对他漠不关心的人民头上的，他必须以毫不松懈的努力才能保住自己的地位。要办到这一点，他需要有一大批有效率的和

可信任的部属,这些人可以分成三类不同的人材即: 军人、行政人员和税吏。直到他统治的最后几个月, 他的制度没有出现活力衰退的征象, 或胜任的官吏的补充来源有限或可能耗竭的征象。然而, 即使在他的全盛时期, 获得充分的人才补充也是有困难的, 因而在所有的低级职位方面就不得不使用心怀不满的“和台”了。库车和阿克苏的东干人在一旦发生危急时并不比他们的佛教同族可靠多少。但不管可能发生什么别的事情, 执掌着人民的教育、宗教、社会秩序和地方行政大权的广泛的国家文职机关必须维持其日常工作。可以立刻觉察出来, 当一个从来没有深得人心的政府只有有限人数可以支配时, 它就无法解决困难, 而是迟早会耗尽可用的人才的补充来源, 或引起心怀不满的人民的造反。除非经常记住这样一个事实就不可能理解阿古柏伯克统治的秘密: 即他作为一个穆斯林的严格正统性和他在国内更严格的强制执行他的宗教法律, 只是他的对外关系的力量要素; 在对内事务方面, 这两点使他处于一个暴君的地位并妨碍人民对他本人及其统治有任何热情。除宗教教师阶层和比较狂热的安集延人以外, 是否还有任何人有巨大的宗教热情是值得怀疑的; 说喀什噶尔人全部都是狂热的穆斯林完全是错误的, 就象说布哈拉人或阿富汗人全部都是狂热的穆斯林就完全是对的一样。除了在喀什噶尔城内没有贵族或富有的官吏阶级以外, 还有一种古怪的不协调现象, 那就是执行极其严格的礼仪和极端平凡的服装与仪式同时并存。的确, 很少听到任何到喀什噶尔的旅行者谈到宫廷官吏的富有或服装的华丽。连哈吉·妥拉、或是按他现在的称呼叫做赛义德·阿古柏·汗和叶尔羌长官穆罕默德·云努斯, 阿塔勒克哈孜的这两个最受信任和最杰出的追随者, 也没有任何外在的标志可以把他们的崇高地位与朝廷圈子里的一大群较小的领导人区别开来。有些王家军队的军官们, 在他们皮制的朴素军服上有一个用丝线绣制的龙头纹章, 大概是中国人遗

留下来的一个习惯。在喀什噶尔的知名人士中，只有最近来我国访问的哈吉·妥拉——以前他曾访问过俄国、土耳其和印度——曾经把欧洲生活中的一些舒适的东西和奢侈用品引进他的家宅。没有多少人效法他的榜样，而且经过一个短时间的流行以后，他所努力想使之普遍流行的改进，就消逝无踪而再也看不到了。有绅士以上地位的人们的通常服装就是一件套在紧身上衣和马裤上面的象毯子似的斗篷，农民穿的衣服也和这差不多，只是他的斗篷通常是羊皮做的罢了。爱弥尔本人作出了穿着极其朴素的榜样，他的下属们都是些很有手腕的朝臣，他们绝不至于想使他们的习惯和他们的君主有所不同。但他的宫廷在华丽方面的欠缺，却由于在宫廷仪式的每一细节上实行一种完整的礼节制度和对于统治者及其宗教所表现的崇敬外表，给人以深刻印象而得到弥补。爱弥尔每天在他的接见室里公开接受觐见，这时人们就把所有的诉状和有关严厉的处罚的问题呈交给他。他的沙格瓦尔即外事秘书们把关于印度或俄国，阿富汗或东干人关系中的一些最紧急的事务向他汇报；所有当时正在首都的各地方长官也都来朝觐，或者是为了亲自向统治者致敬，或者向他汇报他们各地区政府的事务。但除了他的几个亲属以及象阿伯杜拉那样比较亲密的伙伴外，都不许在他面前坐下。就是这些人也不能坐在他们君王的一定距离以内。所有被准许接近他的臣民，对他都必须以最谦恭的态度和最谦卑和恭顺的恳切的语言来对待他。他的儿子，胡里伯克，在和臣民的交往中，更是特别注重礼节。就连他的表兄，哈吉·妥拉，一个在经验和家世方面都应受到特别尊重的人，也从来没有把自己和这个年轻的暴君放在同等的地位，在和他谈话的时候总是以谦恭和逢迎的辞令来装饰自己的语言和思想。根据我们所得的情报所能正确提供的意见，立刻可以料想到，所有这一切恐怖政治，就使得这个统治家族把战场上的勇武和密室中的超凡能力所赢得的好感

142 统统都丧失掉了。在喀什噶尔，丁尼森^①的诗句：“以恐怖政策实行统治的人就是犯了严重的过错；”得到了有力的证明，但是，这个国家既然建立在军事体制上，而且对于被征服的种族又极端地不信任，就不可能不是这样。

阿古柏伯克的统治是怎样建立起来和维持住的最可靠的证明，可以从他的翰尔朵或王宫就是一个大的军营，里面的房间专供他的王室家属使用这一事实上看出来。他的外屋里满满地陈列着从古老的中国伊尔吉尔式到近代的克虏伯式和阿姆斯特朗式各式各样的枪炮。他的精选的穿着大红军装的炮兵团，除了对外国敌人进行重大战斗外，很少离开主要城市。在喀什噶尔的新城里他也储藏军需品，据说在那里的工厂里他可以模仿欧洲科学的最完善的武器制造相当数量的大炮和滑膛枪。但必须注意的是，我们没有得到在实际战争中有使用他的自造武器的记载，一般知道大量使用的是从俄国或英国补给的武器。除了他的臣民中的中国人后裔富有模仿的天然才能外，在他的军队里，特别是在炮兵里，还有许多在兵变^②时或在那以后从英国军队中逃跑的印度兵。这些军人作为军士或再高一些的军官是很可贵的，他们和从浩罕来的以及邻近山区部落来的优良部队结合起来，就给予整个军队以简直难以估量的结合力和活力。这里应该顺便说一说，这个军队被分成很不相同的两大类，除了当全国力量都被动员起来保卫国家的紧急时期外，要求他们执行和他们本身的组合成分那样相反的不同任务。爱弥尔用以征服喀什噶尔的那一支由混杂的人群建立起来的军队被分成两个部分，即吉杰特或称骑兵，和沙尔巴兹^③或称步兵。前者是比较精锐的战士，是根据个人的体力或技能选拔出来

① Alfred Tennyson (1809—1892), 英国诗人。——译者

② 指 1857—1858 年反对英帝国主义血腥统治的印度兵变。——译者

③ jigit (阿拉伯语)，意为“年青的兵士”；sarbaz (波斯语)，意为“勇敢的兵士”。——译者

的。骑兵既受过步兵作战的训练也受过骑兵作战的训练，用一支长单筒枪和一柄马刀武装着。他们的军装是一身耐穿的皮制军服，绝大多数是浅黄色。他们实际上相当于我们的龙骑兵，或许更接近于拟议中的来福枪骑兵团。步兵里面也包含着炮兵，比他们的骑马的同袍们具有许多种用途，他们也是经过某种正规操练的，住在军营里。这是一种正规军人，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倚靠他们来保卫国家。不可能很准确地说清楚在全国部队里骑兵和步兵的人数有多少。几个月以前有人估计有五万或六万之多，可能还要多，现在我们对这个问题聪明些了，但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然而很可能阿古柏伯克在他的军队里从来未尝有过两万名完全可靠的兵士，在东干战争结束以后，这个数目的一半就会比较准确地反映了他的骑兵和步兵的兵力。但在多少有点效率的主力部队以外，还有一些难以分类的部属，如“和台”、东干人、半野蛮的柯尔克孜人和象朵兰人那样的粗鲁堕落的野蛮人，在人数上也会形成一个颇为强大的阵容。应该立刻把“和台”从估计中除去，因为从来不许他们走出叶尔羌和喀什噶尔附近，在这些地方他们是和别人隔开的，被用作军事仆役、哨兵以及军工厂和车间里的工人。在不同时期服役于喀什噶尔军队中的东干人，他们对于国家的忠诚是非常可疑的；此外，他们的勇敢也是成问题的，所以他们并不是具有任何重要性的同盟者。在他们中间互相比较，能力也各不相同。在阿古柏伯克征战事业早期参加到他这方面的东干人似乎是其中最好的。在阿克苏和库车陷落后参加的，能力较差，他们的忠诚也暧昧不明；那些住在库尔勒到吐鲁番和玛纳斯地区的，就完全没有用，也丝毫不可信任了。柯尔克孜和乞卜察克的游牧部族与其说他们会使得敌人害怕还不如说他们对于友军是一个危险的根源。所以，阿古柏伯克只拥有为数很有限的服从指挥的军队，用来维持他的王朝不受和卓和东干阴谋的损害，并保卫他的漫长而易受攻

击的边疆免受有野心的强邻入侵。如果他想单独地冒险阻挡俄国人的推进，那简直是最荒唐不过的事，而且为他说一句公道话，他也从来没有自欺到这种程度，以为他能那样做。看来他所希望做到的只不过是当俄国人入侵他的领土时尽最大的力量去抵抗，宁死也不投降而已。尽管他的正规部队数目有限，看来他们还是很有资格在亚洲军队中居于相当高的地位。的确，他们并不是象锡克人或廓尔喀人那样强大的部队，也许还不如阿富汗人，但除了在人数方面外，他们比布哈拉的爱弥尔或浩罕的汗所能够送上战场的部队要强得不知多少倍。组成这支军队只应归功于阿古柏伯克本人。

阿古柏伯克的行政制度是极其简单的。在每一个地区里任命一个达克瓦即长官，那个地区的所有事务的最高统治权就交在这个人手里，但这个人并不是一个不对任何人负责任可以任意施行暴政的大臣。在小事上残暴，毫无疑问，他们当中好多人的确是有的，但臣民的生命却只能由君主本人的命令才能被剥夺，这样一

145 来，无所不为的地方长官手中最强大的武器就被拿走了。

而且，在规定的时间内，这个长官还得到喀什噶尔来汇报在他的地区内所发生的主要事情。在这种场合，包括对长官的指控在内的一切申诉都将提到阿古柏面前予以正式地考虑。也许有人会说，这种做法不过是一出滑稽剧而已，很可能一个受宠的总督可以对他品格的一般指控只是一笑置之，但这只能是一个例外。有许多长官由于行为恶劣而受到了降职的处分，有些，就象阿古柏伯克的同父异母兄弟那样，由于不能胜任而被撤换。与长官共同进行统治的还有哈孜即法官，当然，他和总督并不处于同一个等级，但赋予他全权处理对于犯罪的一切法律裁决。给予司法当局的这种卓越地位，在公众心理上产生了良好影响，因为尽管一般地说，哈孜未必敢于阻挠长官的欲望，但法律效力的至高无上性仍

然极少受到损害。也许很自然地有人会问，这是什么法律呢？除了少数几项能看出是受中国人影响的革新外，和任何其他穆斯林国家的法律完全一样。阿古柏伯克特别严厉地执行了在所有逊尼派国家里所遵守的先知的神圣法典，即沙里阿特。在实行这个法典的过程中，不容许抱任何宽恕怜悯之心来缓和它的条律的严厉性。女人犯罪受到了比犯同样罪的男人更重的惩罚。一般的惩罚如：鞭笞、断肢、拷打，只要有长官下令就可执行，只有死刑的案件决定权属于君主。盗贼、乞丐和在宵禁以后在街上游荡的流浪汉当即予以拘捕，然后带到哈孜那里，由他给予警告，如果被告以前犯过罪，则处以鞭笞。对于官吏滥用职权的另一种限制则有下列规定。凡处刑高于用底拉（一种安有木柄的皮鞭）鞭打二十下的罪犯必须经过每一官级的一名官员审查。这样，哈孜须把犯人连带他的批语送交穆夫提，穆夫提送交阿林^①，阿林送交达克瓦。如果这些官员中任何一个不同意他的下级的批语，而案件又不能采取互相让步的办法得到解决，那就呈请君主裁决，或不了了之。在辖区内执行刑罚时，长官每次都必须到场，并为任何执法不公事件直接对爱弥尔负责。哈孜拉依斯，即首席法官，有权自行决定一切小案件，例如当他在街上巡视时，碰到一个没有蒙上面纱的女人，他可以下令用皮鞭责打多少下；他如果遇到一个出售掺假的食物或使用小秤的人，他可以下令鞭笞若干下并没收他的商品或以其它方式处以罚金。他和他的随从们特别热衷于在祈祷时间迫使在市场上闲逛的人到清真寺去，哈孜拉依斯以十足家长式的权威这样为他的人民的利益而行使他的微末职权。他的专横也是有限制的，他无权判处用皮鞭责打四十下以上的罪行。与司法紧密相关的是警察系统，它的错综复杂的体系布及社会上一切部门。如果在一定程度上行使得当，可以在阿塔勒克哈孜的国家内保证

^① 伊斯兰教教法学者。——译者

有一种大体上公正的这种司法法典，我们既已颇为赞赏，那么证明
147 政府有惊人能力的警察法规和纪律就更应受到我们的赞扬了。阿古柏伯克只是简单地采用了可兰经对于所有忠诚信徒所要求的法律，作为一个立法者，他是没有什么独创性可言的。但作为一个运用无所不为的君主对于制止变乱所能采取的一切措施的统治者（这种措施在富歇^①和第二帝国治下曾经达到最完善的程度），他是有资格被列于这类君主中的最高等级的了。在这一成就方面，他也绝不是一个剽窃者，因为他对于在欧洲存在着的类似条例一定毫无所知，因此，我们必得把创制这样一个难以找出丝毫缺点的警察制度的功绩归之于他。其实，在中国这类制度一直就存在着，每当皇帝牢固地掌握着政权并使他的个人意志体现于国家事务的管理中的时候，警察总是政权的最活跃的工具之一。但即使在那个帝国里，也没有记载说明，他们曾象过去十年中在喀什噶尔达到的对人民的行动和感情控制得如此完全程度。看来，后者的唯一卓越之处就在于它的体制的优越性；因为东干人或中国的警察，个人对个人比较起来，是比喀什噶尔人和阿古柏伯克的其他警察高一等的。一句话，他们的存在应全部归功于那个统治者。

现在我们就对这个重要组织作一些叙述。警察被分成彼此截然不同而且互不相关的两大分支：即秘密的和市政的。秘密的分支和我们的秘密警察不同，我们的秘密警察是和市政警察联合行动，受命负责发现罪犯和阴谋的一类可以指认出来的侦探。而它可以大致看作是由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所组成，因为所有的人都希望和当权者有良好的关系，而达到这一目的的最容易的方法莫过于向他们提供一切秘密情报。但很明显，即使在象喀什噶尔这样一个
148 不负责任的政权的国家里，如果这样明目张胆地鼓励人诽谤自己的邻人，其结果只能导致无益的争讼和混乱。肯定有一种制止臣民

^① 拿破仑一世第一帝国时代的警察头子。——译者

过分热心猜测的方法,尽管关于这个问题的证据不多,但看来它有两个方面。第一,一个诽谤者是冒着严重刑罚的风险的,特别是如果被诽谤者出身于圣者家系,或者是现任官吏的话。这就对于过分轻率的指控起了一种制止的作用,特别是人们后来知道这种效劳的报酬一般都来得很晚,而且很少符合揭发者的期望。但看来这种在阿古柏伯克当政的早期单独采取的遏制措施,随着他的权力的逐渐巩固就发现是不够的。于是这种秘密警察就在一定程度上组织起来,这就是说,就它的成员必须经达克瓦或拉伊斯的批准这点来说,它就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个明确的组织。但由于关于他们身份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他们之中很少有人被一般人知道。社会的各个阶层普遍存在着疑惧,在官邸里的长官,在法院里的拉伊斯,在棚铺里的店主,在茅舍里的工匠,都终日惴惴不安,因不知与他进行最友好的谈话的邻人是否正在详细推究他的言语,以便发现其中是否有任何图谋不轨的形迹。这个可怕的组织成员总是跟在外国使节或外国商人的随从后面,只要一有他们出现在行列的后面,就足以有效地使居民们闭住嘴,或促使他们说出虚伪的或矛盾的答话。

毫无疑问,这种在阿古柏伯克统治的晚年达到高度完善的秘密组织,使他的政权获得了他的前人所未曾有过的稳定性和力量。在结束对于这个制度的作用的叙述以前,最后也要指出,这支149侦探队伍只是在发现国内安集延人或东干人中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上有用,对于试图以暴力镇压任何人民情绪的爆发是无能为力的。它的成员仅仅是些密探而已,作为一个组织,当它的成员被大家识破了的时候,就丧失其价值了。要保持一大群只与地方长官或法官进行正式联系的男的甚至还有女的化名微行的人,唯一有效的方法就只有经常更换和引进新的成员了。

市政警察又被分成市区警察和郊区警察两类,他们和我们方

才所试图描述的无定态组织形成了完全的对比。他们的职务是大家知道的而且是可以识别的。他们是一群执行哈孜命令的公务员,在街道和市场上维持秩序,和我们的警察很相似。佐尔巴士是这个组织的首领,他的下属叫做塔尔扎格齐。他们穿着一种显著的制服,他们的营房附有操场,但他们并不是都必须住在营房里的。按照规章他们主要是军人,他们是对付一切犯罪作恶和图谋造反的人们的有力的第一线。当哈孜每天巡视街道和市场的时候,陪着他的就是他们,一般的刑罚就用他们的武器皮鞭来执行。他们的主要职务似乎是在夜里维持城市秩序,因为在白天我们只听说他们当中有少数人被差派去侍候达克瓦和哈孜。到日落的时候他们的真正重要性就更显出来了,因为他们不仅被派到所有大街、广场和城市的其他开放场所站岗,而且在日出前的整个夜间每隔一定时间还有巡逻队到城里的主要地区巡查。在这段时间内,赋予他们的权力是很大的,在宵禁以后任何生人如果胆敢外出是很危险的。日落以后所有在街上被发现的人都要被逮捕,拘禁到第二天早晨,到那时,如果他们能说出令人满意的理由才可以被释放,同时还要警告他们以后不要再在深更半夜外出。但如果他们不能说明理由就会继续被拘禁,一个生人在这以后的某一段时间内想获得完全自由是相当困难的。郊区警察的任务和这大体相似,他们在夜里在所有乡村道路上往返巡逻,并在十字路口站岗放哨。和城市里一样,所有的旅客除持有通行证者外,都要拘留起来并在早上对他们进行详细盘问。“盗贼、乞丐和流浪者”则根据地方官的意见而加以惩罚。流浪者法的执行情况也和我国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相同,在干预臣民思想和行动的一般方式上,喀什噶尔政府已经达到了卓越的高度,使得它可以和中世纪的宗教法庭媲美。然而秩序还是有的。没有发生过损害公众幸福的和谐状况的暴乱,而且对于一个外来的观察者,特别是来自一个认为秩序就是

最切需的事项的国家的观察者来说，阿塔勒克哈孜的政府似乎就是亚洲国家的一个最完美的典型，而那个秩序也就成了把其它一切美德归于其创始人的一个理由。

然而，持有通行证的旅客则被给予通行的特权，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可以准许他们在禁止没有特权的人们通行的时间内继续他们的旅程。在每一个主要城市内都有发给这种旅行许可证的机关。对于那些为保证他们再回来把财产留下作永久性抵押品的人们，他们想完成旅行的愿望是不会遇到多大拦阻的，但对于不幸没有这些财产的人则很少准许他们旅行到比邻近地区更远的地方。除了到浩罕或布哈拉外，所有要到外国去的旅行都很难获得批准，只有在最特殊的情况下才会得到准许。但看来有一种靠伪装宗教虔诚来逃避这个条例的方法，因为伊斯兰教长有权对前往“圣城”布哈拉或麦加朝圣的人发给许可证。通行证本身的辞句是很简单的，只是说明旅行者的姓名、住址、事情的性质和目的地。只要得到长官的同意和哈孜的许可，获得这张必要的纸条是不难的。如果因离开的时间太长或走向某个禁止的方向而违犯了这一许可的范围的话，则对于第一次犯过是处以罚金。但如果再犯则要受到较重的刑罚。如果能够知道这些公共安全的保护者们得到怎样的报酬，以及通过什么方法得到的，那倒是件很有趣的事情。但在这方面的可靠资料太少了。然而我们知道有一宗专为维持市区警察而征收的税款，至于郊区警察的报酬是从什么款项支付，那我们就没有根据作任何断言了。对于所有的店户和棚店主，实行了一种按周征税的办法，作为支付他们的保护者的报酬之用，但在比较重要的城市里要维持一支大队伍这个数目是不够的。其差额大概是在司法经费项下由国库补足。据此，我们推测，对于农民和乡村居民也徵收类似的税款来维持郊区警察，大概不会很错吧。由于秘密警察的开支在乡村比在城市需要的少，很可能乡村的税款

就差不多够支付全部费用，而不象叶尔羌或喀什噶尔那样。由于
152 在一切可以为采取这类极端措施提供借口的场合随便地运用警察
监视和军事恐怖主义，这就不可避免地在喀什噶尔人的日常生活
中和被征服人民的面容和感情上留下了它们存在的痕迹和影响。
过去居住着心情轻松愉快的民族的地方，现在就仿佛有一种永远
不能摆脱掉的忧郁气氛覆盖着大地，统治者对于安全的保证也好，
对于商业的不时的鼓励也好，都不能除掉已经笼罩在人民的精神
和幸福上的阴影。正如他们当中的一个人以伤感的语言所表达的
那样：“在中国人统治的时候什么都有，现在什么都没有了。”说这
句话的并不是一个商人，人们会以为他由于贸易的凋零而心情沮
丧，而是一个军人，并且还是一个酋长的嗣子。如果对他来说，阿古
柏伯克的军事体制尚且令人不满和感到厌倦，在那些把商品和贸
易看作象鼻孔呼吸那样必不可少的、更爱好和平的臣民看来将会
是怎样呢？从受到了耗费巨大的雇佣额外的暗探和告密者的严重
影响的这套完善的警察制度所得到的一切好处，和个人的行动和
经营受到束缚的损失相比起来，似乎就化为乌有了。就其本身而论，
喀什噶尔的警察制度也许是阿古柏伯克的最完美的设计，他的一
大群密探的效率也可以和任何君主的成就相媲美。但作为对他的
实力的持久的额外因素来说，他究竟是否由于运用了后者而巩固
了他的统治，还是由于建立了前者而获得比一支由可靠的、勇敢的
人们所组成的训练有素的军队的效劳更大的收获，那就是可怀疑
的事情了。东干战争中断了对东方的交通和给予喀什噶尔本地人
153 的很有限的自由，使贸易受到了限制，大大妨碍了一切贸易冒险，
这样就使目前仍在进行的对东土耳其斯坦贸易的大部分在北方落
到浩罕人或俄国人手里，在南方落到克什米尔人和旁遮普人手里。

阿塔勒克哈孜的国家 and 外国所进行的贸易，如果单从数量来
判断，当以和俄国及其附属国的贸易为最大，但如果我们对问题进

行更仔细的考察,我们就会发现其结果却使我们较为满意一些。通过列城对和田和桑株的贸易正在稳定地增加,而俄国通过浩罕进行的贸易则一段时期以来如果没有减少也是停滞不动。还有,许多同俄国的贸易应该记在我国的账上,因为在喀什噶尔市场上经常发现在俄国包装的外表下面却是英国的内容,在来自莫斯科或下诺夫戈罗德的华丽和漂亮的包装下却发现了曼彻斯特和利物浦著名厂商的商标。此外,最近的调查还证明,有些从信德的希卡普尔经由颇兰山口出口的商品,通过中间的山区,来到了故喀什噶尔爱弥尔殿下的领土上。阿古柏伯克也并未完全忽视运用各种方法诱导商人到他的国家来;其实,他主要反对的似乎并不是他们到他的国家里来,而是他们离开他的国家。为了要在他的领土上为暂时居留的商人解决膳宿问题,在各个主要城市里都建造了商队客棧;专门为从浩罕来的商人建造的安集延商队客棧或旅馆,是喀什噶尔城里最大的最引人注目的建筑之一。阿古柏伯克甚至还差派了许多一般在城内各处充当家仆的年老的“和台”或英吉穆斯林去照料商队客棧和住在里面的人们。当我们论述阿古柏伯克和英国及俄国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将对那些在不同场合获得批准的几个商务条约作比较详细的论述,这些条约的明显目的就是促进贸易和其它友好交往。 154

我们现在已经考察了阿古柏伯克的军队、警察、司法行政和宫廷,剩下唯一有待论述的主要题目就是爱弥尔所采取的财政原则了。使任何国家,即使是一个亚洲国家,能够适当维护其独立,固定的税收总是必要的。阿古柏伯克所处的环境几乎一直就是战争的环境,有好几次他处于一种我们所难以想像的经济窘迫的状态中。由于缺乏军费,他的作战行动陷于一种萎靡无力的状态。据可靠的权威资料说,他的许多士兵的薪饷只是用劫掠吐鲁番和其他地方所得的财物来支付的。只要他的经常开支由于增加了特殊的战

爭支出而庞大起来,他就不可能使他的收支平衡。当东干战争结束,从而贸易得到部分恢复的时候,他的财政状况也就有了起色,很可能在他统治的最后几年里,税收有了盈余。但为了获得这个使任何穷困的君主大为高兴的成就,阿古柏伯克不得不采用许多奇怪的权宜办法,并表现极大的耐心和刻苦精神。在克服许多小的障碍和次要的细节问题方面,他表现出是个具有高出寻常的才能的人,并不稍逊于从前巧妙地操纵军队和阴谋者时的表现。在这里他又建立了一种截然和中国人遗留给他的结构不同的结构。比较地说,中国人比他富有,他们单从商品征收不高的税款就差不多
155 可以得到足够的款项来支付他们的全部行政开支。阿古柏伯克没有这样稳定的税收来源;他必须从一个穷困的而且只是半征服了的地区征取几乎同中国人所要求的同样巨大的款额。他能够做到这点就充分证明他有做一个财政大臣的本领,这也是我们钦佩这个特殊的统治者的另一个理由。如果我们能够细细地一步一步考察他在财政上所作的种种努力的历史以及无数没有成功的计划,我们一定会揭示出近代亚洲的最有教益和最有趣味的史实之一。但是,即使有这样的资料的话,喀什噶尔也没有给我们提供作这种探究的资料,我们只能根据我们所能掌握的资料,尽可能地探索事情的线索。阿古柏伯克在宫廷和个人开支方面所留下的榜样,即使是现代亚洲的其他统治者予以仿效也可能得到好处;实行严格的节约制度和对于小宗款额的监督(这些少量款额集合起来却正是决定任何一个国家财政盈余或赤字的东西),是他的行为的两个指导原则。尽管喀什噶尔是一个农业非常落后的国家,而且多年的动乱和战争毫无疑问地使它在繁荣和文化方面都处于一种很落后的状态,但这位阿塔勒克哈孜深信拉丁哲学家名言的真理,“节约就是最大的收入”^①。必须记住,阿古柏伯克给自己规定的任务

^① 拉丁文原文为“Parsimonia magna vectigalia est.”西塞罗语。——译者

是和中国人不同的。尽管中国人对弱小的邻国经常有侵略的倾向，他们的目的不是扩张他们的帝国，而是想要得到一块有收益的领土：和盎格鲁撒克逊征服的先驱者们为了寻求财富和冒险投机事业在全球各处留下他们的印记很相似，中国人也由于一种似乎不可抗拒的冲动而布满亚洲大陆之上。当这样做的时候，他们既受到指望可能获致的利益所引诱，也受到争取军事声誉欲望所驱使。156

乾隆皇帝本人曾因越过戈壁的胜利而得意洋洋，但他的副将们和总督们追求的却是更有实际利益的目的，如果不是由于永远征服土耳其斯坦所提供的金色希望，他们就会劝说他们的主人把力量转向更为有利可图的事情了。中国人在取得喀什噶尔以后，他们是非常明智的，不肯以有组织的劫掠来耗尽它的资源，而是，尽管他们的主要目的是提高他们个人的权利地位，却集中他们的注意力来发展它的自然财富，所采取的办法我们在前一章已详述过。有三代之久，随着他们的属地的繁荣昌盛，官员们也富裕起来，而同时，人民本身的兴隆也并不稍差。中国人根据他们在西藏统治的同样原则，在治理喀什噶尔方面承担了不轻的责任，但是，由于惊人的忍耐力和良好的管理，他们战胜了一切困难。为国家和地方开支所征收的税额很大，足够维持许多年良好秩序并在各方面使国家得到永久性的改进。中国人自愿承担的责任远比阿古柏伯克所不得不担负的重得多，但他们具有阿古柏伯克所没有的许多有利条件。他们有一支巨大的忠实的军队；他只有一群不可靠的乌合之众，遇到一点点灾难的朕兆就会逃跑或投敌；他们有一个强大的帝国资源作为后盾；他除了自己的精力和决心外一无所有；而尤其重要的是，他们有一种足以增加他们的力量并方便其行动的声望，而他则被认为仅仅是一个军事冒险家，既受到东干人也受到和卓的轻视。事情的本质使得中国人把他们的最大精力集中于商业上，而阿古柏伯克多年以来的唯一思虑则是巩固他的军 157

事实力和建立一支强大的常备军。许多年的时间阿古柏伯克只把钱花在训练士兵和购买武器上。当从俄国或阿富汗或东干人来的危险似乎不时威胁着他的时候，他常要花很可观的钱在受威胁地区的防线上建筑碉堡。但他的主要开支都用在军队上，用在以警察制度维持他的王朝上。司法行政工作需要花一定数量的钱，为了维持伊斯兰教教会也用掉了他的财富的相当一部分。很明显，他的开支尽管在我们眼里不算很大，对于一个并非处于高度繁荣光景的一百万人口来说，负担就是很重的了。在过去，对中国的贸易一直是财富的主要来源，当这种贸易断绝了的时候，尽管和俄国和印度的贸易交往有了少量的增长，也是不足以充分补偿其损失的。事实上，这个国家，如果没有中国人的精明机巧和商业才能，本是很穷困的。在布素鲁克汗统治时期的战争年代里，获得必要收入的唯一方法就是掠夺和对占领地区的强迫征税。当喀什噶尔西部地区被征服的时候，阿古柏伯克发现他的国库已不名一文，而且想不出什么充实它的容易方法。处于这种窘迫情况，他求助于一种尽管不很新颖却无论如何是非常有效的权宜办法。他向他的忠实臣民颁布了一个布告，大意是：作为一个征服者他是全国土地的所有者；但他愿意——更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切望——以一种低廉的价格把土地卖给他们。但是，他没有把中国的回郡王和办事大臣们的旧有财产包括在内，而是把这些人的范围广阔的田地分赠给他的追随者中间比较杰出的人们，他们则承认他们有为他服兵役的义务作为报答。这种制度完全是模仿旧的封建制度，因而

158 阿古柏伯克就取得了中世纪封建领主所具有的一切权利和权威。伊斯兰教教会由它对新统治者的支持所获得的大量报酬更进一步地保持了这种相似关系。过去专用于维持寺院及经院的旧的收入在争夺土耳其斯坦混乱战争期间已中断，现在重新恢复了，而且为了显示君主的慷慨大度和他对于穆罕默德宗教的尊敬，还增拨了

一些新的财产。他的老朋友伊斯兰教长老尤其幸运，特别指定了一个大庄园专供他个人享用。看来这些穆斯林宗教教师们并没有辜负他们所获得的新权力和优势；在喀什噶尔辛苦工作的人们中间没有人为了他们的宗教利益、为了巩固阿塔勒克哈孜的权力，在教育人民和扩展他们对人民思想的影响方面比他们更卖力的了。但在有一个方面，而且是再重要不过的方面，阿古柏伯克企图靠过去他所施的恩惠以及以后再给其他恩典的关系建立一个效忠于他的强大军人阶级的努力，是失败了；因为他的追随者们，除了极少的例外，都不愿操土地占有者这个新行业。他们不肯用心专注农业和其它农村生产中所产生的问题上，而是把他们的全部土地转租给安集延来的移民，他们自己则住在他们的斡尔朵里，或者纵情淫欲，或者过着十足怠惰的生活。甚至连阿伯杜拉伯克那样卓越的军人，象他的歌颂者夸耀的那样，杀过一万二千人的煞星，在活跃的战斗终止以后，也习染了流行的萎靡风气；至于下级军人中间，这种堕落腐败的现象就更为严重了。在他的早期的拥护者中间这种精神变化，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促使阿古柏伯克越来越多地倚靠安集延商人和店主，也促使他在其执政的晚年，对对外贸易采取更为赞助的态度。 159

由于出售土地所直接收到的金钱使他能够对东干人作战，而这次战争，既大大扩张了他的领土，也增加了他所负的责任。的确，在执行这一办法的头几年，金钱不断地流进了他的国库。但即使是这种财源也是应付一时的，由这种办法和以劫掠形式从叶尔羌、喀什噶尔、和田和其它地方所得来的金钱并不足以支付建立一支庞大军队的费用。这两种办法中不论哪一种都不能认为是取得收入的永久办法，因为前者是不容许重复的，而后者很快就使其本身陷于枯竭。当阿古柏伯克的政权稍稍稳定，这些筹款方法，加上那更可谴责的掠夺外国商人的办法，都已在一定程度上变得过时的

时候，他就不得不把他的财政计划放在一个比较实际和比较体面的基础上。虽然阿古柏伯克的工作比起中国人来，是在如前面已予列举的一些不利的条件下进行的，但他有一个比他们大为有利条件，即：他所努力的目标比恢复喀什噶尔的旧日繁荣容易完成。在他的预算中，他只要不断地照顾到为维持若干数量的骑兵和若干数量的警察需要多少钱，再在他的国库里有少量剩余，以备应付不幸的紧急事件就行了。对于道路，他让它们自生自灭，国家各处所迫切需要的灌溉工程，只好留待继任者去办理；所有一切改善人民生活的建议也被搁置起来以待更为有利的时机。但军队必须有几千名骑兵；武器库里必须有若干数量新的枪炮和弹药；必须用丰厚的薪给来吸引若干数量的冒险家到军队里充当下级士官以便使所有的兵士都可以受到良好的训练。他的地位本身的需要迫使阿古柏伯克不得不作所有这一切的军事准备；然而费用是巨大的，统治者本人和人民所必须作出的牺牲也是非常严重的。最近的事件使我们相信，阿塔勒克哈孜如果采取一个比较地不那么积极的对外军事政策和—一个比较和平的对内政策，将会比他虚张军事声势更使他的统治增添力量。即使如此，阿古柏伯克终于在1867年制定了两种税则，可以认为它们就代表了他掌权时期的两种主要的税收。第一是对全国所产谷类征收什一税；这种税叫做乌什尔。第二种税叫扎朵提，是对所有进入喀什噶尔的商品所征收的一种关税。除了伊斯兰教教会所占有的土地，或者以为君主服军役来代替缴税的人所占有的土地外，所有土地都必须缴纳乌什尔；连那些向贵族阶级租地耕种的人也必须向统治者交纳什一税。因此可以看出，得以免除一般公民所负纳税义务的并不是土地本身而是它的法定所有者。由安集延商人取得国家的所有土地以及由于这些人的精力旺盛有逐渐取代他的较为亲近的追随者的地位的危险，阿古柏伯克并非没有觉察到，因此，他采取了限制他的贵族

不得他的许可不许出卖他们的土地的措施。从这种乌什尔所得到的收入是相当巨大的，若干年中间这就是他的主要收入来源。我们对于喀什噶尔的土地价值只知道一个大概。为出卖土地，因而也是为征税而计算土地的方法是非常奇特的。并不是按土地的一定面积计算，严格说来也不是按它的收成多少计算，而是按所播麦种的数量计算。平均计算率是每用二十磅麦种的土地约值一英 161 镑。佃农向政府交税并把净收成的四分之三交给地主作为地租，只有剩下的四分之一是自己收入的部分。在这种制度之下，只有在丰收的年岁里，而且也只有很大的佃户，才能过温饱的生活。在收成不好的年头，地主如果不是被劝说在灾年完全放弃他的权利要求的话，也只好满足于收取较小的份额，但那些受托收税的包税员们，千方百计要发财致富，至少也想送上一份没有一个拖欠者的名册向当局讨好。不幸的人民只好完全听凭他们的摆布，无法判明应付税额的准确性，也无力抗拒包税员的无理勒索。只要他们办得到的话，他们总是不出一声怨言地，或许也不怀疑对他们玩弄的欺骗，便把向他们索取的数目交上。由于他们应纳的税款是在收成的总数未被动用以前就被征索，并毫不拖延地即行缴纳，所以阿塔勒克哈孜总能按时收得他的一份，而包税员们则把额外多征的部分饱私囊。据说，在很多情况下，官员们征收的税额比法定要求高达三倍之多。这样一种制度不仅对人民有害而且对统治者也同样地不利。单就一种税收而论，从人民榨取来的税款被官吏贪污的就比贡献给国家需要的为多，这一事实充分揭示了在君主方面监督制度的松懈不严，这也是阿古柏伯克在许多方面都是各种矛盾现象的混合体的一个强有力的说明。我们很难使自己相信他知道这些事情，然而，他又怎能不知道呢？

除了乌什尔以外，还有一种对当地产品征的税即塔纳比，这是 162 对于专门用来种植蔬菜和水果的土地所征的税，顺便说一句，塔纳

布是四十七码的长度名称，而塔纳比则是一块四十七平方码的土地。对于这么一块大小的种植蔬菜或水果的土地征收少量税款。这种税随着地区性质不同和当年收成的好坏而变化的幅度却比任何其它的税都大。即使在最荒瘠的地区，一塔纳比很少小于一先令，而在有些地区，在年成好的时候，则可达到五先令，甚至更多。但在这当中也是有中间人插手，只要他看到可以弄到手，他总是尽量的多榨取。毫无疑问，这种税应该能够得到大量的税款，因为用作果园和菜园的土地比用作种植庄稼的土地多；但这种税不知是不是比较难以征收，或者是从纳税人过渡到国库的中间是不是有更多的侵吞中饱，确实，我们关于这种税所听到的事比我们以为能够知道的少得多。所以，关于当地产品的两大税收一个是谷类税，一个是水果税。税率本身并不太高，任何一个村社都可以毫无困难地缴纳。至于由于官吏的贪污使得这两种税成了多大程度的繁重负担，这就不很清楚，但即使按最好的估计，公民由此而被剥削的数量也是为数不少的。对统治者来说，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是，这样的事会怎样影响他自己在他的臣民心目中的地位呢？由于这些繁重的负担，阿古柏伯克在喀什噶尔人民的眼中看来，是不是成了一个苛征暴敛、专横压制的暴君呢？

不可能对这一点作确定无疑的论述，但只不过很自然地料想，情况正是这样。要求种田人在他自己还未动用分毫之前，甚至还未付地租之前，就把约三分之一的收成上缴，没有一个种田人会对这样一个君主，感恩戴德的。阿古柏伯克不大可能会赞成他的官吏获得这样大的私利，但由于他在统治的早期就容忍了小项的榨取，当弊端达到这样惊人程度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已经没有办法来制止它了。不可能相信发生在他眼底下的事情他会一直毫无所知，而且有一些明显有根据的指控说，他和他的税收员还摊分了利益。尽管我们不愿承认这些非难的正确性，但支持这种指控的论据是

非常有理的，很难对之作出很有把握的反驳。如果他对于这样一种使他正在丧失他的臣民的同情心的事实竟毫无所知，那就很难称赞他的秘密警察的效率了。

1868年和田城被攻陷以后，那里的金矿开始开采了，而且一直到现在还在生产着。没有关于这个贵金属的年产量的情报，但很可能产量并不很大。靠近阿克苏和库车的煤矿除了少数个人开采外，已不再被利用，而那个地区的铜矿，自从中国人离开以后，也只有很少一部分被开采。过去一直是从阿克苏和和田来的大量的玉，在喀什噶尔各处仍然可以看到；尽管几乎全部的玉仍然可能来自这些城市，但喀什噶尔人自己关于它的产地却是吞吞吐吐地不肯明说。一个访问喀什噶尔的人，在游览市场的时候，很快发觉，由于有被特别派来防止白种外国人获得关于人民情况或国家资源的任何惹麻烦的情报的秘密警察跟在他后边，人民都不敢说话。有一个明显的事例说明了这些维护秩序的人们注意到何等最微末的事情。这位游客在一个以玉为主要商品的摊商前问他玉是从哪 164里来的，得到的回答是阿克苏。他往前走到另一个商店前再问这个问题，这一次却告诉他说是从浩罕进口的。游客说，你的邻居告诉我是从阿克苏来的。这个店铺老板，听到这突然冒出的话大吃一惊，显得很狼狈，承认了是从阿克苏来的。但由于官员向他用眼色作出警告，他就又重复说是从浩罕来的。无法知道这种荒唐的闪烁其辞和蒙骗外来人的做法用意何在；因为，只要我们知道，在喀什噶尔的各城市里，玉不管是未加工的粗糙状态也好，或者经过雕琢的成品也好，都是一宗重要的商品，它是从阿克苏来的或者是从浩罕来的便是无关紧要的问题。

关税或扎朵提，是伊斯兰教规所认可的在各条通向国内道路的边境哨所上征收的一种税。在和大不列颠及俄国的条约被批准以前，它的规章极其模糊并有极大伸缩性。事实上，如果在这些条

约订立以前，任何商人胆敢冒险进入喀什噶尔而能逃避对他的轻率行为的惩罚的话，他就有理由认为自己很幸运了；因为为了爱弥尔殿下特殊利益他的行李肯定会被没收。直到晚近的1869年，俄国商人的行李还被抢夺，本人受到虐待，经过长年交涉之后，俄国政府才为它的一个臣民所受的伤害和损失得到一点赔偿。即使是这样，阿塔勒克哈孜是怎样把他答应赔偿商人损失的钱送去的呢？他竟然是用了在喀什噶尔的一个废弃的寺院里发现的大量贬值的中国钱币的一部分支付的！在这以前，所有对外贸易都是和浩罕、布哈拉、阿富汗和巴达克山进行的，除了从掠夺塔什干商人或列城商人所得的财物之外，从扎朵提所得的收入完全微不足道。但由于在北方的俄国人和在南方的英国当地商人为求突破掩盖着东土耳其斯坦地方的朦胧帷幕所作的不懈努力，阿古柏伯克再也不能维护他那末力图维护的隐身术了。也许，当他直接和文明帝国接触时，盼望从扎朵提的收入能解决他的许多困难，在他的心里也不无影响。他的希望太乐观了，看来在他一生的最后十二个月里，他对于和邻国贸易的利弊，再度变得漠不关心起来。确然，当他把他的关税置于一个公平的基础之上的时候，他就发现，需要很多年他才能补偿他所放弃了的苛捐杂税。那些最初试图和喀什噶尔开始贸易的商人们，很快就为路上的危险以及在一个财富和人口都被夸大十倍的国家里进行大量有利可图的交易所开的微小门路而感到沮丧了。在一个其主要城市里最富有的商人也只不过拥有八千英镑资本的国家里，不可能希望得到很大的财富；而且尽管对所有商品所规定的法定税率是百分之二点五的从价税，人们很快就发现如果统治者需要钱的话，他就会毫无顾忌地从一个外国人的手里把他所能拿的东西都拿走。无论对统治者也好，对外国商人也好，在新的协议里都包含着一些不合口味的东西。前者觉得他放弃了一些最高权利，而且他也不能获得更多的金钱作为补

偿,后者则知道条约的规定并不能使他免于付出额外的费用。

扎朶提不仅远沒有显示出所希望的增加收入的倾向,而且,如果沒有减少的倾向,似乎也是更偏向于停滞不动;而外国商人从统治者获得的只是对他的人身保护和协助他处理商品的某种诺言。阿古柏对于关税收入的停滞不动的不满表现在他勒索额外的稅款上,这些额外稅款,有时是向英国人,有时向俄国人,但更通常是向浩罕和阿富汗商人索取。这些强横措施,不仅沒有使他的收入增加,反而使它减少,从而使他处于一种比以前更坏的境况。他沒有那种使他能够安心等待贸易更充分发展所必需的耐心,也沒有那种坚忍精神或圆通手法,在商人们面前提出新的诱导,使他们愿意恢复对他和他的国家的交易。许多人初次带着商品来到喀什噶尔,但确实很少有人愿意再来。统治者对他们的接待很不客气。他们很难得到行动的自由,而且由于必须交纳百分之五而不是规定的百分之二点五稅款,他们的商业旅行收益就大为减少了。因此,所谓在阿塔勒克哈孜统治期间由于他的友好倾向而使对喀什噶尔的贸易有了增加的说法,完全是一种虛构。如果输入他的国家的商品量有所增加,那也只是由于它的人民的需要,而且是中亚两大供应国与之直接贸易,或经由当地一些邻国与之贸易而造成的必然结果。它所企图激起我国对于这个叶尔羌的神话式统治者的过分热情从来沒有传布多远,关于这个新国家如何强大的传说,即使不能提出反证,也是一直抱有怀疑态度的。冷静地观察阿古柏伯克所处的真实地位,我们发现,即使在他权力鼎盛时期,他也一直是一个财政困窘的统治者,哪怕是以掠夺一个商人的形式取得小小的横财,他也欣然为之。他的顾问们曾向他指出过,如果能够诱致外国商人把他们的商品带进国内来,则扎朶提很可能成为一种最丰富的稅源。人民由于中国人离去所曾受到的损失,可以由于俄国商人和英国商人的来到而得到充分的弥补。如果说,

他的愿望落空了，扎朶提一点也没有显示出具有人们所预言的弹性，那很可能是由于他认为对外贸易可能引起对外纠纷而增加了不耐烦的情绪，使他未能给予这个计划以充分时间的公平考验。他的其它收入来源，乌什尔和塔纳比，以及和田的金矿所带来的款项，足可以供应政府的日常开支并维持他的募兵官员所能招募来服役的兵员。至于盈余，如果有的话，也是很少的；至于地方上的改善和一切可能有收益的和对人民有益的支出，都在严格禁止之列。我们所能看到由他兴建的、以增进臣民利益为目的的唯一工程就是在各城市里的商人旅店，而这些也是靠自己维持的。阿古柏伯克无权要求人们承认他是一个做了好事的仁慈的统治者。他是一个军事独裁者，在建立一个粗具规模的政府体制方面显示了罕有的才能，而且在历次战役中一直是获得非凡的成功。他也没有资格被认为是一个深切理解人民的需要，并采取各种尽可能好的措施以满足这些需要的统治者。的确，他不能和中国人相比，尽管中国人有个人动机，但他们的确使国家达到了高度的物质繁荣，他们过去的占领也留下许多难于磨灭的政绩。这两个以暴力控制喀什噶尔人的统治权力，却都比自称和卓后人的窃踞者无比高超，并代表了对被征服种族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统治方式。中国人力求采取怀柔政策，并使人民感到他们存在的必要性；阿塔勒克哈孜对臣民的幸福毫不关心，只要臣民愿意交纳贡金并在他的军队里服役就行。本来是可以希望得到完全相反的结果的，因为这个浩罕冒险家和喀什噶尔人之间的关系，要比中国人和安集延人之间的关系亲得多。当然，赞赏阿古柏伯克的人们会辩护说，阿古柏伯克的政权还未达到充分巩固的地步，所以他不可能花费力量去从事象修筑公路和河渠那类巨大的工程。在一方面他没有可以动用的劳力，因而他受到中国人所没有遇到的一种困难的阻碍。然而，如果我们记住，所有这些工程都会是有报酬的，而且是会巩固阿古柏伯克个

人权力的,并不至于耗竭他的资源,这种辩解就不值考虑了。阿古柏伯克之所以配受我们的称赞,只是因为他没有重复和卓们的腐朽统治,而是比他们强,当然,在他的同时代人中他有资格列于最高的地位。如果所要求的仅仅是把他放在他们之上,没有人会提出丝毫反对意见;因为毫无疑问,他是几个世纪以来出现于这些汗国中的最奋发和最有才能的统治者。但是,如果否认有人在为他要求比这更高的地位,那就未免过于做作了;我们在没有让他享受这种地位的权利之前,必须对作为这种要求的基础的证据加以最仔细的分析。即使现在,我并不说他的要求没有得到证明,但他的功绩是否被夸大却是值得怀疑的,我想凡是研究过他在喀什噶尔的经历的人都必须承认这一点。除了阿古柏伯克的个人能力可说是卓越超群之外,如果说他可与成吉思汗或帖木儿相比却是荒谬的。作为一个立法者和公众的恩人来说,应该公道地把他和中国人比较一下,中国人有些比他优越的条件,但是在宗教和其它方面条件都不如他的情况下工作的。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经过不偏不倚的研究之后,我们就会发现中国人比他高得多。我们从这上面所能够得出的判断,除了说阿古柏伯克的统治虽然有其引人注目的特色,但与中国人的统治相比毕竟是较低级的以外,还能作出什么判断来呢?只要记住,在他前进的道路上困难很大,但其中许多困难都被他战胜了,这就算公正了。在结束本章之前,对那些先在征服这个国家方面然后又在治理它方面帮助过他的一些主要人物作一些描述,也许是读者们所感兴趣的吧。

169

从地位和高超的才能来说,这些人当中的第一个就是赛义德·阿古柏·汗,或者象人们更方便地称呼的那样,哈吉·妥拉,这位亲王最近曾访问欧洲几个主要国家的宫廷。他是阿塔勒克哈孜的一个近亲,但是,奇怪得很,在他们之间却没有血缘关系。他是塔什干长官纳尔·穆罕默德·汗的儿子。纳尔·穆罕默德·汗娶过阿

古柏伯克的姊妹为第二个妻子，在阿古柏伯克早年在浩罕的经历中曾帮助促进过他的事业。这个赛义德于 1823 年生于塔什干，几乎和他的舅父，喀什噶尔的爱弥尔同样年纪；但尽管关系这样近，在征服喀什噶尔上，哈吉·妥拉却没有参加。在阿古柏伯克对东土耳其斯坦的冒险获得完全成功以前，浩罕的显要人士把他仅仅看作一个冒险家。赛义德·阿古柏·汗出身于土耳其斯坦的最良好的家系，很可能在 1867 年以前，他对他的这个舅父是相当不关心的。肯定的是，当他的这位亲戚在他的多事的生涯中正在拚命

170 挣扎的时候，哈吉·妥拉并没有帮助他，而是在做旁的事情。在浩罕的文职行政机构中，他曾在阿里姆·库里之下担任过象塔什干的穆斯林经院院长之类的高级职位，后来曾被任命为哈孜或法官。阿克摩斯杰德陷落以后，他才开始他的旅行家和谈判者的生涯，这一工作使他走到波斯普鲁斯海峡、涅瓦河和泰晤士河岸。那是 1854 年的事，他被派到米尔扎·詹·艾芬迪的使馆里担任类似秘书的职位，那位大使是毛拉汗派驻君士坦丁堡求援的。以后在毛拉汗死后，当他的继任者即阿里姆·库里扶植的穆罕默德汗短时间执政时，他又以类似的资格来到君士坦丁堡。这是 1865 年，在随后的浩罕混乱时期，即其合法统治者及阿里姆·库里的对手，呼达雅尔汗的最后胜利期间，哈吉·妥拉安静地住在君士坦丁堡并受到苏丹阿布都拉·阿齐兹的豪华的款待。看来，他在从东西土耳其斯坦来到土耳其的许多访问者中享有某种声誉，除了他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品格外，很少人不对他的欢快而又高贵的风度有良好的印象。在 1870 年他的舅父确实已经战胜反对他的统治的一切反抗，乍看起来人们可能觉得奇怪为什么他要一个他在这许多年中很少见到或很少了解的人来为他服务。但哈吉·妥拉有中亚居民中非常罕有的才能和经验，而阿古柏伯克当时最需要的正是他的外甥所具有的才能。

1870年阿塔勒克哈孜迫切希望把他和土耳其政府之间的联盟纽带拉得更紧一些；谁能比一个多年住在君士坦丁堡而且和土耳其的苏丹有亲密友谊的人能更好地帮助他呢？1871年，阿古柏伯克第一次看出当时占领了固尔扎的俄国是对他的国家的危险威胁，除了见多识广的哈吉·妥拉还有谁能教给他最有效地防止危险的方法，是通过和英国联盟还是同俄国和解呢？赛义德·阿古柏·汗具有的能力正是爱弥尔阿古柏伯克所最需要的。尽管他寻遍了他的所有追随者，就是那些在他那荣枯无常、命运奇特的一生中和他同甘苦、共患难的人们，也不可能找到另一个具有这种能力的人。这么一来，他向他的外甥提出邀请就容易理解了，而他的外甥本人，比起做一个受土耳其政府款待的尊贵客人来，则也乐于接受担任范围更为广阔的工作。他以后在为喀什噶尔服务的过程中，历任驻圣彼得堡、加尔各答、君士坦丁堡和伦敦的使节，这些都是很近而且是大家所熟悉的事，用不着在这里一一叙述了。当他定居于喀什噶尔的时候，他和喀什噶尔伊斯兰教长老穆罕默德·和卓的一个女儿结婚，因此，他对人民很有影响力，他的意见非常受到爱弥尔的重视。哈吉·妥拉的机敏圆通与和蔼可亲的态度，甚至对于强横而凶狠的指定继承人伯克·胡里也能起一定的影响作用。

关于穆罕默德·和卓和阿伯杜拉胖色提，一个宗教师和一个军人，这两个协助阿古柏伯克的主要人物，不幸的是我们未能有许多发现，所知道的一点也都在以前的篇幅里叙述过了。但毫无疑问的是，他们是促使阿古柏伯克扩大权力的主要人物，而他们两人也比任何别人更得到他们所忠诚支持的人的信任和友谊。但关于另一个久经考验的追随者我们知道得多些，这主要是从贝柳医生的著述知道的。在阿古柏伯克的地方长官之中，穆罕默德·云努斯似乎是最有教养、最有见识的人。他是喀什噶尔有名的见闻最广

的人,但是既然当时的教学课程中没有近代语言,就很难估量他的这种名声究竟达到什么程度。他是阿塔勒克哈孜的一个跟随多年的、受信任的追随者,因为当他还在浩罕服务的时候穆罕默德·云努斯就已经是他的书记了。但他作为一个文职人员,并没有参加布素鲁克汗的远征,而且是在阿里姆·库里去世和呼达雅尔汗成功以后才到喀什噶尔,投奔他的坚定的朋友和主人。阿古柏伯克对他的才能的评价是如此之高,而且又如此迫切需要干练的统治人材,所以穆罕默德·云努斯立即被任命为新近征服的叶尔羌地区的长官,这是在喀什噶尔所有的长官辖区中最富足、人口最多、也是骚乱最多的地区。他使麻烦的叶尔羌人完全向新统治者臣服的手段,以及几乎直到现在还可看得出来的他治理他的地区所表现的稀有才能,证明他从前的浩罕同伴的选择是非常正确的。最初这位长官似乎是用一种高压手段统治的,只要发现最细微的反抗征兆,就会立刻进行逮捕,而且不久即予以处决。但在最后七年中,他的统治就温和些了,这主要是因为所有的为非作歹的人已经被扫除了。在较次要的追随者中可以列举的有喀什噶尔的长官阿里什·伯克;喀什噶尔派驻印度第一任使臣伊赫拉尔·汗·妥拉,和阿图什的穆罕默德·伯克,但由于我们没有掌握关于他们的充分资料,不可能作出使广大读者感兴趣的叙述。

第十章 阿古柏伯克的对俄政策

173

阿古柏伯克在他一生经历中很早就和俄国人接触了，虽然从阿克摩斯杰德陷落到他离开浩罕的这一段长时间中，俄国人主要由于被克里米亚战争弄得精疲力竭，没有能够用他们最初向锡尔河流域进军时似乎拥有的气势继续向前推进；然而，毫无疑问，在阿古柏伯克和他同时代人的心里所首先考虑到的，就是这类事情有发生的可能。当俄国人在 1865 年威胁并终于攻克了塔什干，从而把他们的疆界推进到乌浒河的中途的时候，阿古柏伯克由于正在忙着应付他自己在喀什噶尔的事务，已无暇对浩罕进行任何干预了。但随着浩罕的被肢解和布哈拉军队在 1866 年被击溃，他就不得不注意到这一事实，即他本人好像将成为俄国扩张主义的下一个牺牲品。也就是在那一年，他不仅战胜了在喀什噶尔较重要地区的一切反抗，而且由于布素鲁克汗的被废黜，他已对于这个国家人民的政治行动负有比以前更大的责任。可以假定，早在 1866 年，这位喀什噶尔的新统治者，由于他的老敌手对浩罕人和布哈拉人的胜利，就已经把注意力放在这个老敌手的动向了。但很明显，俄国人对于他在这一时期的行动却并未予以同等的注意。随着浩罕北部的被占领，就使俄国的统治和喀什噶尔的新兴政权离 174 得更近了；这样，或者是这两个政权达成和谐的协定，或者是由于一系列小的争执而导致俄罗斯帝国向印度和中国的进一步扩张，那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浩罕汗国的独立部分，仍然把两者隔离着，克孜勒牙尔特山区的崎岖险阻则起了一个有益的作用，使阿塔勒克哈孜在决定他和俄国未来关系之前可以有一个喘息时间。的

确,直到这个时候为止,俄国人对于喀什噶尔事务的兴趣还是很淡薄的,因为看起来过去在这两个地区之间,如果有交往的话,也不很多。在伊犁则远非如此,在那里俄国多年以来已有商人和领事居住。俄国人的驻屯地阿拉木图或称威尔尼,这个位于伊塞克湖以北约五十哩、伊犁本城以西约二百五十哩的重要城堡,在几年之间就变成了一个巨大而繁荣的城市,不复保持它原来的小山区堡垒的本色了。通过这一条路,俄国商人和伊犁、乌鲁木齐、哈密和北京进行了广泛的贸易,而他们和中国商人的关系也已奠定了一个良好基础。因此,在附近居住的绝大多数俄国人,对于东干人在伊犁起事是没有好感的。由于这一起事所引起的骚乱,使得这一带的贸易有一段时间完全陷于停顿。以往和中国的贸易继续维持下来就不得不通过一条经由西伯利亚的比较间接的路线来进行。俄国人容忍了伊犁的不稳定状态达六年之久,在那里东干人和塔兰奇人互相争夺统治权;但当由本地政权取代中国政权的时候,他们的不满就很难再隐藏下去了。因此,当阿古柏伯克征服了天山以南地区,看来即将威胁到天山以北地区的时候,俄国人寻找借口,抢在他之前,强占了那一带地方,使他们和伊犁居民的通商恢复和过去同样的良好关系,那就不足为奇了。但俄国人决定尽可能不要引起中国人的愤怒。俄国正式承认伊犁为中国领土,通过派驻北京的代表,沙皇自愿答应,一俟中国皇帝能够派遣足够的军队在那里维持秩序,就把它归还中国。这一圆滑手腕,使他们获得了中国长久的好感,由于它的这种巧妙外交手段,俄国还在几项重要贸易特权上获得满意的报酬。俄国对于中国人的这一友好行为,由于我国方面的一项不幸的政策,其效果更越发提高了。潘泰在云南建立了一个穆斯林政权,似乎完全和北京断绝了关系,传到我们边境的情报讲到统治着大理府的潘泰君主的权势和友善,以致我国很不慎重地和这个君主进行了谈判。中国当局很自然地

于我们这种暗中支持一个叛乱的臣属行为深感不满，不管以后我们怎样努力，都未能消除由于我们那时的摇摆态度所引起的中国人对于我们的疑虑。俄国人则由于在几年之间一直坚持拒绝承认由布素鲁克汗和阿古柏伯克在喀什噶尔所成立的政府，还继续保持着对中国友好的外貌。然而这一行动并不值得称许，因为俄国人在那个时期在喀什噶尔并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他们所唯一关注的是在准噶尔地区所发生的事情。他们和这个地区有着可以上溯几 176 乎一世纪的密切的贸易和政治联系。毫无疑问，准噶尔地区是深受在喀什噶尔所发生的骚乱的影响的，因此，我们看到，当在喀什噶尔所发生事情发展到威胁准噶尔地区的未来独立时，俄国人就采取迅速措施占据了那个地方。当伊犁落入俄国掌握的时候，这一路的原有贸易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随后还和乌鲁木齐、玛纳斯和哈密的东干人发生了一些贸易关系。他们似乎曾采取一些措施，使得这些城市的统治者们深刻地认识到，不干涉商人或旅客的事务是明智的，因而对俄国的安宁来说，事情就变得在一定程度上令人满意了。但伊犁城却从未恢复其往日的繁荣，因为阿拉木图仍旧是这一带的最重要城市。它原是一个小型山区哨所，是为了保护这条路线，防御劫掠为生的柯尔克孜人，在 1854 年构筑的碉堡，但它已经从原来微不足道的地位成长为一个巨大的哥萨克人和加尔梅克人的定居地，而且现在已成为一个非常繁荣的地区了。因此，必须记住的是，俄国人所关怀的首先就是准噶尔地区。就喀什噶尔内部事务而言，它本是可以把阿古柏伯克和中国人这两个敌手的争执置诸不理的；直到一个强大的穆斯林国家在东土耳其斯坦建立起来，并且既威胁着伊犁的独立又将在浩罕引起分裂的时候，俄国才不得不考虑对于新近被宣布为阿塔勒克哈孜的人采取什么政策最为明智。尽管对于兼并伊犁是不是绝对必要，或者甚至是不是慎重行动，还有理由可以怀疑；但对俄国人采取这一步骤却是

无法指摘的。这可能是在俄国人的所有征服行动中最可原谅的一次，但这一决策仍然可能是建立在对于情况的误解上，也可能他们
177 阻止阿古柏伯克进入一个必将完全受俄国人摆布的地区也为时过早。甚至连阿古柏伯克是否有如人们所慷慨地加在他头上的、打算去干必然造成政治上死亡的事的意图，即推进到天山北路去，也是不清楚的。我们希望读者知道的是，俄国人对于在喀什噶尔所发生的事情，就如对于在印度所发生的事情一样，同样地都是漠不关心的。这种漠不关心至少一直持续到 1866 年年底。到了那个时候，阿古柏伯克的事业已经获得了完全的成功，由于俄国政府所获得的情报比我们在印度的政府迅速而且准确，它对于这个已经开始在喀什噶尔以西的穆斯林国家中引起骚动的新兴政权的出现，就不得不予以一定的注意。

但在 1866 年，沿纳伦边境的双方军队司令已经达成了某种含混的协议，对于彼此的行动互不干涉。俄国军队被允许在名义上属于喀什噶尔的边境内追捕浩罕的逃亡者和劫掠为生的柯尔克孜人；当有需要的时候，也给喀什噶尔官员以同样的权利，也许是由于某种幸运，也许是由于互相尊重，在实行这些早期的笼统协议期间，这两个政权的代表之间并没有发生过有严重后果的冲突。尽管西伯利亚和土耳其斯坦的俄国总督们都拒绝承认布素鲁克汗和阿古柏伯克，但他们似乎曾尽力利用这些沿着北部边界的和解措施作为促使阿古柏伯克向他们请求支持的一个手段。如果这就是他们的意图的话，那么我们从以后的事情中看到，阿古柏伯克的坚决态度，使得他们的一切计划都失败了。然而，从喀什噶尔的统治者
178 对于俄国权力的明显的疑惧心理获得某种的好处是绝对必要的，那怕只是为了显示一下莫斯科外交手腕的所达到的完善也好，因此，俄国一面拒绝承认在东土耳其斯坦这个新成立的国家，而且深深地惋惜中国人的离去，一面他们又下令驻边疆的官员要求附近

的喀什噶尔官员批准建筑一座横跨纳伦河的桥梁和一条通过天山进入喀什噶尔的军用公路。这是 1867 年的事,喀什噶尔当局对此断然予以拒绝是毫不奇怪的事。如果默许这一要求就会把喀什噶尔城完全置于俄国人的控制之下。喀什噶尔城的位置从军事观点来看是极为不利的,从伊塞克湖出发的军队所遇到的唯一障碍就是由于纳伦河的急流所造成的道路难走和这段天山山脉的各山口一般都难以通过。俄国政府对于从一个土著统治者那里所遭受的拒绝深为失望,于是迅速地决定了就在他们边境上在纳伦河旁筑起一个碉堡来。1868 年,这一碉堡竣工了,但在那一年,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从而产生了一种新的希望,以为还可能通过和平手段和喀什噶尔达成一个协议。在这两年中在西土耳其斯坦不断地发生了骚乱和战争。据俄国人说,布哈拉由于受到阿古柏伯克的煽动,已经和浩罕及基发联合起来反抗俄国;但所谓联合反抗并没有发生过,因为布哈拉和浩罕都被沙皇军队轻而易举地各个击破而吞并了。基发则留待以后有机会再惩罚它。的确,在所有同盟者之中,惟有基发在战场上获得过一些成功。那次战役的最明显的结果就是俄国吞并了撒马尔罕,所有的反抗似乎都暂时被镇压下去了。但是,俄国主力部队一回到塔什干,当地一支很大的武装力量马上就包围了留守撒马尔罕的少量驻军,而且整个地区又都起来进行武装反抗了。俄国驻军紧紧地守着他们的据点,从全部兵力看来,他们的损失是严重的,他们还是守住了那个城市,直等考夫曼将军率领援军到来。于是布哈拉求和,经过一番拖延,终于同不幸的爱弥尔·穆扎夫尔丁签订了和约。通过这个和约俄国人获得了在克尔米尼叶、查尔朱和卡尔希的驻军权。克尔米尼叶位于布哈拉城以东约五十哩,在从卡塔一库尔干到撒马尔罕的路上;卡尔希位于卡塔一库尔干以南约六十哩,到乌浒河去的中途;而查尔朱则是在乌浒河上,在布哈拉以西约八十哩。在所有这些地方中最后一

179

个最为重要,因为从那里有一条商队大路直通谋尔夫和马什哈德。1870—71年,布哈拉再一次走上战场,但由于同盟国的步调不一致和浩罕的衰弱,这次的行动又失败了。在这五年西土耳其斯坦各民族不断起来反抗的多事之秋,阿古柏伯克一直保守中立。如果说他在成立一个反抗俄国的同盟中曾经暗暗地插了一手的说法是对的,那末,他也一定尽力使他的行为和他的外交手腕背道而驰。没有一个喀什噶尔士兵曾经参加过布哈拉和浩罕为了摆脱作为俄国附庸所受的桎梏而一再作出的努力。就象喀布尔的希尔·阿里一样,他专心从事他所直接管辖范围内的事务,宁可在领土的极东边发动一场对同信仰者的战争,而不愿冒险去进行一场反对伊斯兰教最强大的敌人的“圣战”! 俄国人确实很少抱怨阿古柏伯克干涉他们的属地。他对于不成熟的起事的煽动,或者说,如果他沒有煽动的话,他的某些主要大臣们对于这些反抗的赞许,正是他对当时土耳其斯坦的统治权力所能作出的最友好的行动了,因为俄国对于中亚这一地区的民族任何孤立反抗从来就是一点也不怕的。在西土耳其斯坦,如果沒有全体一致和步骤协调的起事,而且还须有一个由正规部队和军官们所组成的核心的支持,例如,远的不说,就象阿富汗所能提供的,或者喀什噶尔在某一时期可能提供的那样的核心力量的支持,如果沒有这些因素就决不可能给予俄国军队以沉重打击,在短短几个月的战斗中把俄国军队打回到他们十三年前的老巢去。阿古柏伯克是否曾经有过这样强大的力量使他足以把他国家的独立作为赌注来从事这样重大的冒险事业是很值得怀疑的;所以,当他在国内有够多的事情吸引他的全部注意力并耗用他的全部资源的时候,他就避免战争,而采取可称许的慎重态度;但即使情况是如此,他对浩罕人由此所遭受的痛苦的漠不关心却不能不在他的令名上留下一个污点。如果说他在这些早期的策划中扮演了不很光彩的角色,他在1875年最近一次反叛

中的行动就更不光彩了。我们对这件事暂且不谈，留待本章的后面一部分再进行研究。阿古柏伯克很可能是对于事态采取了一种很自私的态度。由于他自己还很不能牢牢地掌握政权，他就惴惴不安，怕任何刮自国外的风暴可能摧毁他所借以维护其独立权利的脆弱小舟，因而他的政策的全部目的就是把人们对他自己的注意力引到别的方面去。最重要的是，必须使俄国人忙于不断地镇压他们自己属地上的骚乱，每展延一天，阿古柏伯克的地位就可以随着增强一些，一旦按照俄国人的想法，试图粉碎他的权力的日子终于到来时，他可以进行坚决的抵抗。从这个观点来看，阿古柏伯克对于他的同胞们的行为就会显得稍微好一些，尽管他的权宜政策本身并没有什么可称道的。但结果正符合了他的期望。1868年俄国人建筑纳伦碉堡是占领喀什噶尔明言不讳的预备措施，阿古柏伯克的这种妥协政策把他从那次危机中拯救出来了。1870年他又被宣布为沙皇的不可救药的死敌，俄国人准备进行一次远征来使他清醒过来；这时在浩罕又发生了反抗，再一次转移了俄国人的注意力，并把俄国军队从纳伦地区调到费尔干纳。1873年对基发的远征，也起了转移目标的作用，按照许多人的意见，是把本应落在敢于冒犯的阿塔勒克哈孜头上的打击转移到别处；最后，1875年在浩罕所发生的起义，是当地人反抗俄国的所有战争中最严重和最接近成功的一次，使他避免了一次一切都已准备停当了的入侵。

回过来讲 1868 年，那时俄国政府已经在纳伦河上筑起了碉堡，并且公开地宣称它的意图就是要惩罚阿古柏伯克对它的轻蔑态度，因为他不答应建筑一条通向阿图什的山区公路。直到那年为止，他们之间的交往是通过双方边境官员而进行的一种半官方性质的交往。现在我们触及了问题的略微具有不同意义的方面。俄国官员们努力要从阿古柏伯克那里取得有利于他们国家的让步，

而同时却断然不承认阿古柏伯克作为一个独立君主的正式身份。但他们的对手是非常精明的，决不会让自己被这样一个简单的策略所欺骗，他的官员们如果不以符合他的君主身份的方式把问题呈请阿古柏伯克批阅，他们自己就完全无权达成任何协议。我们
182 已经看到，俄国人由于运用外交上的奸诈手段失败而求助于恫吓，但命运的作弄却阻止了他们把这些恫吓付诸实施。除了俄国政府所作的努力外，还有一些由个人进行的具有另一种性质的尝试。在固尔扎的俄国商人队伍中有几个在经营对中国人和东干人的贸易中出色地表现了他们的冒险精神和胆量。任何冒险事业，只要有厚利可图，不管风险多大，都不容易制止他们不干。商业上的先驱者们并不象官方行动那样受到拘束。对他们来说，不管谁统治喀什噶尔都是无关紧要的，只要在他们居留的时期内能对他们的货物和人身予以保护就行。俄国政府对于翻越天山的努力抱着赞许态度，因为风险的绝大部分只落在个人身上，而政府则可以从个人经验的成果中得到很多好处。因此，当俄国商人把他们的计划向科尔帕科夫斯基将军提出时，他们并没有受到当局的阻挠，正如英国商人在同样情况下不会受到加尔各答当局的阻挠一样，不仅如此，可以相当肯定的是，他们还受到许多劝诱，要他们坚持达到他们的目的；利用了他们的爱国心和谋求增进自身商业财富的愿望，怂恿他们设法获得准许进入喀什噶尔。所以，到 1868 年，当俄国人已清楚，使用间接手段不能从阿古柏伯克得到什么，并且断定采取军事办法也不适当的时候，供另一种角色开始活动的场地就已准备好了。

183 1868 年初，一个名叫克卢多夫的俄国商人，在阿拉木图凑集了一个小商队。他的主要商品就是在莫斯科制造的一些便宜货，根据俄国人的经验，这些东西是在西土耳其斯坦最畅销的商品，但是，在这些中看不中用的商品包裹之外，也附带一些比较有

用的必需品，例如棉制品、刀具之类，作为同俄国人做交易会带来的一些真正好处的样品。克卢多夫出发时打算经由纳伦河翻越天山，走向乌什边境城镇，从那里可以很容易地沿着大路到达喀什噶尔。但是他在走过那时还在建筑中的纳伦碉堡不多远时就受到了一帮劫掠者的袭击。尽管他的一切财物都损失干净，还应该认为幸运的是，他本人并未受到严重伤害。也许是因为这些强盗对于俄国臣民本身怀有某种尊敬心情，或者，一如对阿古柏伯克的指控所断言的那样，正是那位统治者明令他们这样干的，因为他所希望的是吓退任何俄国臣民进入他的国土，而同时不使政府受到任何严重牵连。然而，克卢多夫却是一个意志坚决的人，一旦他拿定主义想干一件事，是不会轻易地被阻止的。政府以怜悯的心情看待他的事件，并且帮助他凑集了一个规模比以前那个更大的商队。但在从同一条路出发之前，他决心设法让阿古柏伯克本人知道这件事，而且非常幸运的是，他通过住在固尔扎的一个喀什噶尔人竟然做到了这一点。他送去了精心选择的礼品，连同一封申诉他从那位喀什噶尔统治者的柯尔克孜臣民手中遭受劫掠的信，他所要求的补偿仅仅是准许他作为沙皇的一个和平臣民进入他的国家，这完全赢得了阿古柏伯克的谅解。他打发人到阿拉木图给克卢多夫和他的商队送去了一个安全通行证。这个商人给这位喀什噶尔统治者留下了极为良好的印象，而且看来有一个时候他似乎可以完成前两年的所有外交手段都未完成的事业。甚至阿古柏伯克也被劝诱采取了一个微小的步骤来争取他和他的邻邦之 184 间更好的妥协，因为在 1868 年夏天，他打发了他的一个侄儿沙迪·米尔扎到阿拉木图去，请求准许前往塔什干，把他的君主愿与俄国达成完全谅解的建议递交给塔什干总督。在阿古柏伯克打发沙迪·米尔扎前去的同时，一个俄国官员，赖因塔尔上尉，被固尔扎长官科尔帕科夫斯基将军派到喀什噶尔，要求把从阿古柏伯克境

内出动劫掠俄国商人的一些柯尔克孜盗匪交出。他们还掳走了几个浩罕和纳伦地区的居民，俄国政府要求把这些个人作为它的臣民无条件地交出来。赖因塔尔上尉受命断然地提出这两项要求，并使这个新政府确信，俄国决不容许发生任何违反他们和在中国人领导下的旧政府缔结的条约精神的事情。赖因塔尔上尉得到了很周到的款待，但他的行动却被严格地限制在城内。他在这次出使中没有获知很多有关这个国家的重要情况，但对于他所见到的军队却获得了一个良好印象。由于阿古柏伯克的命令，柯尔克孜盗匪被捕获了，不过他坚决拒绝把他们交出来。被监禁的俄国人体面地被拘留着，作为沙迪·米尔扎安全返回的保证。但当得悉沙迪·米尔扎到塔什干的使命进行得很顺利的时候，他们就被准许返回俄国境内了。赖因塔尔上尉的使命几乎毫无成就，而当他回到他的上级那里的时候，还不得不向他的上级报告这样一个令人惊异的
185 消息，即新政权决心在亚洲扮演一个独立的角色，对挑衅报以挑衅，对威胁报以威胁。这一报告看来一定难以置信，但作为他的体验的成果，赖因塔尔建议对这个新兴政权采取一种宽大和友好的态度，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对于中亚的一个暴君采取这样让步的政策是总司令部那里不能同意的，于是问题就暂时被搁置起来。沙迪·米尔扎曾被扣留在阿拉木图，最后被允许继续向塔什干前进，到了塔什干，他发现考夫曼将军已经不在那里而回欧洲了。接着有命令把他送到圣彼得堡去，1868年最后几天他到了那里。他受到土耳其斯坦总督几次非正式的接见，但并没有见到沙皇或任何更高一级的官员。其实，他只得到了一个普通旅行者的待遇，并没有受到作为一个邻国代表的接待。直到这时候，俄国政府并没有做过任何事情表示他们承认阿古柏伯克为喀什噶里亚的统治者。在俄国人的眼光里，不管谁暂时是那个地区事实上的所有者，合法的所有者仍然是中国人。当1869年1月沙迪·米尔扎返回喀什噶

尔的时候，可以说俄国和阿古柏伯克之间的关系已经完全回复到原来的状况。俄国人所有做交易的要求都没有成功，除了克卢多夫先生的光辉旅行之外，没有一个人打破过那把一切外国人拦阻在亚洲乐园之外的魔法。他们的使者赖因塔尔上尉受到沙迪·米尔扎在阿拉木图和圣彼得堡所受到的完全同样的待遇，但当这个俄国官员试图把他的使命的主要部分的威胁话表达出来的时候，阿古柏伯克一种坚定而尊严的态度就有效地把他抑制住了。在阿古柏伯克镇静地主张他和全俄罗斯的沙皇处于同等地位的态度中，有一种凜然不可犯的气概。当俄国人要求阿古柏伯克在贸易方面作出让步遭到拒绝，而用俄国的强大威力为论据，要他屈服的时候，他总是回答说：“我的弟兄白色沙皇是个最强有力的君王，他统治着地球的一大部分，我和他比较起来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王公罢了。尽管如此，我也能象一个真正的人那样临危不惧，把为保卫我的国家和信仰而死看作一种幸福。”对于如此勇敢，如此庄严的答复，这些惶惑无措的军官还能拿什么话来反驳呢？对于阿古柏伯克坚定反对俄国的态度不可能不予以最高的赞扬。如果只是为他自己狭隘的私利这样随便挑战也许未免太轻率，但当我们看到他纯粹自私的动机践踏在脚下，而在亚洲人反对俄国人，伊斯兰教徒反对希腊东正教徒这个更为广大的问题上维护他的领导权时候，我们就不能不对他的这种态度更加表示尊敬了。如果在他的一生中他一直是前后一贯的，如果当需要作出巨大努力反对俄国的时刻到来的时候，他的信念是坚定的，而且果断地把这些信念付诸实践，就象他一贯地那样，那么他自己的命运将会有多大的不同，而且中亚的当前形势又将会有多大的不同啊！

在这些没有结果的行动之后的一段时期内，俄国人不对喀什噶尔作任何直接的干预了，但当布哈拉的爱弥尔把阿塔勒克哈孜 (Athalik Ghazi) 或即信徒统领的称号赠予阿古柏伯克的时候，就

187 引起了俄国人无法消除的敏感。的确，中亚伊斯兰教的首领这样承认阿古柏伯克的正统性，这似乎就宣告这两个国家已达成了某种谅解，而且是把威胁矛头指向俄国政府。在穆扎夫尔丁和阿古柏伯克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协议现在还不能说，但由于他们所共有的对于俄国的反感，产生这样一种协议也是不足为奇的。然而，阿古柏伯克对于 1870 年的骚动并没有积极插手。当俄国军队在他们新获得的费尔干纳省及其附近对每一个敌手取得节节胜利的时候，阿古柏伯克正忙于对付在他的极东边境制造纠纷的东干人。浩罕的反抗失败了，而正在东方率领胜利的军队进行新的征服活动的阿古柏伯克对于在西方发生的事情显然漠不关心。在 1870 年一年中，当即将来临的风暴的低沉响声逐渐变得清晰可闻的时候，俄国政府曾经努力想和浩罕的呼达雅尔汗结成同盟，以便把阿古柏伯克置于他们的势力范围之内。正如前面已经谈到过的，这个汗曾被效法野心勃勃的大臣阿里姆·库里榜样行事的阿古柏伯克所背叛，现正主要倚赖俄国的支持来对付背叛他的臣民。所以，无论如何，他不大可能被认为会对他的邻国喀什噶尔怀有什么好意，也不大可能会对他的保护者和恩人的事业漠不关心。俄国人很肯定地认为，他是热烈支持他们的这样一个计划的；这个计划如下述。正如从前面喀什噶尔历史的简述中所看得出来的，从远古以来，在喀什噶尔就有两个竞争的力量——中国人和浩罕人。最近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是胜利者，而在所有其余时期，则浩罕人或多或少地占上风。但每当一个当地王朝获得某种程度稳定的时候，它总会受到浩罕汗的野心图谋的威胁；这个浩罕汗通常也就是对这个王朝的建立成功最有帮助的人。俄国政府决定利用这个历史事实向呼达雅尔汗耳中灌输一些阴险的计谋，说他有权作东土耳其斯坦的封建王公。他们论证说，这次又是一个浩罕臣民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并且与浩罕相对抗的政权，而他的一切胜利都是由于浩罕的同

188

情和浩罕臣民们强有力的支持才获得的。但是，当这个幸运军人从浩罕得到他所需要的一切之后，他又是怎样对待他自己的祖国呢？他给所有参加了反对呼达雅尔汗的阴谋的人提供了避难所，他在浩罕国内煽动叛乱来反对俄国人和他们所任命的合法统治者呼达雅尔汗。就好象这些罪行还不够严重似的，他又拒绝承认呼达雅尔汗为他宗主而侮辱了他。他们还利用呼达雅尔汗个人的恐惧心理，使他对俄国人的建议表示默许，这是他们要使阴谋成功所必需的。他们还向他指出，喀什噶尔的一个强有力的军事政权将会激励正在阿弗托拔查灵活的头脑里酝酿着的阴谋，阿弗托拔查就是三十年前的首相兼大臣穆斯林·库里的野心勃勃的儿子。这些论证本是似是而非的，但不能怀疑它们对呼达雅尔汗产生了影响。这个很可怜的统治者，尽管由于他的处境不得不迎合他的俄国顾问们，仍然有勇气拒绝提出他对喀什噶尔的领主要求。他用一种温和的讽刺态度指着地图表示：浩罕的边界本应更向西推展，即使征服了克孜勒牙尔特不毛的山地，怎么也抵不上塔什干和霍占的损失。但他答应尽力劝说阿古柏伯克向俄国政府提出建议批准一个商约。就这样，呼达雅尔汗在他的俄国朋友们的授意下写了这样一封信给阿古柏伯克，但他另外又写了一封私信向他说明俄国人未来的意图，给这颗苦药丸加上一层糖衣。那封信的大意是，189
俄国人并不象可能被认为的那样，想把对阿古柏伯克的关系搞得十分紧张，他们所最希望的是，在不由他们先提出要求重开谈判，从而对尊严没有明显损害的情况下来解决问题。无论是公开地或秘密地呼达雅尔汗都劝说阿古柏伯克在表面上对俄国政府作出某种让步。俄国人自己，在劝说呼达雅尔汗对阿古柏伯克施加压力未能奏效的情况下，似乎也得出了呼达雅尔汗信中所写的同样的结论。阿古柏伯克必须先有所表示，然后他们就会迎上去和他妥协，使他可以分享到作为一个俄国同盟者所能得到的巨大好处。

塔什干当局甚至以为他们已经使得他们的主要麻烦之一得到了解决而洋洋自得。他们已经利用呼达雅尔汗为媒介，给阿古柏伯克降低自己的身份敞开了大门。这样的迁就是从来没有听到过的，他们毫不怀疑，这个傲慢的穆斯林统治者将会欣然地赶快抓住这个因沙皇的宽大所给他的最后机会。

但他们的这种一厢情愿的如意算盘打错了。阿古柏伯克很快觉察到俄国人的要求假装不在乎的外表下掩盖着一种游移不定的意图，一个强国肯这么绕弯儿以达成一种协议，当直接进行谈判的时候必然会作出更多的让步。他显然已给予了访问过他的国家的少数俄国人一种相信他力量强大的印象，谣传还夸大了他的资源，把他的小小的杂牌随从部队说成了正规的、有训练的军旅。当他几乎也有胜利的把握的时候，阿古柏伯克不是那样的人，会破坏掉在他一生经历中对他有那么大的帮助的，关于他个人的良好印象，这种印象是他的政策在四年之久的时间中成功地建立起来的。经过了相当的拖延之后，呼达雅尔收到了对他的书信的正式答复，而这个答复的内容必然使俄国人深为不满。总括起来，他表示由于俄国人拒绝承认他的政府，而且一直支持他的仇敌中国人的事业，他拒绝和俄国人进行谈判。但他不止于这样率直地拒绝塔什干的建议，又进一步谈到了一些较小的事情，并且以明确的语言谈到了俄国的政策问题。对于他和他的共同信仰者的共同敌人，不值得他和他的同盟者即浩罕和布哈拉的统治者作任何考虑。“来到我的喀什噶尔国的俄国人，看了这些地方，就会熟悉这个国家的情况，所以，最好是不让他们来，因为他们是一种阴险而且心术不正的人。”阿古柏伯克就是以这样明白的语言谈论一个强国，这个强国不必冒多大严重的风险随时就可以粉碎他。然而从某种意义来说，他的大胆正是高度审慎的表现，而且获得了成功，如果态度不是这么果断，也许就会完全失败了。俄国人在对他

们的新对手的估计方面完全受了骗，既然劝说阿古柏伯克放弃他对俄国人的冷淡态度的一切手段都已用尽，在塔什干就开始认真讨论，即使单纯为了取得关于他的国家的正确情报起见。承认一个差不多已有六年之久成为亚洲很大一片地区的负责统治者的存在是否明智。阿古柏伯克还给俄国的外交家们铺平了道路，因为他写了一封信给土耳其斯坦总督，说明沙皇用不着通过呼达雅尔汗的斡旋来建立外交关系；如果俄国人真想和他建立联盟，他们可以打发一个使节到他那里来，到那时就可以为达成所希望的贸易和其它协定开始采取正式步骤。这封信就象中世纪的一个欧洲君主写给另一个君主的信一样，是一份很庄严的文件。他在信中说：“他并不否认俄国的权势和能力，但因为他是—一个勇敢的人，他所倚仗的是真主，他决不会逃避斗争，他所希望的只是为他的信仰而死。”这封信在塔什干产生了极大的印象，于是决定派一个使节到喀什噶尔去。 191

在继续叙述以前，也许有必要先概括地讲一下到目前为止，在俄国和喀什噶尔之间所发生的事情，因为自此而后，这两个国家所处的相互关系就完全不同了。俄国人试图劝诱阿古柏伯克对他们作出最优惠的商业上和政治上的让步，而同时他们却除了作出“从俄国制造的产品中得到好处”这一含混的允诺以外，拒绝给他任何同等的让步。他们甚至还在伤害之外加上了侮辱，公然宣布他们只承认中国人为喀什噶尔的统治者，而拒绝讨论沙迪·米尔扎提出的为支持他的叔父要求承认他为事实上的君主的论据。他们对于这位亚洲君主采取了恫吓的态度，在他们的实际行动中大力宣扬“强权即公理”这句格言的真理。有几次他们还炫耀军事准备以支持他们的口头恫吓，但他们一次也没有把这些恫吓付诸实施。另一方面，阿古柏伯克的政策却是始终一贯的和庄严的。他很谨慎地避免任何进攻性策略，即使是在采取防御性的预防措施的借口

下，而对于那些屡次向他提出的劝诱他摊牌的半官方性建议总是坚定地拒绝接受。他不是按照所有的过去先例那样，以一个恳求者的姿态出现，而是采取了一个独裁者的态度。“除非承认我为喀什噶里亚的合法统治者，否则就中止一切谈判。派遣一个经正式
192 委派的大使到我这里来，他将会受到体面的接待。然后一个具有公认资格的代表将会把我的友谊表示给你们的君主带去。如果拒绝考虑我的这些正当要求，那末我的国家的大门就会对你们的商人和官员毫无例外地关闭着。要想进来只有跨过我自己的和我的忠实军队的尸体才有可能。”在俄国历史上，一个亚洲君主使得那个惯用阴谋诡计进行无限侵略扩张的帝国疲于奔命，这还是第一次。阿古柏伯克是拒绝向沙皇卑躬屈膝，而且终于对他的代表们取得外交上的胜利的唯一君主。1872年春，阿古柏伯克正处于他的极盛时代。他还没有开始对东干人的后几次战役，这些战役比任何其它事情更倾向于削弱他的政权，引起人们对于他的统治的不满。由于新近对俄国人取得了外交上的成功，他在许多亚洲人眼中看来，就成了在和俄国人冲突中能挽救他们命运的一个称职的战士。他们的这种热情，毫无疑问，是可以理解的，但可以相当肯定的说，由于他的朋友们的奉承和俄国人的神经质的敏感，阿古柏伯克的力量被过分地夸大了。值得注意的是，正象英国曾被认为犯有后一种毛病一样，俄国在有一个时候被证明也很容易犯这种毛病。

被委任充当俄国政府驻阿塔勒克哈孜朝廷中第一任代表这个微妙职务的人，是锡尔河源头的探险者考尔巴尔斯男爵，没有比他更好的外交家可委以这一任务了。1872年5月初，他从固尔扎出发，带着送给这位统治者和他的主要顾问们的大量礼品，顺利地
193 在同年6月抵达喀什噶尔。在这里他受到了最热情的接待，这位统治者所给予他的礼遇和款待是超过一切想望的。当阿塔勒克哈孜

第一次接见考尔巴尔斯男爵时，他用东方生动的语言说：“请坐在我的膝上，坐在我的怀里，或你们所喜欢的任何地方，因为你们是天送到我这里来的贵宾。”这个使团的全体成员第一次被给予最大的行动自由。为了考察这个国家而随同他们来的两个商人也得到了去叶尔羌和田的安全通行证。在俄国人面前，阿古柏伯克毫不隐讳他的得意心情；也许他的高兴主要在于他作为外交家的本领受到这样无可置疑的承认。他在各方面给予他的客人以方便，使他们能够在喀什噶尔一带看到他们所感兴趣的一切事物。为了对这次盛会表示庆祝，还举行了阅兵式，正巧有相当数量的军队从附近经过，去与库车外边的东干人作战，这个气派就够雄伟的了。俄国人对于他们所看到的情形印象良好，考尔巴尔斯男爵本人对于演习所表现的军事动作的准确也表示惊异。一向喜欢受奉承的阿古柏伯克在一个热情洋溢的时刻叫喊道：“我把俄国人看作是我亲爱的朋友，如果不然，难道我会把我的军事力量给你们看吗？就是你们，肯定也不常把自己的真实情况让一个敌国知道的吧！”事情现在很有圆满解决希望了。考尔巴尔斯男爵和阿古柏伯克彼此都很高兴，但在愉快的谈话结束以后，就必须对两国未来的政治和商业关系作一些明确的计议了。

当俄国人打发考尔巴尔斯男爵到喀什噶尔来的时候他们的主要目的有三个：第一，他们想获得关于这个国家的一般情报，弄明白阿古柏伯克是否真象传闻那样强大。第二，他们希望把他们和他的关系建立在一个明确承认的基础之上，使得他们能知道他在土耳其斯坦和固尔扎准备采取什么政策。第三，他们想获得在他的国家里进行贸易的垄断权，使他们可以先发制人以对付英国企业，自从沙敦和弗赛斯两位先生的访问以来，英国企业已经把注意力转移到这一带地方来。这最后一个是最容易获得的，阿塔勒克哈孜也以一种很友好的态度考虑俄国人关于贸易的一切建议；至

于他们所迫切要求的第二项，考尔巴尔斯用尽了他的一切机智和才能，能从他的东道主那里得到的只是一些最含糊泛泛的意见而已。第一个目标，就地理的和科学的情报而言，已经大量地得到了；但阿古柏伯克对于他的权力和他控制这个国家的情况方面所采取的欺骗俄国人的警戒性措施则看来是成功的。考尔巴尔斯男爵从前仅仅根据传闻得来的消息肯定已有许多被证实了；但问题毋宁是他所证实的东西是否超出了他的经验所能证明是正确的呢？他这次出使的结果是，阿塔勒克哈孜被提到和喀布尔的爱弥尔同样高的地位，而毫无疑问，这样的一种比拟是没有事实根据的。1872年6月2日阿塔勒克哈孜和考尔巴尔斯男爵签订了一个条约，但根据俄国人当时还在采用的旧历，这一天是5月21日即圣君士坦丁节。关于这一巧合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和另一种说法都有同样多的根据。

据说，阿古柏伯克为了想要表示他对俄国人的善意，坚决主张在那一天签字，以表示对君士坦丁大公的敬意。现在有一些观察家认为，这种说法有两三个不大可能之处，第一，阿古柏伯克首先就极不可能知道那个日子是圣君士坦丁节；还有，第二，很可能他
195 也同样不知道有一个君士坦丁大公存在。无论如何，根本就没有正当的理由认为，一个中亚的君主怎么会设想他对那个大公表示特别尊敬就可以证明他一般说来是希望和俄国人友好的。另一种说法，象许多其它情况一样，是从徐楼先生的著述中透露出来的，这种说法有更大的可能性，而且不会受到同样的反对。根据这种说法，考尔巴尔斯男爵当然是知道那个圣徒的节日的，正是他要求在那个条约上写上那个日期，而且在条约一经签字之后，就给考夫曼将军发去一封信，说阿塔勒克哈孜出于对考夫曼将军的友好，特别要求在那个日子签订条约，以表示对考夫曼将军的守护神的尊敬。尽管这位高贵的将军兼总督对于他的使者这番细腻的殷勤感

到很高兴,却不得不放弃这个对他推崇的荣誉,在他送到圣彼得堡去的公文里,他用君士坦丁大公的名字代替了他自己的名字。没有什么疑问,这是正确的说法;它的确很清楚地说明了在俄属亚细亚所存在的一种互相讨好的方式,不过总得认为,有一种特等的权力和排场是专属于考夫曼将军阁下的。

在这个带有签订者名字的条约签字后不久,考尔巴尔斯男爵带了阿塔勒克哈孜的许多表示友好和善意的话,就告别了。但在他离开之前,他们商定了一项办法,由阿古柏伯克派一个使节去访问塔什干。这位使节携带了签字后待批准的条约,在塔什干受到了极其友好和尊敬的接待。看来俄国政府肯定认为,他们和喀什噶尔的关系,那怕只能维持一个短时期,也将会令人满意的,他们特别留心,给予喀什噶尔使团一个良好的印象。在土耳其斯坦首
府作短期的逗留以后,条约签订后奉有特殊使命的阿古柏伯克的外甥,哈吉·妥拉,就前往圣彼得堡,在那里他受到沙皇的款待,参观了阅兵式,受到了极其殷勤的、像接待王侯那样的待遇。他在1873年所受到的接待和沙迪·米尔扎在1869年所受到的接待大不相同,很明显地表明了消息灵通的官方人士中间所考虑的他们和喀什噶尔之间的关系所发生的变化。 196

我们现在要研究一下,俄国政府是否有理由如此自信地认为,他们已经获得了东土耳其斯坦穆斯林统治者的永恒友谊。哈吉·妥拉结束圣彼得堡的访问之后,又转向南方,在莫斯科和敖德萨作了短暂的逗留后,就到了君士坦丁堡,在那里他已经有许多朋友和关系。不必过分深入地探询他在那个帝都的活动——因为关于这些活动读者只要根据其结果就可以作出最好的判断——我们在这里只简单地说一下,在他又结束了在金角^①的逗留后,他就经由苏伊士运河前往印度,在到达印度的时候,正好赶上与道格拉斯·弗

^① 金角(the Golden Horn)即君士坦丁堡。——译者

赛斯爵士所率领的使团同行,那时他们正要前往喀什噶尔。所以,哈吉·妥拉给他的舅父带来了关于三个与喀什噶尔命运有关的主要强国——俄罗斯、土耳其、英国——的大量情报。但甚至在他还未回到本国以前,在俄国和阿古柏伯克之间就已经发生了新的不和。1872年还未结束,阿塔勒克哈孜和土耳其苏丹之间已经缔结了一些经过一段时间酝酿的秘密协议,这个伊斯兰教卫士,就以爱弥尔的衔头,以更为神圣的新面貌出现在亚洲人面前了。他承认了土耳其政府的宗主权,并且还不以这种正式宣告为满足,又发行了一种带有阿布都拉·阿齐兹头像的新硬币,而赋予这件事以特殊意义。可以想象,俄国人对于这两个可以被认为都对他们的利益有敌意的穆斯林国家之间的联盟是不高兴的,在军界当中就有很大一部分人叫嚷要立刻出兵讨伐这个傲慢的穆斯林。有一个时候这个好战派好象要占上风,因为所有到过喀什噶尔的官员和商人都证明,阿古柏伯克正在一天一天地变得强大起来。对塔什干政府施加了压力,要求采取果断措施。考夫曼将军似乎也很想同意即时惩罚阿塔勒克哈孜的建议。可说是喀什噶尔的幸福,在俄国人眼中看来,基发的汗是一个更老的罪犯,而且俄国本国政府断然禁止在靠近中华帝国边境的地区采取任何行动。很明显,俄国本国政府的温和态度比塔什干某些军官的冲动性要求是个更为明智的政策;但不那么清楚的是,当俄国人在1873年对基发进行大讨伐,从而提供一个极好的机会时,为什么阿古柏伯克却拒绝充当浩罕的解放者这个角色。考尔巴尔斯条约规定,俄国商人只要缴纳百分之二点五的从价税,就可自由进入该国。不仅不应再有任何其它的勒索,而且还保证对于要求到喀什噶尔旅行的俄国臣民,只要他们持有护照和俄国总督所发的旅行许可证,就予以良好的待遇。当考尔巴尔斯男爵居留在这个国家的时候,没有比对他的随员所给予的待遇更为周到的了,对于那些前往叶尔羌的商人也

给予方便，让他们卖掉在这次旅行中所带的少量商品。给予这样来到喀什噶尔的商人的这种友好接待，在整个谈判期间，直到阿古柏伯克本人的使节离开俄国时为止，一直都维持着。但随着哈吉· 198
妥拉来到君士坦丁堡以及宣布阿古柏伯克被土耳其苏丹晋升为爱弥尔的尊贵地位以后，阿古柏伯克对俄国的政策精神就改变了。的确，阿古柏伯克从这个通商条约里看到了自己被一种未预见到的危险所威胁。他从前就憎恶俄国商人出现在他的国家里，因为他认为他们都是间谍。但现在由于他的处境的需要，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被迫和他们的政府订立一个正式条约，他感到他的小小的国家简直是处在被那些俄国商人入侵的危险中，那些商人为了分享和东土耳其斯坦居民进行贸易所发的横财而麇集到固尔扎。他一直是憎恶商业的。他是一个战士，对于俄国人和“和台”的骗人诡计很容易感到鄙视，并表示出来。

但由于前者在为他的后宫提供小装饰品之外还能够为他的军队提供较好的武器并为人民提供较温暖的衣服，如果他们人数有限并在一定间隔的时间来到，还是可以容忍的；但当他感觉到他们会象许多猛禽落到一具被弃的尸体上那样降临到他的国土的时候，当他怀疑到他们很可能会象在布哈拉和浩罕那样，和喀什噶尔的政治倾轧纠结起来的时候，他就下决心在对使他们得到百分之百利润的商品征收微不足道的百分之二点五的税以外，对他们的到来再加以另一些限制。但是，他曾经宣誓保证商人们将得到公平的待遇，他怎能找到一个条约上的漏洞，既可以避免履行他的诺言，同时又不致和俄国人公开决裂呢？这事需要最巧妙的处理手段，但阿古柏伯克证明了自己是有应付能力的。不过，也不可能 199
希望，阿古柏伯克在完成阻止俄国人事业的任务的同时而又不惹怒俄国政府。

尽管考尔巴尔斯男爵受到了友好的待遇，在某些人的心中，对

于信徒统领的郑重声明是否真是象他要人相信的那样真诚，却一直不能确定。因此，在固尔扎的商人谁都不愿第一个派一支商队到喀什噶尔去。固然大家都想分享利润，但这总还是个冒险的尝试，每个人都宁愿他的邻人开始这个冒险事业。在商业圈子里，关于这个新国家和在这个国家做买卖的前景谈论得很多，关于“谁将敢于冒险”也谈论得很多。这种踌躇莫决的心情，如果确实是这么一种很自然的心理值得在这里明确说明的话，也很快就过去了。一个在中亚大部分地方有很广泛商业联系、名叫普佩舍夫先生的商人决定运送第一批货物到喀什噶尔去，但普佩舍夫先生不能亲自去，所以他的商队就委托他的伙计索莫夫带去。这个商队毫无阻碍地到了喀什噶尔，在那里索莫夫先生在一所专供外国商人下榻的商栈里安顿下来。但他立刻就感到统治者的情绪已有了变化，因为商队成员的个人自由受到了限制，他们的一切行动都受到了最严格的监视，而且索莫夫先生的居留时间极短，因为阿塔勒克哈孜本人把他的全部商品都买下了。从商业投机的观点来看，这种结果应该是令人非常满意的；这个俄国商人不必因为他的商品找寻买主而遭受拖延的损失。但是另外发生了一个必须加以考虑的问题，
200 那就是买主付款方式。索莫夫先生收到的都是中国钱币，价格是按照爱弥尔亲自规定的；普佩舍夫先生在他的代表回来以后一算，估计损失约一万五千卢布。俄国政府对他们臣民的案件进行了处理，向喀什噶尔提出了抗议，要求立即赔偿俄国商人所受的损失。阿古柏伯克对于这个断然要求所作的答复是礼貌和圆滑的典范。他完全否认对索莫夫进行过任何干预。那位先生一直有完全的自由做他所欢喜做的事，到他所欢喜到的地方去，至于他以为他，爱弥尔，买了他的货物，那是完全错了。毕调勒特和贸易完全不发生关系，这种事情他是完全让他的臣民处理的。他自己只是一个军人和先知的门徒。但他还是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调查，并且发现他的

某些官员为了想以较低价格得到这些商品，就用他的名义买下来了，这些官员是应该受惩罚的。阿塔勒克哈孜对于这件事的发生表示遗憾。不管俄国政府认为它的臣民在这次交易中遭受多大损失，他将极其愉快地予以赔偿。在塔什干指派一个委员会来研讨关于这个问题的各种情况，经过了一番讨论之后，普佩舍夫先生的要求从一万五千降低到一万二千卢布。爱弥尔同意了决定，但在过了几个月之后，普佩舍夫先生才收到他的款项，而且这次仍是贬值的中国钱币。我们有理由认为，所有这一切都是计划好的，设在普佩舍夫先生路上的障碍，只是使俄国商人对喀什噶尔失去兴趣的有系统计谋的一个重要部分而已。而且也没有提供俄国政府任何可以抱怨的明确的理由，因为阿古柏伯克毫无保留地表示了遗憾，他把这件事的全部责任都推到某些“他已经下令要处罚的官员”身上。他毫无怨言地赔偿了普佩舍夫先生的正当要求的钱数，如果说在偿还赔款方面有些拖延的话，那只能说是由于他的国库空虚，而不是什么缺乏善意。他诉苦的大意是，“我是一个贫穷的君主，我的国家自从中国人离开以后被连续发生的战争弄穷了；你们花钱费事到我的国家来是得不偿失的，你们为什么坚持要到这里来呢？你们这样做对你们自己和我的人民都没有好处，只是使我为保护你们不受侮辱和伤害而操心 and 麻烦罢了；你们必须承认我一直是这样做的。”这种说法当中是有一部分道理的，尽管固尔扎方面不相信，那里的人认为不论发生了什么不对头的事都归之于爱弥尔的敌意。但阿古柏伯克在对当时为开发东土耳其斯坦所进行的热烈准备泼了冷水这一点上却是成功了，而且他的做法是富独创性的和有特色的。很少的统治者会预见到，摆脱一个麻烦的来客的最好方法就是把他带来卖给人民的东西统统买下来；用成问题的货币付款这种简单的办法就足以阻止成百的人效法索莫夫先生的榜样。但阿古柏伯克并不满足于听其自然。清付了普佩舍夫所

要求的赔偿以后,也许人们会认为,以后阿古柏伯克会对他自己的对待俄国商人的意图,保持聪明的缄默了。的确,他尽可以让问题找到它自己会找到的解决办法;但是,处于一个软弱的时刻,为了使他对他的诚意不加怀疑,他要求俄国人再派一个商人到喀什噶尔来,那时他们就可从他所受到的待遇来判断爱弥尔对他的“亲密盟友”俄国人是否友好了。俄国当局抓住了他这句话,在隔了十二个月时间没有一个俄国商人去喀什噶尔以后,另一个叫做莫罗佐夫的商人来考验阿古柏伯克所说的话了。正象他所说的一样,这位先生受到了最热情的接待,为他的货物获得买主提供了方便,爱弥尔还为他的武器库购置了一些看来适用的东西。莫罗佐夫先生回到了固尔扎,叙述了他怎样受到这位统治者本人的热情欢迎,以及这次生意在商业上是怎样取得成功的。别的人也效法了他的榜样,在阿古柏伯克统治的最后二年半里,俄国商品,通过俄国代理商或当地代理商,大量地运进了喀什噶尔。但这种贸易总是容易由于政治地平线上经常出现的乌云而转向萧条时期,俄国人并没有象他们早先所深信的那样从贸易中得到好处。的确,英国制造商,在1873年后,在喀什噶尔的许多城市和俄国商人展开了尖锐的竞争,在1876年结束以前无论如何已把他们的商品赶出叶尔羌市场了。但这一事实只促使俄国人更坚决相信,必须吞并喀什噶里亚,或在王座上扶植一个甘心充当沙皇代理人的傀儡。的确也有许多人建议应该让中国人回来,但当时他们离得太远,而且显然也很软弱。主张吞并喀什噶里亚的一派日益强大,叫喊得更响;所有的观察家都同意,沙皇下令消灭阿古柏伯克的统治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1874年赖因塔尔上校被派赴喀什噶尔,设法把事情弄得较有希望些,但并未得到成功。俄国人在和当地各个国家的谈判中,或在以武力威胁要求签订的条约中,除了贸易特权外,都要求在各国的主要城市里设置领事级官员的权利。这些官方代

表的表面职务是照料他们政府的利益，并尽他们所能保护俄国国民的生命财产。就所谈到的这些非常必要的职能来说，俄国在认为需要保护时，是完全有权要求取得这些保护的。但是，对那个国家的名誉来说是很不幸的，亚洲人的经验已经充分证明，这些公开的职务，只是他们任务中最不重要的部分而已。

他们的秘密使命是在所派驻的国家里不错过任何机会去发现舆论的动向，了解不幸构成这些国家主要历史事件的王朝密谋的一切来龙去脉，并运用他们所能用的一切手段来促进他们所服务的伟大帝国的利益。既然他们的使命容许有这样的广泛的行动自由，而且还提供了那么许多秘密的和公开的诱饵来提高他们的兴致，如果我们发现，在中亚这些独立和半独立汗国的舆论一有变化时，俄国政府马上就会知道，那就不必惊奇了。阿古柏伯克曾经把喀什噶尔的不和分子熔合成为一个军事组织，但这种不和远远没有完全消弭；因此，把俄国这样一种体系引进喀什噶尔，会对他个人产生危险，阿古柏伯克是非常敏感的。如果一个米尔扎^①出现在浩罕和布哈拉就已经导致该地十年祸乱和逐渐臣服，那么，这些人如果出现在东土耳其斯坦，象他这样一个军事冒险家并且在该地又是一个外国人，更能够期待什么呢？但考尔巴尔斯男爵已经要求这种让步，也许比要求其它让步更坚决；阿古柏伯克在他的客人的一再强求下，即使不在实质上让步多少，至少在形式上必须有所让步。为表示一种很大的恩典，他同意任命一些商队头目，即在商人们来到的时候，照料他们生活起居的管理人员；而商队头目是一个未受过教育的不重要的人物，对这样的人是不必有什么害怕的。这完全没有使俄国主管官员满意，他们以后的一切努力主要就是试图把这种不重要的人物变成为到处窥探，到处打听的米

^① 原波斯的一种称号，当置于人名之后，通常意为“王子”、“亲王”等，置于人名之前，意为“学者”、“士绅”等。——译者

尔扎。阿古柏伯克也下定决心坚决挫败他们的企图，从考尔巴尔斯男爵到库罗帕特金上尉一系列使节的历史，就是在这个问题上要迫使阿古柏伯克摊牌的毫无结果的努力的漫长过程。在莫罗佐夫先生的成功的旅行以后，1874年又派遣了赖因塔尔上校，试一试能不能获得一个更好的协议；但尽管爱弥尔对他招待得很殷勤，他并没有比他的前任们得到更好的结果。在那一年，阿古柏伯克在国内的地位也更加巩固了。东干人被赶回到天山以北吐鲁番那边和罗布泊以东地区。库车和库尔勒等城市的不满情绪显然也在消逝；但尤其重要的是，看来英国的巨大保护伞已经覆盖了他整个国家。这一假设尽管不能用与道格拉斯·弗赛斯爵士签订的条约来证明，爱弥尔却是对他新发现的盟友作了最充分的利用；大部分的英印人和英国的中亚事务权威，出于对他本人的同情，或者是由于相信英国的利益和他的事业完全一致，都主张应当支持他反对俄国的侵略，这就给了他一种表面上的理由，宣称英国在喜马拉雅山外的政策中第一次把它的保护延伸到它的自然边界以北的一个当地国家。西伯利亚和土耳其斯坦的俄国地方政府，由于受到它们的外交部着重强调的警告，要它们不要引起英国的不快，起初都倾向于利用这个要求作为它们推进它们和爱弥尔之间友好关系的借口，但当它们的建议没有得到响应，当为爱弥尔的代表们所大大夸大的弗赛斯使团的重要性变得很显著的时候，俄国当局的语调就又一次变得蛮横而带威胁性了。总之，经过两年多的谈判以后，事情又回到了考尔巴尔斯条约以前的情况。俄国人没有实现他们的主要愿望，即在喀什噶尔设置一些领事级官员，而阿古柏伯克则和过去一样，大胆地对威胁报之以威胁。倚仗着他作为中亚最正统和最强大的伊斯兰教国家的日益提高的声望，并深信在俄国人打败他的国家以前英国会出来干预，他甚至在反抗的而且几乎是好斗的态度之外又加上了讽刺的态度，下述事件就是一

个典型的例子。1874年初,爱丁堡公爵娶了沙皇的独生女玛丽·亚历山德罗夫娜,阿古柏伯克抓住这个机会发了一封贺信给全俄罗斯沙皇表示祝贺,他说,听说他的好盟友英格兰和印度女王的儿子即将娶他的朋友沙皇的女儿,他就此事,特驰书致贺。这封热情洋溢的信并未得到复信,它是否送到比塔什干更远的地方也是令人怀疑的。不难得出结论,这样的表现有损于这位喀什噶尔的统治者在其它方面所表现的引人注目的伟大性格。他对俄国的反抗非常值得称赞;他维护作为一个独立统治者的特权的做法是慎重的,而且是值得我们尊敬的;但他对于俄国人所施加的一些器量狭小的侮辱则既不明智又不郑重了。他抑制了以商业利益为伪装的俄国侵略本性,这很明显是对的;他以充沛的精力和不屈不挠的精神挫败了试图把俄国间谍和阴谋带进喀什噶尔的每一尝试也是值得我们钦佩的;但他何必用上述给沙皇的信那样毫无意义的侮辱来削弱他的光辉成就的效果,并使他已获得的一切冒受风险呢? 206

塔什干当局既然觉察到英国舆论对于在中亚进行积极干预一事未必已经酝酿成熟,就恢复了他们原来想对喀什噶尔统治者施行强迫手段的意图,尽管他们的本国政府三令五申地不要他们这样做。因此,在1874年,所有为来春开始战争的准备都已就绪。粮食和军需已被发送到纳伦,还部署了一个辅助师从西边的捷列克山口进行侧面运动。俄国在亚洲的将领们曾经被指责说,他们布置远征是为了他们共同的利益,既可获得晋级又可获得勋章。自从彼罗夫斯基以来,由于渴望晋级和荣誉,每个军官都严重地受到这种毛病的感染,这种病症就是普遍都知道的所谓圣乔治或圣安娜十字勋章热。我们现在所谈到的日期以前的七年中间,如果说在士兵和低级官员之间,荣誉和战利品已经得到公允的分享,有些地位较高的人却认为他们的利益由于考夫曼将军垄断了最高声望而受到了侵害。其实,这种情况在基发陷落以后就很明显,胜利的

功劳完全归于考夫曼，而他所率领的师对于这次胜利却很少或全无功劳。还有，在塔什干小宫廷上所采用的礼仪和这个得意的将
207 领所实行的半帝王般的仪式对于那些习惯于战场上的放纵生活而不惯于宫廷里拘谨礼节的军官们，也是可厌的。那些在这位沙皇代表的军队中担任次一级职位的主要将领们也并非没有更为阴险的动机，其中突出的一个就是年轻的斯科别列夫，由于一心想要出名，大声叫嚷要求参加某种在成功后可以获得圣乔治十字勋章的远征。尽管考夫曼将军在他的上级善意的眼里看来是坚强的，即使他有意但也无力拒绝斯科别列夫及其父亲、和他自己部队中一部分比较好战的人强迫他接受的要求。据说，除了这些可以觉察到的原因外，还有一些涉及到考夫曼家族和斯科别列夫家族之间不和的原因，这是由于当沙皇尼古拉在位时，两家族的年轻人供职宫廷里的时候就彼此不和了。为了消除这些不和，并满足其他部属的要求，考夫曼将军同意进行一次对喀什噶尔的远征，而且把它交给小斯科别列夫指挥。将近 1874 年年底的时候，战云不祥地向着阿塔勒克哈孜的头上移动，按照所有的观察者看来，它好象要毁灭性地猛烈爆发在他虔诚的脑袋上。主张只有英国的干预才能拯救他的叫嚷声很高，然而十分明显，英国的政策将是见机行事。英国驻印总督肯定没有建议积极参与这个问题。旨在划定一个中立区的格兰维尔—戈尔察科夫谈判的失败也使英国相信，签订条约的办法不能解决这两个国家之间的问题。但即使喀什噶尔落入俄国手中，我们的利益所受的损害会不会大到使我们应该采取极端
208 手段，这一点也不清楚。这样俄国进军的道路就铺平了。考夫曼将军和斯科别列夫将军进行了一切准备，要使这次打击既猛烈又是决定性的。总共出动了不少于二万人的俄国军队直指阿古柏伯克，现在他试图向他的邻居作一些让步已为时太晚了。他所能招募的军队都结集在喀什噶尔附近，另一支由他的儿子率领的军队驻扎

在阿克苏。但关于结果的看法是不可能有两种意见的。当这个将受打击的对象只有几个星期缓刑期的时候，发生了把俄国人的思想全部转移到另一个渠道的事件。阿古柏伯克由于在浩罕所爆发的骚乱得救了。尽管俄国人从未承认这些骚乱严重到妨碍他们向喀什噶尔进军计划的程度，然而派遣到边境的军队还是逐渐地调了回来，那些受命开往纳伦的，也被留在塔什干和霍占这两个主要受威胁的城市。尽管这件事并不是喀什噶尔历史的一部分，但对那个国家却起了非常有益的作用，确可以说它拯救了那个国家。在这里对这件事作些简短的叙述也许不是不受欢迎的吧。

呼达雅尔汗在他的仇敌、大臣阿里姆·库里在1865年死去以后，部分由于他自己党羽的努力，部分由于俄国人的帮助，又恢复了他对浩罕的所有权。从那年起至1875年，他在事实上以及在法律上都是浩罕的汗。虽然在那十年当中有几次他被卷入了与俄国人和与他自己臣民的纠纷之中，他仍然在浩罕的西部保持着名义上的独立，并以浩罕城为首都。但由于某种原因，这个汗一直不得人心。就我们所知道关于他的事情而言，他并不比他的邻人更坏；但国内有一派人指责他是俄国的工具，而另一派则受那个国家的政府所雇用的代理人的唆使，宣称他正在使他的国家逐渐地走向 209 同那个强国进行毫无希望的斗争。在他的整个国家里遍布着对他的统治的不满。由于在吉尔吉斯人中间发生了骚乱，他的臣民们就急急地抓住这次骚乱所提供的机会起来颠覆他的政权。一开始这个运动在俄国人看来并不具有什么重要性，它被认为只是通常发生的不足为奇的改朝换代的争吵之一。造反的一派还把汗的长子纳斯鲁丁拥上了宝座，他是一个被认为对俄国友好的青年，不大可能成为一个怎样可怕的人物，因为他已养成了一种沈缅于“伏特加”酒的恶习。但在这个表面的统治者背后，还另有些人希望做一个比象浩罕这样小国的国王拥立者更为显赫的人物。这些人中首

要的就是呼达雅尔的姻亲，主要的军政长官阿布都拉赫曼·阿弗托拔查。这个首领是呼达雅尔早年的乞卜察克大臣穆斯林·库里的儿子。这些同盟者由于不相信俄国会保持中立，或者由于爱国心所驱使，想解放浩罕的受奴役部分，对考夫曼将军发出了宣战书。边境地区奋起响应，塔什干和霍占之间的交通被切断，俄国占领区一时情况大乱。浩罕军队踌躇不决，没有作任何严重的进击，而把时间浪费在山区进行无益的劫掠上。如果对塔什干或者即使对霍占采取一次迅速行动，这次起义也许就成功了。布哈拉在重要关头可能加入，阿古柏伯克的战斗精神也可能从昏睡中苏醒过来。然而这种事情并没有出现，俄国人的恐惧逐渐消失了。斯科别列夫上校率领他的哥萨克骑兵在全境进行了搜索；霍占和塔什干的电报交通恢复了；叛军在全境很快被肃清。跟着呼达雅尔逃跑的逃亡者被送到后方，而迅速调来了援军参加对浩罕采取的必要攻势。这里只需提到这一点就够了：在马克拉姆战役和其它几个小战斗中战败以后，纳斯鲁丁和阿弗托拔查一派就求和了。求和被接受，但浩罕却成了俄国的费尔干纳省。斯科别列夫上校晋升为陆军少将，并由于马克拉姆一役而获得圣乔治十字勋章。这件事一般称为 1875 年浩罕人对俄国的反抗，它标志着一个重要时代，它使得浩罕人和其他亚洲人相信，任何想获得自由的图谋，如果不是协调一致和有组织的行动，都会是毫无结果的。那次图谋失败了，以后也没有新的图谋，但那次图谋本应该得到更大的成功的。

俄国之所以能够很容易地进行对亚洲的征服，主要是靠不幸存在于受它侵害者之间的倾轧不和，看来它想要保持住这种征服也将主要依赖这个盟友。没有比浩罕最后这次战争的历史更足以清楚地证明这一点了。但当我们试图分摊对这种倾轧不和应负的罪责时，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主要应由阿古柏伯克负责。他比起任何

其他亚洲统治者来，他取得了他的宗教和秩序的总保护人的头衔，以反对俄国的征伐；由于他对那个国家的大胆反抗态度，他比任何其他他人更支持这样一种信念，即只要中亚国家结成一个联盟，就仍旧有应付危局的希望；他似乎比任何其他他人更能证明这种愿望是正确的；当他在最有利的时刻放过机会不加利用时，他就比任何其他他人更应受责备了。何况在浩罕爆发这次起义时，他已经作好了 211 保卫自己反抗俄国的一切准备。他看到俄国人由于他们的处境需要，不得不把他们的军队调到别处去，而他竟然没有为保卫他所一直宣称对他最神圣的利益而发动一击。在这样一个重要时刻，他竟这样地无动于中，这是无法解释的。他拒绝参加阿弗托拔查一边进行干预，这对于他的如果改正这一缺点就是十分显赫的名声上必然留下一个最大的污点。那次反叛失败以后，俄国人接着占领了费尔干纳，他们的注意力似乎就越来越多地集中于乌浒河上和喀布尔的事态而不是喀什噶尔的祸福了。浩罕被吞并和中国人出现于天山北面的几个月期间，阿古柏伯克对俄国采取了一种比较和解的政策，很可能在一个短时期内降到一个仅比呼达雅尔或穆扎夫尔丁稍重要一点的地位上。但在这期间发生了别的事情，使问题起了完全不同的变化，这是在以后的有一章里将要讨论的。我们以钦佩的心情结束他和俄国关系的叙述，这种关系如果不是出现了他在 1875 年所表现的弱点，就将是完美无缺的。他大胆蔑视和一贯反对俄国妄图在东土耳其斯坦称霸而赢得了我们对他的尊敬和赞许。即使那次动摇也不能把所有这些值得我们尊敬的事迹一笔勾销。

第十一章 阿古柏伯克和英国的关系

在描述阿古柏伯克统治时期存在于英国和喀什噶尔之间的关系时，将没有必要象我们在前一章详细叙述俄国和喀什噶尔之间的对立那样，对那些支配着那些关系的潜流，作非常详尽的叙述。英国因为阿塔勒克哈孜对我们作了商业上的让步取悦于我们，所以能够向他伸出友谊之手，但俄国却加倍地生气了，因为这个人长时期拒绝给予俄国以同样的地位，而且在一个短时期内，还由于他自以为在英国的保护下已安全无虑，进一步发展了这种挑衅态度。我国政府，从这位统治者的大胆行为中不能不看出，一旦中亚发生战事，一种错误地认为它将会怎样行动的想法可能产生怎样的后果，因此它会竭力使阿古柏和他的使者们清楚地知道，我们对越过喀拉昆仑山那边的事决定不加干预。现在回顾起以前络绎不绝的旅客们从东土耳其斯坦所带给我们的那些传说，说那里发生了一些怪事，中国人被赶走了，从浩罕来的一个新王登上宝座了，再按照自从沙敖先生发表了《高地鞑靼》那部有趣的著作以来我们所大大扩展了的见闻来看待他们，再回顾一下我们最初怎样知道阿古柏的名字，在七、八年的时间内，英国人怎样环绕他的名字编造出一个传奇式的故事，把“六城地区”说成为一个土地肥沃、人口众多的地区，它可以作为阻挡俄国人前进的一个障碍，好象是另一个喀布尔，可作为从印度斯坦山脉延伸到中国人的天山山脉的另一个“缓冲地带”，那就不是没有意义的了。那些美梦现在都消逝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个非常具体的、实际存在的中国人胜利的景象。

无论谁有机会在喜马拉雅山谷居住过——沙敖先生是个权威——就一定会产生一个希望知道山那边地方情况的愿望。这种愿望是很自然的，但自然界的阻力却是非常巨大。从沃伦·黑斯廷斯^①时代起，进入西藏就曾经是无数英国人的目的，但这一目的只有三个英国人达到，而最后一个是在距今六十六年以前。从尼泊尔、锡金和不丹到西藏有四、五十条可通行程度不等的山路，就在我们边界的那一边居住着一个具有高度文明和热爱和平的民族，我们关于他们知道得很少，这就成为激励探险者的一个目标。然而，沃伦·黑斯廷斯和托马斯·曼宁^②的想法却一直沒有实现过。

在喀拉昆仑北边并没有类似的吸引人之处。五十年前住在拉达克的穆尔克罗夫特先生，似乎并没有表现过任何想穿过北方铁障的愿望，然而他却难以抗拒地着迷似地向往着卢杜克和西藏。米歇尔兄弟关于小布哈拉或东土耳其斯坦的特点的描述，说明了一个事实，长期以来吓退了一切旅行者到该地区探险的企图。他们说：“小布哈拉是一个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的性命拿在手中的地方，旅行者一个接一个被在那个地区旅行的艰苦和危险所吓退，毋庸置疑都是可以谅解的。”但尽管没有英国人闯过喀拉昆仑山和昆仑山的那些令人头昏目眩的山隘，却不时地有人从桑株、和田及其附近来到拉达克，他们带来了有关在那个地区更北边所发生的政 214
治事件的情报。他们的情报常常是纯粹虚构的、总是含糊和夸大的，但不管怎样，它总告诉了我们，东土耳其斯坦当时的情况，是和平或是战争，满意或不满意。一般地说，大家都知道中国是那个广阔地区的名义上的统治者，但中国在那个地区所保持的确切关系，它怎样征服那个地方，它维持它的征服的时间和方式，所有

① 沃伦·黑斯廷斯(1732—1818)，英帝国的第一任印度总督。——译者

② 托马斯·曼宁(1772—1840)，英帝国主义分子，曾以旅行家、医生身份旅行印度、中国，是潜入西藏，到达拉萨(1811年12月)的第一个英国人。——译者

这一切都没有弄清楚。的确,这种无知的状况有过一次突破,那就是那位博学的旅行者阿道夫·施拉根瓦特于1857年带着几个当地随从进入喀什噶尔。最初的困难被成功地克服了,一开始,好象命运之神有意要向他的冒险事业发出微笑。然而,施拉根瓦特先生是在一个特别不适当的时候到达的。和卓倭里汗刚刚侵入喀什噶尔,当这位旅行者走近叶尔羌的时候,他的军队已向南扩展到叶尔羌。施拉根瓦特似乎已亲自向克什米尔驻叶尔羌的代表报告他的到达,后者随即向中国办事大臣联系,请求准许他进城;但当他还逗留在城墙外边的时候,就被倭里汗的一支巡回部队抓去了。他立刻被急忙带到倭里汗驻喀什噶尔的总部,在那里,这个暴君,由于过度服用大麻制剂,一阵狂怒之下,吩咐把他处死。他的随从逃跑了,把他被杀的消息带回拉达克。

这就是喀什噶尔的第一个探险者的不幸遭遇。1868年初夏,人们普遍地都知道中国人被赶出喀什噶尔,阿古柏伯克以布哈拉爱弥尔所封的“阿塔勒克哈孜”称号统治着那个地方。那一年,他打发了一个半官方性质的使者,穆罕默德·那扎尔来到旁遮普,好象要了解一下我们的领地情况。沙敖先生在拉达克已听到最近在东
215 土耳其斯坦所发生的变化,当这位使者回去的时候,他就向他提出,他有意访问喀什噶尔,并看一看这位名闻遐迩的阿塔勒克哈孜。使者对这个提议表示了热烈赞同,但认为慎重起见,最好等候这位统治者本人正式同意。在克服了他的任务所面临的各种困难之后,沙敖先生于1868年12月果断地进入这位阿塔勒克哈孜的领域,他是进入小布哈拉的第一个英国人。他受到特别热忱的接待,官员们做了他们所能够做到的一切,使他在这个国家居留感到愉快。浩罕人的所有达官显贵都一个一个地象对待朋友和兄弟一样接待了他。连这个国家的第二号人物,叶尔羌的长官穆罕默德·云努斯,也非常热情地款待了他。应该记住,沙敖先生到那里去并

沒有任何官方身分,而仅仅是作为一个英国旅行者。当然,对喀什噶尔的统治者来说,殷勤地迎接他,并借以证明他们已完全平定了东土耳其斯坦,这是最好的政策;但在指出沙敖先生所受到的殷勤款待时提到这种潜在的政治动机,并不能减损它的价值。阿古柏伯克在喀什噶尔特别接见了这个英国旅客,并以最热诚的态度对待他。当沙敖先生把从印度带来的象来福枪之类少数几件礼物呈送给他时,这位统治者笑着说道:“在你我之间何需这样地送礼呢?我们已经是朋友了,你的安全到达已经使我十分满意了。”沙敖先生旅居喀什噶尔一共三个月,在这期间他受到了这位阿塔勒克哈孜的三次接见,一次比一次更为友好。总之,沙敖先生所受到的待遇是很好的,而在所有论述喀什噶尔的作者中,他对那里的人民和地方情况的描述是最为生动的。沙敖先生的地位由于另一个英国 216 人,即受人哀悼的海沃德先生的来到而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害。海沃德在三、四年之后,在克什米尔的吉尔吉特堡垒附近,在带有几分神秘的情况下被谋杀了。这两个旅行者有一个时期都在喀什噶尔受到一种软禁,但一切都顺利结束,东土耳其斯坦的头两个英国探险者都完全安全地回到了拉达克。沙敖先生有趣的旅行的结果,一直到 1871 年才在英国公布,当时他已参加了道格拉斯·弗赛斯先生(现称爵士)的第一个使团,第二次前往喀什噶尔并回来。这一次访问叶尔羌和喀什噶尔的结果几乎具有磁石般的吸引力。不仅印度政府很快地考虑了我国和这位阿塔勒克哈孜应有怎样的政治关系的问题,而且整个英印社会都留神倾听了关于这个新国家的故事。一条新的通商道路开辟了,而且,归根到底,东土耳其斯坦还可能成为通向布哈拉和固尔扎市场的真正门路。和我们比较贴近的有和田之玉的交易应予恢复,单是自古以来就闻名的鞑靼羊毛就应该构成一宗主要商品。叶尔羌和喀什噶尔人烟稠密地区对于曼彻斯特的商品和印度的货物来说也是有很诱人的前途的,

这些地方的人口最初被认为比它们实际所拥有的更为稠密。一开始，主要意见很可能是单纯考虑满足商业上的需要；后来，由于浩罕和固尔扎的情况的发展，在英国人的心目中，政治动机就显得更为突出了。一个贸易公司在构想中形成了，但其开始活动则是在
217 几年以后，在弗赛斯条约签订以后；关于这个条约，以及该公司活动方式的正式规定，读者可参看本书的附录。

沙敖先生本人对于印度和喀什噶尔之间贸易的前途作了非常乐观的估计，并从其在列城的有利职位，以其一贯的积极性，参与了增进叶尔羌贸易公司财富的活动。尽管比较乐观的期望从来没有实现过，公司本身却是成功的，并且在不大容易的情况下，完成了一项很有益的工作。它的业务，现在是随着一个国家的统治权更换后所常有的不安定状态而中止了，要看中国人方面，或者我国方面，会采取些什么步骤，把在阿古柏时期开始发生的好感，在中国人的统治下继续维持下去。许多人对于和中国人睦邻相处以及进行交往的可能性，是抱着怀疑态度的；因为在沿着中英边界的整个地区内的任何地方，这种交往都肯定并不存在。但这些人不大肯承认，在这方面，应受责难的是中国人，如果我们有所忽视的话，因为俄国由于订立了几个条约，并由于他们在外交上的圆通手腕，在中华帝国北部的每一个市场，从库伦到乌鲁木齐、玛纳斯、楚呼楚、固尔扎和喀什噶尔，都有一种商业上的地位。如果中国人在他们旧有的每一块属地上都恢复了所有权，俄国仍将在所有那些边远的属地上有一个合法地位。无论如何，英国商业对于从印度和克什米尔方面去开发中国内地的成功不应绝望。在大多数情况下，政治行动一般地都是跟在商业冒险事业之后的，但在我们和中国人的交往中，次序是颠倒过来了，政治性的建议和外交上的安排必须为贸易扫清道路，这种贸易必然不仅在印度斯坦与鞑靼地区和西藏之间，而且在印度斯坦与中国本部省分云南和四川之间兴起。毫

无疑，困难的根源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满族在许多方面和中国 218 群众有所区别，就和十二世纪时诺尔曼人在英国的情形一样。满洲官吏认为，以某种不确定的方式把欧洲的科学和文化介绍到中国，将会倾向于降低他们的影响和政治权力。但是，如果我们是明智的，我们就应不理睬这种意见，而是力求通过他们的合法当权者，即两个半世纪以前胜利的鞑靼族，来接触到一般人民，而不是象有些人所建议的那样，通过在人民中间进行宣传战来试图影响他们的统治者。

沙敖先生回到列城以后几个月，这位阿塔勒克哈孜，无疑在认真考虑了那位先生关于在拉合尔派驻一位代表的建议以后，就打发了一个使节到印度来，为的是表达他想和英国政府建立友好关系，发展两国间贸易，并要求派一个英国官员去访问他的首都的愿望。这时他已经充分体会到沙敖先生所说他不是以正式资格来访的那句话的意义是什么了。因此，如果他想要从向英国表示友好的态度中得到酬赏，或者能够利用和英国联盟以抵抗俄国的仇视，他发现他必须采取主动。由于这一发现，伊赫拉尔·汗就来到了印度，并受到了我国政府的很友好接待。正是为了回报伊赫拉尔·汗的访问，弗赛斯先生才在次年作为我国的第一个使节被派前往喀什噶尔。

弗赛斯先生由自告奋勇的沙敖先生和亨德森博士陪同，沿着沙敖先生走过的同一条路线，到达叶尔羌，并没有遇到什么大的不便之处。但是这个使团是在一个非常不适当的时刻到达工作场所的。阿塔勒克哈孜恰巧前赴最东的边境去镇压东干族城市吐鲁番 219 和乌鲁木齐的叛乱，他在那边会耽搁多久又是很不确定的。因此，弗赛斯先生没有得到机会解决印度和喀什噶尔之间的未来关系问题，就在9月离开叶尔羌回去了。亨德森博士在他的《拉合尔到叶尔羌》一书里按时间先后记载了这次到喜马拉雅山以北地区旅

行中所发生的事件。

就在次年，即 1871 年，阿古柏伯克又一次打发伊赫拉尔·汗到印度来，重申他的友好主张，不仅托他给总督带来了信，而且也给女王陛下带来了信。但这一建议并没有产生直接的结果。

在这期间，俄国更坚决地在东土耳其斯坦进行了工作。俄国和它的邻居之间讨论了好几年的商约，终于在 1872 年 6 月 8 日在喀什噶尔签字。这个条约让给俄国不少的贸易特权，因为，正如从研究条款中可以看出的那样，对于进入该地的俄国货物，不能征收多于百分之二点五的从价税。事实上，如果不是由于阿古柏伯克的小心谨慎，把在各城市指派俄国商务代理人一事只限于设置与商头大不相同的次等人物商队头目，那么那个条约就会实际上把喀什噶尔变成考夫曼将军的所有物了。就按当时的实际情况来说，被认为是仇敌的俄国已经把被看作是朋友的英国远远地抛在后边；在那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那里没有地位的英国商业，对于要求获准进入这位阿塔勒克哈孜的领域一事，一直抱着一种犹豫不决的态度。

但考尔巴尔斯男爵的条约在实质上是一个骗人的东西，因为两国之间并未发生好感；如所预料的，双方既互不信任，贸易也就没有起色。这个条约签订之后两个月，阿古柏伯克打发他的外甥赛义德·阿古柏·汗作为特使前往俄国，从那里他又到了君士坦丁堡，途经印度回国。当时，他和我国当局进行了几次长时间的讨论，商讨有关如何把喀什噶尔和我国之间的一切事情置于一个友好的基础之上的措施。土耳其苏丹赠予这位喀什噶尔的统治者以伊斯兰虔诚的爱弥尔的崇高称号，以后不久，阿古柏伯克就自称阿古柏·汗，宣布为喀什噶尔的爱弥尔。在这里不妨谈一谈汗和伯克这两个称号。在本书中一贯地把喀什噶尔的统治者称为伯克（意为王公）而不称为汗（意为君主）；这有下面几个理由。汗的

称号比伯克的称号高贵得多；而且是世袭的。吉本^①在中亚问题方面的权威地位是高于许多近代学者所愿承认的，他给汗下定义为成吉思汗后裔的特殊标志。成吉思汗的继承人和他们的子孙成了西亚的诸汗。和土耳其人和乌兹别克人融合起来的蒙古人，带有群众公认的众汗之汗成吉思汗家族的独特权威。尽管晚年的阿古柏伯克，或是仰慕他的人们，为他编造了一个追溯到帖木儿的家系，从而使他成了一个蒙古人的后裔，但这种神秘的家系很可能没有任何可靠的根据，我们也不能承认任何其他主张，把那种在历史的评判面前站不住的过高称号给予阿古柏伯克。历来那些“庶族出身”的统治者，常有一种强烈的愿望萦绕心头，即非常希望他们自己能够攀附古代帝王的高贵地位，阿古柏伯克也不免于有这种心理；而在土耳其斯坦，昙花一现的王权的具体表现就是这个曾经如此被滥用的汗的称号。

按严格意义来讲，把汗的称号加在阿古柏伯克身上是错误的，尽管毫无疑问他在位的最后三年曾经用过这个称号；但即使作为 221 权宜之计来说，也是容易引起误会的。在亚洲的政治舞台上还有一个阿古柏汗，这是一个按家系来讲应有汗的称号的人，而且他所具有的能力也不低于他的在东土耳其斯坦的这个同名者。常常由于把这两个人物混淆起来而造成了混乱，但如果对这两个人物都各以其合法称号而加以区别，就不至引起误会了。1873年接近年终的时候，赛义德·阿古柏·汗（按家系说他可以有汗的称号，这个称号是他的舅父所没有的），回到了印度，在那里他发现，英国使团已在前几天起程前往喀什噶尔。

这时，印度政府再度指派道格拉斯·弗赛斯先生作为他们的使者前往喀什噶尔，1873年夏天，旨在抵销考尔巴尔斯男爵条约

^① 吉本(Gibbon, 1737—1794)，英国史学家，《罗马帝国衰亡史》的作者。——译者

的不利后果的这个重要使团，就已在积极准备中了。由于这是英国—喀什噶尔关系中的一个转折点，有必要对它作较详细的叙述。在过去四年中，我们在东土耳其斯坦的政策以及和它的交往的全部结构，都依赖于弗赛斯先生的使团。的确，若不是弗赛斯爵士的报告和条约，就连沙敖先生的饶有兴趣的著作和勇敢的旅行，也将不能使我们对于喀什噶尔及其统治者保持持久的兴趣。

到了7月，一切都已准备就绪等待出发，但由于赛义德·阿古柏·汗，或者象他更通常地被称呼的那样，哈吉·妥拉的到来有了耽搁，弗赛斯先生仍然滞留在茂莱。在这期间，比达尔夫上尉和特罗特上尉以及斯托力茨卡博士都动身前往列城去探查那个城市和沙希都拉之间的道路。尽管这个地方已经被沙敖先生、海沃德先生和凯利博士描述过，²²² 这三位先生还是对于拉达克以北的地方作了很仔细的探查。弗赛斯先生和总部人员，在克什米尔的斯利那加城作了短暂的逗留之后，于9月20日到达了列城。在这里把那些参加这次使团人员的姓名列举出来可能是有用的。首先是这位使者本人，道格拉斯·弗赛斯先生，现称爵士，原巴斯勋位而现在则是印度宝星章爵士团上级爵士。他的第二位指挥人员是T. E. 戈登中校，印度宝星章爵士团初级爵士，他在这个使团的主要目的达成以后，对帕米尔的很大的一部分作了探查，考查结果记载在他写的《世界屋脊》那部著作中。其次是贝柳医生，印度宝星章爵士团初级爵士，少校军医，负责管理这个远征队的医疗事务。三个军人，查普曼上尉、特罗特上尉和比达尔夫上尉，担任各种不同任务；第一个人是秘书，后两个人担任科学职务。除了这些人员以外还有博学的斯托力茨卡博士，后来由于空气稀薄而死去；一个高地兵团的英国下士，以及六个当地军官和熟练助手。还有由印度边境警备团提供的十名印度骑兵、一个印度兵班长和十个印度兵组成的护送队。

这个使团的装备也是非常细心精选的，而且特别考虑到它所面临的各种自然障碍，和必须完全倚靠当地人运输大批行李所会有的不方便情况。于是由一个商人兼任使团司库的塔拉·辛格在印度购买了良种骡子一百头。还给它们配备了在坎普尔市的政府工厂制造的特殊型式的鞍具。所以，总起来说，这个前往喀什噶尔的英国使团规模非常庞大，从人数来说，它具有一支小型军队的规模；营帐里有“三百个人员和四百头牲口”。英国旅行者怕同时成群结队地进入喀什噶尔会引起当地居民恐惧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弗赛斯先生带着他的君主和总督所授与的全权，前来和喀什噶尔的统治者谈判订立一个友好条约，当地人民大都从这个事实里看到了他们的自由和独立得到维护的保证。 223

到沙希都拉以前，旅行是在大家很熟悉的地区进行的，也是在阿古柏伯克的疆界之外。在那个地方，遇到了这位统治者的权力的第一个标志，情形象五年以前，沙敖先生看到的这位阿塔勒克哈孜权力的南方前沿一样。喀什噶尔军队的一位首领，尤孜巴希·穆罕默德·扎里夫·汗奉派到边界来迎接我国使者并给予他以热诚的欢迎。经过了四天的休息以后，整个远征队，分成两个队伍，越过格里姆山口，即桑株达坂前进，进入了桑株的住人地区。在这里，从印度紧追他们来的哈吉·妥拉追上了他们，他以灵活手段和对于英国的真实的友谊，为这个使团的完全成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越过格里姆山口尽管是成功了，但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贝柳医生在他的《克什米尔与喀什噶尔》一书中，对它作了如下的生动叙述，我们特加引录，以便说明无论是一个军队或是一个商队，在这一带行进所会遇到的某些“自然障碍”。

“突然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景象是不容易描述的，更是不容易忘却的。紧靠着左右两边，耸立着银灰色板岩的光秃秃的陡坡，就象城门的入口处一样，它们缓和地向两边伸展开去，变成斜坡倾斜到

一起,形成了一个以他们为界的舞台面。就紧接在面前,从粘板岩碎片的石块上方开始徐缓地隆起的高坡——在蕴含丰富的云母的明亮闪光中看不出它的本来颜色是暗黑的——立刻投入我们的视野。这里,在高坡脚下,跨前一步就使我们把光秃秃的岩石的令人厌倦的单调晦暗色彩抛在后面,而在眼前呈现了晶莹夺目、洁白无瑕、覆盖一切的积雪。它整整齐齐地向左右两面极目之处的山脉顶峰延伸开去;在前面,它就象一座巨大的墙壁耸立着,顶端以一连串尖峰划破了天空,显出罕见的明晰轮廓。顶上是广漠无垠的天空,一片浓厚不可测、毫无杂色的纯蓝,象暴风雨来临前那样宁静,多么美妙的景色啊!”

这就是一个目睹者对于这种惊人景色的描述。这种景色就其庄严而论,已近乎崇高,就其宏伟而论,则几乎令人生畏。斜坡的最下面一百尺是一道峻峭的冰墙,就象马特霍恩峰^①一样,骑兵的马匹和驮运行李的骡子和乘马都必须用人力抬起才能上去。单单克服这一障碍就花了整整一天多的时间,但以小小地损失了八头骡子和四匹乘马才把它克服了。翻越过格里姆山口,自然界的险阻就不见了,自此以后,这个使团就在喀什噶里亚的比较有树荫遮蔽的平原上行进了。

过了桑株以后,走了几天的路程,那一带地方土地贫瘠、五谷不生,只是有一些较为肥沃的小块土地,由于努力耕种,才稍微减轻了荒芜的面貌;这一事实,既说明了统治者的恩惠,也同样说明了他的人民的勤奋。我们有充足理由相信,在叶尔羌和和田地区,阿古柏伯克的施政最为成功。这也许是由于这里人民的品质比东干族和更往东去的地区的混杂居民较为优良的原故;但这也一定是由于在这一带地方,没有那种破坏性战争,象在东干族居住的地方那样,在1874年以前隔不了多久就发生一次。阿古柏伯克杀

^① 马特霍恩峰是阿尔卑斯山的一个高峰,在意大利和瑞士边境。——译者

害和田的哈毕吐拉汗的背信行为曾经引起人们对于他的诚实发生怀疑，这种怀疑在他当权的日子只不过是在潜伏着罢了；但和田、桑株、哈尔哈里克和克里雅的人民是非常勤俭而且精明的，他们不会懒洋洋地坐着冥想他们所受到的损害。他们既没有忘记也没有饶恕，但他们抑制住了反对这个新统治者的任何煽动性意见。

弗赛斯先生到达的第二个城市，哈尔哈里克，显示了更多的繁荣与文明的迹象。“一个饭馆，和它的干净的桌子、长凳、成叠的磁碟和磁碗，立刻使我们回想起在海洋彼岸的许多法国乡村饭馆的情况。”为了招待从英国来的代表，各方面都作了特殊的安排，弗赛斯先生表示很惊讶，因为在特别安排做他宿舍的地方，他发现和我们自己那样的壁炉、气窗、和自古以来就以制造地毯这类产品闻名的和田来的华美地毯。在每一个停留的地方都作了类似的准备，人民，不亚于他们的君主，也作了最大的努力，要尽可能地使这些外国人在逗留期间感到愉快。不仅如此，甚至在每天行进中的歇息处，头人或当地大人物，也都毫无例外地用“达斯他关”款待他们，这也就是说，用茶点款待他们。“达斯他关”本来是桌布的意思，是由各种不同的食品组成的，有时甚至有一百种之多，每一种由一个侍者端着。这是一种当地普遍照式实行的民族习惯。客人有责任首先把面包切开，然后递给他主人。他们有一种风俗，对于刚从有各种麻烦的种姓等级制度印度出来的人，特别令人感到清新。“不管主人是土耳其人或英国人，他和他的客人们都同样地 226 从一个碟子里吃东西，并且把食物分给周围的侍者们吃，而后者也不会由于有等级上的顾虑，妨碍他们尽情饱餐一顿。”

使团现在快到叶尔羌了，无论从政治上或商业上说，叶尔羌都是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城市，因此，就为他们正式入城作了安排。在一个叫做兹尔察克的村庄，一个侍从官，在那里叫作雅撒瓦尔一巴士，带着一队王室卫士，即阿古柏伯克亲信的骑兵，穿着黄色皮军

服,出来充当护卫,这队人马还由于沿途前来给新来的客人们以优先欢迎的许多有势力的公民和商人而声势更为壮大。由于有了这些人的加入,相当壮观的一大队人马,就来到叶尔羌城外。为英国人安排的住所是在城北边的一个堡垒,因此,在到达他们的休息地之前必须骑马穿过叶尔羌。那些拥上来看热闹的人似乎也都很友好,总而言之,相互间的第一次印象有一切理由使人感到满意,而不是象有些人认为的是很不愉快的。

第二天举行了和叶尔羌的长官,穆罕默德·云努斯·詹会见的隆重仪式,关于这个人的历史,读者可参看本书第九章。接着客人们就被准许随便到他们想去的任何地方去。弗赛斯先生前次访问时则并未给予他同样的自由。他们在街上一出现,引起了好奇的人们很大的骚动,但这也是友好善意的。他们依次参观了所有的主要街道和市集,例如屠宰街或市场,在那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各种不同的肉类,这些肉的质量可以从完整地留下来的头和尾来加以鉴别。看来叶尔羌的习尚是,采购生活必需品是在早晨,而选购
227 奢侈品则在晚间。有一个叫做沙姆^①的专门夜市,在这里从下午起就陈列着准备出卖的帽子和其他衣着,还有各种旁的物品。如果点起灯笼来,这必然会呈现出一幅动人的景象,和我国的乡村集市很相似。弗赛斯爵士没有告诉我们在阿古柏伯克统治时期在这个集市上是否有燃点豪华的中国彩灯的习惯,也许,我们对于这种情景的想象只适用于以前的统治时代。

这种和谐关系也并不限于普通平民和我们的人之间。他们的统治者作出了大家都争相模仿的榜样。使团的官员们对于这位长官产生了一种热情,高出于通常客人对主人的敬重之情,这也得到了热诚的回报;与此同时,哈吉·妥拉则运用他的巧妙手腕和无尽才略消除了一切困难。他在使团滞留叶尔羌的整整三个星期的

① 意为晚上。——译者

时间中并没有一直留在那里，而是往首都去了，为的是让这位爱弥尔了解英国的事情以及我国当局对于他的国家所怀抱的确切目的。

穆罕默德·云努斯把相当多的当地车辆拨归使团使用，这提供了很大的方便。这些车辆构造得很坚固，有两个六呎直径的轮子，根据情况，用四匹或六匹小马拉着。它们所载的重量不得超过一千一百二十磅，载着这样的重量，通常每天可走二十到二十五哩。较重的行李就是装在这类车辆里从叶尔羌运往喀什噶尔的，使团人员和较轻的装备，则在几天以后随后前往。当提到这些比印度的运输工具远为优良的车辆时，我们应指明它们也是作为公共马车和驿站马车使用的。它们经常往来于堡垒和喀什噶尔城之间，其距离为五哩，也用作驿站马车，行驶于叶尔羌到喀什噶尔之间，全程共分五站。但任何商号按规章条例都不能垄断这种交通事业，当地法律已经规定了一种不得违反的运费表。 228

11月28日使团从叶尔羌出发，长官下令，高级官员要陪行一段路程以表示欢送。从叶尔羌到英吉沙一带地方都呈现着同样繁荣的景象，但荒地也不少。科克拉巴特村和阿克拉巴特村（这两个名字的意思分别是蓝色的和白色的兵营）都是一派兴旺气象，而阿古柏军队的出现（仍旧是骑兵）则更给整个阵容增添了秩序和紧凑的气氛。这种军队在操场上是严肃认真的，但他们也同样善于充当侍者、木匠等各式各样的角色。英吉沙，由于近边有阿古柏伯克构筑的强大堡垒，因而外貌就显得更为雄壮，但其本身，由于房子都有泥墙围起来而且墙顶上还开有枪眼，倒很象是一个防御工事。在这里逗留的时间很短，使团就开始他们的最后一段路程。1873年12月4日是第一次看到一个英国使者进入这个首都的重要日子，这个首都是沙敖先生在四年前以非官方身分访问过的。在离堡垒不远的地方为使者安排了住处，王室宫廷也就在那个堡垒里；

这些宾馆如果说不是很华丽，也是够舒服了。曾经两次作为使者到过印度的伊赫拉尔·汗·妥拉第一个来拜访刚到的客人，同时他也是来请他们马上去见阿塔勒克哈孜的。下面就是弗赛斯爵士本人关于他第一次会见爱弥尔的描述：

229 “按照礼节，我们在离大门约四十步的地方下马，缓慢地向前走，伊赫拉尔·汗，雅撒瓦尔—巴士即侍从长官，手执白杖，走在前面。在外边的一个门廊里，有一些士兵坐在一个台阶上，枪放在面前地上，盘着双手，目光注视着地面。接着我们斜穿过一个空的庭院，走过第二道布满士兵的门廊，又穿过一个院子，穿着华丽服装的士兵坐在这个院子的四边。我们从这个院子进入内庭，这是一个很小的院子，里头一个人也看不到，一片死一样的沉寂。在这个院子的那一头有一个长的大厅，有几扇玻璃门。伊赫拉尔·汗整肃步伐，带领我们成单行走到大厅旁的一个台阶；于是，他差不多蹑手蹑脚的走进去，看了一下，回转身来，用手招呼我一个人前进。当我快进门口的时候，他打手势叫我进去，他自己则立即退出。我发现自己正站在一个样子很普通的房间的门口，没有任何装饰，地上铺的也不是很好的地毯；正在张望的时候我看到从对面一道门外走进一个穿着普通服装的个子高大的人。他向我招手，于是我就往前走，以为这一定是一个要把我引到‘御前’的侍从。然而，当我往前走的时候我却本能地鞠了一躬，很快我发现自己被两只手握住，受到了通常的客气的欢迎，我就知道自己是站在名闻遐迩的东土耳其斯坦的统治者面前了。在几句欢迎词之后，阿塔勒克哈孜带我走到房间的另一端，让我在窗前他的旁边坐下。这时鸣放了十五响礼炮。殿下以恳切的语调问候女王陛下和总督的健康，然后就低声叫伊赫拉尔·汗把其他官员引进来。他们鱼贯而入，他与每一个人都握了手，并让他们在我旁边坐下，然后就是一个长时间的而且有几分令人难受的沉默，这时，这位阿塔勒克哈孜凝神

细看了我们每一个人。我已听说第一次会见的时候客人多说话是 230
不合礼貌的，而完全安静地坐着并把眼睛往下看才是有礼貌的。
……这阵静默考验以后过了一会，在阿塔勒克哈孜示意下，十六个
士兵端着‘达斯他关’进来，阿塔勒克哈孜掰了一块面包和我们大
家分享。等到桌布撤去以后，我们想起了关于礼节的教导，就都站
起身来，一面抚摸着我们的胡须，一面说‘阿拉，噶，阿克巴’；接着
阿塔勒克哈孜立刻就说，‘库希，阿玛第德’（‘你是受欢迎的！’）。①”

这次印象深刻的接见就这样结束了，所以说它印象深刻，并不是
因为这个宫廷，或者这个统治者本人有任何豪华壮丽之处，而是
因为爱弥尔本人的神秘性格，他的令人捉摸不定的权力和威势，以
及他对于那些构成他的宫廷和卫队的臣民的控制。他的所有的浩
罕朋友和亲属（他们的得势走运全仗着他的权力）都是坚定地忠实
于他的。至于在这个表面之下，还存在着互相倾轧的分子，一旦外
敌当前，就足以无可挽救地推翻他的统治，这类事情，那就不是使
者们所能完全预见的了。对观察者来说，阿古柏伯克和他的武装
随从的外貌就是潜在力量的最高证明。秩序是至高无上的，无论
是在爱弥尔的宫廷里，或是在他的堡垒的兵营里，都可以看到鲜明
的纪律。

正式接见在 12 月 11 日举行，那一天我国政府赠送给爱弥尔
的礼物，由一百多人抬着，呈交殿下。有包括两门小炮的各种枪
支、花瓶，等等，等等；但这位统治者最感高兴的友谊象征则是女王
陛下的亲笔信。这封信装在“一个华丽的淡黄石英盒子里，扎着镀
金的饰带，还有镀金的把手，并镶着玛瑙浮雕。”爱弥尔以毫不掩饰 231
的满意心情接受了这个礼物，几次重复说，“赞美真主。”接着他就

① Allah o akbar 是阿拉伯语，意思是：“真主是伟大的！”；Khush amadeed 是波斯语，意思是：“愿你快乐！”或“祝你愉快！”这些是伊斯兰教徒的口头祝愿词，本书作者把第二句按这种场合的英语习惯意译为“你是受欢迎的！”。——译者

郑重地说了一些表示友好的话，把这些话和我们对于他这个人的钦佩结合起来，就足以使英国和喀什噶尔紧紧地联接在一起，成为比英国和任何其他中亚的统治者更亲密的同盟。“你们的女王是一位伟大的君主。她的政府是一个强大的仁慈的政府，她的友谊是值得希求的，因为它总是以源源不绝的好处给予得到这种友谊的人。女王就和太阳一样，在她的温和的阳光里象我这样可怜的人才能够很好地滋长繁荣。我特别希望获得英国人的友谊，这对我是不可少的。你们的统治是正义的。这条路对任何人都是开放的，从这里到伦敦任何人都可以完全自由地来往。”

12月13日我们的代表第一次参观了喀什噶尔城。喀什噶尔周围一带的土地非常肥沃，是一个经过精耕细作的人烟稠密之区，它的繁荣景象所给予使团的深刻印象不下于叶尔羌。此外，人民的外表也更为健康，主要是因为沒有患甲状腺肿的人。喀什噶尔的长官，阿里什·伯克，是喀什噶尔人而不是浩罕人，他的友好态度不下于叶尔羌的长官，在他的陪同下，度过了很愉快的一天。在18日那天举行了大检阅，但完全不知道由于什么原故，接受检阅的只是那些当喀什噶尔卫城陷落时留下来给新统治者服务的以前的中国兵。关于这些军队的操演的描述读起来就象一个巡回马戏团的表演而不象是训练有素的军队，尽管如此，这些中国兵确是军队的好材料。他们演习用的是“提夫”，一种笨重的武器，是一种火炮，由两个人搬运，三个人操作，据说在二百五十码内效果很好。

在这里应该说明一下，很清楚，当英国使团在喀什噶尔土地上的时候，它的生活和旅行的一切费用都免费供应；爱弥尔以硬币支付他的臣民所提供的任何服务，很明显，象他这样的小国，这笔费用不能算轻。把这一事实尽可能地广泛为人知道才公平，因为，去年以同样方式款待赛义德·阿古柏·汗的时候，竟有人表示不满。

这种不满出于无知；因为很难想象，任何一个英国人会对酬答一位中亚君主的友情发出怨言。使团在首都滞留了差不多四个月，时光过得非常愉快。气候的确很酷烈，但在办事情、参观和娱乐等方面需要做的事很多。

2月2日阿古柏伯克在通商条约上盖了印，这一行动就使英国使团的事务方面告一结束。3月16日向阿塔勒克哈孜正式告别，于是使团回到印度。它以卓越的成就完成了任务，弗赛斯使团，作为从印度出发、领导得最好而且最有实际意义的使团，值得人们长期怀念。

自从那个条约签订以后，土耳其斯坦贸易公司就一直积极从事于每年派遣几个商队进入喀什噶里亚；但是现在它的工作已经停顿了，至于这种停顿是暂时的还是永久的，那就要等着瞧了。最近这几年，沙敖先生在他作为拉达克专员的老岗位上，仍旧象从前一样，安静地做着有益的工作；去年曾有过传说，作为对他的酬报他将作为另一个使者，或者更精确点说，在那里充任常驻代表，进入喀什噶里亚。如果这一任命曾经作出过，那末在今天（10月1日）它已经暂时中止实行了；而且由于发生了必须考虑的新情况，它可能无限期地拖延下去。1877年6月至7月当土俄战争发生，东方问题再度变得尖锐的时候，哈吉·妥拉访问了我国，那次访问使我们重新恢复业已下降的对于东土耳其斯坦的兴趣。但他是在一个不幸的时候来到的，6月里我们听到了在吐鲁番一带失利的消息，7月还未过去，阿塔勒克哈孜本人死亡的消息就传来了。

在我们收到这个确实的消息以前，曾经有过可笑的谣传，说阿古柏伯克决心充当土耳其政府的同盟者的角色，而他，这个可怜的人，则正在以绝望的心情，并且是以他的生命为代价，反抗着一个残酷无情的、不可抗拒的敌人，事情就是这样的捉弄人！这位在亚洲的失败者竟在欧洲被某种离奇的幻想说成为一个重大问题的主

宰者，而且成了所有在俄国统治下被激怒了的东土耳其斯坦各族人民的带路人。其实，弗赛斯爵士回来以后我们和喀什噶尔的关系虽然有一时期曾经预示有很良好的希望，但由于缺乏动力，就疲塌下来。不管我们对他本人是多么钦佩，也不能使我们永远保证喀什噶尔不受俄国的侵犯；因为，只要一想到两地中间的地区的情况，就使我们的同情心立刻冷却下来。格里姆山口和沿途鱼贯而行的干瘦得不成样子的旅客和牲口，就使得喀什噶尔果园和叶尔羌繁华街道的光辉情景消逝无踪了。当弗赛斯爵士的报告弄清了这一事实，即，不管印度从哪一方面会受到威胁，至少从克什米尔北面不会受到袭击的时候，人们曾经不禁深感慰藉地吐了一口气。不错，从和田到卢杜克有一条可通行的路，从那里可以通到印度，但那不在阿古柏伯克的掌握之中，因此不在考虑之列。其实，1874年以后，我们对喀什噶尔和阿古柏伯克的意见，就象我们对波兰和科修什科^①一样；当中国人的卷土重来，使我们更深刻地考虑到中亚的事务时，我们发现，不管有过多少反对的意见，在中亚毕竟还存在着一个，而且是一直被忽略了第三强国，我们就开始容忍俄国人侵入那个国家了。在这两个国家之间除了友好的感情外没有别的，而凡是赞赏勇敢、正义、好客和坦率的礼貌的人，对于这位在不小程度上把所有这些美德都集中于一身的人物都怀着友好的感情。但比这更深的同情就没有了，或者更精确点说，比这更坚实一些的联系纽带就没有了。印度政府感到，如果支持阿古柏伯克而反对一切外来者，那就等于是支持一个未被人公认的事业；在更为紧迫的事务的压力下，我们和这个阿塔勒克哈孜之间的关系就不再被人放在眼里了。

对待爱弥尔的这种态度的后果并不是不明显的，就在他统治的最后十二个月内，他的政策就变得较为亲俄而较不亲英了。但

^① 科修什科(1746—1817)，波兰军官，曾抵抗俄国侵略。——译者

我们保持了“我们的有条不紊的平稳政策”。阿古柏伯克对我们没有象阿富汗统治者始终保有的那种影响力。实际上，对于我们说来，他的国家比西藏更难进入；对于我们说来，俄国人在叶尔羌也比好战的怀敌意的中国人在拉萨的危险性小得多。总而言之，英国和喀什噶尔做朋友是因为他们没有理由做仇敌；但他们是泛泛之交。为了彼此的不幸可能流些眼泪，当发生悲痛的事件的时候也可能说些安慰的话，但仅此而已，按真正意义来说并没有联盟，也没有坚实不变的友谊。在一个短时间内曾经有过同情和亲善，²³⁵接着就是长时期不变的淡漠。在1877年以前，沙敖先生所燃点起来的星星之火又经弗赛斯爵士煽成的火焰就熄灭了，而随着火熄灭之后，曾经为许多人所希望的、要在几个无畏的勇士所奠定的基础上兴建坚实结构的想法也就消逝了。不管我们是慎重也罢，不慎重也罢，真诚也罢，虚伪也罢，仁慈也罢，不仁慈也罢，当阿古柏伯克由于指望我们的支持而向俄国挑战时，他所倚靠的只是一根折断了的芦苇罢了。关于我国在中亚政策的这章书可以尽快地结束；如果我们在这章书里没有得到很大的光彩，但愿宽容的后代在判断我们的过失时，对于我们保持严格而不负责任的中立，会作出同情的考虑。

第十二章 阿古柏伯克和中国的 最后一战及其死亡

在 1876 年秋季结束以前,阿古柏伯克对于他的东方边界并未亲自予以多大的注意。在第一次东干战争和攻取库车之后,他把在兼并的地区维持秩序和保护他的领土不受中国人侵犯的责任交给了他的儿子和副手们负责。约在那年的 9 月,信使们带着一些奇怪的消息来到喀什噶尔。这些消息,我们可以想象,是简短而可怕的。中国人出现于天山以北。他们夺取了乌鲁木齐,正在紧紧地围攻玛纳斯。谣传把他们的人数夸大到差不多有十万个战士,他们配备着西方科学所能提供的全副武装。

在叙述喀什噶尔统治者接到这个消息以后的行动以前,有必要先考虑一下忽然出现于准噶尔的这支中国军队的历史。按照事件的自然演进,中国政府在解决了太平天国和潘泰造成的困难、在极度混乱的地方恢复了秩序、把一群乌合之众整顿成为劲旅以后,就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他们所未忘怀的惩治甘肃省外的东干造反者问题,云南省获胜的军队没有被遣散,而是被调来参加在戈壁
237 以外地区的新战役。不需要太多的想象就能了解皇帝的诏书到达这些老兵面前的情景:诏书号召所有忠实军人为维护他们国家的光荣、和他们被干犯了的宗教而讨伐东干游民,象张曜这样的将领所作出的热情的榜样很快地为他们全体士兵所效法。在这样的旺盛士气之前,我们仿佛又回到了罗马帝国时代,那时一个省份的征服就是另一新的胜利的前奏,而参加每一次战役的队伍中都有前一战役的老兵在内。就这样,大理府战役的胜利者,通过贯穿四

川与陕西的长途行军而到达了兰州府，即甘肃省会，在这里该省总督正在集聚军需用品并招募新兵以便把那些受过训练的士兵核心扩大到和一支侵略军队相称的规模。有些人曾经认为（我们也并不否认有相当多的理由支持这种意见），这一冒险事业根源出于一个政治动机，那就是统治家族有意让这一大批受过训练的军人去做点事，因为如果他们留在中国本部，就会为有权势的阴谋者，或跋扈放肆的觊觎帝皇尊荣的野心家所利用。不管这种推测是否有任何根据，可以肯定的是，那些不需要在云南担任卫戍工作的部队，通过一条远离首都的迂回曲折的道路被调到西北边疆城市兰州府，在那里为自从上一世纪中国征服东土耳其斯坦以来最艰巨的军事冒险进行准备。

我们不能确定，这些调动是什么时候开始进行的，但看来没有理由怀疑，在1874年结束以前，中国军队的先头部分就开始向西进军了。兰州府和哈密之间的不毛地带，是一个直线距离约九百哩，但按中国人所走的道路来讲更可能接近于一千二百哩的区域，为了克服阻碍主力部队前进的这些困难耗费了一个冬天，甚至可能是两个冬天的时间。但这段间隔时间在总司令部并不是完全闲着过去的，在这里集中了大量的武器和军火储备，招募并训练了新兵，而且那震撼了亚洲（如果不是也震撼欧洲的话）的作战计划，也在甘肃总督本人和他的能干的副手们的参加下草拟出来了。最后，随着戈壁沙漠平原上春季的出现，总共约计五万人的中国军队，就沿着贯穿沙漠的长路出发，向着天山南北更为肥沃的地区前进。关于这个冒险事业的这一部分详细情况，《京报》很奇怪地保持了沉默。这是极度保密的，尽管大家都知道西北有军事活动，但其目标和规模都是保密的。先头部队由于必须在沙漠里构筑固定的营舍，或毋宁说是屯居点，种植谷类以便来春能够进军，而经过耽延一段时间之后，中国军队在沒有受到任何严重阻碍

的情况下,就出现在乌鲁木齐城墙之前,这是东干领袖决心守卫的地方。

尽管阿古柏伯克手下的几个军官当时碰巧就在城里,还有东干族的几个重要人物也住在那里,防御并没有持久,几天以后,乌鲁木齐就向中国人投降了。许多居民逃到了邻近的玛纳斯城,但防守部队在中国将领的命令下被屠杀了。这里没有提到那些留在城里的居民的命运如何。

乌鲁木齐是在1876年8月底投降的,9月2日中国军队就在
239 玛纳斯防御工事前驻扎下了,玛纳斯城比乌鲁木齐地势坚固得多,并且由东干人以全部力量防守着。在中国人出现引起的最初震惊过去以后,玛纳斯的防卫者看出他们不仅是在为他们的事业和独立作战,而且也是为他们的生命和家庭荣誉作战。乌鲁木齐的可怕教训,对于玛纳斯城的坚定而拼命的守军不是没有影响的。乌鲁木齐的攻陷,从军事意义上说,是一件值得称道的功绩,但战役的成败还必须在玛纳斯城堡前决定。9月2日中国的排炮就开始向城墙的东北部分轰击,对四周城墙进行或轻或重的轰击达两个月之久。几次攻城被击退,东干人在人员和武器都占优势的敌手之前英勇作战。但在八个星期的围攻以后,中国人的顽强攻击精神仍和他们最初到达时一样,而东干人的粮草储备则已消耗殆尽了。随着供应的耗竭,他们勇气就耗竭了,在经过一次没有成功的突围后,东干将领海宴向中国前哨自首,请求准予光荣投降。表面上看,条件都答应了,——或者,按照中国官方报告所表达的,毋宁说一切都是含含糊糊的——11月6日,海宴和他的主力部队由城里出来走向中国军营。以后的事情就不清楚了,但这些人的态度似乎可疑,人员都是武装的,并且排列成完整的方阵,从在四围山上的中国人看来,他们似乎要突围而出,中国将领们一旦感到怀疑,他们就当作无可争议的事实立即采取行动,东干人从四面受到

炮兵、骑兵、步兵的袭击，在短时间内就被消灭了。他们当中没有²⁴⁰被杀的首领们被带到中国将军的面前，也都被立刻“处以极刑”。在城里或附近凡被发现的身强力壮的男人都被屠杀了，但报告明确地说，所有妇女、小孩和老年人都被饶了命，这里没有理由怀疑中国人的诚实。在他们眼中看来，对于象这样完全是理所当然的报复行为，是无须加以掩饰的。

中国人不满足于惩罚活着的东干人，把他们作为在未来一代期间能够自卫的种族而加以消灭，那些在东干运动萌芽时期的首倡者如妥得璘、黑峻、韩刑脓等人的尸体也都从土中被挖掘出来并加以肢解，作为所有背叛中华帝国的人的儆戒。玛纳斯的陷落成了传遍中亚细亚一带的一个沉重打击，消息传来，所有中国土耳其斯坦和准噶尔地区的人民无不惊惶万状。这次进军是以如此惊人的隐蔽进行的，而攻击又是如此神速和巧妙；由于这些原因其效果就更加提高了，这是在中国和中亚细亚的历史上所从来没有过的。“和台”不仅为了报复而回来，而且还随身带来了那些使英国和俄国在这个大陆上成为统治强国的一切补助手段。“和台”不再是按照过去早被遗忘了的时代的那种笨拙的队形挺进，而是遵照以法国和德国的方式为根据的教令前进。他们的大炮不再只是炮手们的危险根源，而且和克虏伯先生的工厂所能提供的有同样效力。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将领们已经有了更为惊人的进步。在乌鲁木齐和玛纳斯的围攻中，他们已经证明自己绝不是平平常常的战术家；在下一个更为扩大的进军中，他们将表现出，他们应当被视作为战略家而列于更高的地位。

在1876年底以前，东干人已经不再是一个独立的民族了。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或者阵亡于战场，或者死于刽子手的手下；而²⁴¹随着他们的消失，中国军队任务的第一部分就完成了。1862年和1863年被屠杀的“和台”的血得到了抵偿，中国人的威望恢复到了

本世纪以来的最高峰。在他们的全部任务完满成功以前，还有许多更重要的事需要完成，无论是在其危险方面或在其成果方面来说；但就是到目前为止，中国军队及其将领，已经完成了任何国家都可以引以自豪的功绩了。

对于我们这些远离他们的影响，而且对于凡以中国人为主导人物的事情抱着一种没精打彩的傲慢态度的人来说，这些事情似乎是意料不到的，而且是奇怪的。但对于住在喀什噶尔王宫里的阿古柏伯克，尽管他的王宫离开他的胜利的敌人扎营地有一千哩，看来这些事情必然会是什么样的呢？东土耳其斯坦各处的人是以怎样恐惧的心情看待中国人的这些初步的胜利，这是我们无法估量的；如果说，这位阿塔勒克哈孜勇敢的心没有使他产生疑惧，那也决不会是因为他对于危险的严重性抱着任何轻松之感。

242 玛纳斯陷落的消息传到阿古柏伯克那里大概是在11月底以前，由于季节已晚，在他面前有一整个冬季可以从事防御准备。这些城市的投降，我国直到1877年4月才普遍知道，当时我们也听说，阿古柏伯克向东方进军，以保护他的受到威胁的边境。在1876年3月到1877年3月，这就是说，从浩罕骚动结束，阿布都拉赫曼·阿弗托拔查投降，到阿古柏伯克集结其军队于吐鲁番周围这一段时间，关于喀什噶尔内部事情我们知道得很少。毫无疑问，在这一段时间内，喀什噶尔人民的情感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这些变化对于一个偶然到那里的观察者可能并不容易感觉到，但就其后果来说，它们和明显的骚动同样重要。要提示一下这些变化中的某些情况可能是什么，并不困难；对于它们所导致的结果——阿塔勒克哈孜权力的削弱——更无怀疑的余地。

阿古柏伯克在1875年11月当浩罕最后一次起事爆发时的过度谨慎，对于他的威望的损害比一次战事失利更为严重。它给他的部下中的浩罕分子的热情泼了冷水，如果我们记住正是这些人

才是他的最能干、最忠实的党羽的话，那末，单是这一次就是一个严重打击了。有许多迹象表明，有不满情绪的并不限于他的人民中的任何一部分，而是遍及全体人民之中。东干战争一直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一种劳民伤财的血腥的作战行动。和俄国地区的旧日贸易，曾经那么有利可图，但由于缺乏支持鼓励，就变得萎靡不振了。北部山岭的艰难险阻，曾一度由于中国人的耐心和细心而被打通，现在却反而被充分利用来阻止和固尔扎及阿拉木图的交往。比一切更甚的是，作为“玩弄辞令能手”的阿古柏伯克的全部技巧也掩盖不了他和英国签订的条约是一个失败。这个条约没有给予他所最希望的英国的保护，而且，由于较大的天然障碍，也没有给他的人民提供在他们眼中认为唯一值得获得的新的贸易孔道。弗赛斯条约似乎使英国和喀什噶尔的关系突然中止了；喀什噶尔人是足够机灵的，如果把条约认为是（在他们眼中，不可能不这样认为）两个国家之间的唯一联系纽带的话，他们已觉察 243 到这个阿塔勒克哈孜不会得到英国刺刀的支持来反抗俄国的侵略。这样一种意见的后果是，忍从在不远的将来臣服于俄国。

由于存在于他的人民中的这些不满情绪，阿古柏伯克掌握的权力就必然会受到削弱，而正是在这个时候，当他才稍微清楚地看出这种情绪的时候，中国人回来已经被宣告临近了。面对着一场巨大的共同危险，善意的人民将会紧密地团结在他们的首领的周围，并会从危机中看到有一种共同的需要，应在人民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取得比以前更好的谅解。在库车以东地方，如果还有人居住的话，那也不过是由于阿古柏伯克的代表的命令而被屠杀剩下的少数孑遗。在这些人中对于他的事业是不会有有多大好感的。喀什噶尔城的守备队主要是由被饶命的“和台”士兵，即他们所称的“英吉穆斯林”所组成，希望从他们当中获得有力的支持去反对他们的信佛教的同胞也是不可能的（参看附录）。军队中大多数的新

兵都是库车、阿克苏及其附近的东干人，也许有人会认为，至少从他们当中，这位阿塔勒克哈孜可以获得忠诚的效劳了。然而，就连在他们当中也有不满情绪。他们有一切理由惧怕落入中国人之手。那屠杀无辜的“和台”的正是他们，对于这种罪行阿古柏伯克至少是没有染手的；中国人的忿怒行动首先是指向他们的。但他们对于这位统治者也有他们的怨恨。他曾在战场上打败了他们，而且他们与其说是受他劝诱，不如说更多地是受他强迫参加了他的军队。他们对安集延穆斯林的仇恨只是比对佛教徒中国人的仇恨略逊一筹罢了；他们的雄心勃勃的事业被他们目前的统治者的军事才略所挫败了。在1862年到1865年间，他们曾经冒极大的风险参加反对中国的叛乱，当他们完成任务的时候，他们发现自己所取得的报偿被别人骗走了。所以，面临中国人入侵的时候，在那造成这一切麻烦的穆斯林造反者本身之中存在着不和。如果把这些人作为没有积极作用的人除掉，阿古柏伯克军队的核心的确为数很少；但他所能倚仗为他的王冠和宗教进行战争的人也只有这少数的核心。

1876年冬天，当他忙于在叶尔羌和喀什噶尔搜集武器、军火和储备品的时候，他一定已经发现许多这些不谐和的成分了；但他坚决地继续准备下去。他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最勇敢的策略就是最慎重的措施；只要他能在战场上用优越的战术制胜中国人，他就可以克服他的一切困难和危险。由于这些见解在他心中占首要的地位，于是他把他的所有军队，包括东干人在内，沿天山南麓集中起来，总部就设在吐鲁番。俄国军官，库罗帕特金上尉曾被派出使喀什噶尔，他旅行了喀什噶尔全境，在吐鲁番会见了爱弥尔，据他估计，阿古柏伯克有下列兵力，他还补充了关于这些军队沿着边界部署的情报。

守卫着穿过山脉的主要隘道的达坂城堡垒，驻有九百个骑兵，

配有滑膛枪和两尊大炮——一尊是后膛炮。在吐鲁番和爱弥尔在一起的有三千五百骑兵和五千步兵，二十尊炮，绝大多数是旧产品。托克逊是一个设防的地方，位于往库尔勒去的大路上，离吐鲁番几哩，驻有四千骑兵和二千步兵，有炮五尊。哈克·库里·伯克²⁴⁵在这里指挥。在库尔勒有一千五百人，在库罗帕特金上尉离开后不久就被调往前线去了。阿古柏伯克不得不用这些分散在一个很广泛地区的一万七千人来抗御敌人，这个敌人在人数上占优势，而且，如结果所示，在指挥上也同样优越。

这位俄国军官，在他回国以后，对阿古柏伯克的事务作了非常黯淡的描述，预言他的国家很快就会瓦解。他还提到东干人在大量的逃亡，在库车以东到处都是对喀什噶尔统治者不满和不信任。这个贬抑性的描述，几个月后被到罗布泊去作冒险旅行回来的普尔热瓦尔斯基上校所肯定。他在1877年5月28日从小裕勒都斯发出的一封信里，说他受到阿古柏伯克的亲切接待，但也受到了怀疑的监视。“从海都河到罗布泊，他一路上受到了卫队的护送，他们亲切地努力满足他那怕是最小的愿望，但不让他或他的任何随从和居民接触。阿古柏伯克有点专横地要求普尔热瓦尔斯基上校说明为什么俄国人向进攻他的中国人提供粮食；但在库尔勒的一次接见中，他又一再地向这位俄国旅行者保证说，他是俄国的朋友和对俄国怀有良好愿望的人。尽管有这些事先警戒，普尔热瓦尔斯基上校和远征队的其他成员还是成功地让本地人告诉他们：他们讨厌阿古柏伯克的军事专制并且盼望俄国人快来。”

这封信里所包含的消息是1877年4月底的事，或者说，是阿古柏伯克第一次被中国人打败，退到库尔勒的时候；但在这里它正好证实了库罗帕特金上尉的话。

除了阿古柏伯克在边境上所结集的多少受过点训练的一万七千人以外，库罗帕特金上尉还提到了一万东干人，这就是说，住在²⁴⁶

东部地区的东干居民。这些人不仅是出名地不足信任，而且装备也很不好，因而总起来说，与其说他们是力量的源泉还不如说他们是软弱的源泉更为恰当。2月底前阿塔勒克哈孜就在吐鲁番了，他在托克逊和天山一带构筑防御工事，努力用他自己不屈不挠的精神鼓舞士气。

在这期间中国人并没有闲着。他们战胜东干人以后，就在靠近乌鲁木齐的古城设立了司令部，为保证他们和甘肃之间的交通，已组织了正规的信差来往，武器、后勤补给和人员源源不绝地穿过戈壁流向远征军。例如，在兰州府建立了一个储藏武器的大型军械库，曾经一次就护送走了贝尔丹型步枪达一万支之多。当甘肃总督^①兼总司令左宗棠为了在雪融化时即强越天山而在天山以北进行这些准备的时候，另一个中国将领张曜，则为了在天山以南进行牵制性的突袭以配合主攻而驻扎在哈密。估计中国军队总数约有六万人——五万人在古城附近，一万人在哈密——这只是一个大概的数字。实际总数容有出入，但我们相信把它估计为六万人是在目前可能的情况下最接近于准确的数字。在3月里中国军队已经把进攻阿古柏伯克的一切准备都做好了。按照我们的地理知识，从古城到吐鲁番并没有直达的道路，因此，中国军队的主攻方向是从乌鲁木齐攻击阿古柏伯克已经筑有堡垒的达坂城。但是，
247 尽管较大的一支军队是在天山以北活动，实际决定性的打击则是由哈密出发的较小的一支军队所作出。如果我们根据喀什噶尔军队的部署来加以判断，这支部队的活动并没有受到阿塔勒克哈孜应有的注意。

4月中旬张曜将军没有遇到任何严重的抵抗就攻取了七克台和辟展^②两个小城，后者在吐鲁番以东约五十哩，从这里他和他

① 左宗棠当时为陕甘总督。——译者

② 即鄯善。——译者

的上级，左宗棠，开始了那即将粉碎喀什噶尔一切抵抗的协调一致的行动。略微看一下地图就可以发现，位于吐鲁番的阿古柏伯克，由于受到从乌鲁木齐和辟展前进的两支军队的夹击，就仿佛陷在两片火焰当中一样，如果被打败的话，他的退路将完全暴露在一个有胆识的敌人面前。中国人一经发现他们的初步行动取得了成功，就下令全面进攻。很明显中国人最初在达坂城是遭到顽强的抵抗的，在强取天山隘口还未成功的时候，就有消息传到守军耳中，说一支中国生力军把他们的统治者从吐鲁番赶走了。于是，阿古柏伯克部下的各级官兵都乱成了一团；在那疑虑和失去理智的惊恐时刻，他的大多数士兵或者投向敌方，或者逃往喀喇沙尔。当这绝望的时刻，阿塔勒克哈孜仍然象一个勇敢的军人那样镇静自若。他在吐鲁番城外又和入侵者交锋，尽管由于众寡悬殊而败走，仍然在吐鲁番以西四十哩的托克逊继续抵抗，当第二次又被击败的时候，才退到喀喇沙尔作新的努力来抵抗入侵部队。在这几次战役中，阿古柏伯克，由于士兵逃亡和死于敌方攻击，包括东干人在内 248 大概损失了不下二万人。因此他认为，进一步向他的境内撤退是明智的，于是，驻留了几天之后，他就离开喀喇沙尔而退到库尔勒。

在发生这些惊人事件的几个礼拜以前，阿古柏伯克就已经打发了一个使者到塔什干去请求俄国人帮助反抗前进中的中国人。但俄国人只给他的使者几句好话，并没有干涉卡曼斯基先生和中国军队进行的商业交易。当时俄国人正忙于对付欧洲事务，也没有余暇过问喀什噶尔问题。

中国人许多年以来就是俄国的好朋友，而阿古柏伯克的一生则几乎是俄国毫不隐讳的敌人。在这样的两个交战双方之间，俄国政府一定是首先对前者表同情；而且阿古柏伯克近来对于俄国的态度也不是象可能做到的那么小心谨慎。阿古柏伯克的外甥，赛义德·阿古柏·汗就是一个为了某种不明确的目的而呆在君士坦

丁堡的出名的代理人。他还保护了俄国在中亚的死对头布哈拉王阿伯杜拉·蔑利克或称卡提·条列，这也是对吸引俄国向他表同情不利的事。

中国人在象乌鲁木齐或吐鲁番这么远的地方获得胜利并不足以引起俄国人的敏感。在许多方面，中国人的这种入侵反倒使俄国人松了一口气。它使俄国人得以在中亚细亚腾出手来，而这也许是从来没有受到充分重视的事。佛教徒在东土耳其斯坦的胜利是对所有汗国的伊斯兰教精神的一个严重打击。毕调勒特或称“幸运者”的威望下降，起了给予邻近诸国王公以具有特殊意义的警告作用。

所以，不难发现，俄国人之所以拒绝在交战双方之间进行调解
249 是有其充分理由的，阿古柏伯克尽管想以保障他的个人安全为条件努力谋求和中国人达成协议，但他的所有外交建议都遭到了断然的拒绝。

中国人进入托克逊以后忽然中止前进，其原因是什么不清楚。但他们的引起恐惧的名声已经走在他们前面，喀喇沙尔以东地方很快地被居民们放弃了。中国人的耽搁可能是由于必须储备粮秣才能继续向前进军，或者是由于发生了什么流行病，就如印度的一个刊物所说的那样。在这一点上北京的《京报》保持了极度的沉默。该报6月23日那一期刊载了有关在吐鲁番周围作战的记述，并列举了给予有功将领们的荣誉和奖赏，但对于中国人为什么在以后好几个月里静止不动，无论是在那一期或以后几期上都保持缄默。在这一份报告里的最值得注意的一句话是：“收抚降回，均令各安生业”，如果这是真的话，无论如何，它总是中国人采取温和策略的一例。看起来可能奇怪，随着这次初步的胜利，中国人进军的活力似乎消退了，有五个月之久，再也没有听到中国军队的行踪。在这期间，在喀什噶里亚发生了最重要的事情，中

国人虽然是这些事情的创造者，却和它们没有关系。我们在这几页里所考察的(阿古柏伯克)多事的一生中的最后场面，入侵的“和台”并未参预。他们也许并不知道在离他们营地三百哩地方所发生的事情，一直到事情发生以后好几个星期才知道的；当他们知道的时候，他们就认为最好的策略是在挥戈西进以前，让在这个国家 250 内部的分解因素先充分发挥其作用。当普尔热瓦尔斯基上校会见阿古柏伯克的时候，那一定是在他死之前不久。即将临近的事情的阴影可能已经笼罩着这位失败的征服者，他从最近遭遇的灾难中只能预感到更坏的事还在后头。

关于阿古柏伯克之死的确实情况有不同的说法。最可能的是他被以阿奇木·汗·妥拉为首的一群阴谋者杀害了。日期据说是5月1日。至于阿古柏伯克会遭到凶杀，如果我们考虑到在他周围的那些象东干首领之类的可疑部属，就不足为奇了；如果我们根据过去的历史考察他的国家和人民，那末，他一生中的第一个挫折会成为新的动乱的信号，也就是意中之事了。所以，按照传闻的讲法，阿古柏伯克被谋杀，其中并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但在相关的叙述中却有许多互相矛盾之处。喀什噶尔爱弥尔之死的第一个消息刊载在去年7月16日《泰晤士报》的一则电讯中。该电讯称：他在短期患病后死于库尔勒，并提名阿奇木·汗·妥拉为继承人，而公然置自己的儿子们于不顾。这条电讯还继续说，阿奇木·汗拒绝接受这个授与他的王位，所以他的长子，伯克·胡里·伯克继承了王位。这则电讯发表以后过了几天，又有消息说，阿奇木·汗·妥拉，和为阿古柏伯克最初拥立，后来又废黜的布素鲁克汗的喀什噶尔旧王朝有关。所有这些消息都来自塔什干。7月23日我们在本国从同一消息来源得知，伯克·胡里·伯克已经把他父亲的死和他自己即位的事通知了考夫曼将军。阿古柏伯克真的死了，对此再也沒有任何怀疑的余地了。

由于某种原因，伯克·胡里·伯克似乎不受俄国人的宠爱；不过对他的这种反感是出于误会，因为伯克·胡里·伯克肯定对英国是不友好的，他对我们的使者弗赛斯爵士很没有礼貌。而且他立刻和俄国政府取得联系，请求俄国政府就对待中国的入侵他应当采取什么方针提出忠告，他还重新提出他父亲的请求，要俄国停止从固尔扎向乌鲁木齐和吐鲁番运送补给品。据说，但未得到证实，他的后一要求得到应允了。

在8月底以前没有再听到有关这些事件的经过，但在8月底就有消息通过拉达克和克什米尔传到印度，说阿古柏伯克“是被布素鲁克汗的儿子阿奇木·汗·妥拉所暗杀的”。这个消息第一次暗示阿古柏伯克是被他的心怀不满的党羽杀害的。消息本身是如此自然，它使我们对于那个传说阿古柏伯克剥夺了他自己的家族继承权的离奇事件恍然大悟，很快这就成了公认的说法了。问题现在是，阿奇木·汗·妥拉是什么人呢？关于这，有两种说法：一种说他是布素鲁克汗的儿子，另一种说他是库车的一个和卓首领。前一种说法似乎更有理；但因他的名字并未出现在弗赛斯爵士的详细报告里，因此就容易遭到反对，特别是因为我们还听说他是阿古柏伯克征服喀什噶尔战役中的一个主要角色。后一种说法更难得到证明，但不容易受到同样的反对。假定阿奇木或阿里·汗·妥拉是当库车城落入阿塔勒克哈孜手中时的一个被饶命的库车首领，他成为谋反者就没有什么出乎意外之处。假定说他仍旧认为他对那个城有统治之权，正如《土耳其斯坦报》所说，他原来就是那里的长官，当命运之神对他的征服者表示不悦的时候，他就设法实现他个人的野心计划，这也没有什么矛盾的地方。如果阿奇木·汗是布素鲁克汗的儿子，他设法为他的父亲被废黜和流亡报仇，我们认为并没有什么稀奇；但如果他是一个被征服了的统治者，把阿古柏伯克看作是从浩罕来的、一个冒险家，无权要求他效

忠,他阴谋反对并杀害这个喀什噶尔王公就会立刻显得不仅可能,而且是真事。作为库车的一个和卓首领,他也有权代表喀什噶尔旧统治王朝家族的一个支系。但是作为布素鲁克汗的一个儿子,面临来自他的世代仇敌中国人的巨大而紧迫的危险,不至于用杀害一个事实上的君主而使乱上加乱,而如果他是库车的一个首领,在这样一个危急关头,就很可能扮演象阿睦尔撒纳在上一世纪所扮演的角色。据说阿奇木·汗曾经和中国人进行谈判,但后者没有给他什么鼓励。

《土耳其斯坦报》仍旧坚持它原来的说法:阿古柏伯克是在患了七天的热病后于5月1日死去的,他的尸体在5月13日装殓起来,从库尔勒送到喀什噶尔,准备安葬在阿帕克和卓的陵墓里。根据该报报道,接着就发生了在中亚国家历史上所常发生的一桩残忍事件。已故爱弥尔的次子哈克·库里·伯克,他曾在他父亲临终时在他身边,并参加护送出殡行列,在离城不远的地方遇到了他的长兄胡里伯克。这个大儿子立刻在他父亲的灵柩前跪下,接着站起来毫不迟延地用手枪向他兄弟射击,顿时这个兄弟就被击毙。这样杀害兄弟还不满足,胡里伯克还把所有送葬的人都用刀杀死,然后带着他自己的随从护送灵柩回到喀什噶尔。我们一 253 点都不知道这一残忍行为的原因是什么,但胡里伯克是在喀什噶尔而不是在东部这一事实就说明了为什么阿奇木·汗能够在库车和库尔勒建立他的权力。对这个内部纷争的进一步发展和中国人的最后胜利,在另一章里予以考察,会更为适宜。

所以,关于阿古柏伯克之死有两种说法,每种说法都有一定数量证据的支持。关于这个问题的所有报道都有记载,它们是互相矛盾的。中国的《京报》对于这个题目只字未提。中国人仇恨的对象主要是几年前从哈密逃跑的东干首领白彦虎,而不是阿塔勒克哈孜。关于阿古柏伯克于1877年5月在库尔勒死去这个主要

事实已无怀疑的余地。最近几个世代里在中亚历史上留下痕迹的、经历变故最多的一生于是宣告结束了。

不管对这个人的一生的种种遭遇会形成什么样的意见，很少人会否认他是一个有巨大智能的人。毫无疑问，有些人会对他废黜布素鲁克汗这一行动提出疑问，对于他早年生活中一再背弃他的朋友和恩人呼达雅尔也会提出更为公正的责备。另一些人还会想起他在1875年的优柔寡断的行径，从而否认他具有那种作为一切真正伟大人物显著特征的果断品德。他对东干人进行的那些不必要的战争，以及他所奉行的那种把他的帝国推进到中国附近的近视政策，会被认为足以说明他够不上称为一个将才或政治家。所有这些行为都起了破坏他的统治结构的作用，但我们只要提一下阿古柏伯克的品德中从来没有受到足够注意的另一个方面，这些行为就会显得并不那么严重了。这原是他的外交政策的秘密。他肯定并没有象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在没有得到帮助的情况下，就想要在中亚细亚和俄国争胜负。他的见识很广，决不会那样做的。他也不可能希望把他的权力向南扩张，因为在那里阿富汗和克什米尔都会对他的存在感到不愉快。作为一个胜利者，留给他的唯一选择就是继续损害中国来扩张他自己。我们不知道，这个坚定的穆斯林在喀什噶尔他的王宫里怎样地梦想把先知在中亚细亚的所有信徒联合起来，进行一次反对中国的圣战，梦想和那些拿着火和剑进入中国的边境省份，甚至连万里长城也抵挡不住的他的先辈的丰功伟绩相比美。当阿古柏伯克看到他的权力向东扩展十五经度，从阿克苏到库车，从库车到库尔勒，从库尔勒到喀喇沙尔，从喀喇沙尔到吐鲁番，直到他几乎能从他在七克台的边远哨所看到作为通往中国西部和西藏北部的重要关口的富饶的哈密和巴里坤城池，并幻想这两个城池也将落入他的掌握中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他由于听到关于中国衰微的传说，在心中曾经多少次兴起

过这种种的美妙的幻想。但是，除非我们记住，所有这些雄心壮志，是由于对于俄国怀有恐惧心理，和被征服后的东干人仍然不断阴谋反叛，所以未能实现，就不能明确理解阿古柏伯克的政策。他的迫切心情一定会因为不能完成他所认为可能的事情而大为烦恼；尽管他已获得许多次胜利，但在心灵深处他仍然是个失望的人。

还有，在最后几年，当他已经差不多完成了他为自己所规定的任务并有余暇环顾一下的时候，他已不再是青年了，或者说，他已不再象过去那样精力旺盛了。对一个亚洲人来说，他正进入人生的晚年，已经不再有那样的体力去尝试任何旷日持久的不顾死活的事业了。对于一个“微乎其微的希望”，他仍和以往一样的热 255 心，一样的能起作用；但对于那些不仅需要不顾性命的勇气而且需要预见和耐心的事业，他已经不再能适应了。中国人的进入，粉碎了所有这些以及其它许多幻想。在他们的眼里，在他们的权力面前，阿古柏伯克不过是另一个大理府的苏丹而已。他的那些在印度和英国引起人们的同情，和受到一定程度尊敬的伟大品质，在那些受命于天的帝国(用他们自己的话说)的人民的眼中看来，是不足道的。在中国总督们和满洲骑士面前，浩罕的军人和穆斯林的骄傲都必然会被认为是不足道的。如果说中国人曾经想到过这个问题的话，他们就是这样想的。我们这些通过阿古柏伯克的覆灭来观察过去历史的人也必须这样想。阿古柏伯克在喀什噶尔的统治有十二年之久是一个明显的事实；这是英国和俄国都承认的。中亚细亚诸汗欣然承认在他们的迅速衰落的队伍里又增添了一员。甚至连表面强大的统治者希尔·阿里，与其说他以友谊，不如说以妒忌的心情，也给阿古柏伯克增添了荣誉。然而，所有这一切都飞速消逝了。

和中国人的权力比较起来，他的权力等于零；和中国人的坚

256 韧比较起来，他的坚韧等于软弱；和中国人的战术比较起来，他的战术只是一个小学生的战术，甚至和中国人的勇气比较起来，他也不得不承认他的勇气遇到了一个势均力敌的对手。不仅有人数上的悬殊这一静止的压力，还有优越的智力这个活的压力对他不利。优越的战略和优越的武器；更大的武力和更大的决心；毫不踌躇的行动，完全一致的意见，所有这一切联合起来，把一个即使不是为了自由，也是为了生存而拚死奋战的可怜绝望的人压得粉碎。阿古柏伯克本应获得一个更好的遭遇，也能以勇士所固有的泰然态度对待命运，他的失败和死亡可以起到“指出一个教训和点缀一个故事”的作用。故事已经在这些篇幅里根据不充分的记载尽可能接近事实地讲完了；他作为这些主要事实所环绕的中心人物，就连英国人也可以要求应予以注意。在未来的某一世代很可能会有人对于这个标志着中国人在东土耳其斯坦统治的唯一中断的这个人的一生重感兴趣。当标志着和卓入侵和东干暴乱的屠杀和其它残忍事件被双方都忘却或宽恕的时候，人们会承认，尽管中国人在奖励贸易和良好政绩方面给予人民以巨大好处，一个浩罕军在沒有支援的情况下在这一带地方所建立的政权也是有其优点的。所以，让我们这些从不偏不倚的立场看问题的人，给这个已去世的武士以高度评价吧。在他漫长的一生中，作为一个军人，他遇到的对手不多，作为一个统治者，连一个对手也未遇到过。不管我们对于中国人的力量是非常惊异或者也表示非难，让我们不要因为中国人在这场光明正大的战争中用谋略战胜了他，并打倒了他，就对阿古柏伯克作出苛刻的判断。如果我们否认中国人具有那些伟大品质，凡最了解他们的人都会毫不犹豫地承认这点，我们就会用一种随便的尺度去衡量，这种尺度会把阿塔勒克哈孜所获得的好名声弄得无影无踪。如果对于摆在我们面前的事情用这样肤浅的标准去衡量，那就会不仅侮辱了被这种标准所

糟蹋的人，而且也会同样地有损我们自己的智力。不管我们怎样责怪阿古柏伯克，因为他竟然走出去迎击一个本应在库车或阿克苏等候的敌人，他的勇敢和他对于中国人力量的错误的藐视总是很清楚了。我们可以公正地说，他是自从产生了纳第尔·沙赫^①以来中亚细亚全境最卓著的人物。他用一些微不足道的手段成就了那些尽管诞生于帝王家并统治着人口稠密的繁华国家庸碌之辈所办不到的事业。还能把什么更好的墓志铭放在一个勇敢而公正 257 的统治者的墓前呢？

阿古柏伯克一生经历的教训是简短的，但对我们却充满意义。那些在中国边境为自己建立了一个地盘的独立的统治者只不过是一时的赘疣而已，当他们的末日来临的时候，如果他们办得到，他们就会象候鸟一样飞走。英国各级政府从来没有了解中国制度的生命力。今后应该更好地理解这一点。

^① 波斯军人，1736年夺取王位，1747年被刺而死。——译者

第十三章 中国人重行征服喀什噶尔

当阿古柏伯克死于库尔勒时，再次征服喀什噶尔的任务只是刚刚开始。在吐鲁番得胜的中国军队正闲散地滞留在该城的四周，如某些人所认为的，他们是因消耗太大而疲惫不堪。还不清楚，中国人是否渴望完成比他们已经赢得的征服东干族的胜利更大的胜利；只要阿古柏伯克仍然作为一支大军的首领留在附近，征服东干族的任务就不能看作已经完成了；也不清楚，随着喀什噶尔军队撤回喀什噶尔，中国的将军们是否会作无限期的停留。中国人夺得吐鲁番以后，也并不因此就必定能够占取喀什噶尔或叶尔羌。单单距离遥远就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障碍，加上这个国土贫瘠不毛，而溃退的穆斯林军队又会把它践踏得更加荒凉；因此，要预言中国人会取得迅速的胜利，一个无偏见的观察家可能会感到踌躇。但在这些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阻碍，这是一个精明的将军所必须审慎考虑的。夺取喀喇沙尔或库尔勒只须一次勇敢的攻击；但是征服库车可能会是一个比围攻玛纳斯更为艰巨的任务。中国人在东土耳其斯坦腹地耽搁上两个月，就必然会使他们的物

259 资料来源紧张，甚至会毁坏他们的整个大事。而且即使库车被攻陷，还有阿克苏；北面还有乌什，南面还有巴楚堵住通往喀什噶尔和叶尔羌四周这个国家重要地区的道路。现在，阿古柏伯克之死并没有去掉这些地方任何一处的防御；有一个时期有人相信，他那一直有优秀军人之称的儿子会充分利用他无疑地据有的这条十分坚强的防线。事实上，阿古柏伯克之死是一个无可挽救的灾难，因为它破坏了这个国家所有的团结和统一。他本人或许也不能避免

最后的垮台，但搏斗是会变得更为长期的。因此，在1877年5月和6月，紧接阿塔勒克哈孜去世之后，可以十分确切地说，中国人对这个国家的再征服只是刚刚开始。

入侵的将军们在吐鲁番获得胜利后所表现出来的踌躇，首先是由于认为他们的对手不容轻视；当那个对手既死之后，则由于下了审慎的决心，让那些在喀什噶尔迅速出现的内部瓦解因素得到充分时间去发挥有利于他们的作用。与此同时，他们秘密地制定计划，贮存大量从俄国区域运来的供应，探查特克斯河和裕勒都斯河的不很为人知道的渡口。从楚呼楚以北的加尔梅克人那里募集大量的新部队，加尔梅克人在东干叛乱的最严重时期曾为中国人保护该城。

然而，在继续叙述中国人前进之前，有必要谈一谈东土耳其斯坦内部的扰乱，尤其是关于胡里伯克和阿奇木·汗之间为了争夺统治权的竞争。首先，我们需要明白理解，关于在从阿古柏伯克死亡至中国军队最后进攻这段时间之间发生在喀什噶尔的事件，我们实在没有任何肯定的情报；我们将来也不一定能准确地了解到 260 那五个月中的事件的过程。在缺乏确切材料的情况下，我们必须假定一些最接近可能性的事件已经发生。阿古柏伯克死时，他的长子伯克·胡里·伯克是在喀什噶尔城里，或者是在到那里去的路上某地。有可能，在吐鲁番被打败之后，他被派到后方去调取援兵；他不在时，爱弥尔的次子哈克·库里·伯克在他父亲死后担任了军队的指挥。无疑的，他护送阿古柏伯克的灵柩回喀什噶尔，在城墙外被他哥哥所杀。正是在这时候，阿奇木·汗·妥拉出现于舞台。应该记住，阿古柏伯克逝世的消息传到我国是很慢的，而几乎紧接在那消息到达之后，我们也就收到了发生于爱弥尔死后许多星期后的事件的情报。因此，阿古柏伯克逝世情况的一些细节，与那些发生在那事件数周之后的骚乱，我们是在同时听到的。

当哈克·库里·伯克离开库尔勒时，阿塔勒克哈孜的王朝没有代表人物留在那里；在那期间，给阴谋分子提供了活动的机会；一个混杂的宫廷，象阿古柏伯克的那样，是绝不能摆脱这些分子的。阿奇木·汗抓住那个机会，在喀喇沙尔、库尔勒，可能也在库车，建立他的权力；在短期内，喀什噶尔由此分裂为三个敌对的阵营。看来，胡里伯克为中国人暂停活动所迷惑，产生安全的错觉；他决心去惩罚他的叛变的总督的专横霸道，而这却是一个他应该留给中国人的任务。于是，在伯克·胡里和阿奇木·汗之间爆发一场战争，它耗尽了留剩给一位喀什噶尔统治者的少量资源。斗争看来是一场混战的性质，同时，虽然最后的结局是对伯克·胡里有利，他似乎从未收复过喀喇沙尔和库尔勒。这场战争发生在阿克苏城附近，阿奇木·汗被“敌人数量上的压倒优势”所击败。伯克·胡里的主要损失是叶尔羌长官穆罕默德·云努斯之死，后者是他最能干和最忠实的顾问。阿奇木·汗于是带着一千名的步兵逃往俄国领土，科尔帕科夫斯基将军下令将他们立即拘禁起来；阿奇木·汗在那里继续和俄国政府密谋，企图恢复他的失掉的财富。用不着说，这些密谋一无所成；阿奇木·汗已堕落到微不足道的地位，从他参预公共生活的行为来判断，这是对他最合适的下场。

正当在阿克苏城以东进行着这次成功的战役，一桩有特殊意义的事件发生了，它足以用来说明在胡里伯克统治下的喀什噶尔的情况。柯尔克孜的首领思的克·伯克十三年前曾和阿古柏伯克对抗，自那时以来，他已退出了舞台。现在，他抓住胡里伯克的困难所提供的机会，进攻喀什噶尔城，使它的防守部队丧失了大部分。他劫掠城外郊区，只是当年青的爱弥尔急忙从阿克苏赶回保卫他的首都时，他才撤退。柯尔克孜人当然依他们的天性行事，立刻退到克孜勒牙尔特山的荒凉地区去了。然而，他们使正因爱弥尔之死和阿奇木·汗的叛变而引起的混乱更为恶化，乱上加乱，从

而补充完备了虚弱和内乱的因素，这些因素一向证明是中国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同盟者。就阿奇木·汗和柯尔克孜劫掠者本身而论，都是不在话下的；但是，在大敌临境之下，他们起了一种很明显的严重危害的作用。在色勒库尔与和田两地爆发的小规模暴动，²⁶²与外界力量相结合，终于和其他纷乱一起打破了阿古柏伯克帝国美好的外观。我们完全不知道据说在塔什库尔干或色勒库尔一带发生过的动乱的详情；但是，假定这个情况是由于瓦汉人或巴达克山人方面的侵扰，或者由于柯尔克孜人的新的进攻所引起的，这是合乎道理的。塔什库尔干的居民既是叶尔羌的移民者，叛乱或者无论什么形式的混乱起因于他们，那是不大可能的。和田的叛乱比较确实，而且也较容易为人们所理解。该城的人民从没有饶恕阿古柏伯克对他们统治者的背信弃义，他一消失，他们便急忙起来报复。当喀什噶尔驻防部队一撤走，市民就杀掉他们的长官，推举一位他们自己的统治者，他一直掌权到中国人的胜利使他们和他认为对这升起的太阳躬身欢迎是得当的为止。和田的榜样为桑株及其附近地区所效法；这样，在喀什噶尔陷落以后，这个国家的整个南部地区都默认了中国的征服，而不需中国人派一兵一卒进入叶尔羌以南。中国部队在此刻似乎可能已满足于这些区域的降服，而没有用自己的士兵进驻那些与昆仑山脉接界的重要城镇。

当胡里伯克火速返回喀什噶尔以对付柯尔克孜人时，我们说过思的克·伯克立即逃往克孜勒牙尔特山；但他并没有呆在那里很久，因为我们很快就发现他又回到首都，受到与他妥协的爱弥尔的厚遇。他的柯尔克孜追随者也受到国家的雇用；同时，正当这个联盟刚一缔结，消息传来，使那个联盟成为对柯尔克孜和喀什噶尔²⁶³说来都是一桩头等必要的事情，虽然这个联盟是多么无益和毫无意义。中国军队终于在向前挺进了。五个月来，一直在一个穆斯林民族的虔诚头脑里悬虑着的危险，已迫在眉睫。长期使人畏

惧又叫人等待了很久的“和台”，正以不可抗拒的力量迫近首都；一个被吓怕了的民族的危惧不安的心情使他们明白，他们的末日很肯定地就在眼前了。人民自己之间的纷争，统治家族间的不和，以及每一次为求统一的努力中的反对意见，都在起着有利于入侵者的作用。当中国人以一个大国的审慎态度进行策划和准备时，喀什噶尔的人民却陷入了近乎荒唐的党派策略的阴谋诡计之中。在那段时间他们的精力都耗费在这上面，而中国将军们正在把套索进一步收紧，要绞死这个新创立的国家，使它永无翻身之日。喀什噶尔人和他们的统治者好像几乎已经从中国人打进来的第一次震惊中恢复过来，并且对库尔勒以东有中国人存在一事已安之若素了，但当他们听说中国人再次进攻时，他们体验到更为严酷、更为持久的第二次震惊。他们的短暂的满意心情消逝了，他们的旧有的恐怖以十倍的份量全部恢复了。希望在他们的胸中破灭，而绝望的忍从只是支持他们硬着头皮去忍受他们早该以自己的勇敢力求避免的命运。现在我们要回过来谈中国军队以及它的一些决定性作战行动了。

在天山以北，最高总指挥权掌握在征讨喀什噶尔的军队的大元帅、甘肃总督左宗棠手里。在天山以南，指挥官是金顺和张曜，前者是围困玛纳斯城的英雄，后者是对吐鲁番和哈密作牵制战的英雄。前者的基地是玛纳斯，后者的基地是吐鲁番。他们的供应来源是中国边境内的哈密、巴里坤和楚呼楚，以及中国边境外的固尔扎、谢米烈钦斯克^①和塞米巴拉金斯克。他们的武器和弹药从兰州府越过沙漠运来，他们的部队则由加尔梅克和其他部落的新兵得到补充。中国人看来不象是很热衷于扩大他们军队的规模；他们毋宁说是注意配备贝尔丹来福枪和克虏伯大炮来谋求提高军队的效率；同时，在夏季数月的暑热中，他们留在他们最近占领的

^① 即光绪四年十一月左宗棠奏折中所说的“七河省”。——译者

土地上休息。在他们的队伍里，也不可能有那些据说曾在他们之间出现过的传染病发生。《塔什干报》上发表，而为某些伦敦报纸转载的一篇耸人听闻的短文，确认有一种在喀什噶尔称为“伏巴”的霍乱，曾经使中国军队很多人死亡；由于这一灾害的结果，它的进攻被永远地制止住了。毫无疑问，即使这一断言有一定事实根据，这也是一种过分夸大。其次，我们由高级权威方面获悉，俄国政府在它的新结识的朋友胡里伯克的请求下，已经停止运送粮食到中国军队所占领的地区去。然而，没有问题，卡曼斯基先生的商队继续在固尔扎和玛纳斯之间往来，而为中国军队办理伙食的主要经办人就是中亚的俄国商人。在他们来往的过程中，俄国人和中国人之间似乎不存在特别的好感。中国人因他们的胜利而洋洋得意，变得骄傲起来，并且非常喜欢提起固尔扎的问题，从而使该地的实际占领者不愉快。有一两回，这些口头上的争论采取一种更为危险的方式，争论者双方从口角发展到殴打。不管这一冲突 265 是否扩大，俄国政府并未因他们的臣民的损伤而采取外交步骤去要求赔偿，同时，即使不是事实上批准，也继续默许他们的商人给中国人供应粮食。这事的最清楚的证明是，阿克苏一陷落，一支大商队就被卡曼斯基先生派到那里去。在中国人和俄国人之间依然存在着不少的敌意；很久以来人们就怀疑俄国是否会把它的中立态度一直保持到喀什噶尔最后被征服。这种怀疑没什么好说，俄国人对中国的实力和最终意图的捉摸不定，对于中国正在取得的威望、对于它要去收复一个富饶而有利的地方的前景，心怀不满情绪。

总之，在东干和喀什噶尔问题下，酝酿着固尔扎的问题。现在既已说明了中国人在每一目标上准备得如何充分，武装得如何良好，战术单位给养如何充足，以及俄国如何真正地帮助了中国一方，虽然它对结果远不是漠不关心的；我们可以继续谈那些更为活

跃的行动，它们证明中国的将军们具备了充分使用他们所创造的强大武器所需的才干和军事知识，这个武器也是能够完成最艰巨的任务的。

第一个行动是在天山以南采取。就我们所知，左宗棠直到许多星期以后才离开玛纳斯。一位名叫汤仁和的准将，于1877年8月25日，率领前卫部队，离开托克逊去占领苏巴什和阿哈布拉的外围村庄。他的部下似乎不过数百人。两周以后，9月7日，董福祥和张俊带着一千五百人的部队，全都是步兵，随后跟来。他们经过阿哈布拉、库木什和乌沙塔拉推进到曲惠。部队在这地方集中起来。

266 这些分遣部队的首要任务是为主力部队准备前进的道路，在上述地点贮存燃料和用水，并且建筑临时防御工事。这部分任务完成得如此彻底，于是金顺将军，现在称作刘锦棠^①，于9月27日，发布了总进军的命令。

步兵走大路，而骑兵在将军的直接命令下，从侧道向同一方向前进。10月2日，天山以南的中国军队会合于曲惠。人数可能一共为一万五千人。9月24日，喀什噶尔部队的一支小队威胁了汤仁和将军的交通，但当中国人出现时，他们便“转身窜逃”了。金顺将军，就在他抵达曲惠的次日，又继续向前推进。两名准将，他们的名字没有必要指明，被委派带领兵力达六千人的一个师去执行对库尔勒的侧击运动。指挥官亲自领导他的主力攻击库尔勒，到达海都河，此河流入位于喀喇沙尔和库尔勒中间的博斯腾湖。但是他的前进在这里被阻止，因为叛军首领白彦虎已经阻塞了这条河的河道，用水淹这个地区。大水深度，据说最深部分灭顶，最浅部分也到达马背。中国人于是转向一个朝北的方向进军，以便找

^① 金顺和刘锦棠是两个人，作者搞错了，这里说的实际上是刘锦棠，下同。——译者

到这条河的上流，在那里就较容易克服敌人所设置的障碍。沿着这些碱质平原，小心地修建了一条车道，同时，把海都河截断，阻止它从上游流下，并在上边架起一道木桥。这一迂回导致了一些耽搁，然而，10月7日，在金顺本人从曲惠动身后四天，便到达喀喇沙尔了。来自海都河的洪水一直泛滥到这里，城内水深数尺。所有官署民房都同样遭破坏，而突厥穆斯林居民，象北京的《京报》称呼他们的，已被白彥虎强迫跟他撤退。人们很想知道，中国人所说的白彥虎指的是谁，但这几乎无法说明。这既不是阿奇木·汗，最可能的人是乌鲁木齐或哈密的东干族首领之一，他的地盘曾为阿古柏伯克所兼并，并被任命管辖吐鲁番地区。他似乎是留在库尔勒周围的那部分喀什噶尔军队的指挥官。 267

不仅喀喇沙尔被它的居民放弃，整个地区周围一带也是如此。的确，有些人逃入附近山里，但当这些人看见中国人已住在他们的家里，他们不敢回来。征服者于是执行他们通常的办法，移来新的移民定居在这个城市里。蒙古贵族扎希德勒克受命动员他部落好几百人前去占住这个重要的地点，修复房舍，重耕田地；当这种恢复工作正在中国人征服的领土进行的时候，他们经过之处如遇到敌对态度，则要受到远为不同的待遇。10月9日，中国人从两侧向库尔勒进军，就在那一天，发生了一次小规模骑兵战；在这一战斗中，有十五名白彥虎的骑兵被击毙，两名被俘虏。这两个人穿着浩罕人的服装，但都是中国的回民，是陕西省人；从他们的供词中得知，白彥虎和他整个部队撤退到库车，并带走了当地的物产和大多数居民。他们承认他们所属的这个小分队只是一个侦察小组，派出来探察中国军队在干什么。当中国人对他们讯问完毕以后，便把他们斩了首。同一天，中国人开进库尔勒，他们发现它是完全被丢弃了，虽然没有水淹。城墙依然屹立，但许多房屋都被推倒。在这里，这位将军几乎陷于绝望的困境，因为由马车和骆驼运输的 268

粮秣辎重没有到达，这支胜利军队就有因饥饿而撤退的可能。幸好，这位能干的将军想到，或者是有人提示，在这个城里，可能埋藏着喀什噶尔人未能带走的物品。于是全军动手搜索房屋，在所有可能埋藏东西的地方，都加以挖掘。他们的劳动很快得到报酬，找到了“好几万斤粮食”。一斤是一磅又四分之三；对于一支约有一万人的军队说来，这不是无关重要的补给。天山以南的军队的协调行动使入侵者占领了西边远至喀喇沙尔那样的地区。他们下一步的推进就可以把他们带入喀什噶尔平原，虽然他们不能期望这一步会象前一步那样不遇到抵抗。喀喇沙尔和库尔勒一陷落在他们手里，他们就颁布一项公告，招穆斯林居民返回他们的家乡，许多人被招回去了。在这个地区，中国军队并没有因任何过分行为而有损声誉，他们对非武装居民的温和态度冲淡了他们对武装敌人的严厉态度。

金顺逗留在库尔勒的几天里，他听到白彦虎正在胁迫库车以东策达雅尔和其他地方的人民，强迫他们撤退到库车，并毁坏他们的庄稼。他立即决定要挫败这一计划，他亲自出马，带领一千五百名轻装步兵和一千名骑兵前去保护那些地方的居民。他采取急行军，有时夜里大部分时间也继续行进，10月17日到达策达雅尔；这时他了解到白彦虎已经赶走了全部居民，并已到达去库车路上的布告尔。在邻近策达雅尔的村庄，叫做洋萨尔的一个设防要塞，他发现白彦虎仍然走在他的前头，并一路放火焚烧他行军路线上的村庄。金顺把一部分步兵留在后头去扑灭大火，并决然地率领其余兵力向布告尔迫近。这个小镇也已被放火焚烧，但是在这里，中国将军进军的神速得到了报偿，有消息说：敌军带着大批的居民刚刚走在前边不远。由一千名骑兵组成的后卫部队很快赶到，而喀什噶尔人因见中国人人数少而胆壮，奋勇发起攻击。然而，以优良的来福枪武装起来的中国步兵的沉着应战，粉碎了他们的袭击，后

由骑兵进行余下的战斗。喀什噶尔人在战场上遗尸一百，十二名被俘。从俘虏方面知道，主力二千人在前往库车的路上走了有一段路的距离，护送着白彥虎的家属和居民。那一天，再往前走是太晚了，但在第二天，又继续向前行进。先头部队很快看见一大群人——“约数万人”——，但通过望远镜观察，发现携带武器的不过一千人多一点。于是，金顺把所有部队带到阵前，并发出指示，凡发现持武器的一律杀掉，其他人则赦免。

喀什噶尔的军队把武装部分同非武装部分分离抽出，队伍中只留下大批要带往库车的穆斯林村民。金顺下命令把这些村民遣送到后方，并分配居住在条件最方便的村庄里。与此同时，在原有阵地后方几英里处，一个叫做阿尔巴台的村庄附近发生激战。这一战斗似乎打得很好，但是金顺这支小队伍因有优越的战术和武器占了优势，穆斯林军队遭受了重大损失，在极其混乱中溃退。金顺以惊人的速度和不休止的旺盛精力又接连取胜，喀什噶尔军队即刻逃奔库车，把居民和土地放弃给入侵者。不幸的居民苦苦哀求征服者的宽恕，我们怀着真正的满意心情记录这个事实：金顺保证了他们的安全，并要他们不必再恐惧。

这时候，中国军队可能已经从后方得到增援而大为加强，因为现在我们已叙述到了战事更为艰巨部分，攻打库车城。当中国人兵临城下时，他们发现喀什噶尔士兵和拒绝跟他们向西再后撤的市民之间正在进行一场战斗。但一见中国军队来到，喀什噶尔部队便撤离城市，同时，于库车西边和中国军队接战。中国人立即攻击他们，开头没有多少进展，而为数约四五千人的骑兵发动的袭击也因某些困难被击退。但是中国人用大炮轰击穆斯林军队，却收到显著的效果，同时，中国的后援部队不断进入阵地。最后，在密集炮火的掩护下，步兵奉命冲锋，同时，骑兵抓住最恰当的时刻发动突击。喀什噶尔人于是全军溃败，并在无可挽救的混乱中逃走，

271. 丢下一千多名士兵在战场上。他们的将军,中国人称他为马由布,早已受了伤,虽然据说他是一个知名的人,但无法根据这个中国名字确定他究竟是谁。无疑地,这是整个战争中一场最残酷和激烈的战斗。每一方参战人数约各有一万;赢得这场战斗要靠优越的战术和技巧,同样也要靠蛮力和勇猛。中国人的所有军事行动都有他们的非凡的深谋远虑特点,这些行动表明中国将军和他的副手们的非凡才干,也表明他的士兵们的服从、勇敢和忍耐力。从曲惠向喀喇沙尔迅速的推进、从那里向布告尔急行军、占领库车、征服者对待平民的宽容,所有这些综合起来使这一段战争对中国和它的将军们,特别是对金顺说来,是最值得钦佩的。在正式报告中提到喀什噶尔当局企图把居民带走的理由是:第一,叛乱者想要使入侵部队得不到一切援助,以致难以进一步追击;第二、想要讨好喀什噶尔的新的统治者胡里伯克,把这一大群突厥穆斯林献交给他。因此,白彥虎肯定不是阿奇木·汗。相当清楚,他必定是一个东干族的亡命者,或者是胡里伯克的一个下属。

272 中国人在库车设立一个司令部,并把一支庞大的军队作为驻防部队留在那里;但是他们的主要行政措施则旨在改善突厥穆斯林居民的处境。他们建立了一个行政部门,目的在于为贫民提供生计手段和为整个社会利益分配谷种。这个部门也监督道路的修筑和渡船、驿站的设立,用以便利商业和旅行的活动,以及加速邮件的传递。给所有的城市任命了行政长官和治安长官,并采取特别预防措施以对付瘟疫或饥荒的发生。所有这些明智的措施迅速地并以最实际方式实施了,就好象这些异国的立法和行政事务正是中国人的日常职务似的。人们没有理由认为,从吐鲁番到库车的广大地区里,中国人曾经背离过政治家风度的方略和仁慈的方针,这些方针正是他们再次成为统治者的标志。他们对于东干族反叛者和喀什噶尔士兵所表现的严厉和残酷的态度,已被他们对

待人民的温和态度予以抵消有余了。

10月19日,更可能是22日,金顺又继续向前进军,没有遭遇严重的抵抗。他第一次停驻在一个叫做和色尔的村庄,在那里他逗留了一夜给北京写报告,叙述前三周的成就和行动。在下一个叫做拜城的城镇上,金顺停下来等待张曜将军指挥下的后卫部队的到达。这支兵力于10月底之前到达,接着又继续向阿克苏推进。到此为止,我们首要的兴趣集中在天山以南的军队和金顺的成就。我们关于这一部分战役的主要的,事实上也是唯一的权威材料是《京报》。

现在,我们要叙述在左宗棠直接指挥下北边军队的行动,这支军队绝密地在这个国家的北部行动。那位将军,按最稳健的估计,有一支二万八千人的军队在他的指挥之下。有些人估计的数字较高;但是圣彼得堡一家报纸,根据去过玛纳斯的一个俄国商人的说法,估计这支军队有这么多力量。这支军队集中在玛纳斯附近,沿天山北麓,同时,在固尔扎俄国领地边界上也有。从各方面看来,这 273 支军队是处于一种保持静止不动的克制状态,因为它不可能开进固尔扎,所以就经由他们的旧路线,通过别叠里达坂或木素尔岭小道前进。但情况并不是这样,1877年的初期,普尔热瓦尔斯基上校的旅行并不是不曾被中国人注意到;因此,人们认为,一个俄国官员带着他的哥萨克随从能够走的地方,一支中国军队也能走。中国军队,在左宗棠指挥下,即穿过那些由特克斯河和裕勒都斯河形成的罕为人知的小道而入喀什噶尔;两支军队大概是在拜城附近会师的。由于左宗棠这一战略的成功,中国人才能以一支压倒优势的军队出现在阿克苏城下;穆斯林人民和守卫部队一看见这支军队,便在内心深处消失了所有抵抗念头。阿克苏是喀什噶尔东边的屏障,左宗棠一出现在城前,它的城防长官便惊慌失措,在第一次接触中就放弃了他的岗位。他后来被胡里伯克的一名军官拘

捕,并被处死。中国人于是向乌什挺进,它也是不经一击便投降了。我们说过,中国人没有发表任何关于这一部分战事的详尽叙述;因而,对于那些俄国报纸作了大量报道的、传说中国人在阿克苏和乌什的暴行,我们也无法说他们的说法如何。没有疑问,有大量的难民,也许总共有一万,逃往俄国领土,是他们传去了恐怖和夸大的惊慌的故事。如果说武装的防守部队一律被杀掉,我们会很少犹豫地接受这一说法;但是,如果说非武装的平民以及妇女和儿童也遭受同样的命运,我们断然地拒绝相信。每一个先例都有利于
274 认为中国人执行了一种较为温和的政策的想法,而没有强有力的理由解释为什么中国人对待阿克苏和乌什要不同于对待库车或吐鲁番。玛纳斯事件已被煽动者们坚持援作证明这个“暴行”的问题的例证,但我们有最高的权威根据来断言那里被杀的只是武装人员。这是中国人一贯的做法;那是一种民族的习俗,他们肯定不会在东干族和喀什噶尔的事件中背离这种习俗。没有可靠的根据证明他们犯了更残暴的罪行,即使是在被人这样突出地提出来的玛纳斯和阿克苏的例子中。

在12月初,中国人开始了全部行动中攻打首都这最后一着,并于该月17日以奇袭予以攻克。根据一个报道,伯克·胡里·伯克在城外打了一仗而被击败;按照另一个报道说,他先撤退到叶尔羌,当他听到喀什噶尔陷落时,便从那里逃往俄国领土。较为可能的是,他抵抗过中国人对喀什噶尔的攻击,因为他肯定是和在那次战斗中负了伤的柯尔克孜首领思的克·伯克一道到达了塔什干。随着喀什噶尔的陷落,中国人克复东土耳其斯坦的事业便告完成,其他城市,英吉沙和叶尔羌,迅速地遭到同样的命运。和田和色勒库尔也提出臣服的正式保证。但是,攻陷喀什噶尔事实上就结束了这一战役。中国人再没有碰到抵抗,这些新的统治者只需开展重新组织的任务就行了。当喀什噶尔陷落时,大部分军队认为他

们在中国人手里不能期望宽恕，他们逃往俄国领土，并散布关于中国人又进行屠杀的谣言，这可能只是出于他们自己想象的屠杀。毫无疑问，中国人的胜利是彻底的，在今后许多年中，土耳其斯坦人民不会再有勇气造他们的统治者的反了。中国的实力已十分充分显示出来，它的威信完全得到拥护。中国胜利的持久性如果会有什么危险，那不会是来自被征服的天山南路的人民，而将是来自俄国；中国的桂冠也不大会有在一个欧洲敌人面前凋落的危险。左宗棠以及他的副手，已经失宠的金顺——也许他曾激起他上司的妒忌——和张曜，完成了一项能为任何军队和任何国家争光的任务。他们使中国当前的政府增添光彩，而这对它是很有用的；同时，他们取得了不易消失的个人名望。中国人克复东土耳其斯坦，毫无疑问，是一件近五十年中在亚洲发生过的最值得注意的事件，同时这是自从一个多世纪以前乾隆征服这个地区以来，一支由中国人领导的军队所曾取得的最光辉的成就。这又以一种更为不合我们口味的方式证明，中国具有一种适应能力，必须承认这是在中亚日常政治生活中一个很重要的事实。中国人以欧洲人的武器和对西方的科学和技能的悉心研究，征服了喀什噶尔。他们的士兵服从按普鲁士原则训练出来的教官的指导而行军，而他们的将军则根据毛奇和曼托伊费尔的学说来指挥他们的部队。即在使用望远镜和双筒望远镜这样的小事情上，我们也发现这支中国军队是装备良好的。某些过分聪明的观察家描绘这支军队是由离奇地身穿绘有龙的军装或具有其他可怕外表的士兵组成，这是无比的荒唐可笑。凡此种种都是属于一种旧世界的理论。这支在东土耳其斯坦的中国军队完全不同于所有以前在中亚的中国军队；它基本上近似一个欧洲强国的军队。它的惊人的胜利主要归因于中国在这一事例中彻底地融会了西方的见解。

275

276

随着伯克·胡里·伯克逃往塔什干，结束了阿塔勒克哈孜家

族在喀什噶尔的事业。无论在中亚这部分地区事件会有什么变化，无论在浩罕或别的地方会策划什么重新向中国人的统治挑战的计划，被逐走了的浩罕官员们将不会在胡里伯克的周围重整旗鼓了。这个王子，人们有一个时期对他期望很大；由于临危逃跑，由于在一切行动中踌躇莫决，由于残酷地杀害了他的弟弟，他已无可挽回地毁掉了他的前途和名誉。如果俄国有朝一日企图扮演过去浩罕的汗们在喀什噶尔内部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他们端出来作为他们的傀儡的将不是胡里伯克。他的老对手阿奇木·汗有比他更好的机会；如果象许多人所曾主张过的，因为阿奇木·汗是布素鲁克汗的儿子，所以他真的是一位和卓家族的代表，那就尤其会如此。但是，事实仍然是清楚的，阿古柏伯克的在东土耳其斯坦建立一个个人王朝的一切梦想，现在已经破灭，而没有任何实现的希望了。

第十四章 中亚问题中的中国因素

277

击败东干族和收复喀什噶尔并没有结束中国将军们和士兵们在中亚的任务。这些胜利虽然巨大卓绝，但中国人并不因此而满足，因为还有许多事要做。他们已为皇帝收回天山南路，但只要俄国人还占着固尔扎，天山北路只能算赢回一半。而且，只要固尔扎还有一个军事强国驻扎在那儿，中国保持着阿克苏以西地区必然只是为人勉强容忍的。象过去那样，当喀什噶尔挣脱中国统治时，中国常常总是可以从伊犁去再征服喀什噶尔，现在俄国人在伊犁也就可以随心所欲扮演这一角色来对付中国人。简言之，俄国人之留在伊犁就会抵消中国人在最近军事胜利中所取得的一切好处。但是，中国人对于俄国的有利战略地位的疑惧虽然是有充分理由的，在中国人提出要求归还固尔扎的真正内在用意中，那并非唯一的原因，甚至亦不是主要原因。中国人在中亚的领土之中，伊犁是最受珍视的，左宗棠所以进行这种艰苦的征讨，特别是为了要收复那一个地区；这种征讨至此为止已得到胜利，其目的之一是给予这个封疆大臣以足够的威望和势力，以与李鸿章相抗衡。伊犁是他们在中亚的首府，伊犁的失陷便在 1862—63 年东干一和卓之乱与以前的一切祸乱之间造成截然不同形势。伊犁的失陷意味着中国政权的倾覆，只要伊犁在外人手中，中国政权就不能说完全恢复。这一点中国人是看得很透澈的。 278

另一方面，俄国则由于种种原因迟迟不肯交还伊犁。第一点，中国人是否已永久地克复东土耳其斯坦尚未能肯定；中国的财力能否继续负担中亚开支的重负，也不清楚。而且，李鸿章与左宗棠

之间的敌对的程度如何亦不知道，不论左宗棠由于他的满洲血统^①可以对军队和统治阶级有多大威望影响，但前者却掌握财政命脉，随时可以使中国在中亚的活动和威力瘫痪。同时，不论俄国人在北京曾作过怎样的轻率的诺言——他们确实作过允诺，只要中国人的力量已强大到能够回中亚去，他们便把固尔扎还给中国——他们却已正式地“永久”并吞固尔扎了（按照科尔帕科夫斯基的声明）。在中亚居民的眼中，那个声明确定了俄国人要呆在固尔扎不走，而不是对北京当局所作的含糊的允诺。现在俄国人象我们一样知道这一点；它感到，如果它是信守庄严的诺言，那也不能使西土耳其斯坦和东土耳其斯坦的人相信，它归还伊犁不是由于怕中国人而是因为任何其他原因。浩罕人、布哈拉人，以及吉尔吉斯人、加尔梅克人，还有喀什噶尔人全都会认定，俄国人归还固尔扎完全并不是由于它要实行它的诺言，而只是因为它如果不实行就必须和中国开战，它答应中国的要求就被解释成为它表示不想和中国在战场上相见。事实上，即使俄国当即归还固尔扎，它也不会得到它可以因为守信而要求得到的信誉，而且它也不能得到保证，保证中国人因收复伊犁本土就告满足，而不在军事胜利的盛气下进一步要求归还中国在二十年前很虚弱的时候自己割让给俄国的纳伦地区。在阻止归还固尔扎的政治原因之外，还有商业和财政上的原因，使俄国不愿归还这个地区。在俄国统治下，它不仅变得高度繁荣和人口稠密，而且成为俄国中亚领土中财政收入最富的部分之一，此外还有位处天山之中的令人羡慕的边界，这个边界对于以后与中国西部进行贸易比经由塞米巴拉金斯克和楚呼楚一路有利得多，而且最重要的是，这样就有效地驱散了受攻击的真正危险感。中国人会发现突破天山山脉入侵固尔扎是他们几乎不可能办到的事，这样他们就不得不从北面经由乌苏进入该地。这样做，他们就

^① 显然作者误以为左宗棠是满族。——译者

会使他们在玛纳斯和喀什噶尔两方面的整个侧翼和交通线受到具有严重后果的攻击,与一个象俄国那样的有科学技术的敌人周旋,没有一个思想健全的中国人会妄想在没有极度优势的兵力下进击固尔扎的。这里不妨先简述一下 1871 年到目前为止俄国统治固尔扎的历史,然后再来考察中俄之间的纠纷所引起的一些问题。

1866 年在固尔扎成立了一个独立政府之时,一个名叫阿布尔·奥格兰的统治者被立为王。他看来是一个东干人,他确实是一个蛮横而自信的统治者。他拒绝履行固尔扎和北京各种条约的条款,而且,事无巨细都与俄国直接对立。有五年之久,他干他的事,未受外来势力的干扰,在这一段时间内,他容许他的臣民侵入俄国地区,怂恿他的边界以外的吉尔吉斯人造反,并禁止俄国商人进入他的领土。他所使用的手段和后来阿古柏伯克采用的手段一样,只是规模小点。但他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暴君。他的臣民在他的暴政下怨声载道,他的境界内的七万五千个奴隶巴不得有任何一个拯救者降临把他们从他的束缚下解救出来。阿布尔·奥格兰统治下的固尔扎国家是极显明的一个经不起外部暴力一冲击就会马上土崩瓦解的国家。有五年之久,或约有五年光景,阿拉木图、纳仑以及谢米烈钦斯克的俄国当局容忍着他的隐藏的敌意;但是,当事情逐渐明显,他的国家已临四分五裂前夕,阿古柏伯克可能进来攫取其大部分时,俄国人的忍耐也就快告终,他们决定不能让阿古柏伯克或东干联盟抢先占领固尔扎,于是,一份最后通牒那样的东西送到固尔扎去,其中说如果奥格兰肯承认过去俄国与中国缔结的一些条约中的条款,就给予他一个保持住他的权力的最后机会。当要求他与俄国达成这样的协议时,他并未表示明显的拒绝态度。但他老是支吾搪塞和拖延,直到最后莫斯科局的耐心完全耗尽。于是他们决心摧毁阿布尔·奥格兰的政府,并吞固尔扎,并把他们的边界一直推进到天山。

1871年5月,巴利茨基少校越过了作为两国界线的博罗胡吉尔河,率领着一支小部队进入到阿布尔·奥格兰的领土有一段路。但他的兵力很少,只作了短时期的侦察,后又退回俄国地区。六个星期之后,主力由科尔帕科夫斯基将军率领越过国境进入固尔扎,向首府推进。这支侵入部队只有一千七百八十五人,六十五个军官。最初,阿布尔·奥格兰的军队作了英勇的抵抗,但俄国靠大炮和步枪节节取胜;7月4日这个统治者亲自到俄国军队的前哨投降。当他被带到科尔帕科夫斯基将军面前时,他说:“我相信我的事情是正义的,我相信真主的保佑。既被征服,我一切服从天意。如果我们犯了什么罪,请惩处统治者,但要饶恕他的无辜臣民。”第二天,俄国将军进入首府,这次战斗一共只进行了八九天。一切放下武器的人都允予受到保护,阿布尔·奥格兰的军队被解散。他本人则领到年金,并指定奥廖尔为他的居住地。固尔扎,或如公告中所称“准噶里亚”,被“永远”归并,并成为俄国伊犁斯基之下的一个辖区。不容置疑,俄国占领固尔扎,对于当地居民说来完全是一件好事。单是宣布废除奴隶制一点就把七万五千个人从艰辛无望的生活中解救出来。已趋停顿的贸易恢复,使这个社会中的活跃部分获得了繁荣和进步,俄国统治固尔扎的七年,居民在道德上、在物质福利上都有逐步的改善。在这一时期中,人口显著增加,伊犁河流域住满了满足而又兴旺的居民。俄国在固尔扎的统治是它在中亚行政区域中最光彩的一个点。中国人要求归还固尔扎就处在一个不利地位,因为他们是来取代一种有益的统治的。这种不利地位更因据说他们在喀什噶尔和东干地区所犯暴行博得的恶名而加重。谁要是肯费一点精神去仔细调查一下事情的真相,象他们翻阅参考《塔什干报》那样去查一查北京的《京报》,那就会发现,这些所谓暴行原来大部分都是惊惶失措中的虚构,恶意观察者的捏造;在少数几个事例中,中国人的复仇心超过军事纪律时,如

在玛纳斯和阿克苏发生的那样，那我们也都有明白的证据，证明妇女和儿童是未受杀害的。《塔什干报》没有白白地竭力散播中国人暴行的报道；一家伦敦报纸竟把俄国报纸上对中国人的攻击翻译出来提供给英国读者，引述《塔什干报》来说明中国人极端粗暴的不人道行为，来帮助俄国报纸就东土耳其斯坦这些谣传的杀戮行为煽起反对中国人的忿怒情绪。我们要冒昧建议，为了公平对待中国人，这家报纸应该把北京的《京报》上刊布的措词审慎、态度严肃的、关于《塔什干报》那么愤慨地评述的事件的报道提供给读者。

我们说过，中国人十分坚决要收复伊犁。他们可能不容易使俄国人允诺就范，但他们亦不绝望。充其量，他们可能在以外交手段收复它这一方面完全失败，但他们还可以使用现代外交中容许的一切其他手法。有过一些谣传，说中国打算在满洲割让一狭条土地给俄国，这条土地可以使俄国的符拉迪沃斯托克^①港口与阿穆尔河^②上一些要塞建立陆路交通。但这个谣传没有坚实根据；从最近消息看来，中国在戈壁以外的顺利，使它在北方不须再采取节制态度，而是给了它足够的自信，可以采取对抗态度以对付俄国人在这一方面的进一步侵犯。目前有人说，俄国要求赎金以抵偿它把固尔扎弄成目前这种繁盛状况所花费的金钱；这乍一看来似乎再公平也没有，我们认为中国人也不会对支付适度数额的赎金表示反对。但俄国所索取的款额远不是适度的。确实数目未听说，但中国人宣称，这个数字超过西北这一战役费用的总数，肯定不在二百万英镑之下。当然，这是太过分了，这也就是故意提出来的一种理由借以拒绝遵守以前的协议，给它的外交人员一种借口好与中国代表谈判。一个中国使节已被派赴圣彼得堡，力求在固尔扎问题上与俄国达成一种谅解；但这尚未见开始，真正的解决则

① 即海参崴。——译者

② 即黑龙江。——译者

握在左宗棠和考夫曼将军之手。最近报道，前者又重提归还固尔扎；他正热切并有点焦急地在等候俄国答复。在这期间，中国人在一个和田酋长手上又遇到一次影响不大的局部扰乱，中国人的势力似未伸到叶尔羌以南。但他们在赶紧增兵，几个星期前有二万名增援部队到达玛纳斯。他们在加尔梅克人那里也有广大的招募兵

284 员的基础，他们在楚呼楚的地位则可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如果固尔扎问题引起一场俄中战争，中国有足够兵力，也有足够的准备，使二万人的俄国军队陷于困境；而目前，十分肯定，在固尔扎的俄国军队不到五千人。但固尔扎问题，虽然那样突出，只是中国人出现在中亚所引起的和产生的那些问题中的一个，即使是最重要和最迫切的一个。如果俄国人拒绝归还固尔扎，那就尤其如此；而俄国人会拒绝归还固尔扎，那也是几乎不容置疑的；但中国人知道他们的对手的实力，也不会不加考虑地发动攻击，因为他们必定知道，如果失败，那是一定要吃大亏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固尔扎问题就将长期悬而不决，也许会拖到被人遗忘的时候。但中国人不会忘记这种侵犯，更不会原谅这种侵犯。但是，不论这段时间多长，拖延多久，固尔扎问题将继续是中亚政局中最重要的部分，它一日不解决，它对俄国的利益就继续发生不利的作用。中国人只须在楚呼楚、乌苏、玛纳斯、阿克苏、乌什和喀什噶尔保持他们的驻军，逐渐从甘肃和加尔梅克地区调增兵力，就可以使俄国对固尔扎的占领陷于危险的不安全处境。事实上，中国人在这上面是掌握主动权的，并可以采取等待时机的战术；而俄国则只能寄希望于左宗棠急于求成而获利。如果中国人拒绝与背信弃义的俄国人维持任何交往，而仅只宣称，固尔扎不归还，他们就不能与俄国人恢复政治和贸易关系，那么俄国人无论在固尔扎、在纳伦、在浩罕都永远得不到安宁。最重要的是，只要俄国继续象它现在那样经营

285 西亚，它就永远不敢阻截中国的势力，而投入一场东起符拉迪沃斯

托克和阿穆尔河，西到固尔扎和喀什噶尔的战争。因此，固尔扎问题的解决不是一件如有些人所设想的那末容易的事；在这上面，俄国并不象人预料的那样是强硬的，中国也并不是软弱的。但归根到底，如我们刚才说过的，固尔扎问题只是中国人出现在东土耳其斯坦所产生的问题之一。中国人作为一个因素出现在中亚的大问题中还引起更大得多的问题呢。现在，三个亚洲大国凑集到一个地方来了；结果将会是怎样呢？

只有充分认清过去教训的全部意义才可能对未来作一个冒险的猜测。英、俄、中三国之间的相互关系一直是怎样的呢？在本书中我们一直认为，在这里仍将认为，英俄之间不可调和的敌意，至少在亚洲是这样，目前由一层礼貌和文明的光漆掩饰着。我们要考察的只是英中之间和俄中之间的关系。先谈后者，这二国之间的关系一贯以来一直在贸易上和政治上保持着友好和互惠的联系。整个说来，它们之间的交往是颇为和谐的；而英国曾不得不进行三次战争才为我们的商人在若干海港取得立足点，俄国却并不需要采取那种极端行动，就取得了它或是说它的商人在中国中部和西部所要取得的一切。它把阿穆尔河变成一条俄国的河流；它从符拉迪沃斯托克控制着黄海和日本海；它从它在喀尔喀人中的地位和在固尔扎获得了两个门户，通往中华帝国的各个薄弱点。但在那个期间它一直还是和中国保持着极密切的友好关系。它获得 286 了几个最优惠性质的商务条约，因而一贯处在“最惠国”地位上。但是它已得到的比这还多；它已经是最惠国了。不过中国人也从来没有忽视过，与俄国所达到的这种谅解，就这种谅解所产生的好处而论，是非常单方面的。俄国虽然对友谊和善意作了这么许多声明，中国从这些滔滔不绝的许诺中究竟收取了多少好处呢？爱国的中国人只须看看阿穆尔河，看看被削弱缩小的满洲地区，就可以看出俄国人的友谊意味着什么。他还可以进一步看看。他只须考察

一下俄国设法与达若那它喇嘛^①所建立的关系；他只须听听库伦的人民对于俄国人在这个重要城市附近的地位的想法；那他就不会不形成一个清楚而明确的意见，俄国的友谊意味着什么。中国人关于他们的全部北方边界，要与俄国作大规模的谈判。只要中国人仍然虚弱，因而无力对它的朋友的惠顾抱怨时，俄国人就很善于和“富太太”周旋，讨好她并完全取得成功。但一旦中国变得强大，有能力推开它的过去的盟友的殷勤作态时，中国人就会改变语调，我们已听到中国人在阿穆尔河地区采取半抱敌意的态度了。中国的疑惧目前虽然还是模糊的——因为这是起因于它对俄国的敌意，对俄国在满洲和喀尔喀人中间的谋划的疑惧——但在它要求归还固尔扎后，俄国人仍继续霸占不还时，它的愤慨就是显而易见的了。总之，自从俄国人在克里米亚战争时占领了阿穆尔河上一些据点以来，中国对北部边界的虽然保持沉寂、但从未消失的全部疑惧现在已在中亚聚集成一个焦点，在那里俄国的样子似要截断(至少是在企图阻碍)中国人的胜利的前程。固尔扎问题是属于局部重要性的问题，并不象在伊塞克湖地区发生一次危机就会造成俄中之间的决裂那样具有紧迫性。那个裂痕早已存在，俄国方面任何让步也不能恢复它在中国人中间的好名声。不论它现在马上交还固尔扎或是尽可能以强力霸占不放，它都已丧失了要求中国人谅解的权利，因为它拖延承认中国人认为无论就那一点而论都是中国人的正当权利。如果俄国马上对中国说：“我们一定放弃固尔扎，只要求你保证居民的安全，”那末两国之间不但可以保持良好的谅解，而且还可以为了新的目的而在中亚建立一个俄中同盟。这个同盟必定对英国是充满危险的，其理由将在下面英中关系的题目下来谈。

^① Taranath, 意为度母,此人与五世达赖政见不合,出走外蒙,死于库伦。——译者

但俄国当局不能充分掌握这个局势的意义。他们把固尔扎问题只看作一个局部事件,并轻率地对待中国人,以为中国人对这件事没有很强烈的兴趣。他们完全忽视中国人性格中那种可怕的认真性,他们以轻率态度对待左宗棠的要求,这必定已激怒了那位将军。从任何观点看来,他们的政策是肤浅而不明智的,如果考虑到过去俄国与中国打交道所表现的策略和外交手腕,那就更显得浅薄和愚蠢了。当然,固尔扎这个问题在一切方面都与以前一切问题有本质上的不同,在这里,这是第一次,俄国必须后退,而不应象以前一贯地那样前进。俄国当局简单地只从对于中亚各民族有什么影响这一观点来看这件事。他们以为,交还固尔扎就会刺激西土耳其斯坦的一切敌对因素,也会降低他们在整个亚洲的威势。如一家主要的俄国报纸所说的:“归还固尔扎会是一种政治自杀行为,因为,这不仅会把中国的威信提高到前所未有的地步,并且会由于在我国自然疆界内给中国一个重要军事据点而破坏我们在东亚的地位。由于这些理由,固尔扎不能交还。”这一段话概括了俄国人为继续占领固尔扎而辩护所将使用的论点。他们还用谣传的野蛮行为咒骂中国人,吹嘘他们自己和他们的行政能力,把当前的固尔扎情况与假想的中国人收复固尔扎后的情况进行比较,添加了这样一些东西企图在民众的思想中造成对他们有利的影响。在描写假想的未来情况时,他们完全抹杀东干之乱以前固尔扎的繁荣状况,他们似乎认为,当他们在1871年开进固尔扎时存在的混乱状况是由于中国人造成的,而不是由于当地人自己的忘恩负义和反复无常。他们对于中国统治中亚这一个世纪中对当地所作的大量好事则闭目不看。他们希望我们,以及其他每一个对这一事变的观察者,都象他们那样做。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历史的教训是清清楚楚的,并且指向正相反的一个结论。我们并不否认俄国统治固尔扎时的德政。我们很爽快地承认这一点。但那也没有理由可

288

以诽谤中国人，说中国人是十足的野蛮人；在中国人的眼里，那更不是可以拒不归还固尔扎的理由。有理由相信，左宗棠的建议是讨伐阿古柏伯克之前作出的，俄国拒绝接受这些建议，就已触怒了中国人；以后讨论这个问题时俄国人一味拖延，那更使中国人不悦。俄国人意识到这点，并且也确信，不论他们想采取多么友好的态度，中国人现在也不再会欣赏他们的谦逊态度了。如果我们承认这点（这也是不易否定的），那末，固尔扎问题将如何解决，许多人认为可能采取的和平解决将是怎样的解决呢？如果俄国不同意中国决心不再让步的条件，这怎么能和平解决呢？肯定不会通过穆斯林居民方面又一次扰乱而解决，这是有些人把和田一个小统治者对一支中国驻军的小胜利加以夸大而作过的预测。肯定也不会通过象境外的附属国的敌对行为那种无足轻重的情况，使中国人或是被逐出喀什噶尔，或是被迫放弃对固尔扎的要求。和田一个酋长的成功只是整个战役中一个小事件，对于那个地区说来、对于当地人民说来也好，这都应被认为是一件大不幸。中国人是要进行可怕的报复的。固尔扎问题不会通过这些途径来解决，英国读者可以肯定地这样认为；俄中之间的敌意将日甚一日地表面化。在边境上已传闻有小规模的骚扰。曾有俄国商人受到一帮盗匪的袭扰，被袭击者指称这中间有中国士兵；而且从中国将领也得不到令人满意的赔偿。俄国就这个问题曾向左宗棠提出抗议，但他的答复并不是很友好的。在战争过程中，俄国商队在玛纳斯、乌苏和乌鲁木齐总是受到欢迎的，现在不再受到那种热情接待了，中国人正在表示有对俄国人关闭边境之意。《塔什干报》报道，现在愿意从固尔扎前往中国军队占领地区的商队不多；俄中之间的旧日同盟是缓慢地虽然是确定地在开始把过去有过的、但现在没有的东西恢复过来。但是，虽然情况很清楚，固尔扎问题的未来方向如何仍难于预料。左宗棠不见得会公开地进击俄国人，他的手可

能为国内当局所牵制住，他在那一可能和放弃他的事业之间大概没有自由选择的余地。必须牢牢记住，俄国最厉害的武器是在北京搞阴谋，可能有一个能干的特使在播弄左宗棠和李鸿章之间的倾轧对立，诱使后者削减中亚军队的给养和补充以摧折前者的雄心。我们相信，这样一种卖国的勾当李鸿章是不屑做的，而且这肯定包含着极大的风险，他如果为了对付一个私敌而堕落成外敌的工具，这个危险肯定要落到他自己的有罪的脑袋上来。但也不容否认，由于中国的主要政治家之间有倾轧对立情况，必然要危及它最珍视的利益。固尔扎问题在中亚是很难得到和平解决的，但在北京的宫殿里要比在准噶尔和土耳其斯坦进行大规模的战争可以得到容易得多、有效得多的解决；可能，俄国会采用这一办法消除来自左宗棠的危险，使中国人最近的胜利化为乌有。但他们是否能取得成功亦甚可疑，因为中国方面关于这个问题的舆论正日益高涨，满族阶级联合起来支持它的成员左宗棠。即使俄国人取得成功，那也只是把固尔扎问题暂搁起来，因为只要中国人还留在喀什噶尔、玛纳斯和乌苏，他们必定把俄国人留在固尔扎看作对他们的侮辱，也是对他们的交通线的威胁。

但是，一切可能性都阻碍俄国人的成功。李鸿章的地位并不是 291
坚固到使他敢于与那些为维护民族利益，诸如收复中国土耳其斯坦这样的事的人相对抗的。卖国政策采取后可能引起的最小的危险是左宗棠率领他的老兵回朝。如果这种国内危险不发生，那末固尔扎问题就将由左宗棠和在浩罕和固尔扎的俄国当局双方来解决。那种谈判的结果如何是不容怀疑的。双方的代言人都是军人，每一方都同样地对他们的能力和力量具有自信，每一方都因长期的战功而骄傲自大。在谈判这个问题时他们必将是热血沸腾、神情激动的；理性不会是主持会议的女神。双方将互相归咎和责难。如果这样，固尔扎问题就不会长期谈判下去，也许今年年底以

前，更可能是明年初春，在天山脚下俄、中之间将发生战争。即使左宗棠满足于让他的论据披上外交词令的外衣，只要俄国留在原地不走，困难也无从解决；从而，俄中之间的意见相左就会象两国之间发生公开战争那样大。归根到底这是最主要之点，因为，俄中之间一切好感的摧毁，意味着在“中亚的大竞赛”中加入了一个新因素，而这个因素，由于对俄国不利，对于英国就是有利的东西。在固尔扎问题上发生的不和，扩大了两国之间过去存在的不协调之点，从而就无可挽回地摧毁了曾经一度存在的俄中两国对待巴拉吉尔山口和克什米尔的共同政策的任何前景。现在我们得考察英中之间的以往关系了，那么我们才能理解中国重又在中亚出现的全部意义，以及三个强国逐渐靠近，亚洲的无数小国逐渐被消灭，可能会发生什么结果。

那么，英中之间过去的相互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呢？这里不必去讨论我们在沿海地区所处的地位，因为这实际上是一个题外的问题；我们也不必去追述我们在中国东部被迫进行的那几次战争。那几次战争、那些条约以及继续不断的互相往来的结果是，英国人在许多大城市里得到了立足点，英国的商业是在那些地方占最优越地位的。但是，沿内陆边界上的关系则正好与沿海地带所获得的相反，这方面的关系处在完全不同的看法的影响之下。在上一世纪和在本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严格说来我们不是中国的邻国；因为，在二国之间介有一系列名义上归顺中国的半独立国家。这里面有尼泊尔、锡金、不丹、缅甸以及它的属邦阿萨姆邦。在康沃利斯勋爵时代我们初次认识到中国的威望曾经伸到喜马拉雅山以南这一事实的意义。尼泊尔的廓尔喀族统治者们曾屡次侵犯爱和平的西藏人，最后竟变得如此大胆，在一次入侵中推进到拉萨进行掳掠。那时，年高的乾隆正打算退出公共生活（在几年之后，他象是个亚洲的查理五世，采取了这一步骤），但当这种冒犯他的权

威的消息传到时，他的尚武精神又被激起，他誓言要让加德满都的匪徒们因他们的无法无天行为受到严重惩罚。一支号称七万人的大军集结起来，中国将领们就经由吉隆山口向尼泊尔首都进发。²⁹³沿着这条高山上的道路进行了一场恶战，结果是中国得胜。另外几次交战结果也都是中国取胜，廓尔喀人就不得不求和。中国人没有停止推进的意思，直到康沃利斯勋爵介入敌对双方之间，才进行议和。尼泊尔承认中国对它的宗主权，同意每五年进北京朝贡一次。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中按时入贡不误，但最近三十年来有时中断，或是说变得越来越不按时了。但对于我们说来，归根到底，主要之点在于，中国人虽然对康沃利斯勋爵的干预让步，但这样做实际上是很勉强的。我们介入在他们与他们的猎物之间了。

但这还不是我们确实犯了的错误的全部意义。我们触怒了中国人；而且我们完完全全触犯了西藏的人民和喇嘛。沃伦·黑斯廷斯曾经派过两个代表团——一个由乔治·博格尔先生率领，另一个由特纳上尉率领——到扎什喇嘛^①那里去，通过这两个使节在西藏很成功地打开了一个局面。他并且采取温和地对付难于驾御的不丹人的办法，对他施加了一种恩惠；接着他又利用这种感恩心理继续地先后又派了两个代表团。当康沃利斯给尼泊尔打开英国的保护伞时，我们的确与西藏还没有外交关系，但我们与西藏人民有很好的关系，我们在拉萨有一个名叫普隆吉尔·哥山的当地人作代表，我们在西藏南部的城市日喀则的名誉很好。当廓尔喀人进犯西藏时，西藏人把这件事通知了我国政府，并请求它调停以阻止廓尔喀人的侵犯。他们的合法保护者中国人是离得那么远，在²⁹⁴中国人能派一支主持正义的军队赶到以前，可能已受到很大损害；因此，他们在危急时向他们一直认为很公正的朋友英国人乞援。他们发出呼吁时显然以为英国人会答应帮助的。因此，当廓尔喀人

^① 即班禅喇嘛，因班禅主持后藏扎什伦布寺。——译者

迫近拉萨，劫掠雅鲁藏布江灌溉的肥沃地区时，他们看到英国人仍旧漠不关心，他们就感到加倍的遗憾。但是，他们看到我国政府保持漠不关心态度时的遗憾和惊异还不能算什么的，当他们知道我们确实出头干涉了，并维护了做强盗的廓尔喀人时，他们的愤怒就大了。我们固然保护了廓尔喀人免受应得的惩罚，我们当然也阻止了中国人在加德满都驻兵（这本来就是我们可以随时赶走的）；但我们触怒了西藏人和中国人，促使他们联合起来采取敌视我们自己的政策。在那次战事（1792年）以后，喜马拉雅山各山口都对我封闭了，中国人的防舍从此以后就有效地封锁了通西藏和亚洲北部的道路。托马斯·曼宁先生，是最勇敢、最有才能的英国旅行家之一，他在1812年突破阻难、进入了西藏，并在那里居住了一个时期。但这只是英国旅行家战胜不丹人和廓尔喀人的漠不关心和中国人的敌意的仅有例子。西藏至今仍是加上封印的天书，即使条约规定有权进去，但没有一个英国人上那里去；虽然吸引力很大，可得的战利品也远非渺茫、远非微少的。我们认为，其原因就是中国人的隐蔽的敌意。

如果我们再往东一点看，看我们已并入版图的阿萨姆邦，看看缅甸，甚至暹罗，我们也发现同样的原因在起作用。我们承认了云南大理府的潘泰苏丹；我们总是竭力把缅甸和暹罗的国王当作独立的君主，但他们却都是中国的藩属；我们被人认为是在阿萨姆邦境界以外与掸族和其他部族进行阴谋活动。这些做法也可能是慎重的，也可能从某种旁的理由看来是不慎重的，但从激怒中国人这一理由说来，这肯定是不慎重的。作为旨在与中国和解的政策来说，我们在北方边界和东方边界上的边界政策是再坏也没有了，从头到尾都贯穿着错误；其结果是近半世纪来我们一直与中国人处在极不好的关系中。我们本应该能与他们和解的，但我们不但没有能与他们和解，反而引起他们潜在的怀疑和憎恶。我们本应该

是友好的邻国,可是相反的,我们即使不是到了互相水火不相容的地步,至少是互相规避的邻国。我们对中国人的感情的真实基础可以从这样一个事实上看出来:在印度国务政策守则中最初几条中的一条便是“尽可能地和中国离得远些”。这个告戒可能曾经很有用,但已经过时了,现在应是我们的印度—中国政策建立在一个新基础上的时候了。中国现在又君临我们整个北方边界上,它几次在曼谷提出了最后通牒,它认为可以对曼德勒的统治者施加压力,现在正是我们应该完全撇开中亚问题,清理一下我国与中国人的关系的时候了。我们在保护廓尔喀人、在承认潘泰,在对中国人的意见采取漫不经心的态度的总政策上等等方而所犯的错误,都趋向于造成目前我们与中国关系中的僵局。我们的承认阿塔勒克哈孜是不会使中国人对我们发生很友好感情的,因此,目前我们就应假定,中国人在云南、在西藏方面对我们所抱的感情状态在喀什噶尔方面也同样存在;那种感情就是隐蔽的敌意。因此,当中国人开始以一种曾经这样对待英国的敌对情绪来看待俄国时,他们完全沒有改变他们以前对我们的情绪。我们未曾做过什么来促使他们改变。我们沒有对他们作任何帮助去收复喀什噶尔,整个说来,英国的舆论对他们的要求可说是反对的而不是赞许的。他们在喀什噶尔和叶尔羌的兵器库里发现许多证明英国与阿古柏伯克结盟和与他友好的证据;而另一方面,他们却确实从俄国商人的协助和俄国政府的容忍上得到许多好处。我们片刻也不能自己骗自己,误以为中国人会象阿古柏伯克那样向我们乞援以反对俄国。他们沒有我们支持就征服了东土耳其斯坦——实际上是不顾我们道义上的反对;他们尽可以靠自己的力量保持它。他们绝对不会考虑到采取阿古柏伯克的老办法,用英国去抑制俄国。然而,他们虽然将完全独立自主地行动,这并不等于说他们一定会对我国采取敌对态度,只要我们能运用某种侥幸的外交手腕,让他们相信英

国对于中亚战事的结局是满意的，虽然英国在战争过程中未能认识那一方是正义的。但这个侥幸的外交手腕应是怎么一个手腕？这又该怎么进行呢？对这两个问题作出任何大胆的回答都是轻率的。与中国人打交道的話，我们不只是与一个我们还很不了解的民族打交道，而且还是与那样一个政府打交道，它所奉行的政策的动机是我们既不了解也不重视的。因此，我们采取的行动，即使以某一熟悉中国内情的英国人的经验为根据，也很可能不能取得主观上似乎想取得的东西。这可能以成功结束，也可能一败涂地。当然，²⁹⁷首先要决定下来的是，我们该怎样正式承认中国收复喀什噶尔，我们怎样让左宗棠及其部属深信我们已深悔我们在对待阿古柏伯克方面的近视政策，我们愿意尽我们所能充分承认喀喇昆仑以北局势的改变，来进行弥补？

烟台条约授予我们派使节驻在西藏的权利，其条件是在一定的地区范围内活动。我们并没有利用这一特权，我们听说，中国人认为这一权利已失去时效了。我们没有实施中国人为了赔偿马格里先生的被杀害所作出的唯一真正的让步，也许是明智的，也许是愚蠢的——依我看来是愚蠢的。这一让步我们既未利用过，那末是不是可以让我们派一个代表团到喀什噶尔的中国人那里去呢？根据这一先例行事，我们是否可以设想中国人会对于从列城前往叶尔羌的英国使节会伸出友谊之手呢？恐怕很可能不会。目前，那个地区也十分混乱，中国人现成地可以推说怕英国使节发生意外来予以拒绝。而且，就目前而言，这个使节也无具体目的。几年之后，中国人的统治在整个东土耳其斯坦完全恢复时，在这方面的贸易才可望恢复，但目前提出此事，则为时尚早。单纯为了祝贺而派使节也不合适。我们不久前还和阿古柏伯克那末亲密，现在马上又要对他的征服者进行祝贺，那就变成只是对自己的嘲笑了。这样中国人就会得意忘形，以为我们只是崇拜他的旭日东升。不论

我们在中亚采取什么行动,要与中国人达成谅解,我们就必须非常仔细,要事先慎重考虑,要非常小心地把情况清楚地弄明白。任何失错过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都会是个致命伤。因此,我们必须什么也不做。我们的座右铭必须是“不要弄醒睡着的人”,我们必须等待某种有利情况出现,那时才可能与中国进入友好关系。 298

但是,在中亚我们的手虽被缚住,在北京则并未受束缚,如果我们尚未祝贺,我们肯定应该祝贺中国人在天山地区的大胜利。这一步骤可能孕育着一些有利的后果,我们想与我们的新邻居也是老邻居友好往来的愿望可能受到中国人热烈欢迎。中国人不会为了保持他们在东土耳其斯坦的统治而屈身与我们和解;但是,以为他们与俄国人发生争吵时也想和我们找麻烦,那是违反常识的。固尔扎问题一定会把中国推到我们这边来,只要我们不轻率行动,不要与据说打垮了一支中国分遣队的半独立和田酋长发生关系而蔑视中国。同时,与喀什噶尔的统治者进行谈判时,我们必须牢记,通商利益固然重要,但政治利益更是无限重要。简言之,我们庇护阿古柏伯克只是给坎格拉^①茶叶开辟一个市场;但我们从贸易意义上所得的这一点极微末的利益是远不能抵偿我们从承认阿塔勒克哈孜所造成的政治损失的。与中国人交涉时,我们决不可把对喀什噶尔和叶尔羌的善良人民供应茶叶及其他必需品的特权当作我们的指路明星摆在面前。我们所企求的是与作为中亚一个强大势力的中国友好往来;这个势力,在伊犁收复后将拥有它所期望的一切,从而它必然倾向于和我们一起去抵制俄国的过分扩张。这些都是今后能从中英之间的谅解产生的好处。但在当前场合,还有另外一些性质相似、但即时有效的好处。阿富汗问题在许多方面与固尔扎有关,目前要求解决的呼声颇高,如果我们在喀布尔的地位不能更稳固一些,这个问题就难于通过当前危机解决。 299

^① 旁遮普地区中一个山区。——译者

在这两个问题中,俄国的野心都是推动力,并且,它也总是采取风险尽可能少、收获尽可能多的做法。无论在那一个问题中,它如果能够避免,它就不会使用武力;但两者都有一个临界点,超过这一点的时候,它的荣誉心和实际利益都不会允许它继续掩饰自己而保持中立。两个问题的解决正在同时进行中,阿富汗问题的进展至少将严重地影响固尔扎问题的后一些阶段。如果俄国不得不为保护希尔·阿里而战,那么我们可以肯定,左宗棠的军团不会袖手旁观,科尔帕科夫斯基将军或是不得不退回到阿拉木图去,或是就得进行一次依靠他本身的兵力作战而不可能取胜的战争。如果俄国公然进行干涉,维护希尔·阿里,固尔扎就必须还给中国,否则俄国的侧翼便将受到毁灭性打击,中国人不会不立即利用这一机会。因此,伊犁和喀布尔的当前事件有这样一些共同性,都直接地或间接地危及俄国在中亚称霸的结构。英国占领阿富汗,或十分可能是阿富汗的一部分,就会严重削弱俄国在西土耳其斯坦的威势。中国占领固尔扎则会危及它在阿拉木图和纳伦以及在吉
300 尔吉斯人中间的地位。如果同意这些论点,那末是否很自然地可以假定,在这两个问题中俄国都要使用武力,或是即使不都使用武力,它也会在它认为是最重要的那个问题上使用武力呢?但是,我们不必对这个问题再追问下去了。中国人目前在中亚心脏地区与俄国势力对峙,正如不多几个月以前它们反对阿古柏伯克和东干族势力一样。

他们的军队已作好战斗部署;人数一天比一天增多,准备得一天比一天完善。它的将领就是指挥它节节取胜的那几个;它的主力是三次战役的老兵。中国人认为他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也不可能说他们的认识是不正确的。俄国人就无法具有同等的自信,无论在兵力上或在道义立场上。他们所捍卫的并不一定是不好的事情,也不是注定要失败的,但与中国人相比较,他们就沒

合法地位了。究竟用武力办法还是用外交取胜的办法才能弥补他们占据固尔扎的造成的裂痕,还要等着瞧。此外,面对着即将发生的事情,正在形成英中同盟的前景,那是必然对亚洲各族人民总的来说都是最有好处的。但是,在英国人有可能把中国人的出现认为是“中亚问题中的有利因素”以前,我们与中国的关系必须置于前所未有的更坚固、更友好的基础上才行。我们有力量做到这点,俄中之间日见扩大的裂痕在不小程度上使我们这一任务简化了。到有一天俄国会发现固尔扎问题完全不是一个小问题,中亚许多重要事件都可以和它发生牵连。英国也会认识到,在它与俄国长期较量中,固尔扎问题是最有用的情况之一,对它起着前所未有的有利作用。正当我国边界历史上出现危机之时,当我们要对喀布尔的一个爱弥尔进行慎重斟酌过的惩罚的前夕,俄国发现它自己的地位,因为被迫要与中国进行谈判而被削弱了,而它的注意力又必须放在另一个地方。它不愿答应中国人要求的東西,但它又不敢拒绝;中国人则可以老等下去,直等到俄国在另一处被困住。说中国人在明年年底以前,也许还要早得多,将经由和平手段或使用武力收复固尔扎,并不是冒失的预言。那时亚洲三大强国中必有两国就一切中亚事务结成同盟,在这种同盟面前,那第三国就得谨慎地俯首听命了。那个日子来临之时,我们得彻底地、及时地吸取我们已得的教训才行。

附 录

罗布泊的位置

1876—77年,普尔热瓦尔斯基上校对罗布泊进行了探查,探查的结果在今年春天作为一个专刊发表在彼得曼博士的《报导》杂志上。我根据普尔热瓦尔斯基上校的探查,把罗布泊绘在本书附图^①上。这位勇敢的探险者认为罗布泊就是他的喀拉噶顺湖。他这一看法的准确性在本图绘制时还沒有人提出异议,而等到9月14日发表了对它怀疑的下述有力的理由时,我又来不及作必要的更改了。

下边一段摘自1878年9月14日《雅典娜庙》杂志的引文,是关于费迪南德·冯·里希特霍芬男爵对普尔热瓦尔斯基上校的几个湖的考察提出的非难:——

“看来俄罗斯旅行家普尔热瓦尔斯基最近在中亚内地所作的著名的旅行时,根本沒有象他声称做过的那样探查了罗布泊。当今第一批比较地理学家之一费迪南德·冯·里希特霍芬男爵,特地依据中国文献,审查了这次旅行报告;就我们的看法来说,他几乎无可争辩地证实:真正的罗布泊必定位于普尔热瓦尔斯基所发现的所谓喀拉噶顺湖东北某地,它的湖水极可能是由塔里木河东边一条支流所灌注。总之,这可说明,为什么该河河水再往南流时
304 水积有显著减少;这一点不能不引起读这位俄罗斯探险家记载的细心读者的注意。我们沒有篇幅复述冯·里希特霍芬所提出的全部论据,但较为重要的是这些:——普尔热瓦尔斯基所探查的湖是一个淡水湖,而罗布泊古往今来都以咸水湖著称;沙敖、弗赛斯以

^① 原书所附地图未译制。——译者

及其他权威人士报道，罗布泊这个名字在那些地区里是众所周知的，而普尔热瓦尔斯基却没有听到有人用这个名字称呼他那个湖；准确性一再为冯·里希特霍芬证明的中国地图都把罗布泊画在更东北一些，并把两个几乎处于普尔热瓦尔斯基所发现的那些湖的位置的湖叫做哈斯—鄂模，哈斯(Khas)是蒙古语，意为“玉”，是和田地方的名产，中世纪的中国商人就是路经这两个湖前往寻找它。另一个重要的论据，象我们已经提到的，是根据自塔里木河口流出的水积。冯·里希特霍芬的理论假定塔里木河已改变了它的河道，它的主要流向现在是东南，而不是从前的正东。整个问题很值得作进一步的考查。来自圣彼得堡一条最近的电讯说，普尔热瓦尔斯基正要回中亚去，这也许使他能够弄清楚这个问题。他将回到俄国边疆要塞斋桑，然后设法经由巴里坤和哈密进入西藏。

“然而，肯定的，他将会碰到颇大的，如果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因为我们从来自印度的私人报道中获悉，当时拟议派代表赴西藏一事欠考虑地在《烟台条约》中公布，结果，一切道路和隘口上的西藏官员都接到最严厉的命令，不许欧洲旅行者以任何借口进入西藏。”

费迪南德·冯·里希特霍芬男爵的观点受到《雅典娜庙》杂志 305 的高级权威赞同，而且显然是令人信服的。在转述他的观点之后，我们应介绍普尔热瓦尔斯基本人的描述的主要部分，这才公平。1878年5月《地理杂志》记载了他的全部报告，这儿所引的一些话就是摘自那个译文：——

“在离较小的喀拉布朗湖十五俄里之处，考察团折向南行，至恰尔恰里克村；这个村大约在三十年前为来自和田的囚犯所营造，现在还有一百一十四人在为国家种地……。恰尔恰里克村所在的地方和距离它两天路程之处，有两座城镇的遗址，分别叫做奥托古

什沙里(得名于一个过去的统治者奥托古什)和加斯沙里。靠近罗布泊(喀拉噶顺)是第三座、相当大的、叫做老沙里城的遗址。普尔热瓦尔斯基打听到,大约 1861 年或 1862 年,有为数约一百六十或一百七十名的俄罗斯人,包括妇女和儿童,带着他们的驮马,用燧发枪武装着,定居在塔里木河下游和恰尔恰里克村;但是他们没有久留,不久就经由吐鲁番回乌鲁木齐去了……。我们回头来看考察团于二月初到达的罗布泊(喀拉噶顺)时,就可以观察到,塔里木河先流入一个较小的湖(三十至三十五俄里长,十至十二俄里宽),叫做喀拉布朗(意即“黑风暴”);车尔臣河也流入这个湖。喀拉布朗湖和罗布泊这两个湖的大部分都长满着芦苇,河水在湖底中部流动。罗布泊这个名字,本地人用来称呼塔里木河的整个下游,而较大的那个湖叫做乞克库勒或喀拉噶顺。这个湖,或说得恰当些,这片沼泽,是一个不规则的椭圆形,向西南和东北伸延。

306 “这湖的长径大约九十至一百俄里长,短径不及二十俄里。这个资料得自本地人,因为普尔热瓦尔斯基本人仅仅探查了南端和西端,乘小船下来,航行了这湖一半的长度,由于湖水逐渐更浅和四面八方的苇丛,使得他不可能再前进。湖水本身,清澈甘甜,虽然环湖有许多盐泽,同时,在盐泽之外有一片与目前的湖岸平行的陆地,长满着怪柳树。有可能,这片陆地从前是湖的周边;这一猜断得到了本地人的证实,他们说三十年前这湖是比较深的。”

很清楚,罗布泊的真正位置仍须由现代的探查来勘测,但是我们有把握地可以跟着《雅典娜庙》杂志认为,普尔热瓦尔斯基上校的喀拉噶顺湖并不是罗布泊。因此,在这一点上,本书附图不幸是错误的。

人们有一切理由相信,罗布泊将在中国地图所划的位置上找到。中国地图给哈斯—鄂模这两个湖标出的正确位置,非常惊人

地证明了它的准确性；哈斯—奥摩正好就是普尔热瓦尔斯基的喀拉噶顺和喀拉布朗两湖。

如果能得到普尔热瓦尔斯基所说的俄国移民的一本日记或其他的记叙的话，一定会是很有趣的；这些俄国人是在《伊犁条约》签订后的太平年代、恰好在东干骚乱爆发之前进入这块中亚未知的土地。有可能，他们在返回乌鲁木齐的旅途中已解决了罗布泊之迷而不自知。因此，请读者记住，罗布泊实在应在本书附图上给它的位置的东北方面(约四分之三度)，标示在本书附图上的湖只是普尔热瓦尔斯基上校的喀拉噶顺或乞克库勒湖。

307

最近消息：普尔热瓦尔斯基上校坚持他对罗布泊位置的看法，并在准备一份答复，将于今后(十月一日以后)几周内发表。

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①

一八五一年八月六日，咸丰元年七月初十日，俄历一八五一年七月二十五日，伊犁。

大清国总统伊犁等处将军、参赞大臣；

·俄罗斯国使臣；

各遵旨在伊犁地方，公同会议伊犁、塔尔巴哈台两处通商各章程，开列于后：

一、两国议定，通商之后，各谕属下人等，安静交易，以敦和好。

309 一、两国商人互相交易，虽系自定价值，不能不为之设官照管，中国由伊犁营务处派员，俄罗斯国派管贸易之匡苏勒官照管。遇有两边商人之事，各自秉公办理。

一、通商原为两国和好，彼此两不抽税。

一、俄罗斯国商人前来贸易，由该头人带到中国伊犁博罗霍吉尔卡伦、塔尔巴哈台乌占卡伦，必须有俄罗斯国执照呈坐卡官照验，由坐卡官将人数及货物数目声明转报，派拨官兵沿卡照料护送。彼此不得互相刁难。

① 这是本条约的汉文旧译本，见《中外旧约章汇编》，王铁崖编，三联书店 1955 年版，第一册，第 78 页。该书编者在这汉译本后有一附注：

“本章程见《咸丰条约》卷 1，页 19—91。俄文本及法文译本见《俄外部：俄华条约集》，页 96—102；满文本见同书，页 103—109。

本章程有满、俄文本，原无汉文本。《咸丰条约》所载汉文本系译本。本章程交换批准的日期未查明。”

本书英译本上有批准日期“……1851 年 11 月 13 日批准。”——译者

一、俄商往来,均由预定卡伦,按站行走,以便沿卡官兵照护。 310

一、俄罗斯商人在中国伊犁博罗霍吉尔卡伦外、塔尔巴哈台乌占卡伦外行走,倘有夷匪抢夺等事,中国概不经管。自入卡伦及在贸易亭居住,所有带来货物便在该商人房内收存,各自小心经营;其驼马、牲畜在滩牧放,尤宜各自留心看守。倘有丢失,立即报知中国官员。两边官员公同查看来去踪迹,如有在中国所属民人庄院,或将行窃之人立即拿获,尽数搜出实在原窃赃物给还外,并将行窃之人严行惩办。

一、两边商人遇有争斗小事,即著两边管贸易官员究办。倘遇人命重案,即照恰克图现办之例办理。 311

一、俄罗斯商人每年前来贸易,定于清明后入卡,冬至即停止。倘于定限之内其货物尚未卖完,听该商人在此居住,售卖完竣时,由俄罗斯管贸易官飭令旋回。其来往货物、驼驮,如不敷二十匹头,不准其来往行走。至匡苏勒官员或商人遇有事故,专派人出卡,每月只准两次,以免沿卡官兵照护之累。

一、俄罗斯商人前来贸易亭居住,自有俄罗斯管贸易官管束;两国商人交易之事自行贸易。如俄罗斯商人前往街市,必由俄罗斯管贸易官给与执照,方准前往,不得任意外出。如无执照者,即送俄罗斯管贸易官究办。 312

一、两边为匪逃逸人犯,彼此均不准容留,务须严行查拿,互相送交,各自究办。

一、俄罗斯商人前来,必有骑驼、牲畜,即在指定伊犁沿河一带自行看牧。其塔尔巴哈台,亦在指定有草地方牧放,不得践踏田苗、坟墓。倘有违犯者,即交俄罗斯管贸易官究办。

一、两国商人交易,不准互相赊欠。倘有不遵定议有拖欠者,虽经告官,不为准理。

一、俄罗斯商人前来贸易,存货、住人必需房屋,即在伊犁塔 313

尔巴哈台贸易亭，就近由中国指定一区，令俄罗斯商人自行盖造，以便住人、存货。

一、俄罗斯商人依俄罗斯馆之教，在自住房内礼拜天主，听其自便。至俄罗斯商人有在伊犁塔尔巴哈台病故者，即在伊犁塔尔巴哈台城外指给旷地一区，令其埋葬。

一、俄罗斯商人带来羊只，每十只内官买二只，每羊一只给布一匹，其余一切货物，均在贸易亭听两国商人自行定价，概不由官经管。

314 一、两国彼此遇有往来寻常事件行文时，中国用伊犁将军所属营务处图记，俄罗斯国用管西边大臣所属营务处图记。

一、此次议定一切章程互相给与凭文。中国缮写清字四张，钤用伊犁将军印信，俄罗斯国缮写俄罗斯字四张，用使臣图记。中国伊犁将军衙门，俄罗斯使臣各收存一份，永远遵行外，其余二份，咨送理藩院、萨那特衙门，互相钤用印信，彼此咨换，各收存一份。

以上中国伊犁将军、参赞大臣，俄罗斯使臣议定章程，各钤印画押收存。

(签字)^① 工兵团上校 科瓦列夫斯基
奕 山
布彦泰

① 下列签署系本书英译文本所载，为《中外旧约章汇编》中汉译文本所无。——译者

英国与克什米尔协定

315

英国政府与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主、印度宝星章大勋爵伦贝尔·辛格、他的继承人和继任者之间的协定，以由梅奥伯爵、兼莫尼克罗韦的梅奥子爵、纳斯男爵、圣帕特里克勋爵、枢密顾问等衔、印度总督理查德·索思韦尔·伯克阁下授予全权的托马斯·道格拉斯·弗赛斯爵士为一方，以伦贝尔·辛格邦主本人为另一方，共同签署生效。

为了高级缔约各方，以及各方臣民的利益，双方认为对于与东土耳其斯坦贸易的发展和安生应予以提供比目前更大的便利；基于这一目的，一致同意下列各项条款：——

第 一 款

在邦主同意下，将任命英国政府官员测量从英属拉合尔经过邦主领土到叶尔羌酋长领土的通商路线，包括经过昌器利满盆地的路线。邦主将指派他政府的一名官员伴随测量人员，同时，将在他权限内对他们提供一切帮助。各条路线经过测量后，绘成地图，并将核证无误之地图副本送交邦主。

第 二 款

经过上述勘察和测量之后，凡由英国政府宣布为最适合于发展与东土耳其斯坦的贸易的通向昌器利满盆地的路线，即由邦主宣布为永久通行的大路，永远对旅行者和商人开放。

251

第 三 款

为了管理和维持一条其全长经过邦主领土的道路、为了制定第二款中所述通行大路的交通规章、为了实施今后可能协议制定的各种规章,以及为了调处使用该路的运货人、商人、旅行者和其他人等之间的纠纷(纠纷中的一方或双方是英国政府的臣民,或任何外国臣民),每年任命两个专员,一个由英国政府任命,另一个由邦主任命。两专员在任职期间执行职务,应按日前分别订立的规章,和今后可能由英国政府和邦主的联合当局续为制定的规章进行之。

第 四 款

317 专员辖区应在大路两边划界确定之,以两科斯^①为最大宽度,除在某些地段,两专员认为有必要包括更宽的地方作为放牧地之用。专员们在这最大宽度之内决定为最合适的辖区范围,包括放牧地;按第一款任命之测量员即照此划定界线并绘入地图;于是,专员辖区不得再超过这样划定的界限。在这些界限之内的土地仍然为邦主独立占有,同时,按照本协定所含各条款,邦主继续享有完全主权,一如在邦主领土的任何其他部分一样;是项领土权利不受联合专员以任何方式干预。

第 五 款

邦主同意给予一切可能协助来贯彻专员的决定,以及防止对按第三款制定的各规章的破坏或回避。

第 六 款

邦主同意,任何人,无论他是属于英国政府的、或邦主的、或叶

① 一科斯(koss)约合两英里。——译者

尔羌酋长的、或任何一个外国的臣民，可以在专员们辖区内任何地方定居，可在沿途各驿站置备、保有、维持和出租作贸易用途的骑乘和运输工具。

第七款

318

两专员有权在沿途认为适当之处建立供应站，并授权他人建立供应站；有权决定售给商人、运货人、定居者和其他人等的食品价格，决定租用沿途设立的任何歇息所或旅店的租费。应指示古鲁等地的英国政府官员和在拉达克的邦主官员，尽最大的努力以市场价格按专员之需索供应食品。

第八款

邦主同意在上述通行大路上免征过境税；邦主又同意对于从东土耳其斯坦经过邦主殿下领土运到印度，和从印度运到东土耳其斯坦的保税货物，不在邦主殿下领土内分卸者，豁免在他领土内征收的一切过境税。对于使用上述通行大路或任何其他路线进口到邦主殿下领土或从邦主殿下领土出口的货物，邦主可以征收他认为适当的进口税或出口税。

第九款

英国政府同意，对于经由英属印度运到东土耳其斯坦或运到邦主殿下领土的保税货物，免于征税。在邦主领土内制造的披巾和其他纺织品出口到英属印度范围以外的国家，对于这些商品目 319 前所征收的出口税，英国政府也同意豁免。

第十款

本协定共计十款，由梅奥伯爵、印度总督理查德·索思韦尔·

伯克阁下授予全权的托马斯·道格拉斯·弗赛斯爵士代表英国政府，由上述伦贝尔·辛格邦主，于本日共同缔结。双方同意，本协议副本一份，由印度总督阁下正式批准后，于1870年9月7日，或在此之前，交给邦主。本协议定于我主纪元一千八百七十年四月的第二日，相当于印度教历1927年2月22日，在锡亚尔科特城签字、用印、交换。

克什米尔邦主的签字。

(签字)

弗赛斯，

梅奥。

本协议定于1870年5月2日在锡亚尔科特城由印度总督阁下批准。

(签字)

C. U. 艾奇逊

印度政府外事司

执行秘书

俄国与喀什噶尔条约

320

下列有关自由通商条款，由侍从将军冯·考夫曼和哲德莎尔^①元首阿古柏伯克共同提出，并一致同意。

第 一 款

所有俄国臣民，无论信何宗教，有权前往哲德沙尔经商，并前往他们希望访问的、哲德莎尔元首治下地区 and 市镇，一如哲德莎尔居民迄今和以后那样，有权在俄罗斯帝国整个范围内经营商业。哲德莎尔元首，在他的领土范围内，对于俄国臣民的完全安全、对于他们的商队，以及一切属于他们的东西的完全安全，负责严加保护。

第 二 款

俄国商人，在他们希望找到商队旅店的所有哲德莎尔市镇里，有权获得让他们能够单独地存放他们的商货的商队旅店。哲德莎尔的商人，在俄国农村里，也享有同样的权利。

第 三 款

321

俄国商人，如果他们希望的话，有权在哲德莎尔所有市镇置设商业代理人(商队头目)，后者的任务是照料常设的贸易市场和合

^① 哲德莎尔，意为“七城”，包括天山南麓喀什噶尔、和田、阿克苏、库车、莎车、叶尔羌、吐鲁番等七城。——译者

法征收关税。哲德莎尔商人在土耳其斯坦各个市镇享有同样的权利。

第 四 款

从俄国运到哲德莎尔,或从哲德莎尔运进俄国的所有商品,应按价课百分之二·五的税。在任何情况下,这种税将不超过课自哲德莎尔境内穆斯林的税率。

第 五 款

俄国商人和他们的商队可以获得完全的自由和安全,随意通过哲德莎尔领土前往与后者接壤的国家。来自哲德莎尔的商队享有同样的便利,通过属于俄国的领土。

上列条款于 1872 年 4 月 9 日自塔什干送出。

土耳其斯坦总督冯·考夫曼将军签署了这个协定,并在上面盖章。

哲德莎尔元首穆罕默德·阿古柏为了证明他同意这些条款,于 1872 年 6 月 8 日在英吉沙在这些条款上盖章。

本条约系由考尔巴尔斯男爵交涉议定。

英国与喀什噶尔条约

322

英国政府与喀什噶尔和叶尔羌地区元首，爱弥尔·穆罕默德·阿古柏·汗殿下、他的继承人和继任者之间的条约，以由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女皇陛下枢密院顾问、诺思布鲁克男爵、印度宝星章大勋爵、印度总督托马斯·乔治·巴林授予全权的托马斯·道格拉斯·弗赛斯爵士为一方，以由元首殿下授予全权的赛义德·穆罕默德·汗·妥拉为另一方，共同签署生效。

由于认为，确认和加强现存于高贵的缔约双方之间诚意的谅解，以及促进双方臣民之间的商业来往是符合双方愿望的，兹议定下列条款：——

第 一 款

323

高贵的缔约双方保证，一方的臣民可以随意进入另一方领土的所有部分、在其中居住、经商，以及携带他们的商品和财产进入及通过；并在对方领土内享有当地臣民或最惠国公民所享有的商业方面的一切特权和便利、保护及其他权利。

第 二 款

不论什么国籍的商人，可以随意在任何时候，经由他们选择的路线，携带他们的货物和财产从缔约一方的领土到另一方的领土；

257

缔约任何一方不得对这种运输的自由施加限制，除非为了紧急的政治理由并在事前通知另一方；这种限制在其必要性已过去时应即撤销。

第 三 款

欧洲英国臣民，进入爱弥尔殿下领土经营商业或办理其他事务，必须备有证明其国籍的护照。除非携有这样的护照，他们没有资格享受本条约的恩惠。

第 四 款

对于从爱弥尔殿下领土经由任何一条越过位处殿下领域以南的喜马拉雅山山口的路线进口到英属印度的货物，英国政府保证
324 不征收进口税。对于从印度进口到爱弥尔殿下领土的货物，得征收不超过按价格百分之二·五的进口税。上述进口到缔约双方的领土的货物，可以自由成批出售或零星出售，并可以在英属印度之内和爱弥尔殿下领土之内从一地运往另一地；这些货物只按一般地适用于这种类型货物的税收条例和税率以及都市、城镇税收条例和税率来管理。

第 五 款

从印度进口到爱弥尔殿下领土的货物将不受开包检查，直至到达交货地点为止。如果发生任何关于这样的货物的价值的争议，海关官员或代表爱弥尔殿下下的其他官员，有权按四十分之一的税率要求以部分货物代替关税缴纳。如果上述官员反对用抽取部分货物的方法征税，或者货物不能这样分开，争议应交给两个有资格的人员去处理，一个由上述官员指定，一个由进口商指定，他们应对货物作出估价；同时，如果这两个公断人意见分歧，他们应指

定一个仲裁者,后者的决定即是最后的决定,关税即按这样确定的价值来征收。

第六款

英国政府得随意任命一名代表驻在爱弥尔殿下宫廷,并任命一名隶属于他的商务代理人,驻于殿下领土内任何认为合适的市镇或地方。爱弥尔殿下得随意任命一名代表驻在印度总督那里,并在英属印度任何合适的地方派驻一些商务代理人。这样的代表们应享有按国际法给予大使的级别和特权,商务代理人应享有最惠国领事的特权。

第七款

英国臣民得随意在爱弥尔殿下领地内购买、出售,或租用土地、房屋或货仓;英国臣民的房屋、仓库或其他房产,没有占有者的同意,不得强行进入或搜查,除非得到英国代表或代理人的认可并有一名由他指派的人员在场。

第八款

为了裁判爱弥尔殿下领土内与英国臣民有关的民事诉讼和刑事案件,双方同意下列协议:——

- (1) 原告和被告都是英国臣民的民事诉讼,起诉人和被告人都是英国臣民的刑事案件,或者被告人是本条约第三款所说的一名欧洲英国臣民的刑事案件,应由英国代表或他的代理人之一,在一名由爱弥尔殿下任命的代表面前,进行审判。
- (2) 一方是爱弥尔殿下下的臣民、另一方是英国臣民的民事诉讼,应由殿下法庭进行审判,由英国代表或他的代理人之一面前,或者在由英国的代表或代理人为此而任命的一名人员列

席参加。

- (3) 起诉人或者被告人是爱弥尔殿下臣民的刑事案件，除了前面另有规定的情况之外，应由殿下法庭进行审判，由英国代表或他的代理人之一列席，或者由英国代表或他的代理人之一指派的一名人员列席参加。
- (4) 除了前面另有规定的情况之外，一方为英国臣民、另一方为外国臣民的刑事案件，如果双方都是伊斯兰教徒，应由殿下法庭进行审判；如果双方都不是伊斯兰教徒，这案件在当事人双方同意下，可由英国代表或他的代理人之一进行审判；如无双方的同意，则由殿下法庭进行审判。
- (5) 爱弥尔殿下法庭所处理的、有英国臣民为一方的任何案件，英国代表如果认为判处不公，有权把案情向爱弥尔殿下陈述，殿下可将此案交付另一个法庭，有英国代表或他的代理人之一列席，或者有由英国代表或代理人而任命的一名人员列席，重行审判。

第九款

327

英国臣民按本条约在爱弥尔殿下领土内所享受的权利和特权，应同样给予与女皇陛下联盟的印度所有的王公和土邦的臣民；同时，如果有涉及任何一个上述印度王公和土邦与本条约或其他事情有关的任何其他条款值得考虑增加，可通过英国政府进行谈判。

第十款

编档保存或保管在高贵的缔约双方领土内任何确认的法院，或在拉达克的联合专员法院里的宣誓书和其他法律文件可以用证明无误的复本予以确证，该复本由原始文件所属的法院盖章，或在

该法院没有印章情况下,则由该法院法官或法官之一签字。

第十一款

英国臣民在爱弥尔殿下领土内死亡时,他在境内的动产和不动产应归他的继承人、遗嘱执行者、财产管理者或其他有关代表所有;或者(在没有这样的代表情况下)归驻在上述领土的英国政府代表所有。承受这样责任的人应满足那些对死者提出的赔偿损失的要求,同时,应将多余的财产(如果有的话)分给有关的人。上述 328 的规定,在细节上可按实际情况作必要的修改,适用于在英属印度亡故的爱弥尔殿下下的臣民。

第十二款

住在爱弥尔殿下领土上的英国臣民如不能清偿他的债务,或者,无力在任何法院命令他偿还后的一段合理时间内偿还任何债务,债权人应从这样的无力还债人的全部货物和动产中取得偿还。但是,英国代表,如有必要,应该不加推诿地进行帮助,调查无力还债人有否在印度留下可动用的财产可作偿还该债权人之用。对于受法律保护在印度经商的殿下下的臣民,这条条款中的友好规定应被同样适用。

本条约已于今天制成两份,并得到爱弥尔殿下所确认,一份暂为殿下执有;另一份,在印度总督确认后,应于十二个月内送给殿下,以交换现由殿下保存的一份。

本协定于我主纪元一千八百七十四年二月二日,相当于伊斯兰教纪元一千二百九十年十二月十五日在喀什噶尔签字和盖章。

(签字)

T·道格拉斯·弗赛斯,

全权特使

329 鉴于为加强现存于英国政府与喀什噶尔和叶尔羌地区元首之间的真诚谅解,并为促进两国之间的商业来往,于我主纪元一千八百七十四年二月二日,相当于伊斯兰教纪元一千二百年十二月十五日,在喀什噶尔,由印度政府和喀什噶尔和叶尔羌元首殿下为此目的而正式委派和授权的双方全权代表一致同意订立了一项条约,我,印度总督、诺思布鲁克男爵托马斯·乔治·巴林因此批准和确认上述协定。

我主纪元一千八百七十四年四月十三日,于加尔各答政府大厦亲笔签字并盖章。

(签字)

诺思布鲁克

管理东土耳其斯坦新路线 联合专员办事规则

1. 由于气候特点,两专员不可能全年驻留;他们行使职权的时间从5月15日开始,到12月1日结束。

2. 在一个专员缺席时,凡向联合专员上诉的案件可以由另一个专员受理和裁决。

3. 在两名联合专员都不在的月份里,即在12月1日和5月15日之间,所有可能发生的凡向联合专员上诉的案件可以由拉达克长官判决。

4. 联合专员们只处理下述案件:影响贸易的发展、自由和安全,影响本协定订立的宗旨,以及其中一方或双方是英国臣民或外国臣民的案件,除此以外不应干预。

5. 在民事诉讼中,专员们有权处理所有案件,不管争议中的财产价值是多少。

6. 当两专员意见一致时,他们对所有案件的判决应是最后的判决。当他们不能取得一致的意见,诉讼双方有权指定单独一名仲裁者,同时,应作出书面保证,他们将服从他的裁决。如果双方不能一致同意指定单独一个仲裁者,应一方各指定一名,两专员也指定一名第三仲裁者;仲裁者中多数的裁决应是最后的裁决。 331

7. 在刑事案件中,专员们的权力应限于审理相当于英国领土内为一名地方一级副长官所审理的罪案,同时,应尽可能遵守刑事程序法的程序。比较重大的案件,如果被告不是欧洲英国臣民,应提交给邦主审判;被告如系欧洲英国臣民,应将他交给具有充分

司法权的最近的英国法院审判。

8. 在邦主领土上,在刑事案中所罚得的全部罚金和为民事诉讼按现行比例而课得的全部印花稅收入,应归克什米尔国库。被判监禁的人,如果是英国臣民,应送入最近的英国监狱。如果不是英国臣民,应将罪犯移交到邦主监狱中监禁。

9. 在邦主的全辖区内,一律严禁宰牛。

10. 如果划入路线内的任何地方有给列城等市镇供应燃料或建筑木材者,联合专员们应与拉达克长官商定,使那些供应不受阻挠。

11. 在道路界限内,不管进行什么交易,应被认为是保稅货物。如果一个商人解开他的货包,并处理一部分,只要这些货物未越过路界运进邦主领土供人消费,他不必付任何关稅。同时,留在属于专员辖区路界以内的货物,随便时间多长,应予免税。

12. 位处联合专员辖区内的村庄,如有关于征收稅款,或者,通常的稅务当局有必要干涉与商业无关的事情时,联合专员们无权干预。然而,为了防止误会,稅务官员们在对联合专员辖区内的人采取行动之前,应事先通知他们,那是适宜的。联合专员这时可以行使他们的决定权,交出受追查的人,或进行即决调查以确定他们的干预是否必要。

13. 邦主同意今年拨款五千卢比来修筑道路和桥梁,同时,在未来的年份里,殿下同意每年拨款二千卢比来维修道路和桥梁。同样的,为了修缮客栈,将每年给每一客栈一百卢比。如需其他开支,联合专员们将向邦主提出特別报告,要求特別的拨款。这笔拨款将由联合专员们使用,他们将为此目的按市场价格雇用自由劳动力。应指示拉达克和英国领土的官员们,尽他们的最大努力,根据联合专员的委托,按市场价格提供劳工。对于在这条路线上的桥梁不应征收过桥费。

14. 在路界划定以前，或者到今年年底，作为一种暂时的安排，对于目前商人所使用的从拉合尔和斯比迪经过拉达克的几条道路，联合专员应行使本守则中所规定的各项权力。

(签字)

邦主伦贝尔·辛格

T·D·弗赛斯

(本守则系于 1872 年在印度政府和克什米尔土邦之间协议商定，目的在于增进 1870 年商务条约所认可的对东土耳其斯坦和中亚的贸易。)

来自喀什噶尔的故事

喀什噶尔的米尔扎·毛拉·拉赫默特在他去麦加途中，最近到达白沙瓦，叙述了他所知道的在喀什噶尔发生的事件。下边就是他讲的故事：——

伊斯兰教历 1294 年 5 月(公历 1877 年 6 月至 7 月)，喀什噶尔王穆罕默德·阿古柏·汗，结集一支大军和中国人作战。他死于巴里桑(拜城)附近，他的军队于是推戴阿奇木·汗·妥拉做他的继任人。在这同时，喀什噶尔的毛拉们却根据阿古柏的遗嘱，立阿古柏的长子伯克·胡里·伯克为他们的王。阿奇木·汗和当时依附于他的军队来到阿克苏，而胡里伯克也已到达这里，打算夺取这块地方和捉拿篡位者本人。伊斯兰教历 7 月 26 日和 27 日(公历 1877 年 7 月 27 和 28 日)一场战斗便在胡里伯克和阿奇木·汗之间打起来，后者被击败。阿奇木·汗所属部队的许多士兵阵亡，有很多是饿死的，而有一些则于渡一条河时溺毙。阿奇木·汗于是带着一千名精选的士兵进入俄国领土。伯克·胡里·伯克现在夺取了几座城镇，并返回喀什噶尔。就在这时，和田长官纳伊兹·阿奇木·伯克叛变了，胡里伯克和他于战场相见，并夺取了和田。胡里伯克呆在那里还不到一周，便听到中国人到达了阿克苏，
335 并夺取了它。一名曾改宗伊斯兰教(但后来又改回来了)的中国军队的军官(何大老爷?)攻击首都新城，夺取它之后，自己在那里闭关据守。这个城于是被喀什噶尔长官所围困，而围攻持续了五十天。这时，胡里伯克来到，攻进城去，占领了它，并把堡垒破坏。但是，伊斯兰教历 12 月 10 日(公历 12 月 16 日)一支强大的中国军

队进入这国土，很快就再次征服已故阿古柏·汗的领土。伯克·胡里·伯克于是带领他的人马逃向塔什干，他经由明约洛、鄂什和玛尔噶朗到达那里，并把自己置于那里的俄国总督保护之下。叶尔羌长官毛拉·云努斯·詹和他的儿子以及兄弟都落入伊克沙卡尔(疑为商头)哈桑·詹·别伊手中。

上述故事摘自一份印度报刊，附在这里用以说明改信伊斯兰教的中国人或新穆斯林，当中国军队在六城一出现，他们就背叛了对阿古柏·伯克的忠诚。

索引

说明:

1. 译名后的页码是原书页码; 原书页码依次排在中译本切口一边。
2. 本书中出现的各种专名, 凡译者能力所及, 都一一依据通行地图及文献翻译; 有些易于发生疑问的译名, 用缩称注明出处。
3. 译名后所标缩称有下列一些:
 - <志>=《嘉庆一统志》
 - <录>=《光绪朝东华录》
 - <圣>=清魏源撰《圣武记》
 - <新>=《新疆全省舆地图》(东方学会据宣统元年本甲子重印)
 - <冯>=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及《马可波罗行纪》
4. 无从查找出处者, 只得采用音译, 希读者指正。

- Aali 阿里, see Hakim Khan 见阿奇木·汗。
- Ababakar 阿布别卡尔, 34—36.
- Abderrahman Aftobatcha 阿布都拉赫曼·阿弗托拔查, 18, 209—210, 211.
- Abderrahman Khoja (King of Yarkand) 阿布都拉门和卓(叶尔羌王), 102, 105.
- Abdul Aziz 阿布都拉·阿齐兹, 170, 196.
- Abdul Melik 阿伯杜拉·蔑利克, 248.
- Abdullah (Yusuf's son) 阿布都拉(玉素普的儿子), 46, 47.
- Abdullah Pansad 阿伯杜拉·胖色提, 102, 104, 107, 114—116, 117, 137, 158, 171.
- Abdullah Zizad 阿布都拉·齐察德, 23.
- Ablai (Kirghiz chief) 阿布赉(哈萨克左部酋长), 50.
- Abul Oghlan 阿布尔·奥格兰 279, 及以后诸页
- Acbash 阿克巴什, 44.
- Ægis of British Protection 英国的保护, 204.
- Afak 阿法克(即伊达雅图勒和卓), 44.
- Afghan Ameer sends embassy to Peking 阿富汗的爱弥尔派使臣到北京, 51.
- Afghanistan 阿富汗, 8, 49.
- Afghan settlers 阿富汗移民, 16 等页.
- Afridun Wang 郡王阿夫里顿, 98—99.
- Agha Bula 阿哈布拉<录>, (阿哈尔布拉克<志>), 265.
- Ahmad 阿罕木德, 35, 46.
- Ak Musjid, siege of 围攻阿克摩斯杰德, 79—81.
- Ak Robot 阿克·拉巴特, 228.
- Aksai Plateau 阿克赛高原, 3.
- Aksakal 商头, 57—58, 64, 69, 等页.
- Aksakals (risings under) 商头煽起的叛变, 64, 等页.
- Aksu 阿克苏, 2, 3, 37, 46, 66, 272, 273. coal at 煤矿, 163. description of 概况, 7. siege of 围攻, 127, 273.

- Aktaghluc 白山派(旧译“白帽派”), 37, 44—46, 47, 49. description of 有关记述 52—53.
- Alaja “the slayer” “屠手”阿拉贾, 35. 见 Ahmad 阿罕木德条.
- Alim 阿林, 146.
- Alim Kuli 阿里姆·库里, 83—85, 86, 87, 等页.
- Alish Beg 阿里什伯克, 172, 231.
- Almatie 阿拉木图 见 Vernoe 威尔尼条.
- Alty Shahr 六城(地区), 8, 16, 44, 等页.
- Amban 办事大臣, 54, 63, 等页. of Yarkand, 叶尔羌办事大臣, 或 Khan Amban 办事大臣汗, 54.
- Ameer 或 Emir 爱弥尔, 196, 220, 等页.
- Ameers of Central Asia 中亚的那些爱弥尔, 39.
- Amoor 阿穆尔河(黑龙江), 25, 42.
- Amursana 阿睦尔撒纳, 45—48, 49, 252.
- Andijani 安集延, 4, 12, 158, 160.
- Andijani Serai 安集延客栈, 153.
- Appak khoja 阿帕克和卓, 252.
- Arabdan Khan 阿喇布坦汗, 45.
- Arabs 阿拉伯人, 23.
- Arpa Tai battle of 阿尔巴台 <录> 战争, (《一统志》作阿巴特台), 270.
- Artosh 阿图什, 12, 22, 181.
- Aryan family 雅利安族, 14, 17.
- Athalik Ghazi 阿塔勒克哈孜, 1, 7, 118, 186, 等页.
- Azmill Khoja 额敏和卓(亦迷火者 <冯>), 31.
- Babur 巴卑尔, 36.
- Badakshan 巴达克山, 8, 33, 36, 48, 49, 106, 107, 118.
- Badakshi Settlers 巴达克山人移民, 16.
- Badaulet 毕条勒特 <录>, 200, 248.
- Bahanuddin (son of Sarimsak) 巴布顶(萨木萨克之子), 64.
- Bai 拜城, 272.
- Balitsky, Major 巴利茨基少校, 281.
- Barhanuddin 博罗尼都, 46, 47, 48, 49.
- Baroghil 巴拉吉尔山口, 8, 29.
- Bartchuk 巴楚, 3. (=Maralbashi 玛喇尔巴什)
- Bayen Hu 白彦虎 <录>, 253, 266, 267, 271.
- Bazandai 巴彦岱(显系 Bayandei 之误), 125.
- Bedal Pass 别叠里达坂 <新>, 273.
- Beg 伯克, 220—221.
- Beg Bacha 伯克·巴夏 <录>, 见 Kuli Beg 胡里伯克.
- Bellew, Dr. 贝柳医生, 22, 171, 222.
- Benefits conferred by China on Kashgar, 中国给予喀什噶尔的好处, 58, 等页.
- Berdan rifles 贝尔丹步枪, 246.
- Bhots 布提亚人(藏人), 9.
- Biddulph, Capt. 比达尔夫, 222.
- Birlas 巴鲁刺思部(应作 Barulas), 32.
- Birma 缅甸, 42.
- Black Sea 黑海, 14.
- Bokhara 布哈拉, 18, 23, 25, 30, 69, 83, 178, 209, 等页. Russian treaty with 俄国与之订约, 179. sack of 被攻占, 30.
- Bolor 博洛尔, 37, 65.
- Bostang Lake 博斯腾湖, 266.
- Buddhism 佛教, 25, 等页.
- Buddhists 佛教徒, 16, 31, 等页.
- Bugur, fight at 布告尔 <录> 之战, 269.
- Burac 八刺 <冯>, 30.
- Buzurg Khan 布素鲁克汗, 2, 71, 87, 91, 103, 107, 108, 110. intrigues against Yakoob Beg 阴谋反对阿古柏, 111, 117. deposed by Yakoob Beg 被阿古柏废黜, 117.
- Cabul 喀布尔, 28, 211.
- Calmucks 加尔梅克人, 19, 44, 等页.
- Calmuck settlements 加尔梅克人居住

- 区, 19, 44.
- Canals 渠道, 59.
- Candahar 坎大哈, 28.
- Caravanbashi 商队头目, 204.
- Cashmere 克什米尔, 1, 37, 60.
- Caspian 里海, 14.
- Cay Yoli 阜洼勒(萨依尤力)河道 67.
- Chaghtai Khan 察合台汗, 29.
- Cha-hi-telkh 扎希德勒克, 267. <圣>
- Chang Lung 长龄, 67.
- Chang Tay 张泰, 112.
- Chang Tsun 张俊, 265.
- Chang Yao 张曜, 237, 246, 247, 263, 272.
- Chapman, Capt. 查普曼, 222.
- Charjui 查尔朱, 179.
- Chightam 七克台(奇台<录>), 10, 134, 等页.
- China 中国, 41—43, 等页.
- Chinaz 契纳兹, 85.
- Chinese and Khokand 中国人和浩罕, 49.
- Chinese army, character of 中国军队的性质, 275.
- Chinese at Lhasa 中国人在拉萨, 234.
- Chinese Empire in Central Asia 中华帝国在中亚, 22, 39, 43.
- Chinese, first reverse of 中国人第一次失利, 65.
- Chinese in Kashgar 中国人在喀什噶尔, 49, 54—75.
- Chinese merchants 中国商人, 5.
- Chinese moderation 中国人的怀柔政策, 249, 270.
- Chinese north of Tian Shan 中国人在天山北路, 236.
- Chinese overthrow Tungani 中国人击溃东干人, 236—237, 238.
- Chinese pay Khokand annual sum 中国人每年给浩罕一笔款子, 64.
- Chinese principle in ruling Kashgar 中国人统治喀什噶尔的原则, 156.
- Chinese reconquer Kashgar 中国人克复喀什噶尔, 258—276.
- Chinese revindicating army, strength of 中国征讨大军的力量, 246.
- Chinese rule, benefits and disadvantages of 中国人统治的有利和不利之处, 74—75.
- Chinese, strategical advantages of 中国人的战略优势, 66.
- Chinese Turkestan 中国土耳其斯坦, 见 Eastern Turkestan 东土耳其斯坦
- Chitral 奇特拉尔, 29.
- Christians 基督教徒, 25.
- Chuguchak 楚呼楚<志>(即塔城), 10, 等页.
- Chuntche 顺治, 42.
- Coal mines 煤矿, 60.
- Cochin China 交趾支那, 42.
- Comparison between rule of Chinese and Yakoob Beg 中国人统治与阿古柏统治的对比, 168—169, 255—257.
- Constantinople 君士坦丁堡, 196, 等页.
- Corbashi 佐尔巴士, 149.
- Cornwallis, Lord 康沃利斯勋爵, 292.
- Corps of artillerymen 炮兵团, 142.
- Crusade, propagandist, against Khitay 共同讨伐“和台”的宣传, 46, 47.
- Czar, the 沙皇, 185.
- Dadkwah 达克瓦(地方长官)的职务, 144—145, 等页.
- Danyal 达涅尔, 44, 45.
- Darius 大流士, 36.
- Darwas 达尔瓦斯, 72. (喀拉提锦南一个地区)
- Dastarkhwan 达斯他关(音译, 意为茶点), 225.
- Dava Khan 都哇<冯>, 30.

- Davatsi 达瓦齐<圣>,45—46.
- Delhi 德里,28.
- Destruction caused by Genghis Khan, 成吉思汗造成的破坏,28.
- Devanchi 达坂城<录>,244,247.
- Devan defile 达坂隘道,244,等页.
- Difference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Turkestan 东西土耳其斯坦之不同,15.
- Dihbid 迪比德,76.
- Disunion in Central Asia 中亚的分裂 120—121,210—211.
- Disunion in China 中国的分裂,92.
- Disunion in Kashgar 喀什噶尔的分裂,259—263.
- Djinghite 骑兵(吉杰特),见 Jigit 条
- Dolans 朵兰人<圣,录>,9,143.
- Dungani 东干族,见 Tungani 条
- Dungans 东干族,见 Tungani 条
- Durani 杜伦尼(民族),51.
- Dylon Yulduc 迭里温孛勒答黑<冯>,26.
- Eastern Turkestan 东土耳其斯坦,1, 15,17,38—42,59,等页.
- Edinburgh, Duke of, 爱丁堡公爵,205.
- Effects of Khoja risings on China's prestige 和卓叛乱对中国威信的影响,70.
- Effects of past misrule in Kashgar 喀什噶尔秕政的后果,39.
- Elchi Khana 宾馆,228.
- Eleuthian, or Eleuth princes 厄鲁特王公,42,46.
- Emir, or Ameer 爱弥尔,196,220,等页.
- England's policy towards China 英国对华政策,257; 同见第十四章.
- towards Kashgar 对喀什噶尔政策,212—235.
- trade with Kashgar 与喀什噶尔贸易往来,153,202.
- trans-Himalayan policy 泛喜马拉雅山政策,204; 同见第十四章.
- English mission guests of Yakoob Beg 英国使团在阿古柏处作客,232.
- Eshan Khan 伊山汗,71.
- Ferghana 费尔干纳,25,32,181,187,210.
- First outbreak against China in Eastern Turkestan 东土耳其斯坦初次爆发反叛中国,64.
- Forsyth, Sir T.D. 菲赛斯爵士,5,22,138,194,196,204,216,218—219,233,235.
- Forsyth's report 菲赛斯报告,221—233.
- interview with Yakoob Beg 与阿古柏会见,228—230. second mission to Kashgar 第二次出使喀什噶尔,221—232.
- Galdan 噶尔丹<圣>,44,45
- "Garden of Asia", "亚洲的花园",2,59.
- Genghis Khan 成吉思汗,25—29,220,等页. code of 成吉思汗法典,26.
- Ghizni 吉兹尼,28.
- Gibbon 吉本,220.
- Glacier 冰岭,见 Muzart Pass 木素尔岭
- Gobi 戈壁,1,2,19,156,246,等页.
- Goes, Benedict 鄂本笃<冯>,37.
- Gordon, Col., 戈登 92
- Gordon, T. E. 戈登 222.
- Gorkhan 葛儿汗,25.
- Granville-Gortschakoff negotiations 格兰维尔-戈尔察科夫谈判,207.
- Great road from Kashgar to Hamil and Kansuh 从喀什噶尔通往哈密与甘肃的大路,12.
- Great Yulduc 大裕勒都斯,273.
- Gregorieff, Professor 格雷戈里也夫,138.

- Grim Pass 格里姆山口, 223—224.
- Guchen 古城, 10, 246.
- Gulbagh 汉城, 55, 66.
- Guoharbrum 果沙尔布仑山, 11.
- Hacc Kuli Beg (Khokandian general) 哈克·库里·伯克(浩罕军人), 69.
- Hacc Kuli Beg (Yakoob Beg's son) 哈克·库里·伯克(海古拉<录>, 阿古柏之子), 79, 133, 244, 252—253, 260.
- Hadayatulla 伊达雅图勒和卓, 37, 38.
- Hadji Torah 哈吉·妥拉, 140, 141, 169—171, 196, 220, 221, 223, 232, 233, 248.
- Haft Khojagan 七和卓之乱, 71.
- Hai Yen 海宴<录>, 239.
- Hakim Beg 阿奇木伯克, 55.
- Hakim Khan 阿奇木汗, 250—253, 259—261.
- Hamil 哈密, 10, 59, 130, 246, 247.
- Han Hing Nung 韩刑脓<录>, 240.
- Hastings, Warren 沃伦·黑斯廷斯, 213.
- Hayward, Mr. 海沃德, 216.
- Hazrat Afak 哈司拉·阿法克(意为世界之尊), 37, 38, 74.
- Heh Tsun 黑峻<录>, 240.
- Henderson, Dr. 亨德森, 218, 219.
- Her Majesty, autograph letter of 英女王亲笔签名的信, 230.
- “High Tartary” 《高地鞑靼》, 212.
- Himalaya 喜马拉雅山, 213.
- Himalayan passes 喜马拉雅山诸山口, 213.
- Hindoo Koosh 兴都库什, 14, 17, 28.
- Hodjent 霍占<志>, 37, 44, 84, 208, 209, 等页.
- Hordes, Kirghiz 柯尔克孜各帐, 50.
- Hoser 和色尔<录>, 272. (似为《一统志》中的赫色勒)
- Houchow 河州(今甘肃临夏), 95.
- Houtan 和田, 7.
- Husen 侯赛因, 32.
- Hwang Tsang (疑为 Hsuang, Tsang 玄奘之误) 4.
- Hydar Kuli, Hudaychi 海达尔·库里, 84.
- Hyder 海达尔, 35.
- Ihrar Khan Torah 伊赫拉尔·汗·妥拉, 172, 218, 219, 228.
- Ilchi 额里齐<志>(即和田), 7.
- Ili 伊犁, 1, 2, 7, 22, 25, 44, 45, 48, 176; 并见第十四章诸页.
- Ili, Viceroy of 伊犁将军, 55, 等页.
- Irjar 伊尔扎尔, 85.
- Isa Dadkwah 伊萨达克瓦, 65—66.
- Ishac Wang 伊萨克(回王), 68.
- Ismail Shah 伊斯玛伊勒·沙赫, 72.
- Issik Kul 伊塞克湖, 17, 33, 174.
- Jade 玉, 60, 163—164, 等页.
- Jattah Ulus, or Jattahs 察台·兀鲁思, 29, 33, 35. (另有“者台”, “哲太”, “渣塔”等译法)
- Jehangir (Ababakar's son) 札罕格尔(阿布别卡尔之子), 36.
- Jehangir (Sarimsak's son) 张格尔<圣>(萨木萨克之子), 64, 65—68.
- Jehangir (Timour's son) 张格尔(帖木儿之子), 34.
- Jigit 吉杰特(骑兵), 143, 等页.
- Jungaria 准噶尔, 1, 2, 15, 17, 25, 33, 34, 47, 134, 175, 236, 等页.
- Kabil Shah 哈比勒沙<冯>, 32.
- Kafiristan 加菲里斯坦, 37.
- Kafirs 加菲尔人, 37.
- Kaidu River 开都河, 30, 266. (一作海都河)
- Kalkhalu 喀尔喀路, 24.
- Kamaruddin 卡马尔丁, 33.
- Kamensky, Mr. 卡曼斯基, 248, 264, 265.

- Kamschatka 勘察加, 41.
- Kanáat Shah 卡那阿特·沙赫, 82—83.
- Kanghi 康熙, 42.
- Kansuh 甘肃, 20, 24, 43, 92, 等页.
- Kara Khitay 喀拉契丹(即西辽), 24, 25.
- Kara Kirghiz 喀拉柯尔克孜(即布鲁特部), 17.
- Karakoram 喀拉昆仑山脉, 2, 37, 48, 213.
- Karakoram (city) 和林, 29.
- Karanghotagh 库鲁克塔克山<冯>, 36.
- Karashar 喀喇沙尔, 2, 9, 20, 130, 247, 266.
- Karataghluc 黑山派, 37, 44, 46, 49, 52—53
- Karatakka mountains 喀拉塔克山(喀尔铁盖山<圣>), 68.
- Karategin 喀拉提锦<圣>, 68, 77.
- Karghalik 哈尔哈里克<志>, 225.
- Karshi 卡尔希, 179.
- Kashgar River 喀什噶尔河, 见 Kizil Su 克孜勒苏河条
- Kashgari resigned to Chinese conquest 喀什噶尔向中国人投降 52.
- Kashgar 喀什噶尔, 12, 25, 35, 45, 178, 等页. history of 其历史, 22—40.
- Kashgaria 喀什噶里亚(即喀什噶尔), 1, 2, 13, 等页.
- Kashgarian valley, description of 喀什噶尔盆地, 10.
- Kashgarian scenery 喀什噶尔风景, 11.
- “Kashmir and Kashgar” 《克什米尔与喀什噶尔》 223.
- Katti Torah, Khoja 卡提·条列和卓, 71.
- Kaufmann, General 考夫曼将军, 185, 195, 197, 206, 207, 209, 250.
- Kaulbars, Baron 考尔巴尔斯男爵, 192—195, 197.
- Kaulbars Treaty 考尔巴尔斯条约, 219.
- Kazalinsk 卡查林斯克, 79.
- Kazan Ameer 哈赞爱弥尔(一作迦赞), 31, 32.
- Kazi 哈孜, 145, 146.
- Kazi Rais 大哈孜, 6, 146.
- Keen-Lung 乾隆, 43—45, 63, 93, 156, 等页.
- Kermina 克尔米尼叶, 179.
- Khalkas 喀尔喀(部)<圣>, 19.
- Khan Amban 办事大臣汗, 见 Amban of Yarkand 叶尔羌办事大臣条
- Khan Khoja 汗·和卓, 38, 48.
- Khans of Central Asia 中亚各汗, 39.
- Khaton 可敦, 23.
- Khitay “和台”, 5, 7, 21, 46, 47, 71, 93, 98, 143, 240, 等页.
- Khitay merchants “和台”商人, 58.
- Khiva 基发, 25, 27, 178, 181, 197, 206.
- Khivan desert 基发沙漠, 32.
- Khize Khoja 乞思和卓, 33.
- Kho Dalay 何步云<录>, 111.
- Khoja Ahmad 阿罕木德和卓, 44.
- Khoja family 和卓家族, 37, 48, 64.
- Khoja invasion 和卓入侵, 73.
- Khoja Ishac 和卓伊萨克, 52.
- Khoja Kalan 和卓卡兰, 52.
- Khoja Kalar 和卓卡拉尔, 37.
- Khoja Kings 和卓诸王, 31.
- Khoja Kulan 和卓库兰, 102.
- Khoja Padshah 和卓帕特沙赫, 见 Abdullah 阿布都拉
- Khojam Beg 和卓木伯克, 45.
- Khokand 浩罕, 3, 17, 36, 48, 49, 187, 等页.
- Khokand pays tribute to China 浩罕向中国朝贡, 50, 63—64.
- Khokand, rising in 浩罕起事, 208—210.

- Khokandian intrigues 浩罕人的阴谋, 57.
- Khokandian tax-gatherers 浩罕收税人, 97.
- Khoten 和田, 6, 17, 24, 25, 50, 118, 121—123, 224—225. rising at 反叛, 262.
- Khoten gold mines 和田金矿, 163.
- Khoten jade 和田玉, 163, 等页.
- Khudadar 库达达尔, 34.
- Khudayar Khan 呼达雅尔汗, 71, 81—86, 120, 187—189, 208—210, 等页.
- Khwaresm 花拉子模, 见 Khiva 基发条
- Kiachta 恰克图, 48.
- Kichik Khan 基切克汗, 72.
- Kilia 克里雅 225
- Kin Shun 金顺, 136, 263, 266—272.
- Kipchak 乞卜察克, 14, 18, 25, 等页. (钦察)
- Kirghiz 柯尔克孜(布鲁特), 14, 16, 17, 104, 143, 184, 209, 等页. nomads submit to China 归顺中国的牧民, 50.
- Kish 碣石<明史>, 32.
- Kizil Su 克孜勒苏河, 3.
- Kizil Yart 克孜勒牙尔特山(疑指葱岭), 17, 等页.
- Kludof 克卢多夫, 182—185.
- Kohistan 库希斯坦<冯>, 2.
- Kok Robot, battle of 科克拉巴特之战, 72, 228.
- Kolpakovsky, General 科尔帕科夫斯基 182, 184, 281.
- Kooda Kuli Beg 库达·库尔伯克, 79, 130.
- Koosh Bege 和硕伯克, 79, 等页.
- Korla, description of 库尔勒, 9, 245, 248, 267, 268, 等页.
- Koshluk 屈出律, 25.
- Kouralia 见 Korla 库尔勒条
- Kouroungli 见 Korla 库尔勒
- Kucha 库车, 2, 8, 9, 127—130, 268, 269, 270, 等页. battle at 库车之战, 270—271.
- Kucha coal mines 库车煤矿, 163.
- Kucha Khojas 库车和卓, 127, 等页.
- Kuen Lun 昆仑山, 7.
- Kuhna Turfan 库纳吐鲁番, 7; 见 Turfan 条
- Kuhwei 曲惠<录><宣>, (疑即《一统志》中的楚辉), 265, 266.
- Kuldja 固尔扎(伊犁), 2, 94.
- Kuldja qaestion 固尔扎问题, 265.
- Kuli Beg 伯克胡里<录>, (伯克·胡里伯克, 胡里伯克) 79, 133, 137, 141, 171, 250, 251, 252—253, 260—263, 274, 276.
- Kumush 库木什<志>, 265.
- Kunar 库纳尔(河谷), 29.
- Kurama 库拉玛, 76, 82, 等页.
- Kuropatkine, Capt., 库罗帕特金, 204, 244—245.
- Kurtka Fort 库尔特卡堡, 65.
- Kutaiba 屈底波, 24.
- Ladakh 拉达克, 213.
- Lahore 拉合尔, 31.
- “Lahore to Yarkand” 《从拉哈尔到叶尔羌》, 219.
- Lake Lob 罗布泊, 134, 245.
- Lanchefoo 兰州府, 45, 59, 246, 等页.
- Laws in Kashgar 喀什噶尔的法律, 145—146.
- Leaoutung 辽东, 41.
- Leh 列城, 153.
- Lhasa 拉萨, 60.
- Little Bokhara 小布哈拉, 1, 213.
- Liu Kin Tang 刘锦棠. 见 Kin Shun 条
- Lob Nor 罗布泊, 见 Lake Lob 条
- Mah Dalay 马大老爷, 100.
- Mahomedanism in Kashgar 伊斯兰教在喀什噶尔, 24.

- Mahomed Ali Khan (ruler of Kho-kand) 迈玛达里汗(浩罕统治者), 37, 66, 68, 等页.
- Mahomed Arif 穆罕默德·阿利夫, 77.
- Mahomed Beg of Artosh 阿图什的穆罕默德伯克, 172.
- Mahomed Khan 穆罕默德·汗, 170.
- Mahomed Khoja 穆罕默德和卓, 171; 见 Sheikh-ul-Islam 伊斯兰教长老条
- Mahomed Kuli 穆罕默德·库里, 102.
- Mahomed Latif 穆罕默德·拉提夫, 见 Pur Mahomed 条
- Mahomed Nazzar 穆罕默德·那扎尔, 214, 215.
- Mahomed Seyyid Wang, of Kashgar 喀什噶尔的穆罕默德·赛义德王, 66.
- Mahomed Yunus Jan 穆罕默德·云努斯·詹, 140, 171—172, 215, 226, 227, 261.
- Makhram, battle of 马克拉之役, 210.
- Manas 玛纳斯, 133, 236, 263. siege of 围攻, 239—240.
- Manchuria 满洲, 19.
- Manning, Thomas 曼宁, 托马斯, 213, 294.
- Mansur 曼苏尔, 35.
- Mantchoo 满族, 41, 42.
- Maralbashi 玛刺尔巴什, 8, 31, 66, 110, 121; (= Bartchuk 巴楚).
- Marco Polo 马可波罗, 14, 30.
- Maulana Khoja Kasani 大毛拉·和卓·卡萨尼, 52.
- Ma-yeo-pu 马由布<录>, 270.
- Mecca 麦加, 37.
- Merv 谋尔夫, 179.
- Meshed 马什哈德, 179.
- Michell, Messrs, opinion on Kashgar 米歇尔关于喀什噶尔的意见, 213.
- Military settlers 屯兵, 50.
- Mines in Kashgar 喀什噶尔煤矿, 8.
- Ming dynasty 明朝, 41.
- Mingyol, battle at 明约洛<圣>之战, 69.
- Mir 米尔, 82.
- Mirza 米尔扎, 204.
- Mirza Jan Effendi 米尔扎·詹·艾芬迪, 170.
- Mollah Khan 毛拉汗, 82, 170.
- Mongols 蒙古族, 25, 41.
- Moorcroft, Mr., 穆尔克罗夫特, 213.
- Moral of Yakoob Beg's career 阿古柏一生经历的经验教训, 257.
- Morozof, Mr., 莫罗佐夫, 202.
- Mourad Beg 穆拉德伯克, 69.
- Mozaffur Eddin 穆扎夫尔丁, 83, 179, 186, 等页.
- Mufti 穆夫提, 146.
- Mufti Habitulla 穆夫提哈毕吐拉, 122—123.
- murder of 被杀害, 123.
- Mughol 见 Mongol 蒙古族条
- Mugholistan 蒙兀儿斯坦, 1, 29.
- Muhtasib 即莫提色布, 意为宗教警察, 6.
- Mussulman Kuli 穆斯林·库里, 18, 81—82, 等页.
- Muzart Pass 木素尔岭山口<志>, 61, 78, 273.
- Mysoka Bahadur 也速该·把阿秃儿<冯>, 26.
- Nadir Shah 纳第尔·沙赫, 51, 等页.
- Naiman tribe 乃蛮部, 25.
- Nankin 南京, 92.
- Nar Mahomed Khan 纳尔·穆罕默德·汗, 77, 169.
- Naryn 纳伦(河), 一译作纳林河, 8, 61, 177, 178, 180, 183, 等页.
- Nasruddin 纳斯鲁丁, 209—210.

- Nestorian Christians 景教, 30.
- New Turfan 乌什, 7.
- Nur Ali (Kirghiz) 努喇丽(柯尔克孜), 50.
- Ogdai Khan 窝阔台汗, 29, 34.
- Oigur princes 维吾尔王公, 23.
- Oigurs 维吾尔人, 16.
- Old saying in Kashgar 喀什噶尔传说, 39.
- Olja Turkan Khaton 奥里亚·秃儿罕·可敦, 32.
- Opinion of Chinese rule 对中国统治的意见, 152.
- Orda, or palace, at Kashgar 喀什噶尔的斡尔朵, 即王宫, 3, 142.
- Oxus 乌浒河, 23, 211
- Pamere 见 Pamir
- Pamir 帕米尔, 1, 2, 8, 25, 36, 48.
- Panjkora 喷赤河, 28.
- Panthays 潘泰, 92, 175, 等页.
- Pekin 北京, 29, 47, 等页.
- Pekin Gazette 北京的《京报》, 238, 249, 253, 267, 272.
- Perovsky, General 彼罗夫斯基将军, 79—81.
- Perovsky Fort 彼罗夫斯基堡, 81
- Persia 波斯, 14, 23.
- Piskent 匹斯坎特, 76, 77.
- Population of Kashgaria 喀什噶里亚的人口, 2, 59, 157.
- of city of Kashgar 喀什噶尔城的人口, 3.
- of city of Kucha 库车的人口, 9.
- of city of Yarkand 叶尔羌的人口, 5.
- Powers interested in Kashgar 关注喀什噶尔的大国, 196.
- Presents to Yakoob Beg 送给阿古柏伯克的礼物, 230—231.
- Prester John 约翰长老<冯>, 25.
- Prince of Kashgar, 见 Ishac Wang 条
- Prjevalsky, Col., 普尔热瓦斯基, 20, 245, 250, 273.
- Pupyshef, Mr., 普佩舍夫, 199—200.
- Pur Mahomed Mirza 普尔·穆罕默德·米尔扎, 76.
- Rashid 拉希德, 37, 52.
- Reinthal's, Capt., mission to Kashgar 赖因塔尔上尉出使喀什噶尔, 184—185, 202—204.
- Rising against Russia, folly of, if not combined 不联合起来抗击俄国的愚蠢, 180.
- Risings in Khokand 浩罕反叛, 见 Khokand 条
- Road between Ili and Kashgar 伊犁与喀什噶尔间的道路, 61.
- Romanoffski, General 罗曼诺夫斯基, 85.
- “Roof of the World” 《世界屋脊》, 222.
- Royal Body Guard 王室卫队, 226.
- Ruduk 卢杜克, 233.
- Russia at Vernoe 俄国在威尔尼(阿拉木图), 130.
- Russia demands Consuls in Kashgar 俄国要求在喀什噶尔设领事, 203, 205.
- Russia in Central Asia 俄国在中亚, 47, 173.
- Russia in Kuldja or Ili 俄国在伊犁或称固尔扎, 133, 174—177, 279—282.
- Russia invades Kuldja 俄国入侵固尔扎, 206.
- Russia promises to restore Ili 俄国应允归还伊犁, 175.
- Russian attitude towards Chinese 俄国人对待中国的态度, 248.
- Russian merchants 俄国商人, 164, 182, 193, 197, 199, 202.

- Russian policy towards Kashgar 俄国对待喀什噶尔的政策, 177—209.
- Russian trade with Kashgar 俄国与喀什噶尔的贸易, 153.
- Sadic Beg 思的克·伯克, 86, 87, 102, 103, 104, 107, 117, 262, 263, 275.
embassy to Tashkent 出使塔什干, 87.
truce with 和他订立休战条约, 107.
- Sahib Khan 沙希布·汗, 81.
- Said 赛德, 35, 36, 37, 52.
- Salara 撒拉尔, 95.
- Samarcand 撒马尔罕, 25, 33, 52, 179.
- Saniz 沙尼兹, 34.
- Sanju 桑株, 7, 36, 224, 等页.
- Sanju Devan 桑株达坂, 11, 223.
- Sarbaz 步兵(沙尔巴兹), 143, 等页.
- Sarimsak Khoja 萨木萨克和卓〈圣〉, 48, 51, 64, 65.
- Satuk Bughra Khan 沙都克·布格拉汗, 24.
- Schlagintweit, Messrs., 施拉根瓦特, 16, 214, 等页.
- Schuyler, Eugene 徐楼, ix, 195.
- Scobelef, Col., 斯科别列夫, 207, 210.
- Scourges of God 天鞭, 28, 33.
- Seistan 锡斯坦, 32.
- Semipalatinsk 塞米巴拉金斯克, 214, 279.
- Semiretchinsk 谢米烈钦斯克, 264, 280
- Seven Khoja princes 七和卓, 71.
- Seyyid Ali 赛义德·阿里, 34.
- Seyyid Yakoob Khan 赛义德·阿古柏·汗, 见 Hadji Torah
- Shadi Mirza 沙迪·米尔扎, 184—185.
- Shahidoolah 沙希都拉, 223.
- Shahrisebz 沙赫里夏勃兹, 32.
- Sham 沙姆(夜市), 226.
- Shariat 伊斯兰法典(教规), (沙里阿特), 90, 145.
- Shaw, Robt., 沙敖, 16, 194, 212, 213, 215, 218, 221, 232, 234.
- Sheikh-ul-Islam 伊斯兰教长老, 116—117, 151, 158.
- Sheikh Nizamuddin 谢赫·尼扎姆丁, 77.
- Shensi 陕西, 20, 92, 237.
- Shere Ali (Cabul) 希尔·阿里(阿富汗酋长), 8, 118, 179.
- Shere Ali Khan (Khokand) 希尔·阿里·汗(浩罕酋长), 83.
- Siberia 西伯利亚, 1, 47.
- Sirikul 色勒库尔, 8, 106, 118, 132.
- Six Cities 六城, 见 Altysahr
- Sobo tribes 锡伯族(藏化蒙古人), 94.
- Somof, Mr., 索莫夫, 199—200.
- St. George and St. Anne Cross Fever 患圣乔治或圣安娜十字勋章热, 206.
- St. Petersburg, 圣彼得堡, 185, 196.
- Stoliczka, Dr. 斯托力茨卡, 222.
- Subashi 苏巴什〈志〉(苏巴沟〈录〉), 265,
- Sule 疏勒, 1.
- Sultan Mourad 苏丹·姆拉德(即沙赫·姆拉德), 83.
- Sultan Seyyid 苏丹·赛义德, 83, 86.
- Suranchi Beg 苏兰奇伯克, 65, 104.
- Syr Darya 锡尔河, 18, 79, 192.
- Swat 斯伐特, 28.
- Szchuen 四川, 58, 237.
- Taepings 太平天国, 92.
- Tagharchi 托合其, 106.
- Tajik 塔吉克, 14, 78.
- Talifoo 大理府, 92, 175, 237.
- Tamerlane 帖木儿, 见 Timour
- Tanab 塔纳布, 162.
- Tanabi 塔纳比, 162.
- Tang dynasty 唐朝, 22.
- Tang Jen Ho 汤仁和〈录〉, 265.
- Tangut 唐古特, 27.

- Tarantchis 塔兰奇人, 12, 68, 124—125, 174. (一作塔兰齐)
- Tara Sing 塔拉·辛格, 222.
- Tarfur, 见 Turfan 吐鲁番
- Tartar 鞑靼人, 15, 等页.
- Tarzagchi 塔尔扎格齐, 149.
- Tash Balik 塔什巴里克, 65.
- Tashkent 塔什干, 25, 32, 49, 84, 208.
battle of 战争, 85, 209, 等页.
- Tashkent Gazette 《塔什干报》, 见 Turkestan.
- Tashkurgan 塔什库尔干, 8.
- Tatsing 大清, 42.
- Tawats. 见 Davatsi 达瓦齐条
- Taxes in Kashgar 喀什噶尔的捐税, 56, 62, 63, 151—160.
- Tay Dalay 领队大臣, 55.
- Tcherniaef 切尔尼亚耶夫, 84—85.
- Tchimkent 奇姆肯特, 84.
- Tekes, river and pass 特克斯河(山口), 133, 273.
- Tenure of land in Kashgar 喀什噶尔保有土地的条件, 161.
- Terek Pass 捷列克山口(铁列克岭<圣> 47), 61, 103.
- Tian Shan 天山, 2, 20, 33, 59, 247, 等页.
- Tian Shan Nan Lu 天山南路, 61.
- Tian Shan Pe Lu 天山北路, 61.
- Tibet 西藏, 7, 37, 42, 50, 56, 60, 213, 217.
- Tibetan table-land 西藏高原, 36.
- Timour 帖木儿, 32—34, 91.
- Timour Khan (Chinese Emperor) 铁穆耳(指元成宗, <新元史>作铁木耳), 31.
- Timour, Yakoob Beg's descent from 阿古柏是帖木儿后代, 77.
- Tobolsk 托博尔斯克, 48.
- Toghluc Timour 秃黑鲁帖木儿<冯>, 31, 33.
- Toksoun 托克逊, 242, 244, 264.
battle at 托克逊之战, 247.
- To Teh Lin 妥得麟<录>, 240
- Trade 贸易, 153.
- Trade privileges 贸易特权, 57.
- Trade with China 与中国贸易, 217—218; 同见第十四章
- Trade with Kashgar 与喀什噶尔贸易, 166, 216—217.
- Treaty between England and Kashgar 英国与喀什噶尔间条约, 232.
- Treaty between Russia and Kashgar 俄国与喀什噶尔间条约, 194.
- Treaty with Khokand 与浩罕订立条约, 69.
- Trotter, Captain 特罗特, 222.
- Tsedayar 策达雅尔<录>, <宣>, 268.
- Tso Tsung Tang 左宗棠, 246, 247, 263, 265, 272, 275, 等页.
army of 他的军队, 272.
- Tungani 东干族(人), 2, 19, 20, 21, 93, 130, 144, 239, 241, 243, 等页.
- Tungan rising proper 中国本部东干反叛, 95, 96, 123—124.
in Kashgar 在喀什噶尔, 96, 102.
in Kuldja 在固尔扎, 124—125.
- Tungani desert Yakoob Beg 东干人离弃阿古柏, 245.
- Tungani unorthodox 非正宗的东干人, 127.
defend Kucha 保卫库车, 127—130.
- Turanian family 土兰系, 14, 15.
- Turcomans 突厥人, 32.
- Turfan 吐鲁番, 21, 130, 242, 244, 264.
battle at 吐鲁番之战, 247.
- Turfan Ush, 见 Ush Turfan 乌什条
- Turghay 塔拉海<冯>, 32.
- Turkestan, Eastern 东土耳其斯坦, 见 Eastern Turkestan

Turkestan, Western 西土耳其斯坦, 见 Western Turkestan
Turkestan Gazette 土耳其斯坦报, 251, 252, 264, 等页.
Turkestan Trading Company 土耳其斯坦贸易公司, 232.
Tyfu 提夫(译音), (一种火器), 231.
Uigurs 见 Oigurs 维吾尔族.
Uman Sheikh 奥马尔·赛赫, 36.
Urumtsi 乌鲁木齐, 10, 130, 133, 134, 236. siege of 围攻, 238—239.
Usbeg 乌兹别克, 14.
Usha Tal 乌沙塔拉<录>, 265.
“Ushr” tax 乌什尔(税), 62, 160.
Ush Turfan 乌什, 7, 45, 46, 47, 130, 183, 273.
 rising at 反叛, 51.
Vagrants, Laws against 惩治流浪者法, 150.
Value of land in Kashgar 喀什噶尔地价, 160—161.
Vernoe 威尔尼, 8, 130, 174, 176, 182. (即阿拉木图)
Viceroy of Ili 伊犁将军, 55, 等页.
Viceroy of Kansuh 陕甘总督, 237—238.
Wakhan 瓦汉, 8, 64.
Wali Khan 倭里汗, 71, 72, 214.
 character of 性格, 72—73.
Wangs 回王(回郡王), 56, 63, 页等.
Wanleh 万历, 41.
Wealth of Kashgar merchants 喀什噶尔商人财富, 165.
Western Turkestan 西土耳其斯坦, 14, 15, 等页.
Yahya 亚赫亚, 38.
Yakoob Beg 阿古柏伯克
 birth of 出生, 76; early career 早年经历, 78—91; character of 性格, 88,

91; charges against 被指控, 89; sets out against Kashgar 出发攻打喀什噶尔, 91; expedition against Kashgar 远征喀什噶尔, 103—118; fails to take Yarkand 未能攻取叶尔羌, 106; defeats Tungan army near Yangy Hissar 在英吉沙击败东干人, 109; marries Kho Dalay's daughter 娶何大人之女为妻, 112; attacks Yarkand again 再攻叶尔羌, 113—116; reverse at Yarkand 受挫于叶尔羌, 114; takes Yarkand 占领叶尔羌, 116; reasons for wars with Tungani 与东干作战的理由, 120; wars with Tungani 东干战争, 126—127, 127—130, 132—136; retrospect of his invasion of Kashgar 对他入侵喀什噶尔的回顾, 119; his army 他的军队, 134—135, 142—144; policy towards Tungani 对东干人政策, 135—136; internal policy 国内政策, 137—169; foreign policy 对外政策, 见第十、十一章; court of 宫廷, 138—139; police system of 警察体系, 146—152; principles of finance of 财政原则, 154—167; expenses of 费用, 157; revenue of 岁入, 167; reply to Russian threats 对俄国威胁的答复, 186, 191—192; reply to Khudayar Khan's overtures 对呼达雅尔汗建议的答复, 190; sends envoy to Tashkent 遣使至塔什干, 195; arrangement with Sultan 与苏丹协议, 196; his opinion of trade 他对贸易的意见, 198; out-manceuvres Russia 用谋略制胜俄国, 199—201; congratulates Czar on marriage of his daughter 祝贺沙皇嫁女, 205; prepares to defend himself against Russia 准备抗击俄国, 208; weakness of his foreign

- policy 外交政策弱点, 210—211; policy towards England 对英政策, 218—233; declaration of friendship towards England 表明对英友好, 231; prepares to defend himself against China 准备抗击中国, 244—246; comparison with China 与中国比较, 241—249; death of 死亡, 250—253; résumé of career 对他一生的回顾, 253—257, 等页.
- Yakoob Khan** 阿古柏·汗, 220; 见 **Yakoob Beg**
- Yakoob Khan, of Cabul** 阿古柏·汗 (喀布尔的), 221.
- Yangabad battle of**, 英阿瓦特〈圣〉之战, 67.
- Yangy Hissar** 英吉沙, 4, 24, 35, 36, 44, 105, 228. fort surrenders to **Yakoob Beg** 英吉沙堡垒向阿古柏投降, 106.
- Yangy Mussulmans** 英吉穆斯林 (新穆斯林), 112, 243, 等页.
- Yangy Shahr** 新城 (指叶尔羌或喀什噶尔之卫城), 34, 68, 等页. 洋萨尔〈录〉, <宣〉 (策达雅尔附近一小城), 269
- at **Yarkand**, gallant defence of 勇敢捍卫叶尔羌新城, 101.
- at **Kashgar** 喀什噶尔新城, 102, 107, 111—112.
- Yarkand** 叶尔羌, 3, 5, 44, 226. embassy to 出使, 22. river 河流, 5, 59. **Tungan** rising in 东干反叛, 99—102, 105—106.
- Yuldus** 裕勒都斯, 133; 同见 **Great Yuldus** 条.
- Yung Ching** 雍正, 43.
- Yunus** 云努斯, 34, 35, 40.
- Yusuf (son of Galdan)** 玉素普〈圣〉, 46.
- Yusuf (son of Sarimsak)** 玉素普〈圣〉, 64, 69.
- Yuzbashi Mahomed Zareef Khan** 尤孜巴希·穆罕默德·扎里夫·汗, 223.
- "**Zakat**" tax 扎尔提, 62, 160, 164—167
- Zilchak** 兹尔察克, 226.
- Zuelik** 祖艾里克, 79.
- Zuhuruddin** 作霍尔敦, 70—72.

